

渤海大学历史丛书

王凤杰 著

王永江与

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

WANG YONG JIANG YU

FENG TIAN SHENG ZAO QI

XIAN DAI HUA

YAN JIU



吉林大学出版社

WANG YONG JIANG YU

FENG TIA

XIAN DAI

YAN JIU



责任编辑 丛立新
封面设计 刘瑜

ISBN 978-7-5601-5635-4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978-7-5601-5635-4.

9 787560 156354 >

定价：22.00元

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

王凤杰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王凤杰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01-5635-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永江(1872~1927) -人物研究②现代化-研究-辽宁省-民国 IV. ①K825.3②K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060053号

书 名: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

作 者:王凤杰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丛立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5601-5635-4

封面设计:刘 瑜

吉林省吉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0年4月 第1版

2010年4月 第1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序 言

以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专门化为价值取向核心的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一个共同发展的历史进步过程，它不断改变着各民族、各国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发展面貌，因而争取民族现代化是几百年来各国人民的核心奋斗目标，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主线。所以，自 1990 年代初，随着我国新一轮的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近代史学界为配合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历史借鉴，掀起了一个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史（一部分学者称为近代化）的热潮。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以罗荣渠、章开沅、姜义华、金耀基（香港）、虞和平、许纪霖、马敏、周积明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不仅完成了对现代化理论的引进、中国现代化学科理论框架的建构，而且完成了对发达省区早期现代化史的实证研究，以及通过现代化理论对中国近代史体系和线索的调整。

但在这全国性研究热潮不断发展的同时，东北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史研究却一直呈现沉寂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人们对近代东北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认知错误：即东北地区的工业现代化是从 1953 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实施“一五计划”才有的，此前的工业化全部从属于日本和俄国的区域殖民化，因此东北地区没有民族的早期现代化，只有当代现代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东北地区的学者很少关注这个历史时段的东北社会变迁的研究，即使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这时段的东北社会发展问题，也只是单纯从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视角来思考和解构，因此造成了区域现代化史研究的整体滞后。实际上，现代化运动作为近代以来的一种席卷全球的世界潮流，在清末民初东北地区不仅曾出现过，并因其

收效显著，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

第一，东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兴起时间虽晚，但取得成就显著。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始于 1860 年代的洋务运动，而东北地区由于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开展早期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直到 20 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后才初步呈现，所以东北的现代化启动于 1906 年。其和平发展环境只有 25 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东北独立的区域现代化发展道路被腰斩，早期现代化运动就此中断。这个时间比全国的早期现代化中断时间早了 6 年。在短暂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先是清末东北三省地方官、后为民初奉系军阀政府全力组织以地方选举为重点的政治民主化建设和发展工业化、铁路交通建设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以及教育现代化的活动，地方政治局面有了明显改变，一大批在当时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铁路、公路、工厂、学校、报社建立起来了，东北社会面貌得到迅速改观，在一段时间内东北成为国内现代化指标实现程度较高地区。

第二，具有多重的开展现代化的动力和阻力，可供考察的线索较多，尤其是其抵抗殖民化、维护民族化的特征突出。东北地区历史上人口稀少，长期处于封禁状态开发较晚，在现代化运动兴起前，大部尚属未开发的蛮荒状态；与此同时，由于东北三省在日俄战后已经成为被日俄两强分割的半殖民化势力范围，日俄两国同时分别在南满、中东铁路附属地内进行着殖民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殖民地的现代化正在蚕食着东北三省的主权和民族生存空间。经济的落后和日俄的殖民化是东北地方当局组织现代化运动的阻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当时三省启动现代化的动力。三省地方当局深知，没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难以维护民族的政治独立；同样，没有巩固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维护，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没有自己的现代化，东北就将全部被殖民化。因此，三省地方政府在整个早期近代化运动期间，一直以“移民实边”，开发边疆资源，推进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全力抵制

外来殖民化为中心。东北的早期现代化所以带有浓重的反殖民化、维护民族化的典型特征。

第三，涌现了许多为区域现代化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人物。在东北的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因清末北洋军阀、民初奉系军阀对地方控制严密，战乱相对少于关内各省，以赵尔巽、张作霖父子为代表的三省地方官可以专注于现代化运动的社会动员和物质建设，形成地方官府、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三个层面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现代化的社会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卓越的政治领导型精英和社会精英，地方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推进清末政治民主化的朱家宝、锡良、周树模，组织工业和农业及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张作相、王永江、孟宪彝，推动边疆建设的吴俊升、万福麟；贡献突出的社会精英人物有：自发组织三省城市化建设的吉林松毓、沈阳孙百斛，发展民族工业的营口潘达球和李恒春、长春的王荆山和毕维垣、哈尔滨的张廷阁，发展民族航运业的代表大连张本政，建立多种民族报业的顾次英等等。研究这些现代化的精英人物可以整合和深入东北地方史的研究，进一步总结本区的历史发展模式和历史经验，为开展全国性质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宏观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区域性参考资料。尤其是对那些政治人物的研究更为重要，他们大都为地方军阀，以往从政治立场角度对其评价较低，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和评价将会更科学、公正、公允。

王凤杰同志勤于思考，肯下功夫。她读硕士时，专业方向是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但在 2005 秋考入我们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后，她对近代东北地区的城市史和教育史产生兴趣。随着专业学习的不断深入，她对清末民初东北社会整体变迁问题的兴趣逐渐浓厚，初步形成了以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区域变迁的思路。但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研究问题，她亦颇费踌躇。几经反复，决定从研究地方政治精英的角度考察民国时期奉天省区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最终确定论文题目为《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1916—1926）》。通读全书，我

认为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独到之处，值得肯定：（一）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向学术界提供原始性、真实性的数据和资料是本书一大特色。为了保证查找到新资料，王凤杰同志经年累月奔波在辽宁省的沈阳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辽阳市档案馆、大连图书馆和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报刊和地方志等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从而再现 1916—1926 年间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原貌。

（二）关注地方政府和精英在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鉴于以往研究者大都从工业、农业、交通或教育等某个领域早期现代化着眼，而忽视地方政府和精英在其中的作用，作者在研究中运用财政学、行政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拓宽研究视角，对王永江和奉天省政府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效果作了梳理，并尝试运用“存储理论”分析奉系军阀统治的兴衰，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三）吸收社会史研究内容。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作者通过这一时期警政建设、保甲制演变和区村制的推行，重构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机制及其运行状态，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

王凤杰平时勤奋刻苦，笃志好学，自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在学术上进步较快，尤其在东北区域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我为她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欣慰，也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

曲晓范

2010 年 4 月 8 日于东北师范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一、课题研究的缘起	2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3
三、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14
四、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14
第一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财税金融早期现代化	17
第一节 王永江财税金融改革背景	17
一、清末财税金融状况	17
二、民国初期王树翰财政金融改革	19
第二节 整顿财税	23
一、规范税务征收管理	24
二、整理旧税	31
三、创办奉天税务讲习所	36
四、节省财税行政支出	39
第三节 改革金融	44
一、取缔私帖	44
二、整顿奉票	52
三、重组东三省官银号	55

第二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农业早期现代化	67
第一节 地权关系进一步转变	68
一、土地丈放	69
二、移民垦殖	74
第二节 农业经营方式的资本主义化	79
一、农业生产专业化	80
二、农产品输出结构变化与商品经济繁荣	85
三、农业生产规模化	89
第三节 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的发展	94
一、农业科研机构的建设	94
二、农业教育的发展	98
第三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交通早期现代化	103
第一节 辟修公路	103
一、制定《修治道路考成规则》	104
二、确立督修道路原则	107
三、督修道路的措施	109
第二节 汽车运输业的勃兴	114
一、汽车运输公司的兴办	114
二、奉天市汽车厂的创办	119
三、汽车运输的管理	120
第三节 自筑奉海铁路	122
一、自筑奉海铁路的背景	122

二、自筑奉海铁路的过程	125
三、自筑奉海铁路的意义	129
第四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教育早期现代化.....	132
第一节 奉天省学制改革.....	132
一、学制改革的背景	133
二、学制改革的推行	135
三、学制改革的影响	144
第二节 筹建东北大学.....	149
一、东北大学成立背景	149
二、筹备东北大学	151
三、建设东北大学	153
第三节 发展民众教育.....	158
一、平民教育的发展	159
二、民众教育机构的兴起	162
三、民众教育发展的原因	165
第五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城市早期现代化.....	171
第一节 市政公所的建立.....	171
一、市政公所建立的原因	172
二、市政公所的主要活动	174
三、市政公所的运行机制	176
第二节 城市规划与实施.....	179
一、城市规划	180

二、城市规划的实施	182
第三节 城市经济建设.....	190
一、规范公司注册机制	190
二、鼓励工商业发展	192
三、创办奉天纺纱厂	196
第六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区村政权建设和警政早期现代化.....	202
第一节 区村行政组织建设.....	202
一、区村行政组织的缘起	203
二、区村制的推行	205
三、区村制度的早期近代化特征	209
第二节 改革警政.....	212
一、改革警政内务	214
二、维护警权与省城社会秩序	217
三、整顿保甲制度	219
结 论.....	225
参考文献.....	232
附 录	
附录一 王永江年表.....	249
附录二 王永江致张作霖辞职信.....	260
附录三 《县知事学》.....	264
附录四 《王公神道碑》志.....	278
后 记.....	281

表 目 录

表 1-1	1917 年奉天省财政支出状况	22
表 1-2	1917 年奉天省财政欠债状况	23
表 1-3	1917 年奉省各税捐管辖局域表	25
表 1-4	奉天省各征收局解款报册到省城里程和限期表	30
表 1-5	1916—1926 年奉天省统税收入一览表	34
表 1-6	奉天省财政厅管辖各税捐征收局改编经费预算一览表	40
表 1-7	1916 年与 1917 年奉天省部分税收项目比较表	44
表 1-8	1917 年奉天省部分县私帖流通数额	47
表 1-9	奉票发行额一览表	65
表 1-10	日本金票百元对奉票平均行市表	65
表 1-11	1922—1925 年辽阳县部分地区钱租上涨情况	66
表 2-1	1916—1924 年奉天省丈放随缺伍田的数额	72
表 2-2	民国初年奉天省官荒出放情况	72
表 2-3	奉天省职业教员养成所违规罚金数额表	100
表 3-1	奉天省部分县道路与水沟宽度汇总表	106
表 3-2	1922—1925 年奉天省部分桥梁修建统计表	112
表 3-3	满铁营业总收支与铁路收支对照表	124
表 3-4	奉海铁路认购 200 股以上单位一览表	127
表 4-1	奉天省教科书编审处编审图书名称	137
表 4-2	奉天省学制改革后留学生奖励金额	142
表 4-3	1923—1924 年奉天省留日毕业学生任用情况表	143
表 4-4	民国时期奉天省职业学校一览表	146

导 论

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缺乏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着推进早期现代化的主要责任。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奉天省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推进的，从而凸显了地方政府及其当政者的重要性。王永江^①是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大连金州人，字岷源，号铁龛，1872年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7岁时参加县试名列榜首。王永江曾经开过药铺，担任过开设于中国的日本学校的中文教员。1907年开始步入仕途，任辽阳警务学堂监督，办学成效显著，被东三省总督锡良誉为“奉省办警政第一人”。民国初年，他先后出任牛庄、海城、营口及省城税捐局局长等职。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后，先后任命其为督军署高等顾问、省城税捐局长兼土地清丈局和屯垦局局长、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长、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奉天省代省长、东北大学校长和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深得张作霖的敬重和信赖。王永江主张推行保境安民政策与张作霖军事扩张意向相左，1926年春辞职，1927年11月1日辞世，终年56岁。遗著有《读易偶得》、《铁龛诗草》、《医学辑要》、《六书选粹》等书籍。王永江在职期间所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社会发展计划推进了奉天省早期现代化进程。本文尝试利用档案和报刊资料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梳理王永江在财税、金融、农业、交通、教育、城市化及地方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政策措施，从而阐明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王永江及相关政府行政部门在比较自觉的状态下推进了奉天省早期

^① 参见附录1《王岷源先生年表》。

现代化的进程。

一、课题研究的缘起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直接介入现代化进程，而且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而政府能否成功地推进早期现代化进程，往往与政府行政官员个人的地位、见识、能力及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地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考察是研究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对王永江任职期间在奉天省所推行的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的研究，有助于从个人和政府运作的角度探求区域早期现代化，从而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阈。

关于奉系军阀统治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学术界大多予以正面肯定，但在解释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时，往往归结于列强侵略的放松及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间实业建设热潮。很多学者依然将地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定性为“落后和封建性占主导”，忽视了其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历史逻辑。本选题将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结合一起，期望通过定位王永江及相关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全面认识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本选题具有较高的现实关照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①，“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研究历史制度与政策变迁能够为现实服务。但人在制度变迁中到底有多大可以作为的空间，不能够用硬性的指标去量化，只能通过历史

^① 路径依赖性是指社会、制度等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

研究成果来呈现，从而为新制度的制定提供借鉴。笔者试图通过对所掌握大量史料的梳理，综合考察王永江和奉天省财政厅、省政府等行政机构在 1916—1926 年间推进奉天省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概貌乃至全貌，为制定正确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进一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现代化研究在国际国内学术研究领域方兴未艾，其中落后国家早期现代化的问题更为引人关注。近年来国际、国内有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由此也给本论文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研究资料与方法。

（一）国内研究现状

1. 现代化研究状况。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发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汇集了当时知识界各方知名人士所写的专题论文共 26 篇，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研究之肇端。陶孟和、樊仲云等人在特辑中探讨了有关现代化的各种问题。其它刊物如《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建设季刊》和《中国实业》等也刊发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这一时期的论著涉及了现代化概念、中国现代化阻碍因素及应对措施、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现代化的策略等问题。但这一时期的很多研究只是就事论事，缺乏理论的系统建构。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一度中断。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发展，现代化研究作为学术性课题开始出现，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批论著也先后问世。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① 首次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破了传统和西方现代化研究成果的窠臼。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②（3 卷本）将中国现代化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历程分为“前提与准备”、“启动与抉择”和“改道与腾飞”三期，阐释了中国的现代化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从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① 着重从政治发展与变革、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中外关系格局和外交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探讨，并与西欧和日本早期现代化作比较研究，在寻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普遍性与个特殊性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与历史经验。另外，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续编》^② 许纪霖、陈达凯的《中国现代化史》^③、胡福明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④ 和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⑤ 等论著也从更广阔、更客观的角度理解现代化，现代化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而成为“显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相关著述也发展起来，如吴承明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⑥ 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⑦ 杜恂诚的《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⑧ 丁日初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⑨ 和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⑩ 等丰富了现代化理论。

2. 东北早期现代化研究状况。东北早期现代化研究在这一时期也

^①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版。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③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年版。

^④ 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1994 年版。

^⑤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⑥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 年版。

^⑦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1993 年版。

^⑧ 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

^⑨ 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⑩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7 年版。

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东北工业化的进程，孔经纬认为清末随着东北地区的弛禁开放和大规模开发，开始了工业早期现代化。^① 衣保中、林莎进一步指出民国时期工业早期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农产品加工业的高速发展。^② 葛玉红也认为东北工业早期现代化开始于清末，并进一步指出东北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派在东北所办的近代企业。^③ 但是储成仿却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工业化起始于 1953 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其理由是虽然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的机器大工业，但这种工业的发展缺乏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驱动力。应该从器物、制度和文明三个层面上综合把握工业化概念。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从“一五”计划时期。^④ 东北工业化的进程是伴随着外资的入侵艰难前进的，一些研究者初步考察了东北工业化进程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殷剑平认为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了武力、政治、外交和资本的全面进攻，一方面加速了中国东北北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打断了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⑤ 何又春提出日俄战争后，日本以满铁为核心不断加强对东北的资本输出，其经济侵略渗透到铁路、农业、工矿、金融、商贸等各个方面。^⑥ 关于东北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马尚斌认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民族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局面，除了全国大环境的影响及民族企业经营者注重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外，奉系军阀统治当局积极倡导实业、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等一系列政

①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② 衣保中，林莎：《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东北亚论坛》，2001 年第 4 期。

③ 储成仿：《中国工业化起点探析——“一五”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 年第 6 期。

④ 储成仿：《中国工业化起点探析——“一五”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 年第 6 期。

⑤ 殷剑平：《沙俄对中国东北的资本输出》，《西伯利亚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⑥ 何又春：《奉张统治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经济的侵略》，《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策也是东北民族工业发展的不可忽略因素。^①还有学者揭示了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随着工商业发展繁荣，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结构、功能和空间分布亦发生变化。^②

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研究成果首推衣保中的《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研究》^③，他提出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为土地开发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农垦企业的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东北商品粮基地的形成、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商品化和企业化、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推广等。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对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进行了系统、精辟地分析。吴祖鲲、富萍总结了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④ 范立君运用“推拉”理论系统阐述了关内移民促进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历程。^⑤ 周春英认为由于大规模关内移民的适时到来才为东北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加速了东北土地的开垦与农业发展，使东北区域市场经济由此变为全国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一环。^⑥ 王国臣认为大量的国内移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东北近代农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中国内地的人口压力。另外，大量移民人口的增加促进了近代东北地区贸易、工业和城市等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近代东北经济的发展。^⑦ 而王杉指出随着关内移民的流入，广大移民无地化和离土现象严重，大量荒地仍然得不到开垦。移民生活的贫困及其自身素质的低下，造成东北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东北农业

① 马尚斌：《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吴晓松：《近代东北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律设》，《城市规划汇刊》，1995年第4期。

③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吴祖鲲，富萍：《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长白学刊》，1998年第3期。

⑤ 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 周春英：《近代东北三省关内移民动态的分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

⑦ 王国臣：《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

早期现代化的进程。^① 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促进了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王国臣提出近代东北具备了大豆的生产及进行大豆三品贸易的条件，“三品”贸易是维系东北对外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同时，东北近代大豆三品贸易在全国对外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逐渐成为输出量最大的商品。^② 毛英萍提出民国时期东北的各级军阀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农业经济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东北农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③

关于东北城市早期现代化，曲晓范教授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兴起和演变进行研究，总结出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早期现代化动力是“外力”和“内力”的双重合力，通过启动社会各阶层民众参与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形成官与民之间、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以此加快社会转型的速度。^④ 吴晓松从近代东北工商业发展、交通拓展及移民垦殖等方面探讨了东北近代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结构由单核向多核发展，城市内出现各自相对独立的功能区，东北城市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时期。^⑤ 何一民、易善连认为东北地区的城市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对于东北三省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从中国城市最落后的地区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给予充分肯定。^⑥ 谭玉秀、范立君从市场发育等角度分析了东北崛起为中国城市化最高水平的原因。^⑦ 陈亮等人认为工业化是支撑东北地区城市早期现代化至关重要的动力因素，近

① 王彬：《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② 王国臣：《近代东北地区大豆三品贸易研究》，《农业经济》，2006年第9期。

③ 毛英萍：《略论民国时期东北的农业经济政策》，《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④ 曲晓范：《近代的历史变迁东北城市》，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吴晓松：《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 何一民，易善连：《近代东北区域城市发展述论》，《史学集刊》，2002年第7期。

⑦ 谭玉秀，范立君：《从市场发育等角度对近代东北城市化的分析——以奉天东部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

代东北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① 王杉认为近代东北独特的社会环境对城市的兴起有巨大影响，从而形成近代东北城市的特点。^② 《沈阳城市史》^③、《鞍山城市史》^④ 和《本溪城市史》^⑤ 等也对分别对城市建设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关于东北交通早期现代化。东北铁路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显著，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金士宣和徐文述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李占财的《中国铁路史》等都是铁路史的专著，记录了旧中国铁路从无到有的曲折发展全过程，对东北地区铁路作为全国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叙述。王奉瑞的《东北交通》也是了解东北地区铁路史的一本专著，这些著作表明了铁路研究的专业性在不断加深。吉林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组编写的《满铁史资料》（路权篇）、凌鸿勋的《中国铁路志》等都为研究铁路问题提供了详实的史料。更多学者注重研究东北自建铁路问题，认为东北地方政府坚持自主筹资、自主设计、自主管理的铁路政策以及铁路修成后实行铁路联运、减免货运、客运价格等运输政策，不仅推动了东北边疆的经济开发与社会稳定，而且具有维护国家利权和收回利权的重要作用。^⑥ 张伟研究了东北政府通过裁汰冗员、整顿金融货币、提高金融信誉、为商民集资建路、创办民营银行、提倡个人储蓄、实行联省自治、财政自主、夺取京奉铁路和东三省关税、盐税等方式解决财政难题，从而兴办自主筑路的事业。^⑦ 马尚斌

^① 陈亮：《近代东北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的过程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7期。

^③ 张志强：《沈阳城市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刘景玉，智喜君主编：《鞍山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⑤ 沈玉成主编：《本溪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王贵忠：《20年代中国东北自建铁路的管理方针与政策》，《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⑦ 张伟：《东北自建铁路面临的难题与财政难题的破解》，《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着重探究东北自建铁路网计划的演变及其特点，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东北地方政府自主建路与边疆治理的关系。^① 王海晨则论述了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自办铁路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投资权和垄断运输的局面，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东北边疆的经济发展。^② 陶俐考察了奉海铁路建立经营状况，^③ 郑言则认为打通铁路修建工程是奉系军阀自建铁路的发展过程，也体现了其间中日交涉时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重要变化过程。^④ 相对说来，关于东北公路建设和汽车公司研究相对薄弱，比较有价值的为《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阐述了民国时期道路建设、汽车运输业的状况。

关于东北教育早期现代化，齐红深对东北的教育情况进行纵向梳理，认为东北地区的教育是逐步向前发展的；^⑤ 郭建平则对奉系统治时期的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⑥ 杨佩桢^⑦、王振乾^⑧对东北大学的筹办、规模、院系设置及教学模式等做了系统研究，尤其对张学良主政时期进行了重点探究。古小丹认为东北大学建校初期开始实行预科制度、规模、学校常年经费、教学设备等在当时国内数一流，提出至 1920 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⑨ 王志彦认为东北大学办学宗旨是从东北地方实际出发制定的，并且为了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及抵御外侮、抗击侵略而不断调整院系的设置，尤其东北大学结合专业的设置，实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

① 马尚斌：《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

② 王海晨：《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自办铁路的意义》，《辽宁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③ 郑言：《打通铁路建设与中日交涉》，《日本研究》，1992 年第 2 期。

④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编：《辽宁公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

⑤ 齐红深主编：《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⑥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

⑦ 杨佩桢等编著：《东北大学八十年》，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⑧ 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⑨ 古小丹：《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兰台世界》，2002 年第 6 期。

有益借鉴。^①但是更多学者探究张学良与东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如陈崇桥车维汉《张学良将军与教育》、^②马文良的《东北大学与张学良将军》、^③申桂兰的《张学良与东北大学》和^④董伟等的《张学良与东北大学》。^⑤郭建平则具体阐述了奉系采取的扩大职业教育方式，如加强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兴办职业学校等。^⑥

3. 关于王永江的研究状况

国内目前尚没有关于王永江的专门研究著作，但在东北史研究的著作如《奉系人物》、^⑦《东北教育家评传》^⑧等都有介绍。相对来说，期刊文章较多。很多学者对王永江进行了总体评述。贞石介绍了王永江在辽阳警务所长、奉天省官地清丈局长及屯垦局长、奉天省警务处长、财政局长、代理省长等职时所采取的治理措施。^⑨高乐才认为王永江是奉系军阀集团中决策人物，他主张开发东北、保境安民，代表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奉系军阀中较有远见的杰出人物。^⑩杨小红认为王永江毕生致力于东北的经济、文化建设且卓有成效，实乃一位具有民族自觉意识的杰出政治家。^⑪郭建平则对王永江任代省长期间的功绩从改革吏治、兴办教育、扶持民族工业和发展公用事业、促进农业生

^① 王志彦：《1923—1931年间东北大学的院系设置及教学模式》，《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② 陈崇桥，车维汉：《张学良将军与教育》，《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③ 马文良：《东北大学与张学良将军》，《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④ 申桂兰：《张学良与东北大学》，《（党史纵横）》，1999年第4期。

^⑤ 董伟等：《张学良与东北大学》，《民国春秋》，1996年第1期。

^⑥ 郭建平：《奉系军阀时期奉天的职业教育》，《兰台世界》，2002年第11期。

^⑦ 胡玉海：《奉系人物》，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⑧ 齐红深，魏正书主编：《东北教育家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⑨ 贞石：《王永江事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⑩ 高乐才：《王永江评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⑪ 杨小红：《历史档案中的王永江》，《兰台世界》，1993年第9期。

产、发展交通事业及整顿社会治安等方面做了系统的归纳总结。^① 还有学者对王永江的治奉思想进行了探索，鲁岩提出王永江在任期间在治安、理财、振兴实业、屯垦、教育交通等诸方面颇有建树。^② 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王永江基于内心深处的霸王思想，对直奉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从主战到反战的转变过程。^③ 窦应泰则通过论述王永江从被张作霖侮慢到重用，再到政见不和而辞职过程，分析了王永江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思想。^④ 还有学者专门对王永江创办东北大学进行论述。赵守仁认为王永江创办东北大学，改变了奉天及东北文化教育落后的状态，适应东北军事、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⑤ 耿丽华提出王永江锐意创办东北大学，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⑥ 继英则对王永江修建奉海铁路的目的、筹款方式及奉海铁路公司章程做了分析。^⑦ 《王永江纪念文集》^⑧ 是对关于王永江的研究成果的汇编。文集收录了 1993 年以前关于王永江论文 15 篇，王永江书信、诗词等 6 篇以及王永江去世后的祭文和挽诗等 5 篇。其中涉及王永江与张作霖关系、与日本关系及其理财思想，但是回忆性文章居多数。

总之，关于现代化理论和东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其间虽不乏高质量的成果问世，但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近代东北史学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在已有的关于王永江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还停留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上，王永江和奉天省地方政府与东北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做专门探讨尚属罕见。因而，探讨王永江、奉天省地方政府与

① 郭建平：《王永江代省长治理奉天》，《兰台世界》，1993 年第 1 期。

② 鲁岩：《论王永江的治奉思想》，《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③ 葛洪源，吕健：《论王永江的霸王思想》，《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④ 窦应泰：《王永江与张作霖的恩怨离合》，《民国春秋》，1998 年第 5 期。

⑤ 赵守仁：《王永江与东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 年第 3 期。

⑥ 耿丽华：《王永江与东北大学》，《教师博览》，1997 年第 4 期。

⑦ 窦应泰：《王永江与奉海铁路》，《中国地名》，2004 年第 6 期。

⑧ 政协大连市金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王永江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1993 年版。

东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深化近代东北问题的研究。

（二）国外研究概况

从 1950 年代开始，现代化理论在国际上初步形成，很多学者将其运用到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来。1960 年代费正清^①先生运用“冲击—反应”的现代化理论模式阐释主编中国晚清史。随后，莫尔德在《中国、日本与现代世界经济，对东亚发展的一种新解释》一书中提出了“依附论”，把早期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失败归咎于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而依附于世界经济体系。凯思·葛里芬在《不发达的根源：对中国历程的反思》中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不发达是内部和外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组合状况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罗兹·墨菲的《条约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认为外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很小，中国内部因素的影响甚大，现应以中国社会为中心，注意研究中国内部的各种因素。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② 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因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应从中国内部来寻找。建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模式，应由中西文化冲突论转向到中国历史根源论。^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④ 是当前海外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权威性著述，该书编写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他们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分成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又分为“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增长”、“社会一体化”、“知识和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在论述中与日本、

^①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年版。

^② [美]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 年版。

^③ 胡大泽编著：《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30 ~132 页。

^④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俄国现代化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比较的同时，对中国现代化进展情况和模式进行评价。该书认为现代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国内转变，提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应从中国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上述论著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对这一历史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发展与存在问题作出了一些富有思考性的解释，这对今后的研究颇有启迪意义。

关于东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加文·麦柯马克在《张作霖在东北》^①一书中，围绕着张作霖的一生，对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东北的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进行了自成体系的论述。薛龙所著的《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地方政府：传统、近代化与东北地区》系统探讨了1916—1928年间奉天省政府如何不断采取措施克服种种危机，努力进行经济改革和早期现代化建设，揭示了奉天军阀和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中国东北问题成果最多的是日本，如《满洲现代史》、《满蒙全书》、《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东北军阀政权研究 张作霖·张学良之抗外与协助统一国内的轨迹》^②、《满洲开发四十年》、《北满开拓地农业经营论》、《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满洲经济十年史》和《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等等。专门论述王永江的著作至今只有日本人田岛富穗撰写的《王永江》，论著从张作霖与近代东北的变迁入手，阐释了王永江在军警的抗争、奉天省的财政和收回关东州运动的行为思想，将其定位为“大东亚建设的先觉者”。

总之，国内外的学者对本课题相关问题所做过的有益探索，为本文写作提供可贵的资鉴。而关于王永江和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缺憾，本文尝试在这些方面取得一定突破。

^① [英]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日] 水野明著，郑梁生译：《东北军阀政权研究 张作霖·张学良之抗外与协助统一国内的轨迹》，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

三、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

(一) 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通常把东北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对奉天省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通过本课题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对东北三省之间做出宏观、微观的比较研究，深化东北史的研究。而专门对王永江的研究的著作，国内至今尚付阙如。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项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课题注重运用现代化的理论进行分析，力图探求奉天省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本选题具有较高的现实关照意义。“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研究历史变迁能够为现实服务。笔者试图通过对所掌握大量史料的梳理，综合考察 1916—1926 年间王永江和奉天省财政厅、省政府等行政机构推进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策略措施，为东北地区制定正确社会经济政策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三) 资料的运用。为使本课题研究更加缜密，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靠，笔者尽力挖掘与本文相关的辽宁省档案馆档案、辽宁省图书馆珍贵资料和民国时期发行的《奉天公报》、《东方杂志》、《盛京时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和《晨报》等报刊中的资料，多为前人所未用，因而在资料运用方面颇有创新。

四、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研究方法

1. 历史学方法

本文发挥了历史学方法的优势，注重对历史材料真实性的分析和历史过程的具体描述，使得奉天省现代化研究具有高度的经验性和实证性，力争达到“意志服从于事实，判断服从于材料，价值取向服从于历史根据”。同时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力图做到史料真实可靠，观点正确，结论贴近实际。并尝试运用历史学方法的“动态性”研究，探求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2. 量化研究的方法

数量史学是经济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为了增强本课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文中引用了大量数据，编制了许多表格，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等问题进行量化研究。其中有利用文献中的量化数据，也有根据各种资料编制的量化数据。尤其在专题研究和分析中，更注重量化的描述与研究。

3.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研究最大的弱项是资料的缺乏。尽管笔者收集到不少资料，在研究中依然能够遇到“无米之炊”的窘境，因此只能在相关理论指导下作宏观把握。同时，充分利用一些典型事例，尽可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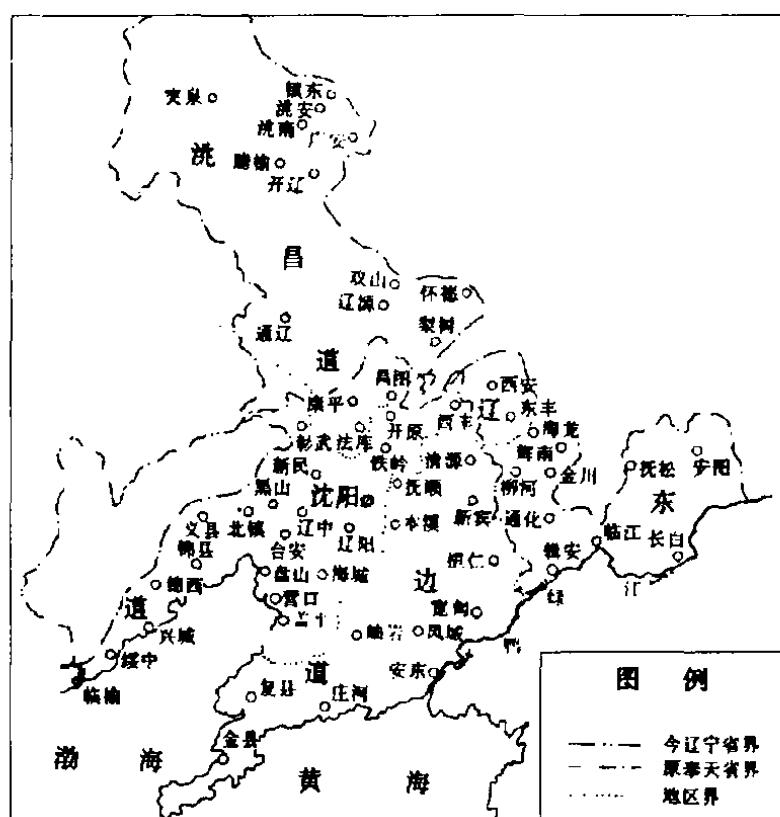
1. 早期现代化

文中早期现代化是指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现代化进程。由于现代化理论涉及的范围十分宽泛，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形形色色，因此关于现代化的涵义至今众说纷纭。笔者认同我国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教授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即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对落后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利用国内外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现代化的各个方面既有互相独立的性质，又有彼此联结的功能，每一个方面可以暂时领先或滞后变革，其最后的成果不是带动其他方面的变革，就是被其他方面的变革所促成。^①

^①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2. 奉天省

民国时期奉天省地域范围大于今天辽宁省的地域空间，包括了当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一部和内蒙古一小部分。如图所示，当时的突泉县今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通化县、临江县、辑安县（今集安县）、长白县、安图县、海龙县（今梅河口市）、辉南县、柳河县、抚松县、洮南县、辽源县和双山县（今双辽市）、开通县（通榆县）、洮安县（今白城市）、梨树县、安广县（今大安市一部分）、怀德县（今公主岭市）、镇东县（今镇赉县一部分）等今隶属于吉林省。



民国时期奉天省行政区划图

资料来源：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编：《辽宁公路交通史》（上册），人民交通出版社，第 100 页。

第一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 财税金融早期现代化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连遭战乱兵燹，财政资源整体处于严重匮乏状态，“几成沉疴不治之症。”^① 1917年5月，王永江担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对财税金融进行整顿改革。他制定了一系列强化税务机构和税务人员管理的法规，修订不合理的税章税则，引导财税管理走向制度化，从而赋予了财税变革早期现代化的内涵。同时，他还通过取缔私帖、整顿奉票和重组东三省官银号等措施，统一币制和货币发行权，规范金融机构的管理，加速了奉天省金融货币体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第一节 王永江财税金融改革背景

经济对财税金融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经济建设也依赖于财税与金融的良性运转。因此，通过财税金融改革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境和边疆危机成为清政府在东北推行新政的重要动因之一。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等人先后在东北地区主持并推行财政改革，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和奉天省地方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依然没有改变财政金融的困境。奉天省的财税金融改革在探索中踟蹰前行。

一、清末财税金融状况

清中前期东北实行军府统治，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奉天地区的财政主要来源于中央拨款和盛京将军府的税收稽征。义和团运动以后，清

^① 《奉天纸币调查》，《盛京时报》1916年5月20日第4版。

政府自顾不暇，只能令各省筹措款项接济，奉天财政入不敷出。日俄战争期间，奉天全省处于战区，省城工商业萧条，稽征极为困难。地方各县的财政状况更为艰难，如辽阳财政金融“困迫已达极点，若不设法救济，断难持久。”^①为转变奉天省财政困窘的状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取以下措施对奉天财政进行改革：第一，整合财政机构。1905年7月赵尔巽奏请将奉天原有的粮饷处、税捐总局、盛京户部金银库合为一处，成立了奉天财政总局，作为全省财政机关。随后部分撤销原有各县税捐总局，设立隶属于财政总局的统捐局，将其作为征收捐税的专门机构。到1907年，奉天省革除了原来财政机关重叠的弊端，形成了由财政总局、税捐局、统捐局所组成的相对完整的财政机构。^②第二，改革旧税制。清代东北田赋不分等则，土地无论肥瘠，每亩征额相同，与税法公平原则相背离。赵尔巽把耕地分上、中、下三等，上则每亩年纳捐1角5分，中则每亩年纳捐1角1分，下则每亩年纳捐6分6厘。^③显然，以土地的纯收益为征课标准更符合税负合理负担原则。再次，增加新税种。税收的首要目的是满足财政的需要，当政府财政陷入困境时，开征新税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从1905年7月到1906年6月，赵尔巽先后增设了烟酒税、房屋税、牛马税等多项交易税种，税收在该财政年度里的增长超过历年或一两倍甚至三四倍。全省共完成市场秤税银91万两、厘捐银32万两、东边银25万两、木植税4万两、辽河船税4万两、粮捐银7万两、营口船税13万两、烟酒税40万、地亩税31万两、盐厘119万两，“共计收银382.5万两，较往年多200万两。”^④

1907年4月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他认为“欲治三省，必先于整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第157号。

② 高月：《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马尚斌：《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④ 《大公报》1906年11月25日。

顿财政入手；欲整顿财政，必先以开拓银行入手。”^① 徐世昌首先将奉天官银号^②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使其成为三省之中央金库”；^③ 随后在奉天省城设立大清银行。在举办新政过程中，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公共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徐世昌虽然力求减省，但依然无法承担开办新政所需要的巨额开支。1908年“奉省入款共530余万两，出款共780余万两”，^④ 徐世昌在上军机大臣的条陈中指出了财政问题的严重性：“世昌待罪三边，忽忽一载，其间筹办要政，或以财力不及而姑植其基，或以事机甚迫而勉筹以应”，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支持，那么新政“将隳已竟之绪，而成中辍之忧”。^⑤ 1909年4月锡良任东三省总督。他采取了节约经费、裁汰冗员等措施，但财政依然入不敷出，年欠款360余万两。1911年6月，赵尔巽任清朝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时，省库所剩无几。

二、民国初期王树翰财政金融改革

民国初建，由于省库空虚，地方银行开始不计后果地加发纸币。东三省纸币发行数目3,460万元。^⑥ 国家财政专员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东北三省财政“受病根源全在滥发纸币，奉天小银元票将近千万元……虽可兑现，而准备不及十成之一，外人辗转盘剥，岌岌可危。银钱比价一日三易，有朝为富户，夕成穷民者，外国银行乘机操纵。”^⑦ 东三省官银行号因垫支政费，滥发钞票，已经造成金融恐慌。1916年国内外

① 徐世昌：《密陈拟借洋款筹办实业折》，《退耕堂政书》卷9，第473页。

② 奉天官银号由赵尔巽1905年创办。

③ 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卷5，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426页。

④ 徐世昌：《上监国摄政王条议》，《退耕堂政书》卷34，第1788—1789页。

⑤ 徐世昌：《致军机大臣》，《退耕堂政书》卷39，第2037页。

⑥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96页。

⑦ 《调查员整顿东三省财政之条议》，《申报》，1914年1月10日。

局势动荡不安，奉票不断贬值。到 1917 年“小洋票”的发行总量已达 1,530 万元以上。^①

1916 年 4 月王树翰担任省财政厅长。为维持小洋票正常运转，他采取了以下措施^②：

向日商借款。根据财政学理论，借助外债是发展经济的良好途径。但近代中国自有外债以来，一直陷于借债还债的恶性循环圈中，财政上的负担日益沉重艰难。王树翰借款没有摆脱这一窠臼。1916 年 6 月 9 日，由王树翰出面与日本朝鲜银行奉天支行签署了 100 万元日金的借款契约。契约中言明“本借款专为用作在奉各民国银行资金，决不为其他目的所使用，年利 6.5 厘。以奉天电灯公司全部财产、奉天电话局全部财产、商埠地及其区内所修道路和其他建筑物为担保品，借期 2 年。”^③ 如果到期未能付清本利，则上述担保各项全部归日本管理。此次借款没能阻止奉票挤兑之风。不久，王树翰再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 200 万日元，^④ 答应以奉天全部契税、酒税为担保。^⑤ 王树翰先后共借日币 300 万元，充实了奉天银行号储备金。但每日兑出奉小洋数十万元，300 万元很快又被挤兑一空。由于每次借款日本都附加许多苛刻条件，借款不仅没能从根本上解救危机，反而让日本得以进一步控制奉天省金融市场。

建立银行公会。为了抵制挤兑风潮，1916 年 5 月 12 日，东三省官银号、殖边银行、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黑龙江官银号、驻奉天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行号组织银行公会，设立“兑换所一处，每日公兑 4

① 《奉天旧银行、银号的货币史》，满洲中央银行，第 13~20 页。

② 参见魏福祥：《张作霖统治初期对奉票的改革与整顿》，《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③ 辽宁省档案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76 页。

④ 当时 1 日元约等奉小洋 1.21 元。

⑤ 辽宁省档案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43 页。

万元，由各银行分担，百元以下自行兑换。”^①参加银行公会的各家行号申明互相间不许收票挤兑。但日本商人“以条件内载有不满百元之款仍赴各银行号兑换等语，持 99 元赴各银行号兑现者每日不下数百人，统计兑出总额约 20 余万元”^②。王树翰只好继续与日本人磋商，把公共兑换所作为唯一兑换机关，每日兑换额限定为小洋 6 万元，限期两月。在限兑期满之日，数万日本人聚集到公共兑换所门前要求无限制兑换，直到奉天当局允诺兑换现小洋 85 万元才肯离去。随后，奉天当局与日方磋商，将出兑奉小洋改兑大洋及日本正金钞票，每日兑换额改为 8 万元，限期 4 个月。期满后，由于现洋短缺又展延半年。可见，银行公会的成立，虽在限兑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过是一种防卫的应急措施，奉票被挤兑之势仍未获根本解决。^③

镇压不法钱商。小洋票跌落之势日益严重，当局归因于不法钱商所致，对不法钱商“采用非常手段进行镇压”。^④奉天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歧、瑞昌恒执事黄献廷、蓬莱洋行执事齐瑞、管库人解中道等 5 人，先后逮捕关押。最后以其贩运现洋、惑乱金融为名，于 11 月 10 日一并枪决示众。^⑤这些措施虽然令那些专门依靠倒卖现洋赢利的钱商一时有所收敛，但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小洋票跌落。^⑥

为解决财政困难，王树翰还推行财政兴革计划，如募集五年期公债、整顿印花税和田赋、裁减各机关经费、清查各县商铺纸币、整顿烧酒业、

① 《银行周报》第四卷第四号，民国九年（1920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行。

② 王瑞之：《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金融概略》，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编：《辽宁文史精萃》第 1 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③ 魏福祥：《张作霖统治初期对奉票的改革与整顿》，《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④ 王鸿宾：《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94 页。

⑤ 荆有岩：《东三省官银号》，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58 页。

⑥ 魏福祥：《张作霖统治初期对奉票的改革与整顿》，《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整顿官员、整顿纸烟出厂税和整顿木税等,^① 但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探寻其原因，一是奉天省财税金融沉疴由来已久，短期内不能得到解决；二是王树翰理财“法老庄之自然无为，以藏富于民”。^② 与此同时，地方军政费用不断增加，省财政每年都有数百万亏空，必须举债方能勉强维持。一年之后王树翰辞职，“省长以颜面计未允，翌日再请，”^③ 张作霖应允。此时的奉天省财政已处于“不可收拾之境，每年收入计 1,400 余万元，而四年度预算应有盈余 300 余万元”。^④ 但实际支出款项共大洋 10,590,000 元。而如表 1-1 所示，奉天省预算收入项下税捐大洋 4,775,000 余元，田赋大洋 368,100 余元，杂项收人大洋 2,432,000 余元，收入项共 10,890,000 余元。^⑤ 实际决算结果不但“毫无盈余，且亏短 500 余万元”。^⑥

表 1-1 1917 年奉天省财政支出状况（单位：大洋）

支出项目	支出数额（元）	支出项目	支出数额（元）
军务费	6,429,000	外交费	90,000
内务费	1,547,000	教育费	506,000
财政费	1221,000	司法费	697,000
农商费	97,000	总计	10,590,000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 页。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42—647 页。

② 金毓黻：《王永江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25 页。

③ 《财政厅长王树翰辞职》，《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④ 《奉天财政现状》，《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25 日第 4 版。

⑤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 页。

⑥ 《奉天财政现状》，《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25 日第 4 版。

同时，省财政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如表 1-2 所示，到 1917 年 5 月，已欠内外债额达大洋 11,950,000 元。

表 1-2 1917 年奉天省财政欠债状况

单位	数额（元）	单位	数额（元）
中国银行	500,000 (奉大洋)	格林生公司	800,000 (奉大洋)
兴业银行	306,000 (奉大洋)	大仓组	15,000,000 元 (日金)
烟酒公卖局	128,000 (奉大洋)	朝鲜银行	30,000,000 元 (日金)
江省官银号	25,000 (奉大洋)	国库证券	803,000 (奉大洋)
殖边银行	83,000 (奉大洋)	奉天银行团	125,000 (奉大洋)
呼兰糖厂	282,000 (奉大洋)	东三省官银号	4510,000 (奉大洋)
折合总计	11,950,000 (奉大洋)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7 页。

财政收入亏空与内外债相互交迫，“一旦债权相迫，筹措不及，破产之患恐将难免”。增加财税收人和平息金融危机成为王永江改革财政的当务之急。

第二节 整顿财税

王树翰财政金融改革失败后，王永江成为张作霖财政主管的最佳人选。1917 年 5 月，王永江任奉天省财政厅长兼烟酒公卖局局长；第二年 4 月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在张作霖支持下采取依法治税的原则，“确定计划，极力整顿”。^① 1917 年 9 月，提出了《奉天省财政兴革意见书》，从规范税务征收管理、整理旧税和缩减开支等方面入手进行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42—647 页。

财税制度改革。《奉天省财政兴革意见书》体现了王永江财税变革思想，可视为其推行财税变革的纲领性文件。

一、规范税务征收管理

我国税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取于国民者多，而纳于政府者少”。^① 王永江鉴于奉天省“开源不免累民，节流必碍于政治”的实际情况，决定“先以除弊为入手”。^② 由于他曾历任辽阳、康平、海城、牛庄等地的税捐局长和奉天省城税捐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等职，深悉税捐的主要弊端在于税务人员营私舞弊，税收流入私囊。为剔除这一流弊，王永江首先强化税务机构及其人事管理。

(一) 整顿税务征管机构。简练便利是财税征收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税收工作中必须考虑征税人与纳税人双方的便利，尽可能把分散的管理变成相对集中的专业化管理。税捐征收局是重要的税务征管机构。民国初期，奉天省税捐征收局的编制、人员录用、业务规定和等级规定等均沿用前清旧制度。1913年奉天省征收总局按照1911年度各局实际征收税款数目分为6个等级38个局。此后一直没有发生变动。1917年6月王永江制定《奉天税捐征收局办事规则》，将税捐局仍分为六等，但对其进行了裁并。如表1-2所示，税捐局数量由38个减少到31个，并对其管辖区域作了明确规定。1924年9月，王永江又制定《奉天省各税局改订分局所章程》，将各税捐局所属的年税收总数在万元以上的分局分卡，一律改为税捐分局。税收不及万元的常设分卡和临时分卡一律改为税局分所及临时税局分所。根据收款情况，王永江将分局再分四等，收款在大洋5万元以上为一等分局；收款在3至5万元为二等分局；收款在2至3万元为三等分局；收款在1至2万元为四等分局。^③

^① 罗从豫：《我国之田赋》，《银行月刊》第七卷，第八号（1927年）。

^② 《王永江理财计划》，《盛京时报》1917年5月9日第4版。

^③ 奉天省财政厅：《奉天省税则汇编》，1925年8月印发。

税捐局的裁并，减少了财政开支，提高了工作效率，而管辖区域的划分，一方面有利于税局开展税捐征收，另一方面便于财政厅对其管理。

表 1-3 1917 年奉省各税捐管辖局域表

局名	等级	管辖局域	所属分卡数
省城税捐征收局	1	省城，沈阳县	9
辽阳税捐征收局	1	辽阳县，本溪县	16
沙河税捐征收局	1	安东（今丹东）县	13
辽康税捐征收局	1	双山县，辽源县，康平县	9
铁法税捐征收局	1	铁岭县，法库县	17
新民税捐征收局	2	新民县，彰武县，辽中县，台安县	16
锦县税捐征收局	2	锦县，锦西县	15
牛海税捐征收局	2	海城县	12
海龙税捐征收局	2	海龙县，辉南县	6
昌图税捐征收局	2	昌图县	12
开原税捐征收局	3	开原县	13
梨树税捐征收局	3	梨树县	8
怀德税捐征收局	3	怀德县	8
西丰税捐征收局	3	西丰县	7
营口税捐征收局	3	营口县	11
通桓税捐征收局	3	通化县，桓仁县	7
洮南税捐征收局	3	洮南县，突泉县，安广县，镇东县，开通县，洮安县	9
东丰税捐征收局	3	东丰县	3
西安税捐征收局	3	西安市	2
新宾税捐征收局	4	兴京县，抚松县一部分	7

续表

局名	等级	管辖局域	所属分卡数
柳河税捐征收局	4	柳河县	10
盖复税捐征收局	4	盖平县, 复县	9
凤城税捐征收局	4	凤城县	21
孤山税捐征收局	5	岫岩县, 庄河县	5
绥兴税捐征收局	5	绥中县, 兴城县	5
义县税捐征收局	5	义县	8
北镇税捐征收局	5	北镇县, 盘山县	12
黑山税捐征收局	5	黑山县	10
辑临税捐征收局	5	辑安县, 临江县	8
长甸税捐征收局	5	宽甸县	5
抚、安、长税捐征收局	6	抚松县, 安图县, 长白县	
计 31 局			293

资料来源：郑树模主编：《辽宁税务志 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87 页。

王永江将税捐征收局的编制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编制设文书、会计、核收、稽查四个股，各局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量多少合并成二或三个股，每股设股员一人，配备若干名雇员和巡差；外部编制设分局、分卡、临时分卡。一、二、三等税捐征收局因其工作量大，下设分局、分卡两级机构；四等以下局只设分卡和临时分卡。分局和分卡为常设机构，而临时分卡一般在征收业务忙时临时开设，没有征收业务时即行撤销。如铁岭、营口、沙河等局所属的水路分卡、凤城局的蚕茧税征收分卡等都属于此列。税捐征收局向各分局、分卡派雇员，向临时分卡临时选派人员进行管理。各税捐征收局局员资格有严格规定，除局长外，“委员、稽查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以上学历和从事税务工作一年以上的资历方可充任；雇员、巡差须具有高小毕业学历且对税务工作有经

验、品行端正，方可采用。”^① 税捐征收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对各局所属人员有监督考察权，对营私舞弊的人员可以随时向上级检举；反之，如果隐匿不报，一经查出，由该局长负完全责任。1924年9月，王永江又制定《奉天省各税局改订分局所章程》，强调分局主任虽由财政厅委任，但“监督指挥之完全责任仍然由该管局长担负”，如分局主任“有推诿萎缩误事者，仍责在局长”。^②

税务行政不透明、不公开是税务人员在工作中营私舞弊的重要原因。为做好预防工作，王永江对捐税征收局日常工作作出严格规定：各局及分局、分卡须将各税应收定额及大小银元折扣数目、纳税方法、办公金数，详细写在一木牌上并悬挂门首，便于检查和监督。税票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法向纳税人收取税款时使用的专用凭证，为加强税票管理，防止作伪作弊，王永江规定工作人员填写税票税目必须使用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等字，不得简写或模糊涂改。如果不慎出现填写错误，必须另换一张重行写明，而且写错税票也需上交，留财政厅备查。尤其强调领用税票须注意保管，如有遗失必须马上查明号数、张数、呈报财政厅核办，以免出现更大损失。为保障税款安全，所征收税款必须当日交官银号及分号或殷实商号存储，不允许直接存留在局、卡，以防意出现外。^③ 王永江通过上述章程，对税捐局等级、组织编制、人员资格任用与录用、业务程序都作出了详细规定，赏罚分明，税务人员工作有章可循，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 完善税务征管的保障措施。税法的稳定性能够保证征纳双方按照法律程序履行相应义务。但在税法执行过程中经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用规范性文件对税法进行补充规定，以保证税法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这增大了税法执行的弹性，并由此在税务征收过程中产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1880号。

② 奉天省财政厅：《奉天省税则汇编》，1925年8月印发。

③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第1880号

生种种弊端。为保证税务征管工作顺利进行，王永江采取以下措施：

统一税务征收工作人员的薪金标准。税捐人员存在舞弊行为，与其薪金没有统一标准和切实保障有关。各税捐局所辖分局、分卡虽然没有分别，但预算和薪俸却有不同，办公杂费也多少不均，存在“畸轻畸重之弊”。王永江颁布《财政厅改变各税局经费预算》，规定“凡同一等级而月俸不同者，为之折衷”，各局长、委员和稽查员等的薪金按照统一标准支付，局长月薪分为六个等级，由高至低分别为 220 元、180 元、150 元、130 元、110 元和 100 元。委员分为三等，月薪分别 50 元、40 元和 20 元。稽查也分为三等，月薪分别为 30 元、25 元和 20 元。雇员依然划分三个等级，月薪分别为 24 元、20 元、16 元。巡差、夫役月薪 10 元。同时严正告知各局“不得有克扣员役薪工及侵蚀分局、卡经费等事情”，^① 保证税务人员薪金收入。

通过制定奖惩规则保证税款及时征收。王永江把奖惩视为促进财税改革的重要手段，他根据土地面积、商户数、人口数以及农工产品生产情况对各税捐局应分担的征收捐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征收指标。各税捐局定有月指标、年指标，所征收税额超过三年前平均额，给予奖励。“局长及员巡俱得分润。舞弊者有严谴，超额者有奖，……局长所得年皆巨万，省库亦固之大盈。财政厅人员按例亦分提成。当时财政厅科员每年所得提奖可及薪水之半。”^② 超出指标的税款除留出提成部分作奖金外，还对有关人记功表奖。对达不到应征税额人员，按章惩处。按照税赋征收成绩进行奖惩取得了良好效果。王永江任奉天省代省长后颁发了《奉天省各税捐局经征税款奖惩规则》，规定各税捐局经征税款超过规定指标时，“照溢收之数，概提一成作为奖励。”各税捐局所得奖金数额进行如下分配：“统全局应以十成之数计之，五成奖励全局员巡人等，余五成归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1999 号。

^② 黄曾元：《王永江奉省从政琐议》，大连市金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王永江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3 页。

局长应得。凡分给局、所员巡人等应得之奖金，照以上五成数，按分局主任、分所主任、员巡依次分配。各局分配奖金时将各领奖人名目列一清表，加盖名章，报厅备查以昭核实。财政厅根据各局常年超额情况，一成奖金数额在 5,000 元以上，厅留 6 厘；在 1 万元以上，厅留 8 厘，在 2 万元以上，厅留一成。奖金不满 5,000 元者，概不提留。”^① 税捐局经征税款奖惩制度更为完善。由于税款数额与税务征收人员利益紧密联系，税务人员无不努力完成定额，最终实现了税收额不断增加。

税款不能及时上缴是税收征管工作中遇到的大难题。王永江制定《奉天省各县解款报册考成规则》，以保证税款及时上缴财政厅。《规则》规定各县征收的应上解到省的款项于次月 10 日由县付解，报册于次月 15 日印发，根据各县到达省城距离的远近和是否通火车等情况分别推算。如表 1-4 所示，长白税捐征收局距离省城最远——1360 里，且不通火车，限期 27 天到达；其次为抚松税捐征收局和安图税捐征收局——1300 里，且不同火车，规定 26 天到达。^② 其他各税捐征收局都有不同的规定期限。各县如能准确无误解款、报册达到 3 月以上、6 个月以上及 1 年以上，分别记功 1 次、1 次和 2 次。记功达到 3 次则并作一大功，记大功 3 次即可“酌予升调”。各县解款报册如果不能及时上缴，“超过限期 10 日记过 1 次；超过 20 日记大过 1 次，罚俸半月；超过 30 日记大过 2 次，罚俸 1 月。其记过 3 次并作 1 大过，而记大过超过 3 次立即撤任，”^③ 从而基本保证了税款及时上缴。

① 奉天省财政厅：《奉天省税则汇编》，1925 年 8 月印发。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1475 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表 1-4 奉天省各征收局解款报册到省城里程和限期表（单位：里）

局名	驻在地	距离省 城里数	通何路火车 及通行里数	陆路 里数	到省程 限（天）
省城税捐征收局	省城				1
辽阳税捐征收局	辽阳县	130	南满铁路 130		2
锦县税捐征收局	锦县	520	京奉铁路 520		2
新民税捐征收局	新民县	120	京奉铁路 120		2
沙河税捐征收局	安东（今丹东）县	630	安奉铁路 630		2
牛海税捐征收局	海城县	240	南满铁路 240		2
盖复税捐征收局	盖平县	360	南满铁路 360		2
铁岭税捐征收局	铁岭县	130	南满铁路 130		2
辽康税捐征收局	辽源县	400	南满铁路 200	200	5
海龙税捐征收局	海龙县	620	南满铁路 180	440	9
开原税捐征收局	开原县	200	南满铁路 182	18	2
昌图税捐征收局	昌图县	240	南满铁路 220	20	2
梨树税捐征收局	梨树县	350	南满铁路 325	25	3
怀德税捐征收局	怀德县	510	南满铁路 510		2
西丰税捐征收局	西丰县	340	南满铁路 180	260	4
孤山税捐征收局	庄河县	630	南满铁路 440	190	5
新宾税捐征收局	兴京县	380	不通火车	380	7
营口税捐征收局	营口县	360	京奉铁路 360		2
通桓税捐征收局	通化县	640	不通火车		13
法库税捐征收局	法库县	190	不通火车		4
东丰税捐征收局	东丰县	520	南满铁路 180	340	7
西安税捐征收局	西安县	430	南满铁路 180	250	6

续表

局名	驻在地	距离省	通何路火车	陆路	到省程
		城里数	及通行里数	里数	限(天)
柳河税捐征收局	柳河县	560	南满铁路 180	380	8
洮南税捐征收局	洮南县	1050	南满铁路 200	850	18
绥兴税捐征收局	绥中县	700	京奉铁路 700		2
义县税捐征收局	义县	520	京奉铁路 410	110	4
凤城税捐征收局	凤城县	500	安奉铁路 500		2
北镇税捐征收局	北镇县	360	京奉铁路 360	60	3
黑山税捐征收局	黑山县	300	京奉铁路 285	15	2
长甸税捐征收局	宽甸县	580	安奉铁路 380	200	5
辑临税捐征收局	辑安县	790	不通火车	790	16
长白县兼税捐征收局	长白县	1 360	不通火车	1 360	27
抚松税捐征收局	抚松县	1 300	不通火车	1 300	26
安图税捐征收局	安图县	1 300	不通火车	1 300	26

资料来源：《奉天公报》第 1475 号。

总之，王永江一方面通过整顿税务征管机构、强化税务人事管理，为构建税收稳定增长机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奖惩条例，监督税收人员有法必依，保证税款及时上缴，把财税工作纳入了制度轨道。

二、整理旧税

所谓旧税就是指过去已经批准并现存的为公共产筹资的税收；新税则是指课征之前并不存在的为公共产品筹资的税收，现行税率的提高也往视为一种新税。^① 民初奉天省财税体制混乱，捐税复杂，种类繁多，随意摊派，浪费侵吞现象严重。现代财政学认为，财政体制考察包括三

^① 许建国，蒋晓惠：《西方税收思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7 页。

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规范的税收；二是财政收入的组织机制和财政支出的安排机制；三是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监督。^① 可见，规范税收制度是财政管理之根本，而厘定税章税则是建立和维持财政管理良好秩序的重要前提。王永江上任不久即颁布了《征收统税现行章程》、(1917年6月)《颁布改定奉天省木税章程》(1917年8月)、《奉天省整顿当帖当税章程》(1917年8月)、《奉天省整顿牙店牙纪斗帖税章程》(1917年12月)、《奉天省整顿牲畜税章程》(1917年8月)，后来陆续颁布了《变通奉天全省清赋章程》、《奉天省征收茧税章程》等一系列税收章程，^② 下面分而述之。

田赋。奉天省农产丰饶，田赋一向是其重要收入。清末奉天省开始清丈土地，但由于荒地不断开垦，民地依然存在“浮多”现象。1917年6月王永江颁发《变通奉天全省清赋章程》，规定民地所有者对自己拥有的土地进行自查，如发现有“浮多”，在6个月内向官署“自行首报”。“浮多”地亩每亩收大银元2角作为地照工本费，全部上缴省财政厅；另外收大银元4角，1角5分上缴省财政厅，1角5分留作县办公经费，1角做地方绅董协助费用。如果超过6个月不报，逐月加罚一倍。《章程》对于出典土地也作了相应规定。已经出典土地如果存在“浮多”，在原典四至以内原业主拥有优先报领权，报领之后归佃户耕种，出典期满准许原业主将两者一并赎回。如果原业主对“浮多”地超出6个月不领报，承典户拥有领报权力。将来赎回时，原业主只准抽赎原领之地，而浮多地即为佃户永业田。在呈报“浮多”地时，存在将他人之地套包侵占现象。章程规定如“事后经人告发或经官查出，除将经照费充公和原地撤回外，并送法厅治以侵占罪惩办。”^③ 报领的地亩当年起科，赋税率以原土地的等则为标准，依照奉天省划一田赋等则章程办

^① 张平：《中西方财政基本理论及制度的比较研究》，天津财经学院2005年硕士论文。

^② 奉天省财政厅：《奉天省税则汇编》，1925年版。

^③ 奉天省财政厅：《奉天省税则汇编》，1925年8月印发。

理。《变通奉天全省清赋章程》的实行，进一步清理了土地的产权、面积以及应纳赋税额，遏制了田赋偷漏现象，增加了奉天省民地的数额。1916年奉天省民地为534,843亩，1918年为585,588亩，1919年为1,950,143亩。^①清赋过程中，“中等县份一般清丈出三四万亩，大县则更多，查出许多过去少报和未报的土地，一律核准缴纳田赋，”田赋税收额因此大增，1916年田赋税收额4,309,817元，1917年增加到5,234,517元，增加额为9,247,00元。^②

统税。统税是财税收人重要来源之一。征收统税的货物，采用同一税率，并只征一次税，简化了税收手续。1917年8月奉天省财政厅颁布《征收统税现行章程》，废止沿用的清代旧税制，规定统税分出产、销场两项。出产税对省内出产的各种杂粮税率从价1%；元豆、青豆、黑豆、磨豆税率从价3%；土货税率从价1.5%。对于省内已完纳出产税的货物及由外地运入各货征2%销场税，而对没有出产票及护照行销的土货按出产、销场两税并征，另各加收10%的附加税。出产货税就出产地征收，销货时，再征收销场税。^③1922年9月奉天省公布《奉天省征收茧税章程》，对奉天省所产山茧改按产销两税并征，税率为从价3.5%；缫丝织绸后，不再征税。^④经过整理后，统税收入大增。如表1-5所示，1917年统税收入2,831,275元，1918年收入3,885,203元，增加1,053,931元；1919年收入5,048,370元，比1918年增加1,163,162元。统税成为奉天省大宗税收项目。

① 《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民国年稿本。

②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875号卷。

④ 郑树模主编：《辽宁税务志（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表 1-5 1916—1926 年奉天省统税收入一览表（单位：元）

年度	总计	出产税	销场税	豆税	木植税	茧丝税	中江税	粮货税
1916	2560539	468544	735125	963756	247521	57953	—	49884
1917	2831275	567319	893916	877998	272433	110917	—	60249
1918	3885208	639386	1006797	1209608	780927	137481	1254	70212
1919	5048370	874766	1424989	1544500	916901	210611	2445	43358
1920	4869668	999171	1358517	1264216	943577	200331	2376	66054
1921	5847095	968608	1502000	1632382	1080228	198125	2571	66342
1922	6546086	1036386	1665234	1981109	895365	852298	4584	47461
1923	6237762	748921	1912080	2075295	925000	480098	4584	47461
1924	7524687	1108924	2175778	2385553	1091488	643683	4168	67165
1925	12557970	1902967	4328532	4384219	1144837	658954	9467	58453
1926	32010531	3646846	1393288310909802	2036788	1250826	16774	85454	

资料来源：郑树模主编：《辽宁税务志 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93 页。

当税帖税。1914 年 3 月，民国政府财政部通知各省按照本地情形整顿当税，制订章程后上报财政部核准。奉天省 1916 年曾制定了《奉天省整顿当帖当税章程》，1917 年 6 月王永江对其重新修订后颁布了《奉天省整顿当帖当税章程》，对典当的分类标准及当税、帖税税额又作了调整。典店分二种：资本在 1 万元以上，赎期 12 个月以上，月利 3 分或 4 分以下的为大当；资本在 1 万元以下，赎期 10 个月，月利 3 分或 4 分的为小当。当帖费为大当每帖大银元 20 元，小当每帖大银元 10 元。当税规定大当年大银元 100 元，小当年 50 元。并另按税额缴纳 10% 的办公金。^① 与 1916 年《章程》相比，王永江制定章程更为简便易行。他将万元以上典店均划为大当，即把甲、乙两种均归为大当。当税和帖税也相应地变成两种，减少了纳税人员的工作量和难度。另外，1916 年章程规定“丙种年纳税 80 元以下 30 元以上。由征收官署查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99 页。

定。”王永江将丙种店归为小当，每年纳税 50 元。这样，征收数额由不确定转为确定，避免了征收人员营私舞弊，符合税法确定性原则。

印花税。印花税是课征于一切财产及权利关系所设立的单据、契约、簿册等，“凡人们在此类凭证上购贴印花，即正式确定其凭证权利义务之效力，能享受国家法律之保障，故印花税亦称凭证税，以求法律或习俗的保护。”^① 因为印花税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手续简便且成本低廉而被经济学家誉为“良税”。1907 年清政府曾颁布印花税则，但未能实施。民初北洋政府制订印花税法并开始征税，颇著成效。印花税由纳税人按规定应纳税的比例和定额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即完成纳税义务，因而很容易出现漏税现象，“几乎无处不有漏贴者，至于贴不足数者，尤无处无之”。王永江责令税务征收人员按户检查，金银库胡同奉天储蓄会因“有奖储蓄凭折未贴印花”，从 1922 年 4 月起到 1923 年 10 月底共发“有奖储蓄凭折 6,894 份，每份应补印花税 8 分，共计 55,152 分，现已如数呈缴财政厅核收。”^② 为了扩大影响，增加威慑力，王永江特意将违法者的名号或行号予以曝光。如义县“义源顺等 46 家商铺未贴印花，均带署庭讯，分别处罚，并榜示罚款，以示薄惩”。^③ 鉴于印花税征税状况良好，王永江根据各县历年征收情况，在 1923 年重新制定征收指标。其中安东（今丹东）县最多，年销指标为 42,000 元，其次为营口县和沈阳县，分别为 32,000 元、30,000 元。最少的是安图县、突泉县和镇东县，年征收指标均为 300 元；双山县、瞻榆县和安广县为 500 元。此次改订后总数计合 44 万元。^④

茧税和木税。具有地方特色的茧税和木税也得到了进一步整理。奉天省各项税章“本极参差……办法极为歧出者，以木税为最。木税名称

① 李向东：《印花税在中国的移植与初步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年 3 月。

② 《补缴凭折印花税》，《盛京时报》1923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

③ 《漏贴印花被罚》，《盛京时报》1919 年 4 月 17 日第 4 版。

④ 《印花税额改订比额》，《盛京时报》1923 年 6 月 20 日第 4 版。

分为三种，东边木税、沙河木税、木植新捐等。而纳税办法，或按价征收，或按料征收。东边按料之中又分 4 项，一料之内有山价、客税、船捐^①之别”。1917 年 8 月，王永江制定了《奉天省整顿木税章程》，对奉天省木税的山价、客税、船捐、木佣等繁杂项目和征收上不便纳税的繁杂规定加以整顿，总体是按时价征税，值百抽八外收附税一成。即每价值小银元 1 元抽收正税 8 分，另征附税 8 厘。同年 12 月，改为值百抽六点六，转销外城时交销场税一成，惟（今丹东）已纳出产税之木，如再用帆船装载出口，须再完纳值百抽二五之出口税。^② 1922 年 9 月，王永江修订了《奉天省征收茧税章程》，对奉天省所产山茧改按产销两税并征，税率为从价 3.5%；缫丝织绸后，不再征税。^③

此外，王永江还关注烟酒税。烟酒属奢侈品或有害品，重征奢侈品符合公平原则，“税中之收入莫如烟酒公卖之一种，现下各处虽设有烟酒公卖，征收税多未推行尽利。”^④ 因此，王永江改定烟酒税章程以增加财政收入。

王永江改定税则、整理旧税等措施为财税征收工作提供了依据，但实际运作效果有赖于税务征收人员能力、素质和水平。为了保证税务征管进入良性运行轨道，王永江筹划创办税务讲习所，培养税务专门人才。

三、创办奉天税务讲习所

税务人员的优良素质是税务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民国初年，奉天省税务人员多是“知识浅陋”、“品格不齐”，且大多出身于农民，“既不

^① 山价指木材原料；客税指买卖税；船捐指流放木筏价征之税；木佣指税局征收的手续费。

^② 奉天省财政厅：《奉天省税则汇编》，1925 年 8 月印发。

^③ 郑树模主编：《辽宁税务志 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93 页。

^④ 《王厅长注重烟酒税》，《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13 日第 4 版。

明税则，久司榷务者又惯为税蠹”，“欲求一全才殊属难得”。^① 为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1924年王永江创办了奉天税务讲习所。

税务讲习所以“养成税捐员的知识”为宗旨，直接隶属于奉天省财政厅。讲习所设所长一人，管理本所一切事务及所内人员，还承担监视学生、教员之勤惰及品行之优劣的责任。王永江选定周士升担任所长。周士升是财政厅总务科科员，奉天省金县人，清末奉天法政学堂最优等毕业生，从事财税工作多年，曾担任过财政厅总务科监视员、印刷处监视员。王永江任奉天省印花税处长时，他任印花处助理员，具有较为丰富的税捐工作经验。税务讲习所的教授员长和教授员都由省财政厅员兼任。教授员长核定讲义和所内文件并规定课程，由财政厅征榷科科员王家驹担任。王家驹毕业于上海公学法律本科，历任奉天省公署实习员、查案员、官地清丈局稽查员等职。教授员专管编撰讲义及讲解课程，由傅良弼、杨宝源、杨文栋等人担任。傅良弼是财政厅总务科科员，日本宏文学院毕业，历任辽阳某高等小学校校长、海龙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吉林省长公署第四科科员、吉林全省警务处秘书、吉林交涉署科员、吉林戒严司令部秘书等职。杨宝源为财政厅征榷科科员，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国文系预科和财政部财政讲习所，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科员、奉天省财政厅科员等职。教员杨文栋是财政厅征榷科科员同时兼任讲习所庶务和文牍，奉天政法学校毕业，曾任辽阳收捐处会计、奉天地方财政委员会审查员等职。教员汪征波是财政厅征榷科科员兼统计科科员，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经济本科毕业，曾任奉天省长公署实习员等职。^② 王永江亲自选定税务讲习所人员都是财政厅的业务骨干，他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对税务工作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同时由于多年从事税务工作，有较丰富的税捐征收管理经验，在师资方面保证了讲习所的教学质量，为培养优秀的税务人才奠定了基础。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789号卷。

② 余阳：《王永江创办奉天税务讲习所》，《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讲习所制定了严格的招生制度。考生年龄须在 24 岁以上 34 岁以下，中学毕业或相当于中学毕业程度。各税捐局职员也可以报考，但要求必须具有一定学识且工作中未曾出现过舞弊和过失，而“有嗜好、曾受过法律处分、性情浮荡、行为卑劣者”一律不准报考。报考科目有国文（包括古文和白话文）、算术（笔算和珠算均可）和文牍，成绩及格者即可录取。报考时，报考者要准备个人履历书、毕业文凭（或委任令）和本人最近半身照片。被录取的考生要填写自愿书和保证书各一份，基本内容是保证遵守纪律，认真完成学业，如半途退学或被开除，情愿赔偿学费等。^① 学员还要详细填写家庭住址、曾祖、祖父姓名和职业等。讲习所期限为四个月，教学课程主要有税务改良、关税论节要及本省的现行税则、公文程式、算学、适用票照及填写表册方法、税捐人员职务概要等，每星期学时为 42 小时。讲习所考核非常严格，如第二期学员讲习 4 个月期满，根据毕业考试成绩评定甲等李勤等 94 名，乙等张同等 31 名，另有不及 90 分者 13 名。王永江将不及 90 分的 13 名学员开除。^②

王永江创办的奉天税务讲习所，由于教员税捐实践经验丰富，学员质量较好，取得了良好效果，以后奉天省历任财政厅长都举办税务讲习所。1927 年莫德惠任财政厅长期间举办了两期税务讲习所；1928 年张振鹭任财政厅长时也举办了一期税务讲习所，其章程、教员、学生的来源及学生分配的原则和方针，基本上沿袭了王永江创办时制定的原则和方针。奉天税务讲习所培养了税务人才，提高了全省税捐人员的素质。1928 年张振鹭任财政厅长时经过周密的调查，认为税务讲习所的毕业生“洞悉征收章程手续”，因而“办理一切事务自无错漏之虞”。^③ 税务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税务专门人才，促进了奉天省税收的增加。1923 年统捐

^①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789 号卷。

^② 《税务讲习所毕业》，《盛京时报》1925 年 4 月 16 日第 4 版。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789 号卷。

收入为 600 多万元，1925 年增加到 900 多万元，1928 年则增加到 4000 多万元；盐税 1923 年为 800 多万元，1926 年猛增到 1500 多万元。^① 正如 1927 年奉天省财政厅长莫德惠所说的那样，“该税务所停办后，所有毕业生分发到各税局帮理税务，近来所收税款多有增加大半，得力于此，诚良举也”。^② 经过税务讲习所培养毕业生全部充实到税收工作的第一线，成为税务工作队伍的骨干，提高了全省税收工作的水平。

四、节省财税行政支出

节省财税行政支出是王永江财税改革的重要原则。王永江极力精简机关人员编制，节制冗费。当时奉天省财政厅办事人员共计 380 人，烟酒公卖局办事人员 50 余人。王永江认为财政厅 200 人已足够，“烟酒公卖局 10 余人已足”。^③ 不久，即“裁去雇员及书记 50 余名”^④。经过整顿以后，机构大为精简。如省长公署第一科负责人事、吏治、财政、外交、蒙旗等，负责事项繁多，但除会计、庶务、收发以外，仅有主任 1 人、主稿 1 人、科员 4 人、办事员 3 人，一共不足 10 人。王永江也尽力节减各机关的经费。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仅奉大洋 2000—3000 元，各厅长上班均乘人力车，不准购买汽车。王永江还认真审查各行政部门财政预算，严格控制预算以外用款。他本人也以身作则，自己身边不设秘书，凡事亲自批阅。^⑤

为节省经费，王永江对各县税捐征收局经费预算进行改编，如表 1-6 所示，1917 年度预算各局列支经费 4,215,560 元，1917 年度改编预算后各局列支经费 4,232,073 元，节余 16,513 元。其中经济发展较好地

① 郑树模主编：《辽宁税务志（1840—1989）》，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8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789 号卷。

③ 《王永江裁员之先声》，《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8 日第 4 版。

④ 《财政厅大事裁人》，《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19 日第 4 版。

⑤ 陈裕光：《王永江整理奉天省财政之前前后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56 页。

区改编后预算数额减少了，而比较偏远地区如梨树税捐征收局、怀德税捐征收局、辑临税捐征收局、长甸税捐征收局、海龙税捐征收局、抚安长税捐征收局等预算后有所增加，尤其抚安长税捐征收局由原来 5,372 元增加到了 9,276 元。可见，王永江财税整理并非以增加税收为唯一指向，对公款分配更多体现为对落后地区减征扶持的政策，保证了全省经济均衡发展。因此，“虽未能臻于充裕，然较之往昔大见起色。”^①

表 1-6 奉天省财政厅管辖各税捐征收局改编经费预算一览表（货币单位 大银元）

等级	局别	改编后预算数（元）	原预算数	等级	局别	改编后预算数（元）	原预算数（元）
1	省城税捐征收局	22452.49	22872.49	3	营口税捐征收局	17265.60	18045.60
1	辽阳税捐征收局	21095.26	20987.56	3	通桓税捐征收局	13512.50	13308.492
1	沙河税捐征收局	23727.64	25393.608	4	新宾税捐征收局	11053.69	11629692
1	辽康税捐征收局	17497.30	16405.296	2	盖复税捐征收局	13425.93	14292834
1	铁法税捐征收局	20843.00	23242.604	4	凤城税捐征收局	11167.00	11347.00
2	新民税捐征收局	19843.38	21235.380	5	孤山税捐征收局	8226.29	8592.296
2	锦县税捐征收局	18517.60	19453.60	5	绥兴税捐征收局	8461.56	8581.596
2	牛海税捐征收局	15421.70	15634.70	5	义县税捐征收局	9914.29	9914.292
2	昌图税捐征收局	15132.30	15480.296	5	北镇税捐征收局	9022.80	8702.296
3	开原税捐征收局	13027.40	12799.396	5	黑山税捐征收局	9365.00	9305.00
3	西丰税捐征收局	10339.10	10099.092	4	柳河税捐征收局	10406.80	10406.80
3	梨树税捐征收局	13070.00	13216.692	5	辑临税捐征收局	8663.64	8483.640
3	怀德税捐征收局	11985.20	11649.192	6	长甸税捐征收局	7322.60	7245.796
3	洮南税捐征收局	13974.30	13830.30	6	抚安长税捐征收局	9276.00	5372.10
3	东丰税捐征收局	10504.50	9081.90	2	海龙税捐征收局	17510.49	16952.592
3	西安税捐征收局	9530.70	9098.70		总 合 计	4215560.0	4232073.32

资料来源：《奉天公报》，第 1999 号

① 《王永江理财计划》，《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9 日第 4 版。

王永江还取消司法收支特别会计办法，把司法新增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中以节省财政开支。1914年以来，奉天省司法使用自为收支特别会计法。王永江认为特别会计法“一般实业及教育事项始与此种会计相宜。盖实业则收入足以自供，教育则补助居其大半。至若司法事项，与此二者性质迥然不同，就收入论，仅居经费之一部分，就补助论，又于名义不甚相符。”因此，司法部门应将“每年所收若干，自应全数解交国库，所支若干，亦应遵照豫算全数由国库领支”。因此他与沈家彝^①等再四磋商，从1917年度起，“取消此项特别会计办法，将未列预算之登记费增加，讼费、状纸费、监狱工业余利均列入六年度豫算，由财政厅列收。奉省六年整顿司法之必要支出，亦略为增加，出入两项相抵，较五年度实行豫算额收入尚赢三万余元。”并提出对司法收入“力加整顿，不但最近二三年内不必为经费之追加，且将来司法经费更可望不仰给国库之支出。”^②

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是节省财政开支的重要手段。奉天省各县地方款项目名目繁多，管理混乱。许多县区在编制预算时已留“吞食之余地”，例如亩捐征收数额竟然超出田赋，各县多者数十万、少者也有数万之多。其他如杂捐、杂租等更为纷乱错杂，“经征者尤易上下其手，且事后又多以收未及额为词，敷衍搪塞，相习成风。”各团体所收桥捐、保卫团加收看青费以及尚未上交的捐款等，“虚糜浮冒，所在皆是”。^③王永江派员严密调查，清查各县预算外的收入。经过审查，各县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预算外收入，其中以兴京县为最。兴京县1916年收入桥捐为15,128元。戏妓各捐为861元3角1分，社会公捐为18,000元，

① 沈家彝：字季让，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时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

②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693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84—85页。

违警罚金为 684 元，共计 33,980 余元。另有学费 7,000 余元。其所列开支的款项中，桥捐征收处年开支额达 14,526 元左右，较收捐处经费多至 20 倍。此外“笼统作为学校开支，暨支县署送捕川资等项，丝毫无存”。^①王永江对此严惩不贷：第一，对有关人员进一步调查，对于擅自经销、支销不当、开伪单据等行为，一经查实，严行查办；第二，对公款出入作彻底根究。追查各县 1916 年所收桥捐及其开支用途是否正当、因何未列入地方预算；各种捐款的具体流向如何。同时对妓捐、戏捐、和违警罚金也进行清理并提出了处理办法。

王永江提出各县地方款项，无论从前如何支配，现在应统一列入地方预算，以便考核。根据调查员的检查报告，对于各县属“征收地方捐款人员弊实业生”，王永江通令各县知事，嗣后如再有劣绅、痞董把持地方收款事情，应由县“详请惩办，并对该知事提付惩戒不贷。”^②随后，王永江逐县清查积欠的款项并做出批示，新陈并计，共计大洋四百余万元。^③

官营事业虽然是奉天省政府的重要收入，但由于经营不善，一些官营企业负债经营，支出多而收益少，反而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王永江对官营事业大加整顿以节省开支。“省内各种官营事业虽现时小有利益而后来无希望者废止之；省内官营事业虽现时无利益而后有希望者提倡之；开放省内荒地极力鼓励垦殖；省内各矿山开采提归官办；官产有应出卖者从速卖之，免致抛荒将来多受损失。”^④经过整顿，1916 年官产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第 195 页

^② 《整顿地方捐款》，《盛京时报》1917 年 5 月 15 日，第 4 版

^③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6 页。

^④ 《王永江整顿财政计划》，《盛京时报》1917 年 7 月 6 日，第 4 版。

收入 36,946 元，1917 年为 101,578 元，增收了 64,631 元。^①

上述财税整顿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17 年，奉天省不仅没有借债，而且“偿还内外债大洋日金共二百八十六万有余”。^② 由表 1-7 可见，田赋增加 924,700 元、契税增加 630,460 元，占总增加额的 50% 以上，说明原有大税目增加数额较大。税捐项下没有设新税种却增收 578,944 元，表明王永江不增添新税种、专门完善旧税的财税整顿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后几年税收状况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1918 年度收入 1,562 万余元，支出 1,211 万元，盈余 350 余万元；1919 年度收入 1,576 万余元，支出 1,147 万元，盈余 428 万元”。^③ 王永江主持的财税改革有效地推动了奉天经济的发展。1919 年 1 月 18 日该号前垫兴业银行股本奉大洋 214018.327 元如数还清^④。1921 年税收比 1917 年的数字大约要多出二千万元，奉天省财政基金积存高达一千万元；而到 1922 年时，财库存有三千万元，此数几乎相当于该年预算的两倍^⑤。“曾不三载，省库充溢”。^⑥“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进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⑦ 从此，王永江被誉为“理财能手”、“关外第一才人”。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22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 页。

③ 薛虹：《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31 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第 268 页。

⑤ 《满洲日日新闻》，1922 年 12 月 2 日。

⑥ 金毓黻：《王永江别传》，政协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 239 页。

⑦ 何秀阁：《杨宇霆祸变始末》，《张作霖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 年版，第 76 页。

表 1-7 1916 年与 1917 年奉天省部分税收项目比较表（单位：元）

款目	1916 年税收额	1917 年税收额	1917 年比 1916 年增加数额
田赋项下	4, 309, 817	5, 234, 517	924, 700
税捐项下	5, 545, 766	6, 124, 710	578, 944
契税项下	622, 275	1, 252, 735	630, 460
官产项下	36, 946	101, 578	64, 631
合计	10, 514, 804	12, 713, 540	2, 198, 736

资料来源：《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第 222 页编制。

第三节 改革金融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必然出现专门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金融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当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时，它积极促进着经济发展。反之，则严重阻碍经济的良性运行。奉天省金融最为混乱之时，王永江出任财政厅长，他采取取缔私帖、整顿奉票和改组东三省官银号等措施进行金融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取缔私帖

（一）私帖盛行原因

私帖，又称民间钱票、票贴、手票等，是由民间钱庄、银号、当铺、商号、商会等非官方机构或个人发行，并能够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流通的信用纸币。一般说来，私帖的流通范围多在发票者所在地，但是也存在跨地区流通的现象。东北私帖始于 1828 年盖平私商开发的“虚票”。盖平临近海口，当时为南北商贩汇集地区，商旅云集，商品交换频仍。为方便交易，当地各钱铺便“起意开始兑买银货之票，诓卖银

粮。军民虽不得钱，其票尚可兑买银货，”^① 时称“虚票”。“虚票”可代替现银现钱流通，解决了搬运金属币的困难，受到商民的欢迎。盖平所出的“虚票”可视为东北私帖的雏形。营口开埠以后，商品贸易发展迅速，工商业自有资本的不足与商品生产交换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显露，私帖也随之进一步盛行起来。具体分析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发帖者有利可图。发行私帖等于以纸币代替现金，发行出去的私帖，只要流通开来，并非每日都有人来兑换现钱。因此，这些行业发行的私帖大多数成为从事经营活动的流动资金，甚至放款资金，从而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资本占有量，获得更多的利润。^② 其次，县区等地方实行“保护”政策。近代东北战乱频仍，通货膨胀成为普遍现象。一个旧的地方银行失败了，地方政府就会将地方金融机构改变一个新的银行的名字，而继续发行新的地方纸币。^③ 在这种情况下，纸币不仅没有消灭民间私帖，反而由于地方纸币失败时，一些地方往往发生金融恐慌，小区域内的经济只好靠私帖来维持。一些县区面对政府取缔私帖就采取地方保护政策。第三，贱金属币效应。中国的铸币多以贱金属铜、铁、铅等为原料，随着交易额不断扩大，使用贱金属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一是携带不便，一是当时的铜制钱夹有许多劣杂铜钱及私人铸制的伪币。因此，商民交易多采取记账的方式，每至年节时结算，借贷相抵，直接抹兑。其中差额由债务人开具欠据，这种欠据由债权人持有，如果在市面流通即为私帖。^④ 第四，货币保有量不足。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战争连连失利，大量的割地赔款造成白银外流，制钱短缺。为

^① 中国人民银行总参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

^② 戴建兵：《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页。

^③ 戴建兵：《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1页。

^④ 海放，张伟，崔灿：《近代奉天的官帖和私帖》，《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了维持商品交易正常进行，一些当铺、钱号、粮栈等发行私帖。1900年前后，沈阳的一些当铺如永保当、福源当、泰兴当等都发行过私帖；日生隆、广生泉、会源栈等粮栈以及泰和祯、渊泉溥、泰兴、双玉恒等钱号、钱庄等都发行私帖，这些私帖可以在市内流通。

另外，日本蓄意破坏奉天省金融秩序也是私帖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奉票为主的东北货币体系向来以银洋为本位，是十足兑现货币，而近代日系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均为不兑换纸币。为了控制东北金融，日本银行以其纸币暗地收买现洋，或私运出境、或改铸辅币，致使东北货币保有量日益匮乏，奉天省“银行之信用益坠，农民交易，皆喜欢私帖”。^①

（二）私帖盛行

由于上述原因，奉天省城镇铺户发行各种私帖者不可胜数，各县私帖愈加不可遏制，私帖流通种类和数额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私帖只限行使于当地，不能流通于其他地区，“虽邻接县份亦极难一致”。因此，私帖发行种类繁多。如（今丹东）有小洋1角、2角、3角、4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等十种；奉天有大洋1元、5元、10元等三种，小洋2分、5分、5角、1元、2元、3元、4元、5元等八种；营口有大洋1元、5元、10元等三种，小洋5分、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等七种。^②奉天省私帖盛行的另一个表现是流通数额巨大，根据《东三省经济调查录》记载1917年前后，奉天省私帖流通总数约合洋310万余元，钱548万余吊。^③

^① 吴振强等：《东三省官银号奉票》，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199页。

^② 《满蒙私帖之调查》，《晨报》，1925年4月10日第7版。

^③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1919年版，第36～38页。

表 1-8 1917 年奉天省部分县区私帖流通数额

县名	单位(元)	县名	单位(元)	县名	单位(元)	县名	单位(元)
兴城县	782, 000	海龙县	228, 900	桓仁县	116, 000	安广县	18, 600
锦县	499, 800	绥中县	207, 900	临江县	77, 700	台安县	28, 400
法库县	396, 800	昌图县	161, 700	本溪县	40, 200	义县	23, 600
北镇县	322, 800	凤城县	187, 300	盘山县	53, 000	西安县	73, 000
梨树县	327, 700	东丰县	121, 000	抚松县	13, 900	铁岭县	71, 000
锦西县	290, 900	辽中县	139, 900	怀德县	66, 800		
新民县	353, 000	柳河县	111, 200	黑山县	61, 300		
庄河县	236, 000	通化县	132, 000	岫岩县	58, 000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1919年，第36~38页。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各级官吏多暗中受贿，以多报少，实际各县私帖流通总数当远远超过此数。而当时奉天官银号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所发行奉票总数只不过1000多万元。奉天省境内流通的私帖几乎占整个货币流通量中的半数，可见私帖流通数量之多。日本商人也设牛马小当等，发行1元以下私帖约2000至3000元。^①

私帖的发行在东北甚至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为匡正私帖泛滥之弊端，民国初年，奉天省政府对私帖发行进行了规范管理，县农会、商会、商家等发行私帖须“禀请县署认可发行，发行额皆须在财产估债额以下”，^②并且确保有三名以上保证人，或发行者连带负责，呈请农商会县署人员之后，才能遵照以下规定办理发行：“发行额须在所有财产二分之一以下，并须备有与发行额相等之准备金；须备有十分之三以上之现款，十分之八以上之财产。”^③各县根据实际情况，又对私帖发行做了具体规定，如“安东呈请商会登记纳费发行；辽源

^① 辽宁省图书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版第725页。

^② 《满蒙私帖之调查》，《晨报》，1925年4月10日第7版。

^③ 《满蒙私帖之调查》（续），《晨报》，1925年4月11日第7版。

具妥保二名，由商会承认，然发行额须在置产二分之一以下；铁岭须经农商会公定发行额，由县署发行之；营口可自由发行，不须手续”。^①上述方法虽然完备，“唯此种规定严守者甚为寥寥”，私帖“未几即流入滥发之域。”^②

（三）取缔私帖

私帖的发行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私帖不能兑现和由此造成的物价飞涨。1834年盖平私帖发生动荡，“凭帖数百万堆积如山”，后在官府协调下二成兑现。道光十六年该地“士民有控钱铺将银粮货物故设高价，顶兑票张，不付现钱”。^③即发行的私帖不兑现钱，只能甲帖兑付成乙帖，人们手中没有现钱流通，引起物价飞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市面现钱短缺，安东（今丹东）经常出现持私帖而兑不出现钱的现象，商民纠葛不穷。为解决私帖兑现问题，安东知县不得不亲自出面“为之变通，酌变定章”，“凡铺商兑用钱飞，数在十吊以内，并十吊至五十吊各付现钱一吊，二百至一千吊付现钱四吊；用以调节实际支绌的艰窘情况”。^④清政府为解决私帖问题，1894年开始由华丰官局发行纸币，希望以官帖替代私帖，未见明显成效。1910年6月，正式颁布《厘定兑换纸币则例》，其中规定：其一，现将此项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无论何项官商行号，概不准擅自发行，必使纸票于纷纷发出之时，而收中央集权之效。其二，在平时，自应以准备数目为发行数目，一遇银根吃紧，需要较多，即由银行体察市情，酌量增发，必使银行任接济市面之责，而仍不准有任意滥发之弊。其三，现拟于现款准备以外，请于纸币发行之次年起，

^① 《满蒙私帖之调查》（续），《晨报》，1925年4月11日第7版。

^② 《满蒙私帖之调查》（续），《晨报》，1925年4月13日第7版。

^③ 戴建兵：《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第2页。

^④ 荆有岩：《东北近代金融概述》，《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7页。

视银行所得余利，按年征收若干，并以税率分三年递进，必使银行于税额增长之时，而仍不觉义务负担之重。^① 随后，度支部又再次奏请对官商行号发行纸币进行限制：“再查通用银钱票流通市面，殊于币制有碍。上年臣部奏定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严定限制，原预为推行币制之地，应与此类纸币则例一体遵守。其业经发行各行号，应即照章按年收回。未经发行各行号及以后新设行号，即不准再为发行。”^② 然而，这些举措也未取得相应的成效。

民国初年，日本商人在关东厅指使下，要求中国银行定期兑换奉票。^③ 1916 年东北“各行号每日兑出现小银元不下七八十万元”。^④ 其后，日商对奉票的兑现演变成有计划的行动。日商“遂次要求兑换之额甚均；人数少而票数渐巨。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计，要求兑现人数仅四十八人，而兑现票额多至 4,183,013 圆，平均每人约持款八万多元”。^⑤ 显然，日商兑换，决非由持券者的任意兑换，而是暗中有系统地组织而预先进行收买分配，藉此兑换来操纵东北金融。

1917 年 5 月，王永江任职奉天省财政厅长。针对私帖“充塞”、泛滥状况，王永江上任伊始即制定了《收销各县私帖章程》，规定“收销私帖无论数目多寡，统限制民国七年八月底止，分作五期一律收清。以本年十二月底为第一期，明年二月底为第二期，四月底为第三期，六月底为第四期，八月底为第五期，期满绝不展限。各县如有不届期满提前归清者，应予以特别奖励；其期满仍未收清者，即行撤惩。并要财政厅与奉天各银行号商议，暂饬分行号多发官币，以资周转。”^⑥ 收销各县

①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 2 册），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 年，第 135 页。

②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 2 册），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 年，第 145 页。

③ Suleski, ronald.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2002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第 42 页。

④ 东北文化社编印处：《东北年鉴》，沈阳：东北文化社，1931 年。

⑤ 吴振强等：《东三省官银号奉票》，沈阳：辽沈书社，1992 年，第 199 页。

⑥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187 号卷。

私帖章程公布后，收销工作进展迟缓。私帖是地方银行发行地方流通纸币的大敌，地方银行在自己的地区建立起货币阵地，必须以消灭私帖为前提。因此，奉天省政府为销毁私帖不遗余力。1920年9月王永江呈请张作霖饬定《查禁私帖考成办法》，规定县知事勒令出帖各商最多限六个月内将流通私帖如数收清。鉴于以往各县勒收私帖过程中藉口流通外县不易收回“以致于任意推延”，这次勒收私帖要求“先布告商民逾定限外，凡他县私帖一律禁绝行使，外省纸币尤不准通用”。^①各商号每月将所收私帖缴送县署，由县知事会同商会共同验明，详细列表后呈报财政厅查核，所收私帖也随案验销。但边远各县交通不便，由县知事将收回私帖就近在商会监视下焚毁，同时将私帖字号、钱数、号码等列清单送往省财政厅。省财政厅根据各县知事督催私帖收销的速度进行考成：“在定限前一律收销者记大功一次；如限收销者记功一次；逾限未尽收销，只余少数者记大过一次；逾限过一个月仍未尽收销者，撤任。对于不遵令收销且增发倒填年月之新票之出帖商号，将该执事任严押讯，办封资产备抵。”^②

但是，私帖完全退出奉天省流通领域需要一个过程。1920年以后“私帖似已绝迹，然一入内县，则仍然因于因习，私自通行，不过不若往时之盛而已。”^③从1921年起，王永江采取下列措施继续查禁私帖。首先，重申私帖禁令。1921年9月，奉天省财政厅重申私帖禁令，“曾迭次通令各县查禁在案，无如阴承阳违者甚属不少”，故“复又重申禁令，如各县再有私帖即惟该县知事是问”。^④义县商务会长吕大武开设的大增永商号因出私帖被张洁清等来省向财政厅呈诉，财政厅要求“请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193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193号卷。

③ 《满蒙私帖之调查》，《晨报》，1925年4月10日第7版。

④ 《重申私帖禁令》，《盛京时报》1921年9月13日第4版。

彻查外，并请逼令兑换”，指令“知事严行查办”。^① 其次，派员监察。虽然省政府屡发禁止私帖令，而一些县区私帖依然屡禁不止，如北镇县之私帖、汇票至 1922 年底依然照常使用，对此省政府“展催该县知事勒令限收回，现忽公文置之不理，”于是财政厅“迅速派员赴该县调查情形，并设法收回。”^② 柳河商号益泰和、生发炉、恒聚和等各出私币一万余元，王永江“以取缔私帖功令甚严，该知事、警官、商会竟予纵容殊甚，堪痛恨，乃于十五日饬令柳河县知事先迅查明，”^③ 后派员前往调查。其三，落实地方官行政负责制。鉴于当局已三令五申严加禁止私帖，“惟行使者仍然如故，虽由于奸商力图要挟，亦县知事姑息放纵使然”，于是“通令各县知事嗣后取缔私币，县知事须负完全责任，如在其辖境发现私币者即惟该知事是问”。^④ 随后提出“各县私帖虽经遵令收清，其僻远乡镇难免不再有发行破坏金融者，”饬令“各县应加取缔，嗣后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私帖，以该地官长是问”。^⑤ 此外，王永江鼓励地方有识之士积极提出有益的建议并汲取采纳。如有的县地方士绅提出了各县成立“地方财务处”，把每年“入粮亩捐项下的款发行债券若干，维持现状通融市面。”另外“组织开附债券一部，附设该处，其票额由五吊至十吊止，以便于私帖收清交易。”关于盈利分配，则“除正当开销外，统归办地方公益，补助警学各费，公家既得巨利，工商减轻担负”，^⑥ 以此来抵制私帖的发行。王永江认为有可取之处，在该地区积极推行，取得了较好成效。

近代东北由于战争频仍而引发经济领域的窖藏被视为平常，货币的窖藏尤其严重。私帖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商品流通，保持一个地

① 《义县私帖讯》，《盛京时报》1923年10月24日第4版。

② 《财政厅调查私帖》，《盛京时报》1922年12月21日第4版。

③ 《饬勒收私帖准》，《盛京时报》1924年4月17日第4版。

④ 《私币责成县知事》，《盛京时报》1923年5月29日第4版。

⑤ 《训令限期收私帖》，《盛京时报》1923年11月30日第4版。

⑥ 《取缔私帖之建议》，《盛京时报》1921年9月20日第4版。

区商业的基本存在。同时由于货币流通本身造成铸币的实际含量与名义含量分离，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因而货币流通中不可避免地隐藏一种可能性，即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执行铸币的职能。私帖在官方纸币发行之前利用这一职能，便利了商品交易，从而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可以说，私帖的出现是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对经济的发展曾给予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民间私帖作为传统的信用工具，其流通范围只能在很小的地区间进行，地域性很强。私帖的大量发行，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奉天省货币体系更加复杂，严重影响了省币的推行，滞碍了商品贸易的发展。私帖盛行造成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区域通货膨胀。

近代奉天省民族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东北地区的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商品市场。由于王永江对私帖严加查禁，奉票流通逐渐遍及城乡各地，从而确保了奉票的主币地位。

二、整顿奉票^①

自奉天官银号发行奉票以来，奉天省一直通用的是小洋票。小洋票是一种实足兑现的纸币，1角小洋票与现小洋1角等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在华外资银行已不再向中国提供大规模贷款，并且各国均限制白银出口。中国难于从西方进口白银等贵金属，“银价奇昂，无处搜罗”。人们对所发行的纸币（奉票）是否有充足的准备金产生怀疑，市面上流通的小洋票开始贬值。同时，袁世凯为筹划恢复帝制大肆筹款，扩充军费，命令中、交两银行停止兑现，致使一度发生“京钞风潮”。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庞大开支都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垫付。截止

^① “奉票”一般指1905—1931年间辽宁省内主要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发行、流通的纸币。狭义地理解，“奉票”主要是指东三省官银号在辽宁发行并广泛流通于东北地区的纸币。文中奉票指狭义奉票。参见姚会元：《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中国钱币》，2002年第4期。

到 1915 年底，中国银行共垫款 1,024 万元；交通银行共垫款 4,750 万元，占其全部放款的 94%，全部存款的 72%。^① 由此，小洋票发生了信用危机。而日本商人恶意破坏更加重了金融混乱。参加一战的西方各国大多实行金本位制，而亚洲国家实行银本位制者居多。因此，欧洲参战国家来亚洲购买物资，必须以金易银，造成银价昂贵。奉小洋票是十足兑换货币，将小洋票兑换成小洋，熔为银块后贩卖，“每万元可获利五六百元”。^② 日本商人勾结中国钱商每天凑集几万元奉小洋票要求兑现。日本商人还大造舆论，蓄意造谣，称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纸币九百万元，流动资本金二百万元”^③，同时利用其控制的朝鲜银行大量发行“金元票”。1917 年 6 月，该行发行金元票的准备基金竟高达 1,400 万日元。^④ 由于朝鲜银行的金元票大量发行，金元票在奉天省广泛流通，形成对奉票的巨大压力。于是，“小洋票”连年贬值：1912 年 1 金元合 1.20 元小洋票；1913 年合 1.23 元小洋票；1914 年合 1.36 元小洋票；1915 年 1 金元合 1.47 元小洋票。^⑤

奉天省内币制紊乱也是奉票改革的重要原因。奉天省内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中外混杂。纸币就有官帖、私帖、小洋票、大洋票、小银元票等十几种之多；金属货币则包括本省发行的大洋、小洋。除此以外，还有其它各省发行乃至从国外流入的银币、纸币等。^⑥ 一些地方银行滥发纸币，乱发纸币。如殖边银行实出纸币 600 余万元，库存现银只有 28 万余元，外欠之无着落者，约 130 万元。这种金属货币量与实际流

① 洪硕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05 页。

② 许阶平：《东三省近代货币金融》，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90 页。

③ 《奉天纸币调查》，《盛京时报》1916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④ 《满洲经济史》，第 240—243 页。转引自姚会元：《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中国钱币》2002 年第 4 期。

⑤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01 页。

⑥ 魏福祥：《奉票的产生及其种类》，《社会科学辑刊》，1985 年第 4 期。

通纸币严重不符的状况无疑会导致通货膨胀。

货币紊乱严重危害奉天省商业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增大了金融市场风险，以致于一些官办的电报局、邮政局等也蓄意压低小洋票价格。哈尔滨电报局甚至“非羌帖则概不收受”，^① 京奉铁路仅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大银元票，不收小洋票。小洋票流通范围日趋缩小，价格日益低落。^②

为稳定奉天省金融，王永江一方面与日方沟通，另一方面进行奉票改革。他首先成立中日金融调节委员会，中日方双方委员各 9 人。1917 年 7 月 16 日双方签订了中日金融调节办法，规定停发小洋票并用大洋票收回小洋票，大洋票兑换按照各国兑换券通例为无限制兑换，但一年半以内执行限制兑换。金融调节办法只能解一时之急，并非永久之策。1917 年 8 月，王永江建议废除小洋本位，改为奉大洋本位，发行奉大洋票，规定大洋票 1 元等于小洋票 12 角。为推进大洋票的流通，王永江责令从前以小洋为计量标准的沈银、东银、炉银、外币、粮食以及各种商品，一律改用大洋票计算。同时逐步废除各行发行的小洋票并限期回收销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发行的小洋票也被取缔。为支付零星交易和小额交易，奉天省发行了铜元票以代替小洋票。由于奉大洋票以日本正金钞为参照，奉大洋票 1 元与日本正金钞 1 元相等，因此，实行大洋本位和发行奉大洋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兑现之累。但因为大洋票仍然可以实足兑现，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奉票被兑现的危险，银元继续外流。为了保持奉票的稳定和信用，增强奉票的流通与竞争能力，王永江决定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即“汇兑券”。汇兑券与大洋票等价，每 1 元折合小洋 12 角，所以称“一二汇兑券”。汇兑券与过去发行的奉小洋票、奉大洋票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只能对外作汇，而在省内不能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调查员姚传驹致财政部条陈》（1914 年 10 月 9 日），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②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密电》（第 2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33 页。

随意持券兑换现洋。毫无疑问，这种汇兑券实际上已成为不兑换纸币，从而使奉天省连续数载的兑现风潮得以逐渐平息。^① 王永江改革奉票的另一项措施是创办东三省统一发展银行。1919年11月20日，王永江等人担任筹办东三省发展银行委员，制定东三省统一发展银行章程和募集股份章程。规定东三省统一发展银行为官商合办，资本金2,000万元，其中官股1,000万元，商股1,000万元。官股由三省财政厅分担，奉天400万元，吉林300万元，黑龙江300万元。商股由三省总商会募集，全部股金限于1920年4月缴齐。但由于章程中所定发行统一货币一事，财政部认为不适当机，未加批准，筹办事宜陷于停顿。^②

王永江主持的奉票的改革与整顿，是东北近代金融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它一方面扭转了金融混乱的局面，迅速平息了挤兑风潮；另一方面恢复了奉票的信用。“不但辽宁省各县均以此为通货，即东北北部各大埠以及直鲁察绥各省亦无不通用之，流通区域至为扩大。”^③ 汇兑券发行后，不仅价格平稳，而且逐渐成为各类奉票中具有代表性的货币，为进一步统一全省货币准备了条件，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三、重组东三省官银号

经济发展的结构对金融结构有决定性影响，经济规模决定了金融规模，同时金融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通过它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如货币方便商品流通，信用促进资金融通等为经济运行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金融通过运作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① 魏福祥：《张作霖统治初期对奉票的改革与整顿》，《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② 沈阳市人民银行，沈阳市金融学会编：《沈阳金融志（1840—1986）》，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1992年版，第476页。

^③ 东北文化年鉴编印处编辑：《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365页。

^①随着奉天纺纱厂、八王寺汽水啤酒有限公司、肇新窑业公司、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等民族工业兴起，奉天省融资需求和服务性需求不断增加，需要有规模大、实力强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奉天省的金融机构极其庞杂，货币发行机关不统一，货币种类繁多，金融机构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解决这个难题，王永江决定重组东三省官银号，借助于金融机构的经营促进资金融通，从而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奉天省经济进一步发展。

（一）重组东三省官银号原因

1916年奉小洋挤兑之风盛行，纸币发行权不统一是致祸的重要根源之一。当时在奉天省发行纸币的银行有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支行、交通银行支行、兴业银行、商业银行、殖边银行、华富银行等。这些银行号均各自发行不同种类的纸币，从而衍生了一批专门从事买卖纸币、现银为生的各种银钱店和小钱铺。在奉天省城内商业繁盛地区，这类小型银钱店铺遍地林立，每逢金融不稳之际就更加活跃。1918年7月，王永江建议张作霖派员对省城各钱庄钱铺进行详细调查，对资本不满千元者，一律勒令停业。经过整顿，在百余所钱庄号中，只剩下义和园、益发和、世合公、宝隆号等21家，其余90余家均勒令歇业。^②此后，奉票进入了稳定时期，与朝鲜银行的金元票之比价从1918年到1920年都基本维持了等价的关系。其中，1918年和1919年大洋票价值甚至高于金元票，1918年大洋票0.97元等于1金元，1919年大洋票0.93元等于1金元。^③但纸币发行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时奉天省实力较强的东三省官银号、兴业银行和东三省银行同属官营，但各

^① 周骏，王学青主编：《货币银行学原理》（第二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② 魏福祥：《张作霖统治初期对奉票的改革与整顿》，《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③ 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第十章，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211页。

自经营。王永江认为东北金融机关“有江省之广信公司，吉省之永衡官银号，奉省又复并立三行，殊属政出多门。为三省之财政统一计，奉省之三行号亦有统一的必要。”^① 并且重组后的东三省官银号在整个东北地区都设有办事处，而且是唯一的为政府发行货币的机构，这将对稳定区域内所发行货币的汇率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重组东三省官银号将废止在区域内发行多种货币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以奉票这种单一货币作为东北的官方货币。^②

王永江也希望通过重组东三省官银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军费开支。1922年8月，奉天省开始实行军民分治。^③ 张作霖对于东三省军民分治当初不过“为脱离中央计”，但王永江“主张军民分治甚力，遂拟实行贯彻分治之主张。两者各有系统，以免侵扰。张作霖以总司令名义通令奉吉黑三省文武官署，一俟实行军民分治后，均须查照规定办理，一切不得互有掺杂情事”。^④ 随后，张作霖决计将奉天全省行政事宜责成王永江代省长办理。^⑤ 王永江筹划从省财政预算中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地方经济建设。但军费开支依然占政府收入的大部分，1922年年关军政费为230余万元，以军费为大宗，占去170余万元，更有军警犒赏费10万元，其余50万元始归政学各机关。^⑥ 1922年，奉天省政府的军费开支总计达到了1,317万元，占整个省政府预算的76.9%；1923年军费开支达到了政府总预算的80.5%，约为13,914,158元。1924年的军费

^① 荆有岩：《东三省官银号》，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② [美]薛龙著，姜宁译：《王永江与东三省官银号的重组》，《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③ 《东三省自治规约》，《盛京时报》1922年8月30日第4版。

^④ 《实行军民分治理》，《盛京时报》1922年9月5日第4版。

^⑤ 《划分军政之预闻》，《盛京时报》1922年9月23日第4版。

^⑥ 《核定年关军政费》，《盛京时报》1922年12月16日第4版。

开始预算仍然达到 13,988,098 元，占当年省政府总预算的 78.8%。^① 由于奉天省地方几大银号拥有部分自主权，军方可以在资金转帐及使用等方面绕过财政厅，随意到银行领取资金充当军费。财政厅不可能对军方的开支进行准确的帐目记录，军方在调配资金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一般说来，财政厅只是在军方进行了大笔的资金支取后，才能知道实际情况。所以，财政厅在极大程度上除了接受军方的行为外，对其他问题均无能为力。^② 王永江逐渐认识到只有建立健全的金融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制止这种混乱状况。

战争是财税金融良性运转的天敌，与战争相伴随的是金融紊乱。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筹措军费令东三省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对工商实业发放贷款，尽力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引起经济界的动荡。^③ “大洋价涨至 1 元 8 角上下，且有买而无卖者，停战之信自奉传来，大洋价骤落至 1 元 6 角上下。”^④ 直奉战争爆发后各银行停止兑现，银洋暴腾不已。因现洋缺乏，又日见腾涨。“金票每元由 107 或 108 吊涨至 119 吊左右。现大洋每元则涨至 133 吊。”^⑤ 金票频频涨价原因，一是奉直再战之消息频传，人心恐慌，争买金票以图安全；二是当局因买收军装、子弹，近来大事购买金票。^⑥ 为阻止奉票跌落，金票频涨，王永江通令省内各大小钱商自后不得再有买空卖空情事，否则一经查出或经人举发必严惩不贷。^⑦ 同时指令钱钞交易所遵守下列各条款：一日间金票交易额不得超过 100 万；交易市价每金票百元须在奉票 150 元以

^① Ronald Sulecki. Provincial finance in early republican: the fengtian provincial biulget, 1915—1928 [J],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 1977, (10).

^② [美]薛龙著，姜宁译：《王永江与东三省官银号的重组》，《史学集刊》，2003 年第 1 期。

^③ 孔经纬，傅笑枫：《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0 页。

^④ 《大洋价退落》，《盛京时报》1922 年 6 月 25 日第 4 版。

^⑤ 《银洋暴腾之恐慌》，《盛京时报》1922 年 6 月 7 日第 4 版。

^⑥ 《金票频涨原因》，《盛京时报》1922 年 9 月 15 日第 4 版。

^⑦ 《王代省长令禁倒把》，《盛京时报》1922 年 10 月 3 日第 4 版。

下；有违犯命令者即令闭市。^① 财政厅派巡官带警一名，监视一般交易商人，恐抬高价值。^② 如何稳定金融再一次成为当务之急。

另外，重组官银号可以降低经营费用。王永江明确指出，三行号合并后事业范围如旧，每年的管理开支将从 270 万元下降到 100 万元。节省的开支一部分从裁员而来，银行职员很快由原来的 800 名将裁至 500 人。在 1924 年 8 月，王永江正式发出通告裁员 300 人。与此同时，详细的裁员计划和训令也发至各个银行分支机构。正如王永江在公开声明中指出的，这种单一的管理模式将便于省政府有效控制官方帐户，并防止财政赤字。^③

1924 年 1 月王永江策动张作霖召开了东北三省军政官员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发展经济问题。会上“决定今后三个月内由三省联合集资 2,000 万元，一年内在十处建立官办工厂，并开发 30 处官有良好的采矿业。另外增加资本 200 万元，扩充呼兰糖业工厂、沈阳棉花厂、鸭绿江木材公司、裴（本）汐湖煤矿厂。除创办实业以外，又扩充公用事业，如自 1923 年至 1927 年，有 20 所中国人经营的电力公司先后设立，其中有公营的也有民营的。”^④ 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投入愈来愈多的资金，这急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金融机构，使政府能够顺利调配大量连续流动的资金。

（二）重组东三省官银号

1922 年底，王永江开始派员详细调查省城各银行号一年来之出入帐目。^⑤ 1923 年 1 月他指令对区域内的各家银行进行审计，查清这些银

① 《财政厅限制倒把》，《盛京时报》1922 年 9 月 16 日第 4 版。

② 《交易所几成虚设》，《盛京时报》1922 年 9 月 19 日第 4 版。

③ 《奉天票と東三省の金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6 年版，第 126 页。

④ 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台湾《传记文学》，第 31 卷第 4 期。

⑤ 《调查银行帐目》，《盛京时报》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4 版。

行所持有的资本量、储备金数量、货币发行量以及债券发行量等等。^① 1924 年 3 月，在审计结束后王永江召开了一系列的经济工作会议。会上宣布东三省官银号、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实行合并。^② 东三省官银号是当时东北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官银号于 1905 年在省城成立，最初名称是奉天官银号，配给资本为 300,000 两沈平银，几年之后徐世昌将其规模扩大，重新命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并将资本增加到 600,000 两沈平银。1918 年，东三省官银号的资本达到了一百万元，这个数字于 1920 年增加到 260 万元。^③ 东三省官银号保管着所有的政府基金以及税收收入，同时也履行发行奉天省政府货币的职责。奉天兴业银行由东三省总督锡良于 1910 年 12 月创办。民国以后，兴业银行代收回农业银行所发纸币，而另发兴业银行纸币。因其滥发纸币行务紊乱，北京政府责令该行限期收回纸币。1916 年 10 月兴业银行停业清理。复开业后，由官府担保信用发行纸币。1917 年 4 月民股由官府收买转为官办，发行不兑换债券。截至 1924 年，该银行的年利润约为 920,000 元。^④ 东三省银行于 1920 年成立，总行设于哈尔滨，分行设于奉天、吉林、黑龙江、黑河、长春、天津、大连、北京、上海、满洲里等 10 处。尽管东三省银行规模不大，但东三省银行仍然保管着相当大数目的政府基金。东三省银行的部分资本来自于通过奉天总商会购买银行股票的个人投资者，但是绝大部分的资本来自于奉天省财政厅、吉林省政府和黑龙江省政府。奉天省政府同时还拥有指定东三省银行董事的权力。东三省银行拥有配给资本 800 万元以及近 200 万元的已付股本，发行自己的可兑换货币。到 1924 年，其已付资本达到了 4,667,400 元，1923 年后

^①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Z]. Washinton, D. C.: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Service. 第 32 卷, 第 4909 条。

^② 《满洲日日新闻》，1924 年 3 月 15 日。

^③ 《奉天票と东三省の金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6 年版，第 2~4 页。

^④ 《奉天票と东三省の金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6 年版，第 125 页。

两个季度的利润为 1,466,351 元。^① 东三省银行发行以现大洋为本位的纸币，称哈大洋，合并到东三省官银号后，哈大洋仍继续发行。三行合并后，东三省官银号资本增加到奉大洋两千万元，实收资本 13,881,125 元 3 角 1 分。其中由官银号股本奉大洋 500 万元，公积金 3,064,086 元 1 角 3 分；兴业银行股本奉大洋 200 万元，公积金 1,202,289 元 1 角 8 分；东三省银行股本奉大洋 250 万元，公积金 113,750 元。^② 其全部资本均属于政府基金，承担奉天省政府货币发行的职责。^③ 除此以外，东三省官银号作为东三省的核心金融机构还承办省政府金库事务、办理省内外汇兑业务、金银及各种货币之交易、存款与放款、抵押与期票、汇票兑现等业务。

王永江对东三省官银号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增设督办一人，由王永江兼任，同时由省政府委任总办一人，会办三人。总办统管官银号一切事务，对外为官银号之全权代表。会办协助总办襄理官银号事务。官银号总号下设业务部、文书处、稽核处三大部门。王永江任命社会名流担任官银号的总办、总会计师。总办的职责是管理银行的总体运作，由刘尚清担任。刘尚清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1913 年任奉天省财政司科长，1914 年到 1919 年 9 月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1920 年任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并兼永济官银号总办，1921 年秋到 1922 年期间任东三省银行行长。总会计师的责任则更集中于管理银行的帐户和资金流动，职位极其重要。王永江委任与其合作多年的彭贤担任这一职务。彭贤于 1917 年 11 月担任东三省官银号稽查，1919 年 7 月升任为总会计师，1919 年 9 月，担任黑龙江省财政厅执行总办。1924 年 6 月，他在担任重组后官银号的总会计师同时兼任总经理一职。姜德春担任长春分行行长，他自 1916 年起担任奉天兴业银行稽查、总会计师，最后成为总

① 《满洲日日新闻》，1919 年 11 月 21 日。

② 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报告书》，1931 年版，第 97 页。

③ 《满洲日日新闻》，1924 年 7 月 16 日。

办。河北分行行长由曾担任东三省银行总经理的梁质堂担任。东三省官银号组织结构调整以后，东三省财政管理精英济济一堂，保证了银行号的良性运转。同时，他们是王永江的支持者，保证了王永江的决策在官银号内得以贯彻实行。为了使奉票成为唯一的市场货币，省政府发行流通一批新的奉票，委托纽约美国银行货币公司印制。新奉票在 1924 年印制完成，于 1925 年在整个东北广泛流通。

（三）重组官银号意义

东三省官银号把三个银行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机构，王永江亲自担任督办一职，从而拥有了任命银行董事会成员和监督官银号每天运作情况的权力。东三省官银号重组以后，在严格的资金支出审查体系下，只要抽调超过预算或是未被批准的资金都会被立刻发现。在王永江同时担任奉天省代省长、财政厅厅长和官银号督办的局面之下，军方在没有经过其同意时，已经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从财政厅调用资金了。^① 因此，王永江能够对政府基金的流向进行更为精确的监管，以防止军事建设所动用的资金超过核准预算，从而保证政府发展项目所需的资金投入。^②

东三省官银号重组促进了官银号自身发展和奉天省经济地方经济的繁荣。重组后官银号的分号已经遍布三省主要城镇和关内大商埠，共 80 多处。王永江极力扩展官银号的场所网络，为商业团体提供方便的服务。它拥有 100 个网点，其中 77 个是完全经过审定的，至少有 11 个是主要分行，鉴于商业活动主要是以现金进行交易的，这些分行拥有巨大的现金存款。^③ 东三省官银号也推动了奉天省经济的稳定增长。官银号董事会采用王永江建议，通过直接投资或者给中国私人企业的贷款来

^① 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of Manchuria [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96 第 45 页。

^② [美] 薛龙著，姜宁译：《王永江与东三省官银号的重组》，《史学集刊》2003 年第 1 期。

^③ 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of Manchuria [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96 第 47 页。

鼓励地方工业的扩展。投资和贷款获得的盈利，40%用于保持奉票的价值，30%用作财政整理基金，剩下的30%用作奉天省地方教育预算的补充、公共建设工程的资助款项和地方紧急救济基金。^①在1924年，官方银行公布的盈利为3,145,499元，^②而在1925年，银行的盈利达到了4,467,751元。^③1924年奉天省政府继续积极地推行一系列地方发展项目，建立奉天纺纱厂、东北大学和奉海铁路等。所有这些项目均得到了奉天省政府财政厅的大量拨款。^④1925年王永江批准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实业的兴办：“添派三省实业督办一员，以便督饬开办实业；添派三省职务监督一员，开采各种官有矿务，由三省筹定二十万元作为基金；添派三省铁路总监一员，兴修指定之铁路；由三省筹定一千万元，组织官办大工场一处，勒令收入无业民，学习各种工艺，并不限额。”^⑤

总之，东三省官银号重组后，王永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军费开支而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在东三省官银号强大的财力支持下，更多的私人投资者和商人来推行实业振兴的计划，带来了1920年代东北工商业发展的繁荣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讲，重组后的官银号可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地方银行。

社会存储理论^⑥将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

① 《奉天票と東三省の金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6年版，第131页。

② 《奉天省の財政》，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424页。

③ 《奉天票》，三菱合资会社，1926年版，第3页。

④ 《满洲日日新闻》，1925年2月28日。

⑤ 《东三省兴办实业计划》，《晨报》，1925年3月2日第7版。

⑥ 储论又称为库存论，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仓库储存的理论。任何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或供应，都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物资。但存货过多，会积压资金增加仓储费用；存货过少，可导致供不应求影响生产。存储论就是研究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办法保证一个合理的、经济的物资存储量、即“物资最优存储量”的理论和方法。它既要保证生产供应等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又要使流动资金占用额和进货仓储费用降到最低。把存储理论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为李桂海。详见《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第140—150页。

类是“自然存储”，即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开拓能力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方式等；另一类是“社会存储”，即整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积聚的财富。^① 如果社会结构中“存储”的“输入”等于或大于“输出”，即“存储”的耗费获得了及时补偿，社会呈现稳定发展局面；反之，如果“存储”的“输出”大于“输入”，即社会耗费没有得到及时补偿，造成“存储”的耗竭，则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可以说，“存储”的多少与补充方法的是否完善，是反映一个社会结构是否有发展活力的重要标志；而如何在“存储”消耗之后及时进行“存储”的开拓补偿，则成为稳定社会最重要问题。如上所述，王永江通过一系列财税金融的整顿改革措施，保证了社会“存储”的开拓和补偿。但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得到开拓和补偿后，如何征调和分配“存储”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对此，王永江与张作霖等出现了分歧。王永江提出削减军用经费，增加民政经费；张作霖则“听杨宇霆之计，日以扩展军备开疆辟土为事。”^②从1922年起，除第二次直奉战争约7,000万元的额外支出之外，每年的日常军费支出就达1,800万元，兵工厂每年支出2,300万元，张作霖的个人活动费和机密费近千万元。而奉天的年总收入较高的1925年也只有2,300万元，就是将所有能够加征的赋税再行增加，也难以填平这样一笔巨额开支。^③ 社会结构中的“存储”处于枯竭边缘，奉天省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奉票的发行额逐年增加，且呈直线上升。其发行数额如下：

① 李桂海：《现代人与历史的现代解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② 金毓黻：《王永江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③ 《奉天省的财政》，转引自高乐才：《王永江评传》，《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

表 1-9 奉票发行额一览表（单位：元）

年度	奉票发行额	年度	奉票发行额
1916 年末	15, 080, 000	1925 年 11 月	513, 723, 000
1922 年末	36, 000, 000	1928 年 1 月	1, 300, 000, 000
1924 年 11 月	223, 284, 000		

资料来源：《向导》，第 170 期，第四集，第 1731 页。

通过上表可看出，1925 年奉票发行 5 亿多元，较 1916 年增加 33 倍之多，而 1928 年较 1916 年增加数额竟达到 86 之倍之多。奉票滥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奉票与日本在东北发行的金票的比价直线下降。

表 1-10 日本金票百元对奉票平均行市表

年别	奉票（元）	年别	奉票（元）
1920 年	100	1926 年	359
1922 年	135	1928 年	957
1925 年	168	1929 年	2, 510

资料来源：常项：《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14 页。

如表 1-8 所示，1920 年奉票的价格还与金票相等，到 1927 年它与金票的比价几乎达到了 1: 10，到 1928 年竟然达到了 1: 25，即奉票的价格已经跌倒了 1920 年原价的二十五分之一。

伴随奉票的贬值，奉天省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近代面粉、油坊、烧锅等并称为东北三大工业，此间均受到打击。如奉天油坊以前有 50 余户，到 1927 年仅存 20 余户，倒闭了五分之三。^①其他如织布业等也不能幸免。“新民县织布业与烧锅、油坊同为该县工业中之最大者，向极发达，……本年（1927 年）因奉票跌价关系，纱价抬高。出货难售，各厂出入均感困难，其资本微薄者，以无力支持，相率歇业。”^②营口织布工厂 1925 年有 120 家，“现因时局不靖，金融滞塞，停工者多，仅存

① 奉天商工会议所编：《奉天经济二十年志》，第 628 页。

② 《经济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第 516 页。1927 年 11 月 1 日。

大小 87 家”。^① 又据“满铁”调查课的调查，“仅 1927 年初 3 个月，在奉天城内即有 400 户工商业倒闭”。^②

农村经济也遭到破坏。这可以从当时田租的变化得到印证。我国“田租还包括一部分农业的红利，甚至一部分工资，这种不正当的田租完全成为田价利息。所以田价的增高尤其当地主受到田赋税捐的压力而田价的利息被侵夺的时候，地主为了维持自身利益更有增加田租的必要”。^③ 仅以表 1-9 中 1922—1925 年辽阳县钱租情况为例，两年之间，钱租最高上涨 150%，平均上涨达 76%。

表 1-11 1922—1925 年辽阳县部分地区钱租上涨情况

年代	辽阳大双树屯			辽阳小闻屯			辽阳五里台子		
	上地	中地	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上地	中地	下地
1922	30 元	25 元	17 元	65 元	55 元	30 元	25 元	20 元	15 元
1925	75 元	60 元	40 元	85 元	75 元	50 元	30 元	25 元	20 元

资料来源：根据民国 25 年编：中国经济年鉴，第七章第 241 页修改。

由于战争费用、日常军费、兵工厂支出及张作霖的个人活动费和机密费等社会“存储”过量的耗费，奉天省社会“存储”结构已遭到破坏，并已经造成生产的萎缩，进而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存储”行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毕竟只能起到一种调节的功能，动用“存储”调节社会结构的发展并不是无限度的。奉天省在社会结构中“存储”积累后，由于对其配置不当，使得“存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再开拓与再补偿，良性经济循环遭到了破坏。尤为严重的是，在“存储”配置极不合理、已经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存储”补偿和分配的办法的情况下，王永江裁减军队和军费建议没被采纳，张作霖依然一意孤行，挥师入关并进军华东地区。于是，奉天省处于动荡、混乱状态也在意料之中了。

① 《经济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第 5 页。1928 年 2 月 5 日。

② 满铁调查课：《東三省官憲の施政内情》，第 27 页。

③ 陈翰生，王寅生：《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东方杂志》，1927 年第 16 期。

第二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 农业早期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中国早期现代化与农业关系最为密切，这是由于一方面工商业的发展必须由农业提供优质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依然以农业为主。中国农业早期现代化始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农业是以生物和自然生产要素为基础，以封建租佃和小农经营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其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知识贫乏，生产技术原始，土地和水利凭借自然，生产发展缺少外部刺激，生产方式封闭僵化，使扩大再生产难以进行，商品化程度和经济效益低下，劳动力投入巨大。^①传统农业不能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商品市场、生产原材料和劳动力，因而成为农业早期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民国初期，奉天省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但因时局不稳，成绩不佳。1916年4月，张作霖任奉天将军兼巡按使后，任命王永江为奉天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局长。王永江积极推行清丈政策，加速了奉天省的地权关系进一步转变。1922年5月，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王永江任奉天省代理省长，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改造传统农业的政策法规，如继续清丈土地、鼓励移民垦殖、发展农业试验机构、改良耕作技术、推广机械农具等，加快了新式农业经济增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奉天省农业早期现代化发展。

^① 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农业现代化》，《扬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第一节 地权关系进一步转变

地权是指土地所有权，即土地所有者占有、使用和处置土地的权力。在复杂的土地关系中，所有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它决定和制约着土地关系的其他方面。清军入关以后，奉天省土地的占有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官地，分为官庄和官荒。官庄即皇庄和王庄，是已经开垦的熟地，官荒即皇室所有的围场和牧场。二是旗地，是官府分给八旗兵丁和下层旗人的土地，有占有权、经营权和部分所有权，要承担一定的义务。三是民地，指一般民户拥有的私有土地，允许自由典卖、转让，承担国家的田赋义务。^① 奉天省地区的官地、旗地很早就有私有化趋向。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盛京内务府果园人丁由私自典卖房屋田地者。雍正九年（1731年）盛京内务府牲丁有私自典卖房地者，民人以高价典买，并交纳钱粮，以为永久之业。^② 但一般旗地转为民地长期未得合法化。自咸丰二年（1852年）有户部议奏旗地买卖章程，但其间多次奏禁一般旗地买卖，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终于正式议准一般旗地随意买卖^③，旗地转为民地合法化。1908年秋冬二季内，盛京镶红旗界内共有旗地买卖147件、镶蓝旗界共有旗地买卖149件、正红旗界共有432件^④，其中有旗人间相互买卖，也有旗人与民人间交易，交易数额少则几十亩，多则上千亩。有些旗人由于土地过多、或无力耕种，将土地典押给一般民人。

清末，清政府出于抵御外侮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推行移民放垦政策，奉天地区先后丈放了东流围场、西流围场、大凌河牧场和盘蛇驿牧场等。

^① 孔经纬：《东北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② 《黑图档》，雍正十年《京来档》。

^③ 户部井田科：《奏资辑要》（上卷），《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01页。

^④ 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238页。

土地的放垦，增加了奉天省耕地面积。1887年全省耕地面积为2849.6万亩，^①1908年全省耕地面积约为4084.4万亩，^②到1909年，全省耕地面积达到41,802,709亩。^③进入民国时期，奉天省地权转移速度大大加快了，其动因主要源于土地丈放和移民垦殖。奉天省的地权关系的变化催生了一批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地主，在省政府倡导下，他们积极改进技术和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为奉天省农业早期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一、土地丈放

民国初年，奉天省设立了官地清丈局，后来又设立奉天丈放官地总局，负责管理全部土地丈放事务。土地丈放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指清丈土地，即对土地面积的重新统计；二是放领土地，是指土地所有权的下放和转移。^④丈放土地以“清理官产，厘定人民产权”为宗旨，其真实目的为解决奉天省财政危机。奉天省官地清丈局的公文中也不断强调收款的重要性，提出“办事以求速为主，丈地以收款为先”，“丈地务宜求速，收款尤不可缓”^⑤。由于丈放土地把“筹款”作为唯一指向并且丈放人员乘机搜刮，引起了乡民的不断反抗。1916年，奉天省抗丈风潮遍及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黑山、辽中、庄河、盖平、海城、沈阳、新民、兴京和康平等十几个县。4月，海龙县3000余人，手持器械，将县署团团围住，要求县知事停止清丈。5月，东丰县抗丈群众曾聚集了4000人，进逼县城，清丈局被迫“收回绳弓”；绥中县抗丈群众千余人夺取保卫团枪支，围攻县城。

在抗丈过程中，一些乡民提出了具体要求。如西安（今辽源）县乡

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农户天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0页。

② 《农林公报》，第1年第11期。

③ [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蒙全书》，第3卷，农业篇，大正12年，第18页。

④ 金艳丽：《奉天省土地丈放》，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⑤ 《总局丈放山荒章程、丈放王公庄地章程》，奉天官地清丈局档案全宗，第8997号卷。

民提出：“清丈地亩事，已丈者请缓期交价，未丈者缓至秋后再丈，册照费减价一半。过期加罚，其中弊实横生，请为轻减浮收款目；省公债乃民间含泪输纳，现换公债票不但折去原本，且均未给利，并有冒收情弊；牲畜补征乃系接续前办，无如今夏影响于去年歉收，民间皆嗷嗷待哺，实不堪再行补征，请为暂缓；质问收捐处帐目未能算清。公布以前电线费用，究竟作何用途，会否积有息利，此次购买电杆仍系出自民间，主何理由，请饬收捐处清算明白，以昭大信。且原买电杆五角，今冒称每杆价一元五毛，尤应剖示”。^①除了最后一条由县核示以外，其余几项乡民要求详细上报张作霖。西安（今辽源）在抗丈中所提出的要求涉及到的显然不仅仅是清丈问题，而是触及税款征收制度缺乏公平性和税政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张作霖认识到“若不设法维持，深恐响影全省为患”。^②

1916年5月，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全省官地清丈局副局长，7月升任奉天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局长。王永江针对丈放中存在的弊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撤换清丈官员。一般说来，土地清丈过程中与乡民直接接触的是清丈员。而清丈员或者“纵容绳役需索规费”，或者“径自舞弊，颠倒长短”，^③王永江亲自派前任千山临时调查员李邦桢等分赴盖平等县调查，将不称职官员一律进行撤换。如东路清丈局长查富玑到局接任后，东丰屡起清丈风潮，王永江认为“其不善与民间代表接洽所致”，马上撤换；^④西安（今辽源）清丈人员“一并撤委”。^⑤第二，委托县代收清丈款项。在收缴地清丈款项时，监绳委员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一般都需要借助各县地方官办理，清丈委员只负责接收，

^① 《西安反抗声中之要求》，《盛京时报》1916年5月22日第4版。

^② 《通令各县防范反抗风潮》，《盛京时报》1916年5月20日第4版。

^③ 《派员调查监绳弊端》，《盛京时报》1916年5月18日第4版。

^④ 《东丰清丈》，《盛京时报》19160年6月3日第4版。

^⑤ 《整顿清丈志闻》，《盛京时报》1916年6月2日第4版。

此举“实地方官分任其劳，委员坐享其功。与其虚糜薪俸，何若裁并为宜？”^① 王永江命令海城等县清丈委员将清丈事宜交由县地方官员受理，从而减少了经费开支。第三，裁减局费和人员。王永江将随时调查员 12 名一并裁撤，“以节靡费”。随后与局长议决将该清丈局原有两科“裁撤其一，只留一科，人员亦大加裁汰”。西安（今辽源）、海龙、西丰各行局也“拟于停丈中辍，暑假后不再派员往丈放。”^② 对留用人员的薪金也大幅度削减，从前绳员每月薪金由 80 元减至 40 元，公费由 100 元减至 60 元。^③ 此外，王永江还采取了奖惩兼施办法。他提出“绳员舞弊所在，”必须严加惩办；“勤恳廉洁者，必极意奖励”。^④

1916 年 11 月王永江转任奉天省警务处处长，但是一直兼任奉天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协理，密切关注农业发展状况，并参与了 1918 年奉天省《改订丈放各种官荒章程》的制订。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他继续推行土地丈放政策，先后颁布了《奉天省改订丈放王公庄地章程》、《清赋办法六条》、《奉省丈放内务府庄地章程》、《查丈王公庄地章程》、和《丈放省有三陵内务府各种官地房基章程》等，并严格督饬奉天官地清丈局、屯垦局等积极推行。王永江积极推行与制定土地清丈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如表 2-1 所示，1916 年随缺伍田丈放数额为 308,578 亩，1917 年为 165,842 亩，此后逐年减少，到 1922 年为 1639 亩，表明 1916 年土地丈放阻力很大，成绩也很大，随后政府为缓和矛盾冲突，采取渐进的方式，清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到 1925 年 2 月，“以随缺伍田地已多数丈竣，呈奉核准撤销屯垦局名义，仍定名曰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⑤ 从此，奉天地区随缺伍田通过合法方式转变成为一般民地。

① 《清局地价委县代收》，《盛京时报》1916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② 《清丈局裁减志闻》，《盛京时报》1916 年 6 月 2 日第 4 版。

③ 《清丈局核减公费》，《盛京时报》1916 年 7 月 27 日第 4 版。

④ 《清丈局裁减志闻》，《盛京时报》1916 年 6 月 2 日第 4 版。

⑤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221 号卷。

表 2-1 1916—1924 年奉天省丈放随缺伍田的数额

年份(年)	丈放数额(亩)	年份(年)	丈放数额(亩)
1916	308, 578		
1917	165, 842	1920	7, 590
1918	102, 707	1921	3, 174
1919	81, 169	1922	1, 639

资料来源：根据《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整理

官荒依然陆续放垦。表 2-2 表明，从 1915 年到 1924 年奉天省官荒出放达 1427, 718 亩，成为耕地增加的重要原因，这在边远县区表现尤为明显。如安图县 1917 年 1 月至 1925 年 8 月共出放官荒 155, 317 亩。1917 年，安图县仅有耕地 36, 992 亩，到 1928 年增至 107, 040 亩。^①

表 2-2 民国初年奉天省官荒出放情况

年代	出放面积(亩)	年代	出放面积(亩)
1915	395, 481	1920	170, 647
1916	150, 699	1921	83, 347
1917	30, 652	1922	72, 740
1918	15, 573	1923	446, 363
1919	25, 301	1924	36, 515
合计			1, 427, 718

资料来源：《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

官地丈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1916—1918 丈放王庄的数额分别为 169, 062 亩、24, 101 亩和 1, 109, 581 亩；^② 从 1919 年到 1924 年，奉天省共丈放王公庄地 1, 242, 692 亩。^③ 1925 年，奉天省下令将未经呈请丈放的各王公庄园“一并收为省有”。^④ 从 1920 年到 1924 年，内务府官地共丈放 33, 385 亩。1920 年丈放三陵衙门官地 21, 834 亩，

① 陈国钧：《安图县志》，卷 4，1929 年。

② 《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民国年稿本。

③ 《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民国年稿本。

④ 杨学琛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92 页。

1921 年丈放 2,478 亩，1922 年丈放 17,947 亩，1923 年丈放 11,132 亩，1924 年丈放 112 亩；1922 年丈放喇嘛养膳地 24,305，1923 年丈放 5,323 亩。^① 清室三陵祭田官地、祭果官山也于 1925 年起逐渐丈放。^②

奉天省政府在土地丈放中获得了大量财富。按照《查丈王公庄地办法》，“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③ 由于“王公庄地均系前清国初时拨给垦种，迄今二百余年，从未清丈，其中侵占浮多者尤难数计。浮多土地可能超过正额，至少百余万亩，价值六七十万元。再加上 20% 的正额地价，奉省仅从丈放王公庄地即可得百万以上收入。”^④ 1924 年奉天省丈放王公庄地 1,242,692 亩，共收入王公庄地八成地价 4,905,017 元。^⑤ 丈放土地所得成为奉天省的一项大宗收入。1916 年奉天省岁入总数为 12,427,619 元，而田赋的收入就有 2,925,670 元，占全部收入的 23.5%。^⑥ 通过清丈土地奉天省控制的土地数量增加了，田赋收入必然随之增加，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土地成为永久稳定的税源。

奉天省土地丈放是对“身分世袭制土地的整理”，丈放出去的土地成为纯粹私有地，“前清诸官庄，便在法律上失掉一切封建性，现出近代的面貌”。^⑦ 虽然这种变化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官庄旗地转化为民地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而私人地主为了扩大剥削，更易于采用新的经营方式，从而有利于封建经济内部资

① 《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民国年稿本。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459 号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131 号卷。

④ 乌廷玉等：《东北土地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56 页。

⑤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下卷，民国年稿本。

⑥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114 页。

⑦ 《满洲经济年报》1933 年，第 24—28 页。

本主义的萌芽”。^① 土地丈放后，佃农与地主尤其是与普通私人地主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因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经济剥削关系，加速了农民由租佃关系向雇佣关系的转化，1920年代，奉天省平均每户雇 3.3 人，占总劳动力的 40.3%。30—50 坪的田场，雇工比重为 32.1%，50 坪以上的田场，雇工超过了自家劳动力，比重达到了 56%。^② 这无疑为奉天省农业早期现代化准备了条件。

二、移民垦殖

奉天省土地虽开发较早，但“西北各县尽属蒙古荒地，此处开放虽然已有年余，开垦尚未及其半，内地荒地亦有开拓未尽之处，故边境如不设法殖民，则不能奏效”。^③ 一些县区的“山深林密之处，易窝藏匪匪，”移民又被视为解决匪患的重要途径。因此，王永江通令“各县速即设法移民，”并批准“引用奖励实业及垦殖章程以收效果”。^④

(一) 制定优惠移民政策

民国初年，虽然有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三省，但是移民绝大多数进入东北北部地区。1915 年东北南部的人口增长率为 1.45%，而东北北部则为 5.06%。^⑤ 奉天省人口增加主要是自然增长。^⑥ 尤其严重的是奉天省还存在移民移出现象，1915 年“奉天所属各县多因秋雨为虐，受灾甚重，人民无力生活。去冬已有多数难民携家前赴黑龙江属各县开垦荒地。……近因天气和煦，解冻在即，每日自长春到埠之垦民，携男带

^①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中国希望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6 页。

^② [日] 满铁调查课：《满洲农家の生产と消费》1928 年日本版，第 106～107 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④ 《各县设法移民》，《盛京时报》1922 年 9 月 29 日第 4 版。

^⑤ 满铁调查课：《满蒙の大势》第 2 卷，1918 年版，第 61 页。

^⑥ 陆军参谋本部：《满蒙资源要览》，日本东京，1932 年版，第 6～7 页。

女为数颇多。闻赴松花江下游各处者最占多数。”^① 为改变这种状态，王永江采取一系列措施吸引移民进入奉天省。

移民机构的设置是进行有组织移民的基础。王永江饬令在皇姑屯、营口、安东（今丹东）、大连等难民的必经之处，分别设立了临时收容所，“每于难民到时，先行收容所内，查明人数籍贯。其有寻找亲友者，则询问明地点，指引路径，酌给川资，令其前往。其无预定地点者，则饬令各县妥为安插，一俟明春开冻，分交各地开垦荒地。”^② 如“遇贫者、无货者并须募款救济，若募款不足时，得由公款量为补助，务令存活”。^③ 王永江还提议在难民来源地或必经地设置移民局，1925年奉天省在天津组织移民局，以便对打算迁徙的人们给予帮助。^④ 并特意派专员“冯献臣到河南地募丁垦荒”。^⑤ 各县纷纷制定吸引招垦移民的政策，如“双山县属荒地甚富，为招徕垦户起见，沈阳县知事制定优待办法，由各县发给护照，如持有此护照之农民，乘四洮路车至卧虎山下车者，按三等车票收三成车资。”^⑥ 这些措施对吸引和安置移民具有重要作用。

奉天省地方政府对移民所需各项经费进行具体规划，其中募民费15万元，设屯垦局费5万元，移民帮助费5万元，移民保护费5万元，共计须费35万元。由于长白与洮南等地匪患严重，在移民居住地带各派兵三百名守护。^⑦ 引进移民的县区对移民安置工作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安排。在移民未到达之前，县政府在预定地点令各村长“详查当地有粮之大户，先令垫借牲畜、籽种及粮食，前项所借粮食于第一年收获中扣

① 《远东报》，1916年4月1日。

② 《东北垦殖史资料》上辑，第2—11页。

③ 《难民救济》，《盛京时报》1927年5月17日第4版。

④ 辽宁省公署档第156捆第1卷转引至乌廷玉等：《东北土地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⑤ 《奉天募丁垦荒》，《晨报》1925年6月1日第3版。

⑥ 辽宁省图书馆藏：《双山招垦之优待》，《盛京时报》1924年4月12日第4版。

⑦ 《张督办移民之计划》，《盛京时报》1925年2月17日第4版。

还，均各加息一分”。对移民领种的荒地则给予适当照顾与体恤，凡灾民在垦荒县份，应与土著农民同等待遇。^① “移民所用旅费均由官给。所领生荒，三年无税。自四年起纳税，并分驻军队六旅，以保护移民。”^② 移民“受领荒地十晌，应限期垦熟，满五年后再行升科。”^③

（二）鼓励垦殖

移民为发展农业垦殖准备了劳动力条件，但垦殖业能否因此而兴起，政府的政策导向起着重要作用。王永江早年从事土地清丈工作，对荒地的状况以及如何鼓励承垦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制定并颁布了《奉天省垦荒大纲》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鼓励移民垦荒，扩大种植面积。这些条例具体地规定了鼓励垦荒的政策和办法，较之以往的垦荒政策和管理办法有很大的进步，并表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主要有下述几点：其一，界定垦荒地的范围。奉天省垦荒区域以洮南、安广、双山、镇东、开通、突泉、瞻榆、通辽、临江、长白、金川、安图、抚松等县为限。这些垦荒地的种类和范围显然是那些尚未开垦和人烟稀少地区的荒地。开垦这些荒地，不仅将变废地为良地，增加耕地面积，而且将带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民向人口稀少地区迁徙，既可收移民实边之效，又可使人口区域分布趋向合理化。其二，明确了承垦者的资格和地价。承领官荒者可以个人或合资形式拥有承领权，但以中华国籍为限，不允许代外国人冒领或渗入外资股，“以重主权”。^④ 王永江将荒地分成五个等级，各等级间价格不等，交齐地价的时间也不同。一等、二等、三等每方^⑤价格分别为400元、300元、150元，限三年缴齐地价；四等五等分别为80元、50元，限八年缴齐地价。^⑥ 其三，规范承垦的程

^① 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卷25第12号，第16页。

^② 《张作霖积极经营东三省》，《晨报》1925年2月2日第4版。

^③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4678号。

^④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4678号。

^⑤ 1方=48日。

^⑥ 《省署规定荒地价格》，《盛京时报》1925年4月12日第4版。

序。无论原业垦户或新承领垦户，限定三年，分年垦齐。第一年开垦三分之一，第二年垦三分之二，第三年完全垦熟。在一般情况下，必须按照规定的年限完成开垦计划，并向主管官署报告开垦进度，不允许擅自继承和转移承垦权，否则全部或部分撤销其承垦权。在放荒过程中存在承领荒地却不开垦现象，如“西丰县放荒之始，多被包揽大段者垄断居奇，以致垦户裹足，贻时期已久而购买无人，垦者不过十分之四，地终荒废。”^① 为革除弊端，各县采取不同方式进行限定，通化县“通令承领户于四十日内重新报领，逾期准外户报领。”^② 洮安县制定《另放章程十三条》及《施行细则二十一条》，限定规定日期以前各原户如不到段开垦，即将原领撤销另丈，^③ 从而避免领而不垦现象，并提高了开垦的实际效力。其四，采取经济鼓励措施。王永江为鼓励人民踊跃垦荒，对于首先报领者除予以优先权外，并发给奖金。领户“如能于三年期满垦熟或建筑并无违误，准按所垦之荒或建筑基地劈与垦户，修房户得十分之六，原领户可得十分之四，以示激劝而促发达。”^④ 各县也纷纷制定奖励办法。镇东县地处边隅，荒地多未经开垦，镇东县知事拟定如下办法，“凡各处农民自往开垦者在五年以内垦熟者免捐二年，六年以内开熟者，免一年。前往当地垦荒农民颇为踊跃”。^⑤ 营口县自 1917 年至 1927 年十年间就新增升科地 835 239.065 亩。^⑥ 可见当时的放垦开垦的速度非常之快。

上述垦荒条例和规则的制定与颁行奠定了奉天省的垦荒政策基调。此后奉天省政府虽然又制定了一些有关鼓励移民垦殖的政策和条例，但大多是在修订王永江所颁布的有关条例基础上而形成的。奉天省的移民

① 《新颁布撤荒章程》，《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

② 《清丈局布告》，《盛京时报》1923 年 12 月 29 日第 4 版。

③ 《布告洮安撤地期》，《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23 日第 4 版。

④ 《请发给垦荒奖金》，《盛京时报》1923 年 7 月 28 日第 4 版。

⑤ 《垦荒免捐》，《盛京时报》1923 年 9 月 20 日第 4 版。

⑥ 《营口县志》，1935 年，第 141 页。

优惠政策吸引了关内移民，关内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东北原有的笨重的旧式生产工具被淘汰，出现了木犁和轻便的锄头。同时更加注意深耕细作，一般要二铲二趟，及时追肥、施肥，^① 农作物的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如玉米产量在 1924 年时为 161.8 万吨，1925 年则增至 180.8 万吨。^② 移民为奉天省工商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 1925 年宽甸县缫丝作坊已经发展到 54 家，著名的有范家作坊、福兴德丝坊等三家，都是山东昌邑人开办的。^③ 据民国二十年《东北年鉴》记载，“来东北经营商业者，多系内地各省之客籍商人。以直鲁晋三省之人为多”。^④ 从某种意义上说，移民是发展东北农业经济的主力军。美国学者薛龙即指出：正是移民的劳动，到 20 世纪下半期，才使东北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⑤ 移民为东北边防作出了贡献。时人已经认识到，“今日东北边防，尚能有恃无恐者，人口繁殖，实其一因。”^⑥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也曾这样警告日本人，“东三省华人既这样发达，日人欲在这三千万群众之中，实行其自由行动，恐非易事。反言之，倘日本人执迷不悟，遇事横行，东三省人民势必群起而逐之”。^⑦

土地丈放和移民垦殖为奉天省农业早期现代化准备了条件。首先，

^① 《辽宁省沈阳市满堂乡满族调查报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0~21 页。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 农产》，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 年版，第 8 页。

^③ 政协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委员会：《宽甸文史资料》第 1 辑，1990 年内部出版，第 85—86 页。

^④ 东北文化社编印处：《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 1931 年版，第 1014 页。

^⑤ SuleskiSuleki.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 Immigrant Laborers and Provincial officials in the 1920s [J]. Modern China Vol. 4.

^⑥ 《赈灾与移民》，《大公报》（天津）1929 年 7 月 18 日第 2 版。

^⑦ [英] Manchester Guardian: 《英报之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前途观》，《东方杂志》第 25 卷第 24 号，1928 年，第 56 页。

土地丈放和移民垦殖之后，虽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化。土地从八旗王公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的庄头地主和移民手中。但这次土地丈放和移民垦殖采用了价买的方式，无论价格高低，都需缴纳一部分地价，土地所有者与国家并未形成任何超经济义务的关系。其次，佃农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旗地佃农面对的是具有特权的政治实体，他们既是经济上的被剥削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被统治者。随着官庄和旗地大量转化为民地，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他们与地主尤其是与普通私人地主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因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经济剥削关系。农民与土地逐渐松散的关系加速了农民由租佃关系向雇佣关系的转化。这不仅使佃农身份地位的改善，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就私人地主而言他们为了更大限度地榨取地租利润和增加剥削收入，也更易于采用新的经营方式使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有所发展，有利于东北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长。^①他们在价领土地后，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地主，这是东北土地制度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

第二节 农业经营方式的资本主义化

土地问题包括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其中土地占有是基本方面，它决定和制约着土地使用。而土地如何使用则反映土地占有的性质和作用，也反映农业生产力水平。1920年代，奉天省土地占有形式转变带动了土地经营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农业商品经济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经营方式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日益加深了。

^①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249页。

一、农业生产专业化

奉天省是东北开发较早的地区，人口相对稠密。据 1915 年的统计，东北（包括热河）耕地面积为 1733.622 万天地^①，人均耕地 7.08 亩，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9.28%。其中奉天省耕地面积为 748.92 万天地，人均耕地 6.28 亩，占总面积的 19.75%；吉林省耕地面积 506.31 万天地，人均耕地 8.98 亩，占总面积的 14.82%；黑龙江省耕地面积 250.12 万天地，人均耕地 10.02 亩，占总面积的 2.87%。^② 到 1920 年代，奉天省粮食大多被当地居民消费，粮食输出明显减少，从前专门以种豆出口为业的辽河流域为满足当地城乡居民粮食消费，于不知不觉中种高粱等食粮，产豆之区被挤而北迁。^③ 如何利用较少的耕地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奉天省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王永江认为通过大力推广种植经济作物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他指出奉天省“经营特殊农产品者不仅稀少，而且对其研究亦不充分。不知特殊农产品需要之大，而且优良者盈利亦高。如能善于从事其种植，所得其利必将无限。”^④ 他要求县知事等地方官员“除掉地位、亲戚等观念，特别选出具有特殊农业知识和经验者，使其对适合土地之谷物进行充分之研究。如有适于某种特产品时，应竭力予以倡导。”^⑤ 1925 年他得知“蓝靛一项为商民所用之大宗，特通令辽沈、东边、洮昌各道尹转各县知事劝导人民广种蓝靛”。^⑥ 在王永江的积极倡导下，奉天省出现了棉花、柞蚕、果树等经济作物生产专区，粮食作物区域化也日趋明显。

① 1 天地合 10 小亩

② 《满蒙の大势》，第二卷，第 100 页。

③ 《我们的富源》第 34 页，转引自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00 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⑤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⑥ 《王省长令劝种靛》，《盛京时报》1925 年 4 月 7 日第 4 版。

(一) 棉花生产专区

1919年，王永江开始筹办奉天纺纱厂。为了保证原料供应，他训令提倡种棉：“查棉业一种，衣被群生，利赖至溥，在农产品中占最有价值之位。……现在奉天纺纱厂业经着手筹备，瞬将开办，需用棉花原料甚多，自应广为劝种，以其供求相应……各县知事自奉此次通令后，应即督饬警察按户劝令种棉，将来收成时，均归本省纺纱厂，按照时价收买。”^①各县也采取措施，宣传奉天省“地土肥沃，宜种木棉，比较种各样植物粮石，得利甚巨，”^② 劝令农户种棉。复县农会依照《农业浅说》的种植方法劝令各户试种。“嗣无籽种，遂由满铁试种场订购黑白籽种，转贷各户。待明年丰获加倍偿还，以备将来递增推广，歉收即作无偿给予。不数日发放一空”。^③政府的鼓励政策，促进了棉花生产专区的形成。

辽阳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适宜植棉。乾隆元年的《盛京通志》中记载辽阳“多种棉”。一般“棉花每亩种子五升，芒种后布种，秋分后收竣，可收熟棉四十斤。棉花二万亩约收熟棉六十万斤。亦出产之一大宗。”^④而且棉花“绒长而柔”，^⑤ 1924年生产棉花400,000斤，1925年生产棉花500,000斤。^⑥ 辽西由于自然条件较好，发展为棉花的集中产区，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5—10%，主要分布在锦县的石厂、石山、大凌河沿岸一带；锦西县的虹螺岘、江家屯、暖池塘一带；义县的稍户营子、扎木林子一带以及黑山、北镇、兴城等地。黑山是东北最大的产棉县，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513号卷。

② 《劝令农户种棉》，《盛京时报》1920年9月14日第4版。

③ 《钱业月报》，7卷2号，1927年3月。

④ 裴焕星，王煜斌，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卷27，实业志，地亩产量，第6页。

⑤ 裴焕星、王煜斌、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卷27，实业志，地亩产量，第12页。

⑥ 裴焕星、王煜斌、白永贞等纂：《辽阳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卷27，实业志，全境全年输出比较表，第16页。

棉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20%。1925 年种棉 116,565 亩，产籽棉 397.05 万斤。^① 棉花及棉籽成为辽西各县的重要输出品。1923 年，锦州输出棉花 240 万斤，棉籽 7 万斤；义县种棉 10 万亩，产棉 300 万斤，当地及附近消费四分之一，其余输出于皇姑屯、山海关、洮南、吉林等地。其他各县的棉花输出额分别为黑山县 70 万斤、兴城县 10 万斤、北镇县 400 万斤、锦西县达 700 万斤。^② 省城周边也成为生产棉花专业区。1921 年新民县种棉 9,122 亩，产棉 78,879 斤；盘山县种棉 8,606 亩，产棉 66,807 斤；辽阳县种棉 45,465 亩，产棉 1,363,950 斤；法库县种棉 3,541 亩，产棉 31,043 斤；康平县种棉 15,417 亩，产棉 102,271 斤；凤城县种棉 900 亩，辽中县种棉 20,068 亩。^③ 1922 年，辽中县棉花产量 48.65 万斤，康平县达 63.78 万斤。1923 年，海城县种棉 15,914 亩，产棉 191,774 斤；1924 年棉田增至 32,182 亩，产棉 388,405 斤；1925 年棉田已达 46,606 亩。^④

（二）柞蚕生产专区

柞蚕是伴随着移民的到来而传入奉天省的。据《大公报》记载，“奉省自昔并无蚕利，前清嘉道间有鲁人某流落于奉，窥见林木中有柞，遂仿照齐鲁间土人放蚕养柞办法，购办蚕子多种，按法试放，而生息之繁不减齐鲁，由是转相则效，渐次推广，竟开亘古未有之绝大利源。”^⑤ 1920 年代奉天省柞蚕养殖迅速发展起来，当时报刊记载，“奉天特产，除大豆、红粮、猪鬃、皮张外，尚有山茧一项。……近年以来，河南、山东出产者，反而不及奉产十分之一。奉天东南各县，无地无之，人民多专业之，亦如奉天北部之产大豆者然。”^⑥ 奉天省柞蚕驰名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21 号卷。

^② 鞍山地方事务所编纂：《辽西事情》，第 3 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行，1925 年版。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20 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21 号卷。

^⑤ 《奉省蚕业发达之调查》，《大公报》（天津）1919 年 10 月 8 日第 2 版。

^⑥ 《中外经济月刊》，130 号，1925 年 9 月 19 日，第 37 页。

中外，年产柞茧一亿斤左右，占全国柞茧产额的十分之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柞茧产地。安东（今丹东）及其附近地区“山峦重叠，树多柞栎，实为天然之最好蚕场”，^①成为奉天省最主要的柞蚕生产专区。比较著名蚕场在九连城有 172 处，佛爷沟有 412 处，劈柴沟有 491 处；宽甸县望宝石有 880 处，长岭子有 438 处；岫岩县高岭有 272 处，杨木沟有 315 处，羊拉塔有 183 处；凤城县石头城有 127 处，鸡冠山有 82 处，边门口有 329 处，长甸石有 435 处；桓仁县干草营子有 15 处，三道河子 35 处。^②盖平是除安东（今丹东）以外重要柞蚕生产专区。1917 年盖平县养柞蚕者达 4,470 户，^③到 1920 年代，盖平县的花红峪、大头沟、三脚山、潘家店、梨子园、万福庄等处成为柞蚕生产地带。其中盖平县接官厅附近有 3,760 处，三岔店地方有 1,596 处。奉天省的西丰县也发展成为北部柞茧生产中心和加工中心。1925 年，西丰县养蚕者 1.04 万人，蚕场面积 18,830 垚，产茧 4 亿粒，还有缫丝厂 43 家，职工 2,000 人，年制丝 2,000 担。^④柞蚕茧及其加工品成为奉天省的大宗出口商品。柞蚕茧输出额 1921 年为 95,821 担，1922 年增至 114,307 担。柞蚕屑茧 1921 年为 171,221 但，1922 年为 208,407 但。绢制品输出额 1921 年为 72,679 海关两，1924 年为 107,926 两，1926 年为 533,134 两。柞蚕及其制品的输出额 1923 年达 19,673,043 海关两，占当年东北输出总额的 8.4%，在东北大宗出口品中名列第三或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21，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版。

② 《满洲柞蚕工业及柞蚕改良增殖方策》，第 141—143 页。转引自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75 页。

③ 满铁调查课编：《满蒙全书》，第 3 卷，满蒙文化协会，大正十二年三月，第 313—315 页。

④ 《满洲柞蚕工业及柞蚕改良增殖方策》。转引自李澍田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75 页。

第四。^①

(三) 果园专业区

奉天省的水果生产以安东（今丹东）、辽西和熊岳一带为中心。安东县私人经营的果园发展迅速。1922年夏，张元夫在安东县设立张氏果园，占地千余亩，到1925年已有果苗1万余株，附设苗场，对中外各地品种广为搜罗，精选优良之品。周正伟在安东县西南创办知悔果园，从日本和美国购进接穗种苗，由园艺学校林田果园购果苗及砧木接穗等，果园苗圃同时成立。到1925年已有技师8名，栽有桃14种，梨20种，杏3种，李3种，苹果19种，葡萄9种，樱桃9种，杂果15种，共计27.2万余株，并已经开始盈利。1925年林墨斋经营的九连城林田果园已经有苹果树2万余株，梨树三千余株，桃树1,900余株，其他葡萄、樱桃及杂果等亦有数万余株。林墨斋还经营一处大型苗圃，配置树苗10万余株。该苗圃以出售苗木为收入大宗，一年收入1,500元，而果实收入仅300余元。^②此外，还有刘长甲建立的甡旭果园、韩树棠创办韩氏果园、温克礼创办的温氏果园等。安东县三育中学、东边林科高级中学也办果园，出售苗木和水果以补充教育经费。辽西盛产水果。1923年锦州产水果150万斤以上，每年输出额15万元，其中输往哈尔滨占40%，奉天、营口、长春各占20%。其中兴城绥中两县每年各向北部输出梨100万斤，锦西县每年输出果品百余万斤。义县所属闾山以产梨闻名，年产200万斤，此外还出产山楂、枣、桃、沙果等果品百多万斤，多输往奉天以北及关内地区。^③

粮食作物的生产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区域。玉蜀黍的著名产地为复

^① 《满洲柞蚕工业及柞蚕改良增殖方策》。转引自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246页。

^② 民国《安东县志》，卷六。转引自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249页。

^③ 鞍山地方事务所编纂：《辽西事情》，第3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行，1925年版。

县、金州、庄河、海城、凤城、宽甸、沈阳、怀德、东丰等县。高粱的重要产地为开原、昌图、铁岭、四平街、公主岭、沈阳、辽阳、义县、锦州、黑山、海城、盖平、榆树等地。粟（谷子）主要产于四平街、辽阳、昌图、铁岭等地。水稻主要产于抚顺、兴京、松树、铁岭、开原、沈阳、安东、海城、营口和熊岳一带。^①

农业生产日趋专业化反映了奉天省农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化。”^②“交换和商业渗入农业，引起了农业的专业化。”^③农业生产专业化为农产品商品化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农产品输出结构变化与市场经济繁荣

农业商品化程度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1920年代，奉天省农业商品经济依然向前发展，但是农产品输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粮输出缩减，加工品的输出却迅速扩大。当时即有学者指出，“运往西欧之大豆原料，其主要供给系属吉黑二省，并非东省全部……是故东省全境可分为两部，北部为原料出口区，南部为制造品出口区；北部因特产关系活跃于西欧市场，南部因制造豆产而在东亚占有市场。”^④

农产品原料输出迈向农产加工品输出是农业早期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奉天省政府扶持政策起了推动器的作用。1924年初，王永江为扩充实业、振兴国货，特别传见实业厅长张之汉，作出如下指示：“鼓励实业之发展；扩充各县大工厂；改良丝布出品；

① 《东省经济月刊》，5卷第8号。

②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9页。

③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④ 《人地学论丛》，第1集转引自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接济工厂经费；改良茶油各项办法。”^① 省政府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奉天省农产品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油坊业为最。1924年盖平有4家油坊即会隆海、震源洪、东洋顺和福泰永，其雇佣工人数由35到50不等，每日产豆油量10万斤至18万斤不等。^② 1924年12月辽源有16家华商油坊：公盛源每日生产豆饼120枚；同裕永每日生产豆饼120枚；鸿升泰每日生产豆饼1120枚；信成久利用新式压榨发，使用电力，每日生产豆饼280枚；永盛增利用新式压榨机，每日生产豆饼600枚；天增盛，利用电力兼人力，每日生产豆饼400枚^③。1924年新民县有16家油坊，号内人数240人。^④ 1924年，海城县有4家及其油坊，4家一般油坊。^⑤ 1924年通江县庆源永油坊由萧庆斋出资资本5,000元，营业人员20人，福德成油坊由王锡久出资资本额为5,000元，营业人员30人；大德泉油坊由孔心斋出资1万元，营业人员70人。^⑥ 营口榨油厂1920年有20家，1921年有23家，1922年增至29家，日产大小豆饼4.41万块。^⑦ 据宋瑞宸回忆，安东1925年有榨油厂23家，1928年增加为27家，是“解放前安东油坊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⑧一些民间的蚕业公司也开始兴出现，如安东（今丹东）“东陀山子村富绅宋郎久，有土山两处，约地三千余亩。因凸凹不匀耕耘不便，遂邀同吴化东等发起种植桑树养蚕收茧，招股二百每股小洋五

^① 《王省长关心实业》，《盛京时报》1924年1月19日第4版。

^②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南满洲主要都市经济状态》（上卷），第275页。

^③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南满洲主要都市经济状态》（上卷），第278页。

^④ 王宝善：《新民县志》，第5卷，《实业》，1924年。

^⑤ 延瑞，孙绍宗：《海城县志》卷七，《实业》，1924年。

^⑥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110号卷。

^⑦ “满铁”鞍山地方事务所编，营口市档案馆译：《营口的现势》，1960年版，第388页。

^⑧ 宋瑞宸：《解放前安东的油坊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十元共集万元”^①，开办蚕业公司。1925年浙江上虞县人罗坤祥以资金10万银元创办了“义泰祥”。罗坤祥自幼从事丝绸经营，在上海久成绸庄从店员升到经理，成为有名的丝绸专家。“义泰祥”设脚踏式木制缫机240余台，电力铁木织绸机100台，年产量最高达到药水丝40吨，柞丝绸140余万米，并注重信誉，保证质量。产品远销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度等国，跻身于国际丝绸市场，与日本丝绸竞争抗衡。单鹿、双鹿商标的柞丝绸信誉卓著，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经久不衰。^②

王永江倡导保护商业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他要求县知事对农业商品应做到“根据输出如何予以保护，根据销路如何考虑予以扩充，根据资金如何而使之周转，估计运输如何以期使之便利，务使经营商业等获取实利。”^③这一时期在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是粮栈。粮栈是行栈的一种，其前身为牙栈，主要通过介绍买卖双方交易收取佣金并向政府交纳牙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洋行需要货物存储运销，内地商人也需要能够为自己办理业务的中间商。于是代理购销和经营批发的行栈应运而生。其职能扩大到代办保险、代为销购、提供中介、向客商进行抵押或信用放贷等，并参与商品的运输。^④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多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行栈专业化趋势明显，形成了棉栈、丝栈、转运货站和粮栈等等。在奉天省，粮栈为市场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粮栈是由东北当地商业资本经营的农产品的购销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经营粮豆的购销，同时也兼营粮豆的储藏、保管、运输以及向农民借贷资金和销售生活用品。

① 《蚕业公司招股款》，《盛京时报》1923年8月30日第4版。

② 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④ 张利民：《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等，其触角伸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成为支配农村经济的强大势力。^①这一时期，粮栈已经基本取代了买办的位置，直接与洋行交易，成为内地初级市场和产地与上级洋行市场进行交易的重要桥梁。奉天省政府的商业保护政策更促使粮栈数量迅速增加。1923年，绥中县和兴城县各有粮栈20余家，北镇县有17家，黑山县有30家，新民县达100家。^②1924年“满铁”沿线各站粮栈的分布情况为金州5家、普兰店10家、熊岳城8家、盖平4家、大石桥7家、海城6家、千山6家、辽阳26家、苏家屯11家、新城子14家、铁岭17家、开原18家、昌图21家、营口43家、抚顺8家、本溪7家、凤凰城7家、安东（今丹东）8家。^③奉天省粮栈中资本最雄厚、势力最强盛的是东三省官银号所属的粮栈，它主要包括利达公司、公济栈、纯益公司、万生泉、广泉公、东兴泉、庆泰祥公记、东兴火磨、东济油房和三畜栈等。^④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壮大了官银号的力量，使其在调剂金融、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奉天省各大城镇一般都设有“特产交易所”或“钱粮交易所”，从事粮豆交易和担保业务。1923年，北镇县成立钱粮交易所，又称交场保证所，主要担保农产的期粮交易（即订购）。^⑤粮食集散市场进一步发展。铁路沿线依然是集散市场的聚集地。锦州每年各种谷类的集散额达70万石，其中高粱、苞米占十分之三。^⑥集散市场也走向了专门化。如玉米的集散中心为开原，每年运出5万余吨；谷子的集散中心为四平和

^①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② 《辽西事情》，第2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行，1925年版。

^③ 《满铁沿线に於ける豪农及び粮栈》，第87—119页。

^④ 荆有岩：《东三省官银号》，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⑤ 鞍山地方事务所编纂：《辽西事情》，第3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行，1925年版。

^⑥ 鞍山地方事务所编纂：《辽西事情》，第2章。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行，1925年版。

沈阳，两市每年装运谷子十一二万吨。^① 这带来了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东北地区“农作物商品化的倾向，比较我国本部一般地要高得多。”^② 农产品输出结构变化与市场经济繁荣，成为推动奉天省农业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三、农业生产规模化

农业生产规模化是农业早期现代化的主要表现。东北农业生产规模化发端于清末的农牧垦殖公司，民国初年得以迅速发展。在奉天省，1912年4月崔洵生等人组织溥丰农场公司，承租奉天昭陵（今沈阳北陵）余地及昭陵私垦地亩。同年，中国实业会奉天分会会员吴光国、顾孟养等创办奉天第一农林会社，承领新民府沙岭岗一带荒地16,000亩。1913年，辽中县参事会参事员李文华、王述路、陈和中等在辽中县设立试办稻田事务所，招股2万余元，承租县境内辽河两块河退地引水种稻。^③ 这些公司的创办为后来者积累了借鉴的经验，起了先行示范作用。

王永江认为农业生产规模化“有待于资本而后方兴，断非空谈之所能者。因而应广聚资本，组织财团。”^④ 他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建立股份制农业公司。资金困乏是制约农业生产规模化的瓶颈，王永江通过省政府训令“凡垦殖公司或私人农场，原有资本在五万元以上且开垦确著成效，欲谋推广而力不济者，得呈请该县知事或农务分会查明属实，由屯垦处介绍官有之银行号，以不动产抵借长期抵利之款项济用，以资协

① 《东省经济月刊》，5卷8号。

② 徐雪寒：《东北农村经济的性质》，《中国农村》第1卷第3期，1934年12月，第58页。

③ 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助。”^①忠义农场是由留美硕士张鸿钧所创建，其生产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先进，王永江特发省署训令，将其作为农垦公司典范进行推广。

在省政府积极倡导下，奉天省建立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性质的农垦公司，特别是稻田公司的发展更为显著。在这些稻田公司建立过程中，省政府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灌溉设施完善和水利管理机构的设立是稻田公司的发展前提，奉天水利局的创设于1912年，最初是以试种稻田振兴水利为职务，开掘水道引注浑河水流以资灌溉，^②后来发展成为奉天地区的水利管理机构。水利局除管理水利外，主要经营灌溉设施等事业。王永江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敦促奉天水利局制定并颁布《用水管理规则》和《征收水利税章程》等一系列水利法规。在《用水管理规则》等提出用水应以自然流入为原则，如不能自流时，须经查勘认可后方得用水。为保障顺利用水，每年放水前对田地沟渠之整理，“应妥为洽商，凡新改建沟渠者应请求查勘、测量，经审查同意后进行。”^③

在颁布法规同时，王永江积极筹划设立县级水利局，实行监视水道及分配灌溉用水事宜。1921年设立岫岩县水利局；1922年设立安东（今丹东）、彰武、法库、桓仁县水利分局。辽中县“近年因无大发展亦未设有专局，仅由新民分辖。民国十三年在境北浦河村设有临时分局征收水利。初则每亩征收大洋八角，继则征收一元或一元二角不等。”^④各县水利机构的设立，加快了水田的开辟速度。1922年桓仁县设水利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卷），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

^② 赵恭寅：《沈阳县志》，民国六年八月，第1页。

^③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水利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3页。

^④ 徐维淮：《辽中县志》，1930年，第490页。

局后，当年开出水田 5,000 余亩，1923 年又增至 2 万余亩。^① 新民县蒲河一带在 1924 年即已形成 15,000 余亩水田。1925 年怀德县已开水田 7,351 亩，西丰县 16,647 亩，东丰县 2,111 亩，营口县 4,980 亩，庄河县 3 万亩，临江县 2,298 亩，长白县 789 亩，桓仁县 30,150 亩，梨树县 547 亩。^② 1925 年海龙县全县已垦水田 1.4 万余亩。^③ 1926 年安东（今丹东）县共开发水田 38,291 亩。^④ 1928 年，奉天省有水田的县份已发展到 39 个。

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水田数量的增加，加快了水田公司组建速度。1924 年，辽中县设立兴业稻田公司，第一年试种水田千亩，公司股金奉大洋 5 万元，分 500 股，土地股以 10 亩为一股，金钱股以 100 元为一股。^⑤ 1924 年，王同光等在洮安县设立稻田公司，试种水稻，“颇有成绩”。^⑥ 同年，德养源报领突泉县界柳树川归流河两岸荒地百余方，“地近河岸，势较低下”，因而在洮南县城组设稻田公司，雇用朝鲜族农民试种水田。第二年，该公司已开成水田 1,300 亩。^⑦ 1925 年 4 月 1 日徐栋臣、马西山等 32 人在营口县创办营田股份有限公司，报领坐落营口县属海退淤荒一段，计 76,600 亩。距辽河只 2 里许，开河道引水灌田，种植水稻。公司成立后，立即“筹备开河，建筑农场，购买机械一切进行事件”。当年该公司即开成水田 850 亩。^⑧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总是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特征是具有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08，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版。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357 号卷。

^③ 王永恩：《海龙县志》卷 4，1937 年。

^④ 王介公：《安东县志》第 43—44 页整理。

^⑤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39 号卷。

^⑥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08，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版。

^⑦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37 号卷。

^⑧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37 号卷。

“不断扩大趋势”。扩大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资本的扩大，包括经营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其他农业投资的扩大，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利用机械农具等，以扩大生产规模。另一种方式是经营范围向纵深发展，即把资金投放于农业、农产加工业、商业，实现农工商一体化，从而形成企业化生产。^① 奉天省这一时期建立的公司，一般都追求企业化经营。1924年，铁岭县杨春芳等人创办圃记稻田公司，公司设于铁岭县南五区乱石山子车站，以创办人集合五百日地播种稻田为基础，由“创办人担负试办河工一应用款”，以后“作为优先钱股，合奉小洋一百元为一股”。公司共招地股二千日，每日地^②为一股；“不论自有、租典均可投入之”。公司分设三个部门：会计部主管钱项粮石之出纳，理事部专管土地人工之事务，商店部经理买卖杂货事务。当年该公司即完成了引水工程，并试种稻田四千余亩，“来年尚可推广两万余亩”。^③ 营田股份有限公司营业范围包括农垦、林业、畜牧、养鱼及其他营业。^④ 由于公司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在较大面积的耕地上进行雇工作业，又有着齐全的劳动工具的保障，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较好地配备组合和协调劳动力，提高了劳动效率，也体现了这种新式经营的优越性。^⑤

奉天省农业公司的兴起意义重大。首先，农业公司广集股金，在农业经营中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利润增加。“资本者万事之母。垦荒为业，资本尤巨。盖缘垦民迁入荒地，川资须费，修桥须费，开道须费，建房、凿井须费、牛犁、籽种以及当年食粮又须费，……且农业一道，春种而秋收，获利尤缓”。^⑥ 因而，解决资金问题是土地开发的重要条件之一。农业公司以集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资金力量雄厚，公司采

^① 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② 1 日地 = 10 亩。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539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540号卷。

^⑤ 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⑥ 吉林身档案馆藏：《吉林省长公署档案》，11（7—7）—2011。

取“多投入多产出”的集约化经营方式，一般获利较多。根据 1920 年代对盖平、庄河、岫岩诸县农户的抽样调查，大农（包括经营地主和富农）平均每户经营土地约 70 块，年收入 4,971 元，支出 3,701 元，纯收入 1,270 元；中农平均每户经营土地 10 余块，年收入 1,792 元，支出 1,581 元，纯收入 211 元；小农平均每户经营土地约 4 块，年收入 836 元，支出 781.2 元，纯收入仅有 54.8 元。^① 其次，农业公司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早期现代化。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其优势是可以用很小的成本来利用先进国家花了很大代价和很长时间创造发明的科学技术。农垦公司是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1925 年 1 月创建的忠义农场的农具均购自美国，一次就引进美国垦荒马犁、美国耕地马犁、美国圆片耙、美国压地铁碾子、美国五垄播种器、美国两垄播种器、美国单马锄、美国双马锄、美国割插器、美国 12—20 马力大车等 10 种新型农业机械器具。^② 使用新式农具省人工、减少时间。如“使用中国旧式犁每日每付犁垦荒 6—7 亩，开辟较浅并且有漏犁现象。用美国新式犁每日每付开荒 13—14 亩，且将垦荒全行翻转深至 5—6 寸。从前用旧式种地犁，每日仅种地 20 亩，用农夫 3 人，如果加肥料则需要 4 人。所种之地浅深不匀，散之种稀稠不均。农场用 5 垄播种器，每日种地 120 亩，仅一农夫使用。自动散种距离均匀。又经本场因地制宜略为改制，深浅自由，两垄播种器，每日每人亦可种地 50—60 亩，高粱、苞米又可分科种植。”^③ 总之，农业公司虽然具有一些封建性特质，但是新式农业机器的使用，耕作方法的改进，股份制的引入，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育。尤其在农业公司使用“资本主义的雇用工

① 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中国农史》2006 年第 2 期。

②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52 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53 页。

人已经相当流行”，^①从而瓦解了封建经济关系，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在农村经济中的增长。

第三节 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农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早期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虽然很先进，不过农民通过经验传承和实践就可以学会这样的技术，传统的中国农民不需要接受正规农业教育。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而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是农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王永江极为重视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的革新，恢复并增设各级农业试验场和农科职业学校，为农业早期现代化提供了大量合格的人才。

一、农业科研机构的建设

清末新政时期，晚清政府在改变传统经济政策，加强了对农业的改良。在商部和农工商部的主导下，在农政机构建设、农业政策法规制定、农会组织倡办、农事试验场和农事学堂的建立以及农产品的改良引进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清末农业向近代转型。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设立的五处农业试验分场可视为奉天省农业科研机构之肇端。民国初期，五个分场一律归地方监督，农会自治会就地筹款，“撙节办理，仅求缩小范围，保存官业”。但“地方经济困难，即维持目前亦复不易”。^②省城东门外农业试验场为徐世昌所创办，当时“投巨万之经费购入欧美牛羊及一切耕种设备，粗具规模。”民国初年不但没有任何进展，而且“房舍倾颓、土地被占、牛羊

① 章有义：《中国农业近代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80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488号卷。

骡马非售即烹，该场已有等于无”。^①1916年7月，奉天省政府发布训令：“省城农业试验场开办多年，尚无成效。际此财政困难，即应停办，以免虚糜。”^②不久，试验场的地亩、物品被实业科接收。奉天省植物研究所因经费支绌，1915年1月被归并于省农业试验场，不再单独领取经费，勉强维持。^③各县农业试验场情况更为艰难。绥中县农业试验分场1912年3月因经费支绌，呈请停办一年，第二年“虽勉强维持，终困于财政，力难赓续进行”，^④1914年起停办。法库县农业试验场1915年4月呈准停办。奉天省农业试验场所属的兴京垦牧分场从1913年5月开办以来，“因历年歉收，产量减少，以致入不抵出，1915年6月，亏损大洋341元9角；1916年1月至7月，亏损大洋863元7角。1916年7月该分场被裁撤。”^⑤除经费困难外，官员贪污和管理混乱也是各试验场经营不善的重要因素。1916年奉天省农业试验场场长高元溥贪污公款29,000多元。他还乘交接之机，私自运走大量农场器具。^⑥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科学技术的进步，能直接促进农业发展。王永江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通过行政手段，陆续恢复和增设了一些农业试验场。他首先恢复奉天省农业试验场，“委张连森为场长，并兼技师月支薪水大洋一百元；更委刘佐为助理员协助办理，同时令将旧有人员分别去留，实行改组并更名为农牧试验场”。^⑦随后勘定省会门外第一苗圃造林隙地51亩开办棉花试验场，经费790元，常

① 《农业试验场改组》，《盛京时报》1922年9月15日第4版。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7085号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7093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489号卷。

⑤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7085号卷。

⑥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7085号卷。

⑦ 《农业试验场改组》，《盛京时报》1922年9月15日第4版。

年经费 986 元，专门进行棉花的品种和种植技术试验。^① 1925 年又将该试验场改为农事实验场，设有农艺牧畜、蚕桑、病虫害、农艺化学四个部，附设有气候观测所、农产品陈列所、农产品萃卖所、动物园、博物标本陈列所等机构。^②

在省级机构设立并取得初步成效后，王永江将农业科研机构向县级推广。1925 年西安（今辽源）县农业试验场成立，每年经费为奉大洋 2,226 元，设场长 1 名，技手 1 名，雇员 1 名，农夫 3 名。^③ 1924 年奉天省洮昌道设立了道立林木场，附设农事试验场，位于辽源卧虎屯地方，占地 158 垚 3 亩。该场育有美利奴羊 60 余头，栽培树木数万株，经费由道属 15 县均摊，每年 1 万元。^④ 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原有的农业试验场恢复了生机。安东（今丹东）农业试验场由于民初经营不善“该场地多营荒芜，屋半倾倒”。^⑤ 1922 年 4 月，安东县监督委员沈景发着手整顿试验场，1923 年增设农科职业学校及县苗圃。1926 年，孙炳勋任校长兼经理，“整顿农场，不遗余力，苗木畅茂，战绩可观”。^⑥

农业试验场的恢复和建立使得常规农业科研试验和推广工作得以进行。从试验成果来看，以品种改良与推广最为显著。奉天农牧试验场试验成绩报告显示产量最多的为开原黄谷紧穗高粱、沈阳老来发粟、日本鸭咀粟、美国黄马龄苞米、英国风格苞米、沈阳无光芒梗子及沈阳、开原、绥中所产的大豆等。收量最少的为辽阳黄谷高粱、大败粟、铁岭双山苞米、大豆等。王永江审核后指令将收量较多的品种推广播种，收量较少的品种设法试验改良。^⑦ 试验场还引进了一些新品种，如甜菜、葡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19 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482 号卷。

^③ 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建国印书馆，1944 年版，第 111 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575 号卷。

^⑤ 王介公：《安东县志》（民国），卷 6，农业，1931 年。

^⑥ 王介公：《安东县志》（民国），卷 6，农业，1931 年。

^⑦ 《农场所地成绩》，《盛京时报》1923 年 12 月 19 日 第 4 版。

葡萄、桑秧等、甜芝麻、豆类、麻类等作物。优种的选用和推广，对改善种植品种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专业化是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奉天省农业试验场的业务范围由混合型向专业型过渡，出现了集中从事某种特定实业的特种试验场如奉天省棉业试验场、蚕业试验场等。其中以奉天省棉业试验场取得的成绩最大。时人普遍认为奉天省“辽阳以及黑山两个平原地方，皆为产棉之最良区域……其他之腴壤，欲多种大豆，皆认不能种棉。”据奉天省棉业试验场试验，“凡种大豆之地，皆为种棉之佳壤”。^①这一实验结果，扭转了时人固有认识，扩大了种植棉田的面积。奉天省棉业试验场试种的棉花品种有辽阳棉、朝鲜新种、朝鲜原种、河头棉、平谷棉、中国大棉、脱利司、隆司泰、金代棉、脱里棉、哥伦比亚、得胜棉等十余种。^②试验结果表明，朝鲜王棉生长较好，适合奉省风土。^③王永江关注蚕业发展，在奉天省城设有蚕业实验所，当时试养的蚕种“有新元种、日欧杂交种，中四种、春界一种等，试栽桑种，则有火桑、湖桑、鸡冠桑、鲁桑、鲁桑、荆桑等”。^④1923年复县呈报“实业计划书内有天蚕”，经王永江审核后，“利益最厚，饬令农牧试验场充取种子试养”。^⑤他还将选择种子的职责归于农牧试验场。由于“种子良否影响于农事至钜”，王永江要求农场等“切实指示农民选择种子以利农作”。^⑥农业试验机构除了上文已述及的农产品改良做出较大贡献外，还对农业教育的发展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王永江深刻认识到农业教育宣传和普及重要性，除“先发条教，令县提倡外”，还明令

^① 《东省豆田种棉》，《晨报》，1925年5月5日第7版。

^②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519号卷。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522号卷。

^④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121，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版。

^⑤ 《令农牧场养天蚕》，《盛京时报》1923年2月10日第4版。

^⑥ 《实业厅选种子》，《盛京时报》1925年6月17日第4版。

“省城农牧试验场为研究机关，按月编辑《农业浅说》，呈送省署鉴核，印刷分发各县，以期家喻户晓，重视农业。现闻农牧场已将一期浅说编竣，呈送省署，由署印刷多册，于三日饬颁各县知事查照办理”。^①

先进的耕作方法和优良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和引用，是农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王永江积极建设农业科研机构，有效地传播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生产实践，提高了农民整体素质，为传统的农业注入了早期现代化的因子，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进步。

二、农业教育的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把对农民的教育投资看作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认为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开阔了农民的眼界，促进了其传统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增强了其采用新技术的意愿。^② 可见，发展农业教育本身即是农业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永江在兴办农业试验机构的同时创办近代农业教育机构，以培养各类农业专门人才。他在筹划建立东北大学时专门设立农科，包括农学系、林学系、农艺化学系及兽医学系，附设农业试验场，以供学生实习操作。1929年东北大学农科发展为东北大学农学院，设有农艺学系、园林学系和垦牧学系。

王永江尤其重视农业职业教育，在其任职期间建立了一批农科职业学校，培养了大量农业实用型人才。其中包括康平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2月成立，设园艺科；安东（今丹东）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3月成立，设蚕桑科、园艺科；怀德县立农科职校，1923年8月成立，设

^① 《省署颁农业浅说》，《盛京时报》1923年2月1日第4版。

^② 亚农著，张炳星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水稻科；法库县立农科职校，1924年10月成立，设林科。^①同一时期设立非农科职业学校也设立农科专业，如1924年8月成立开原县立职校，设园艺科。1924年8月成立辑安县立职校，设蚕桑科。法库县立农科职校，1924年10月成立，设林科。此后，奉天省又陆续设立了一些农科职业学校。如昌图县立农科职校、绥中县立农科职校、盖平县立职校等等。奉天省女子师范学校内设有蚕桑学校，以养成女学人才，以备各县在养桑蚕之预备。^②1925年2月，奉天省政府通令各县未设立职业学校者于一年之内一律设立。

农科职业学校日用蔬菜都亲自栽植。除守门者外，不雇佣任何杂役，也不准学生自费雇佣，体现了“尊劳动为神圣”的思想。^③各农科职业学校必须设有附属实习园林场。为规范实习园林场的管理，王永江责令教育厅颁布《奉天省学校附属实习园林场所暂行规程》，园林场所设园林场所长1名，具有如下资格才能上任：其一，须有实地之经验且办有成效者；其二，须有实地之练习且制有成绩品者。否则，无论何等毕业学生非具有此项资格不得任用。^④园林场所一般拨用公共房屋土地，根据学校所习之科目、地方土宜及需要设立相应实习科目。园林场所种植制造地方未有之物品，一切购备机具，籽种物料及成品运出销售，豁免一切捐税。^⑤

随着农科职业学校的建立，如何培养合格的职业学校教员称为当务之急。为解决农科职业教育师资缺乏问题，王永江令奉天省设立职业教员养成所，其中农科所授科目为土壤、肥料、作物、病虫害、园艺、水产、养蚕、家畜、丈量、和种树等。考入学生还需分送外省、外国农工

① 马尚斌：《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481号卷。

③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4061号。

④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3912号。

⑤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3912号。

场所实地练习。期限分为2年、1年半、一年和半年4种。费用省派送者由省支出，县派送者由县支出。学成回省服务期限定为五年。如果学成回省不担任附属机关实习者，处以罚金，^① 其数额如表2-3。因而学成回国者很少有人跳槽另择业。

表2-3 奉天省职业教员养成所违规罚金数额表

类别	甲	乙	丙	丁
国内实习者	1200元	900元	600元	300元
国外实习者	500元	400元	300元	200元

资料来源：《奉天公报》，第3912号。

农科职业学校发展最为急迫者当属东边道。东边道所属各县“荒山旷土触目皆是，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进行如育苗、造林、果树结实、栽桑、养蚕、培植柞树、蒿柳饲养、育山蚕、天蚕、以及棉花、甜菜、葵花、除蠹菊蛇、麻草等特用作物，较之常田利皆培蓰，考察地方气候亦多适合，此种职业教育，各县急需办理。以辟学子谋生捷径，藉为农民倡导大利。一举两得莫善于此。”^② 因此，王永江责令东边道尹和各县知事积极发展农科职业学校，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东边林科高级中学校。东边林科高级中学校设立于1923年，到1926年有学生179人，中西图书3,225册，理化、测量、植物、生理、土壤气象等仪器，林产制造、森林保护、养蚕和缫丝等器械应有尽有。博物农林标本共3,533件。附属农林试验场拥有风向台1座，测候所1处，为农林业天气预报。梯田内大宗栽植果树，其次为栽桑，以备育蚕。约栽有苹果树7,000株。梨树1,000株，桃、李、杏、樱桃等杂果树500株，葡萄150架，桑树万余株，另有果树标本园，桑树标本园。其他如山势陡峻不便垦梯田者，均作演习林地场内业务。学校分为4系，林产系是关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3912号。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4793号。

于森林、树木、育苗、造林；园艺系是关于栽培果树、花卉、蔬菜、养蜂等；养蚕系是关于栽培桑树、柞树、蒿柳，以及饲养家蚕、柞蚕、蒿柳蚕等；种艺系是关于栽培特用作物、改良普通作物品种等。试验场设施完备卓有成效，不仅能充当学生实习用地，实含有试验、经济、模范三种性质。^①

在奉天省政府倡导下，普通学校也重视农业实践教育。如康平县制定普通学校造林规程，规定造林完全由学生工作，不另雇佣技师、工徒。每年春秋两季，每名学生须植树两株，如第一年未活时，第二年须补种。在学生所种植的树上，须标明其姓名以便负责保管。植树种类“以林场土性适于培植，并能养成栋材者为宜”。^② 为培养专门人才，吸收近代科技知识，王永江还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到海外留学，学生学成后回奉天省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工作。其中最杰出的是留学美国获农科硕士学位后回国的张鸿钧，他积极投身于东北的农业教育和改良事业，创办和经营新式农场，发明了新式改良马拉农业机械，并向东北当局提出维新农政的建议，为东北农业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定时期的农业经济政策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着该时期农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方向。影响农业生产力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物质技术因素，也有表现为劳动者本身的技能和技巧的精神因素。如何将这些因素进行合理组合、利用并适时更新，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经济效益是奉天省政府积极努力探寻的问题。总体说来，王永江制定并推行的农业政策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发展。他建设科研机构，提高了奉天省科研能力，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使农业经营能够获取较大利润，促进农业实现综合化的发展，从而推进奉天省农业的早期现代化。

但是，为了维护本地区利益，王永江也制定了一些限制农产品流通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5867 号。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5231 号。

的政策，主要表现是防谷令。如 1924 年 11 月发布的防谷令规定，“本省所产杂粮，除大豆、芝麻等油粮外，其余米谷、高粱、小米等，一概禁止输出，即同一内地，如开原、铁岭、辽阳等沿铁路各地，亦不准向他处运输，以期各地民食不致缺乏，而地面得以安谧。”^①这一政策人为地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农业发展的规模。

^① 《银行周报》卷 8 第 44 号，1924 年 11 月 11 日，杂纂 20 页。

第三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交通早期现代化

交通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重要媒介，也是社会生产、销售和消费得以畅通循环的重要保证。先进交通工具的应用不仅可以使商品在空间运动速度加快，而且商品流通的空间距离也会从时间方面缩短。因此，交通的发展能促进经济的繁荣，而经济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刺激了对交通的需求，从而导致了新交通设施的进化和原有交通设施的改造。^①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实现人口和物资有序流动的前提，也是一个地区走向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交通运输早期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运输工具科学化，即以机械力量逐渐代替以前使用之人力或畜力；二是经营大众化，各种运输工具的使用，以普通的交易方式行之，绝无等级的限制。^② 因此，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被视为交通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1920年代，王永江颁布一系列公路修建规则章程，辟修县道、乡道和里道，为城乡之间、乡村之间道路的通畅提供了保障。同时他积极支持兴办汽车运输公司，亲自主持修建奉海铁路，努力构建以自筑铁路为主干、以汽车和大车运输为分支的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奉天省交通早期现代化。

第一节 辟修公路

铁路出现以前，奉天省官道干线是主要的运输通道。铁路出现以

^① 张文彦等编：《交通经济带》，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② 周一士：《中华公路史》（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2页。

后，因其速度快且运费低，极大地冲击了官道干线运输。民国初年，官道逐渐荒废，如沈阳县以西京奉官道最广宽处十三四丈，狭处八九丈，此路行旅渐稀，附近居民往往侵垦。^①但是，大车依然是奉天省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港口和铁路车站集散货物，依靠大车运输；不通铁路地区，大车更是主要的运输工具。为了保证大车的运行通畅和商品贸易顺利进行，王永江积极推行公路建设。

一、制定《修治道路考成规则》

王永江认为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与交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②因此，他大力提倡辟修道路。他担任代理省长不久即表示：“道路为交通之脉络，在内政上最关重要，诚以交通便利，则文化之灌输，物产之转运，及各种商业之发达，水旱治安之维护，均可事半功倍……本省长注重路政，提倡实业，早具决心，无论如何困难，必须举办”。^③为保证道路辟修顺利进行，王永江制定了奉天省《修治道路考成规则》，将道路分为县道、乡道、里道三级，县道为由此县城至彼县治城的官道，乡道为县境四乡通行之道，里道为由此村达于彼村之道，修道的标准以能通过马车为准。修道的时间分为四期：1922年9月至当年结冻为第一期，1923年春耕前为第二期，秋收后为第三期，1924年春耕前为第四期。县知事每期修治道路结束后向省政府汇报，接受省派调查员实地查勘检验。对于限期内没完成修道指标或谎报修路实情者，调查员进行第二次实地查勘验证。如果“县知事对于修治道路事宜逾限不报或具报不实者，由省公署分别予以记过，视其情形酌予撤任或扣俸。而职务废弛

^① 赵恭寅：《沈阳县志》，1917年版。

^② 《王省长注重路政》，《盛京时报》1922年8月29日第4版。

^③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编：《辽宁公路交通史》（上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者、有意违玩者予以撤任。”^①对于境内修道路办理确有成效的县知事，由省政府酌情给予记功奖励。

奉天省《修治道路考成规则》是奉天省大修道路的纲领性文件，但在执行中，各县提出一些问题，如修道标准偏高、民户不易动员、技师无处聘请、汽碾无款购置、笨重的铁轮大车易毁路又无法取缔等。对此，王永江及时发出训令：“本省修道，系采取初步办法，由渐而入，事极简单。技师，汽碾尚非需要，笨重大车亦不能骤言改革”。并令各县知事“职在亲民，责无旁贷”，“凡城、县、乡、里道，皆须如限兴修”。^②由于省政府三令五申，反复督促，各县都对道路进行修治，并作了具体规定。如黑山县令“各区督率同乡民先修干路五条，每条宽2丈、高2尺，两旁沟深及宽各2尺。公举两人协助警官督率民户兴修。”^③营口县“如某处不及宽度丈尺者，应立即照数开辟，无论经过何人地亩均应让出，不准阻抗”，“修成马路，高者平之，洼者垫之，务期平坦一律，以便能行马车，但道之中间，必须凸起，形似鱼脊，两旁开沟各以三尺为度，俾便泄水。”^④由于王永江严加督饬并把修路业绩作为县知事考成重要标准，道路修治进展很快。1922年9月份下达修治道路训令，两三个月之后，各县基本竣工。海城“自省宪颁布修道之通令后，县署即派员分往四乡，照旧县道、乡道尽力勘定，尺丈立标”，“按户抽工剋日修筑，经监工员实地督率，所修各路行将竣工”。^⑤沈阳县“以省城为中心，计划修干路七八条，合计四五百里，再旬日即当完竣。”^⑥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② 辽宁省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编：《辽宁省交通志》，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876页。

③ 《限期平治道路》，《盛京时报》1922年11月16日第4版。

④ 《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⑤ 《海城奉令修道将竣工》，《盛京时报》1922年11月18日第4版。

⑥ 《沈阳道路将竣》，《盛京时报》1922年11月16日第4版。

道路修治过程中，王永江不断完善道路修筑的规则，对《考成规则》中没有规定的问题在省署批示中做出规定。如《考成规则》中对道路的宽度并无规定，但在1922年12月6日批示义县修道计划的指令中提出：“至小限度，县道须在3.6丈（合12米）以上；里道须在1.8丈（合6米）以上”。^①为了保证修路的顺利进行，王永江允许各县具体情况有所变动。据《奉天公报》所载21个县的统计，虽然县道一般由2.2丈至3.6丈，多数在2丈至2.5丈之间；里道由1.2丈至2.4丈，多数在1.5丈左右。^②表3-1说明，各县之间差别还是存在。

表3-1 奉天省部分县道路与水沟宽度汇总表

县别	县道	乡道	里道	两旁水沟
西丰县	12米以上	6.67米以上	5.33米以上	沟底宽0.7米以上，沟深与上宽酌定
沈阳县	12米	6米	4米	县道沟宽1.33米，下宽0.67米，深1米
通化县	12米	5米	5米	县道沟宽1米，乡里道沟宽0.67米
铁岭县	12米	8米	6米	县道宽沟深各1米，乡道沟宽深各0.83米
开原县	12米	8.67米	5.33米	宽深以1米为度
盖平县	10—12米	6.67米—8米	4—5.33米	宽0.67米，深0.8米
梨树县	12米	8.67米—10米	以能走大车为限	县乡道沟宽1米，深0.67米；里道沟宽0.67米，深0.33米
辽阳县	8.6—12.67米	3.33—7.33米		县道沟宽1米，深1米
海城县	11.33米	7.33米	6米	县道沟宽、深各1米；乡道沟宽、深各0.67米
营口县	至少10米	至少5米	至少5米	均以1米宽为度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986号卷。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3853号。

续表

县别	县道	乡道	里道	两旁水沟
法库县	10米	5米	5米	均以1米宽为度
辽源县	10米	8.33米	6.67米	县道沟宽、深各1米， 乡道沟宽深各1米
海龙县	10米以上	8米以上	8米以上	
台安县	10米	6.67米	5米	均以1米宽为度
凤城县	9.33米	4.67米以上	4.67米	均以1米宽为度
庄河县	8.67米	6米	5米	均以0.67米为度
昌图县	8.33米	6.67米	5米	今以0.67米为度
岫岩县	8米	6.67米	6.67米	均以0.5米为度
安东县 (今丹东)	7.33米	5.33米—6.67米	4米	县道沟宽1米，深0.67 米；乡道沟宽0.83米； 里道沟宽0.53米

资料来源：《奉天公报》，第3853号。

具体施工方法各也不相同，如海城县将每10人编为1小组，由十家长作工头；将每百人编为一大组，以百家长充大组工头。台安县以5里为一段，由督修员指定某村承修某段。辽阳县与此相似，县道每段为20里，乡道每段为30里，由监修员传知各村民户，分段兴修。在道路修成之后，有些县还设置了交通标志。盖平县在十字路中和岔道口设立木牌，标明方向与通往地点。安东（今丹东）县每距十里竖立石制道标一桩，正面刻距县里数，背面刻附近村名等。^①总之，在王永江积极倡导下，奉天省政府颁发一系列文件和训令，敦促普修道路。奉天省的路政情况大为好转，从而为奉天省公路运输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确立督修道路原则

王永江在敦促各县修治道路过程中，通过训令和布告等形式，确定

^①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编：《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了以下几项督修道路原则：

第一，“开旧不辟新”原则。修建道路首先涉及占用土地问题。王永江坚持以原有道路为基础的“开旧不辟新原则”，道路“宽度不敷者，可略向两旁地边开拓，不准另辟新道，毁民田庐”。修路过程中“须顾及田亩，如近山近河之处，倘因修道太高致有遏成水患之处，须稟告县知事另行设法勘查”。^① 北镇长兴店一带修路过程中把“佟保仁之田地误辟为道路，”王永江随即饬令北镇知事周予洁亲自勘验查复。^② 虽然王永江制订了“开旧不辟新”的政策，但在执行中，依然遇有许多困难，如有的民户长年占道不还、有的要求发给地价、还有的联名赴省控告县知事“自利”。为此，王永江令各县依照省政府训令，结合本县实际情况，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很多县知事根据“开旧不辟新”原则较好地解决了占地问题。如庄河县规定所有县道、乡道、里道均就原有道路修筑，如“原有道路不合规定尺寸者，得由道中立标，两边开展，以符其数。如遇房屋、茔园，不便开展时，得就其一旁占用，所占之地如系公会所有，概不给价，违者以阻挠路政论。但系平民所有，且仅以此数亩田地为命户者，得由该保公会另拨公地，或酌定其价补偿。”^③

第二，按户出工原则。民国以来，各省修治道路所用路工制度分为六种，“一曰包工，二曰民工，三曰雇工，四曰兵工，五曰赈工，六曰囚犯工。”^④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王永江采用“民工”制度，按户出工。修治道路时，每家“出壮丁一人，由此村至彼村之间修至接头处，其家无壮丁者免，并不准令家无壮丁者出钱代工。”“不准地方官吏及士绅按户或按地摊钱致重人民之担负。不准按土地数量摊工，也不准以工折

^① 《修治道路之省令》，《盛京时报》1923年6月7日第4版。

^② 《周知事呈覆勘》，《盛京时报》1923年10月19日第4版。

^③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④ 周一士：《中华公路史》（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0页。

款”。^① 对违背按户出工原则的县署及时指出纠正，如昌图县把修路任务责成道旁土地所有者承担、锦西县实行的不出工者摊款的办法等，均及时予以制止。^②

第三，利用“农隙”原则。王永江以“事举而不扰民，功成而不违时”作为修路的指导思想，特别强调利用农隙，分期修治，不误生产。王永江明确规定修筑道路中由县知事督饬人民于农闲时节进行，“春种秋收正当农忙之际不得勒令出工”。^③ 1923年3月再次下发训令，强调“修道之宗旨，系图人民之便利，若因修道而增扰累，至使事仍草率，只顾考成，不恤民隐，一经告发查觉，定予严惩不贷。近撤知事二十余人，其原因多由于此。”^④

针对修路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王永江采取了灵活自主原则。如在执行“按户出工”原则时，由于户有大小、力有厚薄、贫富不均等问题，省政府支持各县出台的自行规定，如辽阳县县道抽工，每10亩抽1人；乡道由就近民户分段包干。海城县出工以户为标准，分甲、乙两等户，有车者为甲户，无车者为乙户。甲户每户出车1辆，车夫1名，乙户每户出夫1名。这些出工方法，都得到了省政府的肯定，在具体实施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⑤

三、督修道路的措施

王永江在下达修道训令后，对各县修治情况随时审核督修。他先要求县知事将填好道路计划表、附图及分期修竣的期限书等，一起上报省政府进行审批。各县上报的计划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县、乡、里道的

① 《修治道路之省令》，《盛京时报》1923年6月7日。

② 张士杰：《辽宁公路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③ 《修治道路之省令》，《盛京时报》1923年6月7日。

④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986号卷。

⑤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路线名称、起止地点、经过地点、县内里程数、各区分管的里程数；县、乡、里道的修建宽度、边沟宽度与深度。有些县对路拱的高度也做了规定，并制定了人工和车工的负担政策和方法、警察和保甲的督修办法、奖惩制度和道路的管理养护方法等。^① 各县每期工程完成后，省政府委派专员进行实地勘验。1923年初，王永江提出“各县所修之道第一期业已竣事，必须派员勘查”，并于1月18日特派“张全福查勘抚顺、铁岭、开原三县；梁国栋查勘沈阳、海城、辽阳县；郭眷周查勘法库、怀德，董畅查勘新民、北镇、兴京三县。”^② 特派员调查反馈村屯道路状况不好，王永江“通令各县以待明春东风解冻后，将各村道路按照规则概行修理”。^③

修建道路的具体监督工作主要依靠各地警察、保甲、督修员及监修员。县一级督修组织以警察所长为督修员；区一级督修组织由警察区官、巡官任督修员，总甲长和保长等为监修员。县、区督修员负责全县或全区修治道路的全面领导和督促检查，排除障碍，依期报竣。监修员则在区督的直接指挥下，负责所管区域内按户抽丁、分段施工等一切事宜。对民户不服从指挥或抗拒者，由警甲予以调节和弹压。^④ 省政府督修道路甚严，核查之后，对于所修之路不合格者，责令返工重修；对于申报不实者严加惩处。^⑤ 各地县署也对督修和监修人员规定一些奖惩制度。

公路养护是保持公路通畅运输重要条件。按照《考成规则》规定，县知事要利用春秋两季农隙时期，组织沿路农民，分段承包整修道路，称为岁修。随着“各县建筑之官道已陆续告竣。”省政府“为保重路政

^① 张士杰：《辽宁公路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② 《派员查勘路政》，《盛京时报》1923年1月19日第4版。

^③ 《王省长注意路政》，《盛京时报》1923年1月27日第4版。

^④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⑤ 《王省长注意路政》，《盛京时报》1923年1月27日第4版。

计，特行通令各县知事、所长对于保护官道务须慎重，如有故意毁坏者即处以惩罚，以示警戒”。^① 各县根据省令做出相应规定。盖平县由附近村民保护已经修治的道路桥梁，除临时修补维护，每年把农隙时作为岁修时间。每届岁修，各村民均应家出一人，各带锹镐，将县、乡、里道逐一修补。还有一些县区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如道路上不准纵放牲畜、不准堆置物品或竖立杆柱、禁止挖取道路泥土、禁止任意侵占和损坏道路等。如有违反处以 20 元罚金或责令按原道路修治。除了岁修以外，还有雨季补修。由于奉天省夏季多雨，每逢雨季，春天修筑的省道极易被雨水冲毁，王永江“特通饬各县一律勘察有无损坏之处，如有坏者应即修补以重路政。”^② 路边植树是道路维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修治道路过程中，王永江鼓励路旁植树。省政府颁发的《各县种树考成规则》中要求各县在宜于植树的荒山旷地及道旁植树，并规定“谁地谁栽、谁栽谁有”。道旁栽植易于成活的树种，由沿线村公会组织民户义务出苗木和出工栽植，树权归村公会所有。“凡有树者可以移植。其无树者尽可采取柳条沿道分押，随时修理，渐长亦可成树，不准摊钱购树致累人民。”^③ 为了保证树木的存活率，各地还注意树木的保护与管理。如辽中县制定了《保护县道树株办法》，规定“凡经过村内之县道，其树株由该村公会严密保护，如被损坏，不知何人所为者，唯该村长，村副是问”。西安（今辽源）县一般农民恐树株成活妨害禾稼，“多有故意损毁者”。西安市知事制定《毁树规定之罚金法》，规定如有毁损路旁之树者处以 1 元以上 60 元以下之罚金。^④ 上述公路养护管理措施，使公路得到及时养护，平时的路面均可保持良好的状态。

桥梁是道路修建的重要环节。奉天省境内河道较多，在修路过程中修

① 《令各县查勘省道》，《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14 日第 4 版。

② 《通令保护官道》，《盛京时报》1922 年 11 月 21 日第 4 版。

③ 《修治道路之省令》，《盛京时报》1923 年 6 月 7 日第 4 版。

④ 《毁树罚金之规定》，《盛京时报》1925 年 4 月 5 日第 4 版。

桥是一个难题。这一时期修建的多为临时性桥梁，修桥的资金来源仍沿用募捐和摊派的形式。法库“建筑桥梁工程浩大，用款较巨之处，呈明由知事临时酌令公平摊派或协同士绅劝募。”昌图县也有类似规定：“道路所经过之桥梁或新修，或补葺，由各保长查勘清楚，报告本管总甲长，核实估计，再会同警察，就地募捐兴修”。^①此外，还有采取村公会筹办的形式或个人自愿出资的形式修建的桥梁。在普修道路期间，奉天省主要修建了以下桥梁：

表 3-2 1922—1925 年奉天省部分桥梁修建统计表

桥梁名称	修建地点	桥梁种类	修建日期	资金来源	经办人
望海铺桥	新民县	木桥	1922—1923 年	当地民户	村民
李家套桥	新民县	木桥	1922—1923 年	当地民户	村民
王家河桥	新民县	木桥	1922—1923 年	当地民户	村民
白旗堡桥	新民县	木桥	1922—1923 年	当地民户	村民
三台村南桥	铁岭县	石桥	1924 年	当地民户	村公会
三台村西桥	铁岭县	石桥	1924 年	当地民户	村公会
镇西堡东桥	铁岭县	石桥	1924 年	当地民户	村公会
永安堡桥	铁岭县	石桥	1924 年	当地民户	村公会
夏家楼桥	铁岭县	石桥	1924 年	当地民户	村公会
大通门外石桥	岫岩县城北门外	石台木面桥	1925 年	募捐	董寅宾
新石桥	盖平县城外西北角	石桥	1922 年	募捐	章运禧
滨江桥	安东（今丹东）县西南	石桥	1925 年	募捐	韩玉书

资料来源：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根据第 118—119 页整理。

^①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5 页。

在王永江和省政府积极努力下，奉天省各县区交通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1925年全省新修里道49,748里、乡道29,742里、县道22,211里；补修里道32,291里，乡道20,078里，县道13,975里。合计129,975里以上。从此“王道荡荡，顿改旧观，行旅往来人人称便。……昔年坎坷之道路悉变为平正之坦途。”^①到2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辐射状公路交通体系。由沈阳通向各地的公路共八条：其一，出沈阳西南行70公里至辽中。再经台安南下三岔河，经锦州去山海关，是沈阳连结下辽河平原的主动脉；其二，出沈阳西北行90公里至法库（在孟家台出境，境内40公里），是沈阳连结辽宁西北部农牧业产区和内蒙古牧区的主干线；其三，出沈阳北行60公里至铁岭，是沈阳连结辽宁北部地区的要道，可通往吉林、黑龙江；其四，出沈阳东行45公里至抚顺，是沈阳连结抚顺及吉林海龙地区的要道；其五，出沈阳西行60公里至新民，是沈阳连结辽河平原的要道；其六，出沈阳东南行60公里去本溪，经连山关、凤凰城到安东（今丹东），过鸭江入朝鲜。是与安奉铁路并行的公路。使沈阳与辽宁东南广大地区相连接，并可与朝鲜相通；其七，出沈阳南行经白塔铺、沙河驿、烟台，是去辽阳的东道，长60公里；其八，出沈阳西行经张士屯折向南，是经十里河去辽阳西道，长60公里。^②这八条公路境内总长392公里，初步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公路干线。两条去辽阳的公路，与沈阳至大连铁路并行，经辽阳、鞍山，通往营口、大连等城市，是沈阳与营口、大连海港相连结，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干线。^③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全省警甲报告书》（下）。

② 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编委会编：《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第二节 汽车运输业的勃兴

汽车是继火车、轮船之后又出现的一种以机械为动力的运输工具，其本身就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而汽车运输业的兴起更促进了交通早期现代化。汽车的载重可大可小，对起运量没有太大的要求，有很强的灵活性。因此，汽车引入奉天省后，很快引起王永江的关注，他积极扶持开办汽车运输公司，带动了奉天省汽车运输业的勃兴。到 20 年代末期，奉天省的汽车运输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公路运输业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奉天省人口和商品的流动区域，成为奉天省交通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汽车运输公司的兴办

1885 年汽车问世后短短几年时间，即完成了由实验性的发明转变为综合性工业。与轮船和铁路机车相比，汽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1 年。1901 年底匈牙利商人李恩时（Leinz）将两辆美国福特公司制造的汽车运入上海，拉开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序幕。随着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生产成本在 1913 年福特公司推出流水线装配之后大大降低，汽车产量也有很大提高，中国的汽车输入量逐步增加。奉天省出现的第一辆汽车是 1913 年“满铁”从美国引进的，在大连市内从事运输工作。随后，汽车进口量不断增加。据大连海关统计，1917 年至 1923 年间东北累计进口汽车 1,974 辆，1923—1926 年 4 年间，从大连进口汽车 2,064 辆。^① 这些进口汽车大部分销往奉天省。推动汽车输入量增加动力有两种：一是军事运输的需要。1920 年代，中国战争连绵，汽车运输由于其灵活性，辐射范围较广，只要有公路的

^①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104 页—131 页。

地方，就能将军用物资快速运往，受到奉系军阀的青睐；一是奉天省地方政府鼓励民间资本的经营。近代奉天省的轮船和铁路运输主要是由国家资本及外国资本的推动下兴起的。与此不同，汽车运输是借助于民间商业资本从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近代公路汽车运输投资小，收益高，对民间资本很有吸引力，而王永江和奉天省政府积极支持民营企业投资于汽车运输业，引发了各地民众与乡绅积极创办民办汽车运输公司的热潮。汽车运输公司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沈辽长途汽车公司和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沈辽长途汽车公司

辽中县地处省城西南，两者相距 70 余公里，是省城的主要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之一。由于境内不通火车，运输十分困难。省议员苏士达等人计划举办沈辽长途汽车公司。但是公司的筹建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一，沈辽长途汽车公司运行由奉天大西门外至辽中县城东门的路线，总里程 75 公里。除奉天大西门外至火车南站间的 5 公里修有路面外，其余路段都需要在大车道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在修建专用公路时要占一些农田，相关的农户需要迁移。其二，汽车运行后，过去为行人设置的饭馆、栈店冷落萧条。尤其是剥夺了一些拉脚车夫的生计。其三，汽车如果与骡马大车相遇，牲畜受惊，有时还可能出现倒翻车辆的事件。因此，有一部分商绅士强烈反对长途汽车公司的创办，一再具状上告省政府，认为汽车公司的成立是“一利既兴，而百弊丛生；一路既成，而万民失业”之举，极力阻挠建立汽车公司。^① 王永江责成省实业厅、警务处派人实地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王永江赞同“交通计划自有利害轻重之分，若以交通便利而论，亦万难因噎废食，若将沟坎稍加修整，车辆易于躲避，而此患似不难消除，将来行之既久，而车马见惯，亦不致常惊矣。”^② 随后批准了苏士达等人的开业申请，1924 年 3 月 1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900 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900 号卷。

日沈辽长途汽车公司正式成立，经营沈阳至辽中间的以客运为主的客货运输业务。

沈辽长途汽车公司是奉天省最早的民营汽车运输公司，它拥有资金总额为奉大洋 15 万元。沈辽长途汽车公司拥有资金总额为奉大洋 15 万元，分为 500 股，每股 20 元。开业之初共有汽车 8 辆，其中 6 个客座的载客汽车 6 辆，载重 1.5 吨的货车 2 辆。至 1930 年，客运汽车增至 12 辆，共 136 个座位。当时除奉天大西门外至火车南站间的 5 公里修有路面外，其余均需投资在大车道的基础上进行改建。为此，公司投资 29,750 元租赁土地，修建路桥。在当地官府的支持下，终于建成专路，维持通车了。后又经过不断整修，至 1928 年，路线已比较完善，计有大小木桥 30 座，水泥桥 5 座，建成了一条路基宽 5 米的沙土公路。为了提高公路的通过能力，公司设了专职养路工人，进行分段管养。在工程量大的季节里，还临时雇工补充，对力所不及的工程，随时请沈、辽两县的官府协助解决。但由于沈辽公路地势低洼，砂石奇缺，粘砂土质的路面根本无法保证晴雨通车，因此，公司的客、货运输，均属季节性运输。^① 沈辽长途汽车公司每天发车 2 次，每个单程运行 4 小时左右，票价 15 元。

沈阳、辽中两县政府也积极支持沈辽长途汽车公司。每当遇到力所不及的工程，沈阳、辽中两县的官府随时准备协助解决。为了规范公司管理，省政府敦促公司制定了《沈辽长途汽车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的股东只限于国人，经营期限为 30 年；公司车辆不论战时平时，均有战勤义务，军用租金减半。^② 不久，还制定了《载客规则》等业务规章，保证了公司业务的规范发展，极大地方便了辽中与省城间客货往来。此后，辽中县的蔬菜和肉、蛋等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省城，而省城的工

^①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33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896 号卷。

业品也运入辽中及其沿线地区，促进了两地间的经济互动与繁荣。

（二）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初期，东丰、海龙、西安（今辽源）、辉南、柳河等县区是奉天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素有“粮仓”之称，这些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铁、粘土等矿藏资源。但是因为交通不便，粮货以及林木、矿产等都依赖于陆路大车转运，每到“春夏河开道乱，车马难行，往往脚价倍于物价。秋季粮米堆积如山，每苦于道路阻隔，难以外运”。^① 而运到开原站的货物又不能及时运入开原以东各个城镇。从运输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交通费用低廉，速度快捷，产品的运输量才会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开，贸易范围扩大。因此，开原、西丰两地都有人先后提出过修铁路的倡议，但皆因“满铁”的无理阻挠而中断。为避免日人的干涉和阻挠，王德厚等人以兴办长途轨道汽车的名义向省政府提出申请。王永江非常赞同，随即批准。1924年8月17日“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于公司修建轻便铁轨，使用燃油机车，故称铁轨汽车。该线铺设轻便铁轨，轨距1米，桥梁皆为木桥，设备简陋，以小型机车牵引，每小时最高速度为20公里，过清河桥时速度减，至6公里。线路起自开原火车站东北2公里的石家台，至西丰县城，总长63.7公里。中间设老城、老城东、威远堡、松树村、神树、郜家店、大庄阳7个车站，还有马市堡、龙潭、甘沟子等3个简易站。公司在承运的货物中，主要是大豆和粮谷，两者占承运量的80—90%。客、货运价格有明确的规定。客票分甲乙两种。甲种客票每人每公里收费3.6分，准许带行李25公斤；乙种客票人公里2.3分，准许带行李20公斤；未满4岁儿童免费，4岁至12岁半价，准许带行李重量减半。超过上述限额的大、重件行李，每超过1公斤，按里程收费若干，运费以两角为起点。货运计分六等，每一等级又有零担和整车之别，但都体现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899号卷。

了优等高价、低等廉价的计费方法。^① 公司开始营业后，年年有盈余，1926—1928 年每年纯利都占总收入的 40% 左右。

在奉天省城至吉林，四平至梅河口尚未通铁路的情况下，开原至西丰的运输线是东丰、海龙、西安（今辽源）、辉南、柳河、金川等地与南满铁路相衔接的要道。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营运带动了这些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西丰县城的影响最大。由于西丰为终点站，又是邻县销售粮食的聚散地，日常马车流量达 2000—3000 辆，原有城区已经难以容纳。因此，省政府批准在车站以北征收民地 1200 多亩，开辟为市场。市场分为分工业、粮业、商业三区，商贩分居各区。并筹划在适中地点建市政公所，将在城内东南角之小贩一律强制迁入新市场。^② 古老的西丰县城散发出早期现代化的气息。

继沈辽长途汽车公司成立之后，在奉天、安东（今丹东）、辽阳、岫岩、抚顺、开原、铁岭、鞍山、营口、熊岳、本溪和庄河等地先后出现了众多的汽车运输公司。梨树县王青海开办四梨长途汽车公司，经营梨树至四平间客货运输业；安东县张金波等人合资创办振兴公司，经营长途汽车客运业。运行路线为安东至凤城、安东经庄河至城子瞳等地，总里程 2400 公里。士绅白锦堂等募款创办岫海孤汽车公司，经营岫岩境南至孤山的运输业务。^③ 到 1925 年 10 月，奉天省创办的汽车公司如下：“王维坚之奉天康平间；杜雨田之瞻榆泰来间；高殿福之安东庄河间；李玉廷之牛庄海城间；穆惠霖之洮南四乡间；艾湘南之复县海岸间；房鍾狱之铁岭法库间；孙瑞五之怀德范家屯间；曹树恒之辽阳四乡间；西丰开原间之开拓铁轨汽车、辽中沈阳间之辽沈长途汽车以及抚顺

^① 参见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辽宁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1—125 页。

^②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西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丰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16 页。

^③ 《提倡岫海孤汽车》，《盛京时报》1925 年 5 月 6 日第 4 版。

兴京间、安东临江拟利用河水冰冻水面行驶汽车。”^①

汽车运输公司的兴办，密切了城市与周围县镇的联系，活跃了经济。由于汽车运输可以深入工厂、矿山、车站、码头、农村、山区、城镇街道及居民区等活动领域，蔬菜、水果、禽畜等农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城市，而农村所需的工业品等也能得到及时供应，从而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奉天市汽车厂的创办

在建设有轨电车的同时，王永江批准奉天市政当局创办奉天市汽车厂。这是奉天省第一个官办的汽车运输企业，表明政府既是交通运输的管理者，又是直接参与者。奉天市汽车厂在初创时期有 1 个修理厂、1 个补带厂、3 眼压水井及 33 间砖瓦平房。汽车厂只有 1 名技术员，对损坏车辆只能简单修补，不能自行大修。为保证第二天顺利出车，每晚汽车入库时，机务主任及事务员协同修理工人认真检查各车机件，如有需要修补之处让司机将故障写在黑板上，并组织维修工人、徒工赶速修理。如果中途故障，一般由司机自行修理。如果司机自己不能修理，则通知汽车厂派人修理。^② 汽车厂开始拥有客车 8 辆，后来增至 52 辆，营运于马路湾至大东门和大北边门至北市场之间。1925 年 4 月开始营业，在各主要站点都设有木质活动站房，如大北城门、小西边门、小西城门、北市场、马路湾等站房。对这些站房，由各段警察加以保护。^③

奉天市汽车厂管理比较规范，司机、车务员和修理工每年各发制服两套，春秋季各一套。汽车厂员工发有免费乘车证。由于工作任务不同，职工间的薪金差异很大。技士兼主任每月奉大洋 120 元，会计兼庶

① 《汽车路四通八达》，《盛京时报》1925 年 10 月 6 日第 4 版。

② 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编委会编：《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沈阳出版社，1992 年版，第 67 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市政公所档案全宗，第 3908 号卷。

务 60 元，事务员 40 元，文牍员 40 元，雇员 25 元，技术员 80 元，司机 50 元，车务员 30 元，检查员 40 元，修理工 30 元，差役 12 元。可见，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金更高些。不过，员工的工资收入在当时社会属于都是较高水平。汽车厂管理严格，如员工工作怠慢给予记过罚薪，车务员私带客人给予斥责惩罚，司机在车上吸烟记大过两次。在乘车费用方面，汽车厂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给予不同待遇，如发给军官、稽查、宪兵、差役、警察、行政官员免费证；发给学生定期乘车证，以一个月为限，期满缴销再行续购。凭借这种乘车证价格，学生可以享受八折优惠。

汽车厂初期营业状况良好。开业当年仅经营 8 个月就收入 10.6 万元，盈余 1.4 万元。第二年总收入 54.7 万元，盈余 4.3 万元。第三年盈余 7,800 元。但一方面由于奉票不断贬值，另一方面汽车配件和汽油都依赖进口，汽车厂逐渐入不敷出，1928 年 5 月暂行停办。^①

随着奉天省城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的逐步实施，以人力车为主的城市公共交通已经越来越不能够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了，引进更加先进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也就成为必然。奉天省政府顺应这一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奉天市汽车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奉天市汽车厂存在时间不长，但它标志着省政府已经自觉地步入城市早期现代化，并为以后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三、汽车运输管理

汽车运输业顺利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作保障，一是道路修护，一是车辆运行的管理。1923 年 10 月，王永江饬令警察厅制定限制大车办法四条：一头骡马准拉煤 6 袋，重量在 1200 百斤以下；二头骡马准拉煤 10

^① 参见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编委会编：《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沈阳出版社，1992 年版，第 70 页。

袋，重量在 1800 斤以下；三头骡马准拉煤 15 袋，重量在 2600 斤以下。如拉其他货物亦按此重量装载。为了维护路面，四头骡马装载不准在马路上行走。同时，为了维护交通安全，规定拉煤骡马不准使用羸瘦瘸瞎；装载货物时御车者不准坐在车沿、夜间须拉灯等。^① 安东（今丹东）市政公所为养护公路，提出“无论何种车式载重不得超过 4 吨，不得用铁轮等”。^②

1925 年奉天省地方政府通过了《普通营业汽车公司立案规则》，规定创办汽车公司首先呈明创办人及连署人之姓名、职业、公司名称、营业简章、营业种类、资本总额、各种车辆数目，尤其要对资本总额提供确实可靠的证据。实业厅审查合格后，缴纳注册费大洋 10 元和印花税 1 元，随即发给开业凭证。开业凭证有效期 1 年为限，限期满后经实业厅查验后换新证。《普通营业汽车公司立案规则》实行前成立的公司要在两个月内依照规则补办注册证，违者处以相当之罚金。^③ 1926 年，针对请办长途汽车营业“自辟专路者属寥寥，多系利用冬令驶行官道，春融即停行驶”的情况，奉天省地方政府通过《取用官道长途汽车公司注册给办法》，规定“取用官道开汽车官厅并不限制家数，但必须查无窒碍才能核准给证。”^④ 一旦有公司呈请建筑专路并批准后，取用官道的汽车营业即行停止。1924 年 1 月，奉天省警察厅颁发了《管理汽车规则》32 条，对发放汽车执照、汽车行车、旅客乘车和装载货物都做出了较明确的规定。

由于省政府的积极支持，商办与官办汽车运输业都得到了发展，逐渐改变了奉天省未通铁路地区由大车主宰运输的局面。在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虽然传统的大车等交通工具并未消亡，但汽

① 《警察厅取缔大车》，《盛京时报》1923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19855 号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896 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19855 号卷。

车运输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近代公路汽车运输在奉天省从无到有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汽车作为先进的运输工具推动了奉天省交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汽车运输公司为商品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流通领域也随之活跃起来。汽车运输方便了城市与乡镇之间、铁路沿线城镇与非铁路沿线城镇之间的交通联系，加快了疏散铁路沿线城镇滞留人口速度，一方面缓解了铁路沿线城镇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带动了边远地区农业开发，并且为远离铁路沿线的城镇创造了发展的良机。

第三节 自筑奉海铁路

铁路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既是现代化交通运输业中最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而在近代中国铁路的建筑权、经营权和营运权却被列强利用铁路投资特权制度加以控制，铁路衍化为经济侵略的工具。这一情形在东北地区尤为严重。当时“北宁本借英款、中东有俄股、南满则为日所独占。”^① 为改变这种局面，东北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交通运输管理机关—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王永江担任委员长并亲自主持修建奉海铁路，启动了东北自筑铁路的热潮。

一、自筑奉海铁路的背景

铁路是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是近代文明的重要体现。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各国利用外资修筑铁路属于正常的商务活动。但在近代中国，铁路投资制度成为外国列强损害中国主权的特权制度。通过对华铁路贷款，外国投资者不仅赚取大量的佣金、长期的高额利息以及包揽整个工程、高价兜售机车和客货车辆等工程器材等，同时还操纵整个工程设计、勘测、施工、财务等大权，最终完全控制了铁路建筑权。由于铁

^① 东北文化年鉴编印处编辑：《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373页。

路贷款以铁路财产作抵押品，待铁路建成，列强又控制经营与营运权，^① 并攫取铁路沿线开矿设厂权以及司法权、行政权和警察权等。

东北铁路建设始于 1891 年李鸿章主持修建的关内外铁路，到清末形成了以俄、日、英三国分别控制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京奉铁路为中心的三个铁路运输系统。民国初期日本以承认中华民国为条件，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计划。日本未能实现满蒙五路计划，1918 年又以西原借款之机提出了满蒙四路借款的要求，期望藉此实现其对中国东北的控制。^② 1921 年初，东北地区属于中国自有铁路仅 58 公里，即齐昂铁路（齐齐哈到昂昂溪）和通裕铁路（女儿河至砂锅屯）。^③ 日本通过铁路牵制东北地方当局，这在军事调动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东北当局只能自由调动中东铁路（南到长春）及奉天至山海关的京奉铁路，其余路段则必须依赖于南满铁路运输。因此，日本完全可以利用南满铁路控制奉军的行动。在军队调动过程中，除当场交付运费外，东北当局还要满足满铁的附加条件：奉军在得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后才能乘车；要临时解除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奉军的军用物资，必须得到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后才给运输；日本方面随时可以拒绝奉军运输。^④ 同时，铁路经营给“满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表 3—3 所示，从 1921 到 1924 年，“满铁”帐面均有大量盈余，其中铁路盈余都高于总盈余。铁路利润是“满铁”的收入中最大一项。因此“为东北政治及军事上之需要，吉黑两省会与军政中心之沈阳必须有主权在我之铁路干线交通，须以自资自力建筑沈阳直达吉、黑两省会之铁路。而为经济及文化上之需要，东北

① 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75 页。

② 东北文化年鉴编印处编辑：《东北年鉴》，1931 年版，第 373 页。

③ [日] 满史会编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1987 年版，第 160 页。

④ 王贵忠：《张作霖与东北铁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 1 辑（总第 22 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6 页。

各省间又须有主权在我之干路，且能与关内各干线衔接，构成系统，配合整个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① 无论从国防角度还是从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考虑，自建铁路均被视为东北当局的当务之急。

表 3-3 满铁营业总收支与铁路收支对照表（单位：1000 日元）

年份	总收入	铁路收入	总支出	铁路支出	总盈余	铁路盈余
1921	147, 101	78, 204	115, 714	33, 173	31, 386	45, 031
1922	169, 957	87, 813	134, 876	34, 169	35, 080	53, 644
1923	185, 698	92, 270	150, 903	35, 788	34, 796	56, 482
1924	194, 182	92, 562	159, 629	36, 533	34, 533	56, 008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二十年略史》，（夹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7 年版。

为了有计划地推进铁路自建工作，成立一个专门管理东三省交通的领导机关十分必要。1924 年 4 月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成立。它是当时东北各交通事业之最高决策机关，对于铁路之营运兴筑、省县公路之修建、电话电信网之完成、航权之收复、航政之整理等负其督导之责。^② 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由王永江担任，委员 15 人，均由东三省省长和官署长官兼任。内部设置总务、路政、邮航三部，每部有 1 名执行委员，在委员中互相推选担任。执行委员下设 1 名文牍员和多名事务员。并由每个路局指定两人为调查员，随时分任各路审查工程，负责购置材料等事项。^③ 为了抵抗外国对东北交通的垄断和带动东北边疆的整体开发，王永江建议修建纵贯东三省的铁路东、西干线计划。东部干线由奉天至吉林，计划决定由奉天、吉林二省分别组织铁路建设机构，以海龙为中心，南段成立奉海路公司，由奉天省官民共同出资，用本国技术人

① 凌鸿勋：《中国铁路志》，台北世界书局，1963 年版，第 306 页。

② 凌鸿勋：《中国铁路志》，台北世界书局，1963 年版，第 306 页。

③ 东北文化年鉴编印处编辑：《东北年鉴》，1931 年版，第 372 页。

才，完全自主地建设由奉天至海龙的一段铁路。北段在吉林成立吉海铁路局，由吉林出资，亦用本国技术人才，完全自主地建设由吉林至海龙的一段铁路，完成奉吉干线交通。^① 西线由奉天至齐齐哈尔。此路中间距离甚长，以连通现有各条国有铁路为原则。由奉天到打虎山利用京奉铁路干线，由通辽至郑家屯（今双辽）利用四洮铁路（郑通）支线，至洮南以北则利用洮昂铁路干线，仅由京奉之打虎山站修筑一条支线至通辽，即后来有名的打通铁路，以衔接四洮铁路及在洮昂铁路最北之终点站昂昂溪起，接修跨越通过中东铁路昂昂溪站，以达齐齐哈尔，实际上系另计划修筑齐克（齐齐哈尔至克山）铁路，由洮昂铁路昂昂溪站接轨以完成西路干线交通。并越过齐齐哈尔，而达其更北之克山（最大之产粮区）。^② 并且制定了以自主筑路为先导的战略，即用本国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修建铁路，由本国政府或商民经营管理铁路。^③

二、自筑奉海铁路的过程

东北自筑铁路不仅涉及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路权问题。日本方面对于东北官办商办铁路一律强加阻挠。奉海铁路筹建时也遭到日本干涉，王永江开始了与“满铁”艰难的交涉历程：“1923年1月，王永江会晤满铁野村正课长，王询问说，奉天军人派倡议修筑开海铁路，满铁是否同意？野村回答说，开海线的修筑和葫芦岛的筑港联系在一起，构成对满铁的威胁。中国方面修筑开海铁路时，必须事前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④当日本得知东北当局完全依靠其自身力量修筑奉海线时，便以奉海铁路终点海龙县及其以北的吉海铁路线路包含在日本

①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929 东北之交通》，文海出版社，第 140 页。

②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929 东北之交通》，文海出版社，第 141 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7503 号卷。

④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第 2 卷第 3 分册，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 729 页。

“满蒙五路”借款权的预定线路中为由，横加干涉，并乘机提出借款修筑洮昂铁路的要求。经一年多的交涉后，王永江同意修建洮昂铁路借用日本资金，使日本势力伸入洮河以北的北满势力范围，日本方面才同意中方修筑奉海铁路。

王永江取得铁路筑路权之后提出“不依靠外国借款，完全用奉天省自己的力量修成一条模范铁路”。由省城通至海龙，定名为奉海铁路。1925年4月，奉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八王寺成立，委任王镜寰为总理。王镜寰是当时的奉天省政务厅长，这有利于取得沿线各县政府在招募民工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加快建设速度。陈树棠任技术长（总工程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系毕业，拥有丰富的勘测经验。车务课长高元策、工务课长陈明轩都是很有经验的铁路管理者。机务课、电务课、材料课等的负责人，是从四洮、北宁等老铁路延聘的。站务、机务从业人员通过考试录取。总之，奉海铁路聚集了一批东北铁路修建的骨干力量，为保证工程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奉海铁路属于官商合办性质。由于当时奉天省建设项目较多，财政不充裕，王永江决定招募商股以补充官方资金的不足。按原工程预算为现大洋2,400万元，王永江一再命令缩减，最后缩减至1,250万元，合奉大洋2,000万元。官商各投资一半，官股由省政府支拨，商股由商民认股。股本先尽商民招募，余下的由省政府认缴，但商股仅筹到900多万元，其余由奉天省财政厅随时垫支，保证了筑路资金来源。奉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东三省官银号总号和分号为收股款机关，随时发给代收证据，认足200股以上的主要为银行和储蓄会。

表 3-4 奉海铁路认购 200 股以上单位一览表

认股单位	股数	认股单位	股数
官银号	10,000	奉天储蓄会	4,620
交通银行	2,916	海城地方储蓄会	560
东北银行	1,633	抚顺大同储蓄会	4620
奉天总商会	1241	中国银行	2,916
商业银行	885	黑龙江官银号	583
公济平市钱号	584	沈阳储蓄会	798
海城农商储蓄会	700	安东地方储蓄会	580
开原公款处	700	奉天公民储蓄会	238
牛庄商民储蓄会	262	营口商业储蓄会	315
抚顺地方储蓄会	220	抚顺兴业储蓄会	350
盖平地方储蓄会	357	开原地方储蓄会	315
抚顺厚生储蓄会	357	本溪地方储蓄会	365
辽阳地方储蓄会	378	通化商业储蓄会	252
海龙便民储蓄会	273	通辽地方储蓄会	350
怀德地方储蓄会	283	西安公款处	300
安定商会	216	海龙公款处	200
西安魏治安	500		

资料来源：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卷 3803 号。

如表所示，东三省官银号购买 1 万股，是购买股份最多的机构。也有个人积极购股，如西安（今辽源）的魏治安认购 500 股。^① 奉海铁路占用民田一律估价收买，但不发给现款，“按各户被占之亩数若干，概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803 号卷。

行核定价目，发给股票。”^① 公司股票为记名式有价证券，股票可在中国人之间转让，但不准转让或抵押给外国人。

奉海铁路修筑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铁路干线起点为奉天东站，后沿浑河经抚顺进入丘陵，再进入山区，过清源，沿柳河进入海龙平原，又经山城镇进入海龙镇。路线沿途地势险峻，工程艰巨。除草市至海龙一段地较为平坦外，其余地区“山岭回环，极为险峻，中经浑河萦抱。选测路线，无从绕越，工作之艰，实倍寻常。计建筑大小木桥 178 座，水沟涵洞 101 座，混凝土拱桥、平桥共 50 孔。老虎岭及西岭山两隧道，共长约 490 公尺，尤为工程中之最称艰巨者。”^② 筑路过程极为艰辛。奉海铁路修建中遇到另一个困难是资金不足。为了应对这一难题，奉海铁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一切桥梁、车站用房及给水设备都为临时性建筑；采购材料应尽量就地就近；桥梁及其他永久工程均采用洋灰混凝土代替钢筋水泥；各工段区办公室凡是能租用民房的一律不准建新房，不能租的一律建筑普通式砖房；职工宿舍暂租民房，当票房重建时，临时票房改做职工宿舍；电报电话线路由 8 根改为刚刚够用的 4 根；钢轨采用每码 60 磅的经济实用的轻型钢轨。^③ 工程所用枕木当时采用华泰公司承办，但由于运输路途远且供不应求，耽误工期，后改为由生产木业的地方派专员自行采办，如兴京、永陵等地采用了产量高、质量好、价格低廉的榆柞、水曲柳，^④ 保证了施工顺利进行。

奉海铁路于 1925 年 7 月动工，1927 年 9 月通车。海龙至朝阳镇延长线在 1927 年 7 月动工，12 月完工。梅西支线 1927 年 5 月动工，12 月通车。又自西安（今辽源）车站修建至煤矿区线路长 10 公里，1927

^① 《铁路用地发股票》，《盛京时报》1925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

^② 冯元午：《东北第一条中国自建铁路》，通化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东边道经济开发史略》，1998 年版，第 334 页。

^③ 忆先：《沈海铁路之过去将来观》，《东三省经济月刊》第 2 卷 1 号。

^④ 陶俐：《张作霖与奉海铁路》，《兰台世界》2008 年第 8 期。

年7月动工，1928年1月完工。奉海铁路干支线营业里程总长337.1公里，干线自奉天省城经海龙县至朝阳镇263.5公里；支线自梅河口至西安（今辽源）县城及煤矿73.6公里。奉海铁路原定3年完工，最终只用了2年零3个月，提前完成。该铁路“工程之艰巨、建筑之迅速、用费之节省、尤在足以夸耀者也”。^①尤其重要的是，奉海铁路“遂开东北铁路自筑自营之先声”，“至是日人始认中国工程师之能力”。^②

三、自筑奉海铁路的意义

奉海铁路建成前，东北尚没有一条由中国人利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建设并完全归中国人所有的铁路，因此，奉海铁路的建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首先，打破了日俄对东北铁路建设和运输的垄断。奉海铁路沿途经过沈阳、抚顺、清原、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六县和山城镇、朝阳镇两个商业中心市场。这些地区烟麻、粮产、森林、矿产等资源丰富，从前必须通过南满铁路运输，现在可转入奉海铁路运往外地。当时日本人已有一定认识：“奉海铁路对南满铁路的地位，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对日态度来看，不妨说很难具有营养线的性质；反而却怀有将来和京奉线联络，随着连山湾筑港成功，和满铁展开竞争的远大意图。”^③奉海铁路的修建带动了打通、呼海、鹤岗、昂齐、齐克、吉海、洮索等铁路建设。到1920年代末期，形成了东北自建自营、日本独资经营、中俄合办中苏共管三足鼎立的铁路运输局面。与此同时，东北铁路管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的国有和省有铁路的营业里程占东北铁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第4册），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版，第3833页。

^② 中国工程师学会编：《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三十年来中国之铁路工程》，1948年版。

^③ 《驻奉天代理总领事蜂谷辉雄致张作霖照会》（1926.12.28第861号），满铁总务部外事科：《借款铁道关系事项》第24号。转引自陈毓述等：《试论东北结论交通委员会抵制满铁的业绩》，《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路的 50%，从而成功地打破了日俄对东北铁路建设和运输的垄断。^①

其次，改善了奉天和海龙两市的城市空间布局。奉海铁路起点站在奉天市，铁路的通车也推动了奉天市的发展。奉海铁路把兵工厂、大亨铁工厂、造币厂、迫击炮厂、粮秣厂等连成一气，在省城东部形成了新的奉海工业区板块。奉海铁路开工前，这一地区人口很少。为引导城市向外发展，优化城市布局，抵制满铁附属地向外扩张，奉天省政府在设计奉海车站时一次性批准占地 320 公顷，这些土地除了一部分为车站道线和站房占用外，其余大部分土地被规划为商业市场。铁路通车后，这里客货云集，很快成为奉天市最为繁华的地带。^② 朝阳镇在通车后市镇贸易圈扩大，由此运出的木材、烟草和人参等商品远销到香港、上海。人口也进一步增长，30 年代初超过了 1.5 万人。^③ 奉海铁路通车加强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奉海铁路与京奉铁路接轨以后，东北的土特产、山货和毛皮等从沈阳装车入关；关内的钢铁、五金机械等物资也运入东北，加强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促进了奉天省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运输学认为，运输成本或费用的下降直接引起运输供给的增加，致使区域可达性提高，各种经济带的要素会从一地运送到更远的地方，使得交通经济带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增强，促进经济带的规模经济效益提高，加速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④ 奉海铁路每年运出农产品 90 余万吨，以大豆、粮食为大宗货物，占货运量 70%。另外，运输西安（今辽源）的煤炭以及工业品杂货，货源充足，保证营业运输获利。奉海铁路的建成通车也方便了沿途商贾、旅客的出行，客运量逐年增加。1929 年至 1931 年，铁路收入每年增长 200 万元现大洋，1931 年利润最多达 457.6 万元，相当于筑路投资的五分之一，

^① 王海晨：《民国时期东北地方铁路自建意义》，《辽宁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② 曲晓范：《近代的历史变迁东北城市》，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07 页。

^③ 《东边开发之根本——奉吉沿线之发展》，《盛京时报》1938 年 4 月 24 日第 4 版。

^④ 张文彦等编：《交通经济带》，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7 页。

平均每公里收入 1.5 万元，是自建铁路中收入和利润最多的铁路。^① 奉海铁路也带动了沿线其他业务的发展。如在车站等地开办印刷所、贩卖所、粮食交易所，兴办大市场、电报业务等，促进了官商合办的矿业的发展。路沿线的农产品、药品、蔬菜、水果、禽畜及一些特产，还有木炭、皮毛制品等等的交易随着通车日益繁荣兴盛，给沿线人民生活带来很多方便。^② 1920 年代，当全国外贸长期处于入超状态时，只有东三省长期处于出超地位，而且出超额相当大，1922 年出超 782 万两白银，1927 年出超 13,913 万两。^③ 这与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自建铁路运营网络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化的实际推进过程中，为了快速有效地促进目标的达成，减小不利因素影响，政府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或者成为推进者，或者成为直接介入者。^④ 在王永江的积极努力下，奉天省政府在这一时期的交通建设中两者兼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公路辟修，密切了乡村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保证了省城、县城和乡村间“政令通达”；汽车运输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城市与乡镇之间、铁路沿线城镇与非铁路沿线城镇之间的交通联系；自建奉海铁路则有效地抵制了日本利用铁路进行经济侵略，维护了民族利权，带动了沿线资源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东北边疆经济的发展。以自建铁路为骨干，以汽车运输和大车运输为支线的现代化交通网络逐步建立起来。王永江采取的促进交通早期现代化的措施，不但促进了奉天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构建了当地近代交通网络，为形成融运输、储存、包装、搬运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交通系统奠定了基础。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803 号卷。

② 《奉海铁路工程纪要》，奉海铁路工程局 1928 年刊订本。

③ 王贵忠：《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周毅，张德良编：《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44 页。

④ 吴忠民等：《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58 页。

第四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教育早期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与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①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是通过借鉴、学习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将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的早期现代化进行整体考察，的确很难看出其巨大变化；如果分解为不同区域和不同层面审视，则变化还是相当可观的。”^②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地区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速度与规模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奉天省“颇能不受时局波动影响，平稳进展，一切规模，灿然大备。……省、县教育行政机构逐渐完备，地方教育之设施，亦愈普及，突飞猛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③尤其王永江任奉天省代省长期间，奉天省具有现代特征的教育得以迅速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奉天省学制改革、东北大学建立和民众教育的发展。

第一节 奉天省学制改革

学制是国家规范教育行为、调整教育关系的一种基本制度，它主要通过调整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比例关系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来提高教育质量。学制改革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最深层次的变革，是教育早期现

① 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6 页。

③ 辽宁省教育厅编印：《辽宁教育丛刊》第二种：辽宁教育概况。

代化的重要标志。1922年，王永江主持了奉天省学制改革。

一、学制改革的背景

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学制是1902年的壬寅学制，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付诸实施。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为1904年的癸卯学制。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9月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其内容主要仿照日本学制，比较单一和僵化，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矛盾和阻碍，引起教育界人士不满，他们声称“教育部只知抄袭日制”。^① 191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年会，湖南省教育会在会上提出了“改革学校系统案”，成为学制改革的嚆矢。1920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届年会，奉天等省在会上提出了革新学制有关的议案。^②

1922年11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为区别于壬子—癸丑学制，又称新学制。新学制规定了七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和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③ 王永江遵循新学制标准，主持了奉天省学制的改革工作。他首先责成教育厅调查奉天省旧学制存在的问题，为学制改革准备条件。经过综合调查，奉天省旧学制存在着如下弊端：

第一，高等小学置设不当。根据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为7年，即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其中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如满学龄儿童即行入学，10岁即可毕业。儿童年龄还小，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② 安徽提出了《中等学校宜采行集合制案》和《改革小学制度、延长义务期限案》；云南提出了《改革学校系统案》，涉及小学、中学、大学等普通教育的各个阶段；福建提出了《学制改革案》，建议取消高小和专门学校；奉天提出了《改革学制案》，要求重新调整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年限。

③ 《大总统颁布之学校系统改革案》，《政府公报命令》，1922年11月2日第2393号。

“既无职业学校之陶冶，又无补习学校以收容”，只能继续求学，进入高等小学学习。高等小学毕业后，年龄虽然增长了，但因高等小学只传授普通知识，不传授专门技能，造成学生“欲升学则家计不足，欲谋生则技能缺乏”的状况。^① 另外，高等小学主要是为升入中学之预备，而中学所设的预科也是为升中学而预备，无形之中高等小学的设立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第二，普通教育重复冗长。国民学校“初等小学注重儿童身心之发育，施以适当之陶冶，并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为本旨；高等小学以增进国民学校之学业，完成普通教育为宗旨；中学校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② 可见，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都注重普通教育，虽然难易程度不同，但所学习的主要学科依然是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乐歌、体操、英语等普通项目，如此“往复循环，大同小异，足使学者兴趣索然，耗费十一年光阴，仅受一种普通教育；其无力升学者，仍不能自谋生活，即或有志升入大学，又必须再入大学预科，补习外语，方能至本科学习”。^③ 奉天省国民学校毕业儿童 80%—90% 不能升学，儿童虽接受国民普通教育，没有学到任何职业技术方面知识。学生“费十余载脑力光阴，因无职业方面之技能，欲求一适当之位置，渺不可得，因谋生无术，势必流为社会上之游民，”^④ 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实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名不副实”。奉天省当时设有甲乙种实业学校，其专业性差，“名为实科其实乃为实科中之普通科”。例如，以甲种工业最适用的应用化学科来说，其学科包含有药品、颜料、涂料、油漆、硫酸等 33 种，“其小者又无虑百数十种。以三年之光阴学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775 号。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775 号。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④ 《奉天教育事业之状况》，《东北文化月报》第 1 卷第 4 号。

百数十之专门技术……故其学科名为无一不知，实则一无所能而已。”^①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仿照日本学制，就其内容而论，除教育一科为各部通习外，其余如国文部、英语部、史地部的教学内容均与大学文科各门没有什么差异；理化部、数理部、博物部的教学内容又与大学理科各门无甚区别；而师范附设的农、工、商等各专修科，又与大学之农、工、商等专门学校相同，而造就之人才，仅供中学教师之用。“国家耗巨大经费，仅设此骈枝学校，似非计之得也。”^②

由于旧学制的不切合实际，致使“教育之功效日薄，社会之游民日多，各校毕业生大都学而不能用，用竟非其所学”，“非特不能为实施教育的准则，反足以阻碍教育之教育。”^③王永江根据调查情况，进一步总结了奉天省学制改革的必要性，“民国元年所颁之学制，大部分抄自他国，微论其难适中国国情，即于中国立国立教之举亦未免舍本根而趋末枝，削足适履，利未见而弊反来之。十余年来办学员绅亦多为定章所束缚，而于地方之文化人民之发展与夫学子之得失则不暇闻问”，因此，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轨，出现了“此斯非教育之罪，盖学制之罪耳。”鉴于奉天省“一切风俗习尚及人民性格，与内地各省均难强同，施教方针自不能不求其通合，”^④王永江决定结合奉天省本省实际情况尽快推行学制改革。

二、学制改革的推行

奉天省的学制改革是从 1921 年冬季开始筹划的。经过一年的筹备，1922 年 11 月 13 日，王永江颁发实行新学制的训令。他在训令中提出执行新学制后应着重解决的教科书问题、课程标准问题和留学生教育问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775 号。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775 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题。王永江把学制改革和学务整顿结合起来，推进奉天省教育早期现代化。

(一) 编审教科书

教科书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重要媒介。王永江首先责令成立教科书编审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教科书编审处直接隶属于省政府，王永江任编审处总裁，关海青^①任编审处总纂，谢荫昌任副总纂，主要办理编纂审查教育图书事宜，其下设修身、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博物、教育、艺术等 11 个股，每股设编审主任 1 人，编审员若干人，分头审查各科教科书。1922 年 8 月王永江指令“改制应用之教科书尤关重要，亟应从速规定编制方法。择定编制人员，着手进行，以资应用。”^② 王永江要求总纂“竭力考察编审人员，并不惜多金礼聘之，以为早收成效。”^③ 为了推进教材编写工作顺利进行，教科书编审处首先制定了编审原则：“其一，国民学校既定六年，前四年仍适用通行教科书，另外编写奉省乡土科教材‘以补其缺’。后二年取旧日高小学校三年的教科书，改写二年本，以为国民之充分教育；其二，预科中学既定三年，其教科书充分与国民学校教科书衔接；其三，师范既定三年制，其教授应与预科中学教科书衔接。师范第三年应特设乡土研究科，编订参考教授书籍；其四，分科中学文、理科和职业学校普通科教材也可以编审；其五，各科教科书除乡土科外，如所有成本只须稍加审定即能适用者，仍采取以目前应用；其六，国民学校教科每科得编二种以上，以便学校采用。”^④ 编审原则表明，新学制改革非常重视乡土教育，注重培养发展地方经济人才，同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

^① 关海青曾任优级师范高等学堂职务，于教育原理、方法等都有精密研求，当时教育界稍负声望之人，皆亲承其教授。详见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集（下）第 873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③ 《王代长注重教育》，《盛京时报》1922 年 9 月 2 日第 4 版。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性。

编审处对于教科书的编审程序与规则也做出了详细规定，各股编纂或审查的教科书分为国民学校、中学校、国民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四类。首先由总纂、副总纂与各科主任商量选定教科书编审的种类及册数，然后交给编审员编审。编审结束后，由编审主任送总纂、副总纂审核，如认为仍然需要修改时，再交给编审员继续修改。教科书编审的限定期限根据各自性质和原书页数为标准而定，经过审核并认可的教科书，呈请总裁核定即可发刊。编审教材中如果需要添购书籍杂志，可直接与干事股接洽，经主任开单核定后即可交由干事照单购买。^①

无论是教科书编审大纲还是教科书编审处办事规则，王永江都一一认真审阅并及时指正。在王永江督饬下，教科书编审处编成小学学校用书 17 种，共 110 册；初级中学学校用书 21 种，共 39 册；师范学校用书 28 种，共 45 册。初中、师范通用书 6 种，共 13 册。总计 72 种，207 册。^② 具体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奉天省教科书编审处编审图书名称

图书名称	册数	图书名称	册数	图书名称	册数
新国文教科书	12（春季）	生理学教科书	1	平面三角法教本	1
新国文教授书	12（春季）	外国地理	1	簿记教本	1
新国文教案	8（春季）	算术	3	簿记	13（秋季）
新国文教科书	12（秋季）	算术教本	1	手工教科书	2
新国文教授书	12（秋季）	化学	1	各种教学法	1
地理教科书	4	本国地理	3	普通心理学	1
理科教科书	4	国文读本	3	伦理学	2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4341 号。

续表

图书名称	册数	图书名称	册数	图书名称	册数
历史读本	4	手工教科书	3	教育学	2
国史读本	4	图画教科书	3	新教学法原理	1
珠算教科书	3	图画教科书	1	国文读本	3
新算术 珠算 算术教科书	3 2 (5、6 学年)	图画教科书 英华会话范本 乙级三四编	6 (秋季) 2	物理学 世界史	3 3
新算术	2	英文尺牍教科书	1	本国史	3
手工教科书	8	中等英文法	1	图画教科书	3 (春季)
手工教科书	4	本国地理教本	2	图画教科书	6 (秋季)
图画教科书	8	外国地理教本	2	新世纪英文读本	7
图画教科书	8	动物学教本	1	几何学	1
图书名称	册数	图书名称	册数	图书名称	册数
英华尺牍范本 甲级一二编	2	生理学教本	1	平面三角法	1
英华会话范本 一二编	2	植物学教本	1	物理学	1
那氏文法第二册	1	矿物学脚本	1	化学	1
英文法程初集	1	西洋史教本	2	代数学教科书	1
植物学教科书	1	本国史教本	3	平面几何学教本	1
动物学教科书	1	东亚各国史教本	1	立体几何教本	1
矿物学教科书	1	地理概论脚本	1	代数学	2

资料来源：《奉天公报》第 4341 号

教科书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对学生影响最为直接。新审定教科书中融入了新学制的思想，为顺利推进学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二) 审定课程标准

科学缜密的课程标准是新学制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是奉天省在制定学制草案时，主要关注了《新学制系统纲要》，对课程标准没有认真研究。在实施《新学制系统纲要》时，只是公布了小学课程标准，而其他几类学校只制定了教授时数表而已。1924年12月初教育厅拟定学校的《课程标准（草案）》呈报省政府。王永江认真审阅后提出以下问题：第一，小学课程标准为何将国文与习字两门分立？讲授时间比以前减少且程度更低，是否合适？第二，小学讲授朱子学，师范学校的经学主要授论、孟、礼记、春秋。将来能否胜任讲授小学之经学？第三，理科为何不以物理为主？”^①

针对王永江以上问题，教育厅一一给予解答：第一，国文每周应该讲授两课半，无论如何也不需要用十多个钟点。特别设置习字课是因为对于初小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来说，掌握日常生活用字非常重要，而通过习字课为其以后生活中熟练运用打下基础。第二，师范生在小学时已学习朱子小学，师范再讲授小学不过是复习而已。师范讲授论、孟、学记等，主要培养学生“治心处事之道，使之端其品”。第三，高中理化分为算学、物理、化学。三者之中尤以算学最为重要。由于“化学之理待物理而后明，物理之理待算学而后通。算学者实理科之中坚学科”。因此，新课程标准中所设置的算学课程为最多。物理可分为声、光、力、热、电、磁等六个方面，国内各校将这六个方面无分轻重，普通教授，这样并不科学。课程标准采用西方学校教授物理学之法，将力学与普通物理学分开教授，更好地实现物理的应用价值。另外，物理注重实验，而实验课时因各校学生数量、仪器设备不同，难以硬性规定，应根据各校实际情况再作定夺。^②

王永江虽然对此解释比较满意，但经再三考虑，还是令政务厅于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798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798号卷。

1925年1月6日发出通知：教育厅所拟定的新课程标准虽经批示，但改革关系甚大，应召集教育厅长、东北大学和省立各校校长及教育主任会议决定。1月8日召开会议，与会者认为新学制缺点甚多，请求暂缓实行一学期。1月10日，王永江发出训令：“新定课程标准一案，虽经批示，惟兹事体大，非集思广益仍恐有未尽妥善之处，且变更一事宜使众意了然，而后乃推行无阻。”^① 随后令政务厅招集专门学者和在教育第一线有学识经验人员组成课程标准委员会，委员会设3股，即小学股、中学股、师范股，每股设9人；每股负责编制本股所应负责的课程标准。委员会成员有张恩明、林耀山、赵国柱、李象庚、孙国封、侯德锡、方永蒸、冯广民、阎乐山、徐焕章、范先炬、姬振铎、梁兆璜、李承露、邢定云、高风、周守一、崔符乾等，^② 都是当时教育界的名士。1925年7月，课程标准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研究讨论，制定出了较为完善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各项课程标准呈送后，王永江逐条复核，并一再修正，1925年7月16日正式训令教育厅照准施行《奉省新学制课程标准》。

《奉省新学制课程标准》规定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实利教育，而以美感能育陶成之”，教育标准是“优良性行，根本知能，公民资格，健康身心，正当职业，高尚娱乐”，教育目的为“内保我国固有之美德，外应世界教育之潮流，庶有增美释回之效，而无突飞落伍之虞”。课程标准还声明其所遵循的方针为“中西文化之调和”与“理想与事实之沟通”。强调一方面提倡科学，另一方面注重国学，尤其关注理想与事实的关系，提出“事实生理想，理想亦生事实”。显然，在奉天省学制改革中，王永江强调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同时提倡“采取他人之特长”，从而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结合，希冀让东方文化因此“放一异彩”。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798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04号卷。

在新课程标准过程推行中，王永江允许学校以“世界潮流”和“教育眼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种种变通。如高级中学农工商、水产等科课程标准未订，各学校根据本委员会所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名称及学分等变通办理。^①

(三) 留学生制度改革

奉天省开始实行新学制后，王永江对留学生制度进行改革。奉天派遣留学生始于日俄战争之后。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首倡派遣留学生，攻治西学”，并“以本省接近日本，故派遣留日者为多，自后风气渐开。”^② 进入民国，留日学生增长速度更快，到1914年，奉省在教育部备案的留日学生数额高达72名，到1916年，奉系统治建立时，留日学生的数量大致仍保持这个水平，^③ 但留学教育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为了使留学生成为合格的优秀人才，奉天当局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生监督一职，以管理留学事务。监督员的职责是：注重实业人才，务使学生尽入高专学校，得有精深学问；维持秩序，务使学生敦品励志，藉泯嚣陵之习；加意体恤，务使学生安心向学，毋任有困苦荒废，致贻外人之笑。^④

从1923年起，日本特约五校^⑤期满即解约，“嗣后省官费生应一律停补，改为奖励办法。”^⑥ 留学生学费在改革后并非全自负，而是部分由自己负担，部分由奉省以奖励的办法给予解决。^⑦ 奖励金额根据学校、学科之程度、地方生活之状况、学生考试之成绩，分列等级。从而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4784号。

② 奉天通志卷152

③ 郭建平. 奉系教育 [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第209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914号卷。

⑤ 日本特约五校是指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东京高等商业专门学校。

⑥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914号卷。

⑦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914号卷。

保证在不同国家的留学生生活水平大体保持一致，体现公正公平原则。

表 4-2 奉省学制改革后留学生奖励金额

国别	甲等	乙等	丙等
日本	日金 600 元	日金 500 元	日金 400 元
美国	美金 800 元	美金 65 元	美金 500 元
英国	英金 150 镑	英金 120 镑	英金 90 镑
俄国	现大洋 800 元	现大洋 650 元	现大洋 500 元
法瑞比	法金 6000 法郎	法金 65000 法郎	法金 4000 法郎

资料来源：《奉天公报》，第 3777 号。

留学生获得奖学金后，下学年如果“试验落第或不能升级或转学他科、他校、他国者，不得要求给奖学金。但再下学年如能升级仍予以相当之奖金”。接受奖学金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回省服务，否则随时罚其缴还奖金。^① 奉天省留日学生最多，为了鼓励留日学生学习积极性，奉天省于 1923 年 3 月制定了《留日学生施行奖金细则》，对学习成绩优异的留日学生亦给予奖励。《细则》规定：“凡考入指定学校本科者给奖，预科、选科不给；凡某科培养数同在一校者，其奖金以学年分数最优者分别核给。设分在各校，其奖金合各校学年分数之最优者分别核给。奖金等级仍按以往规则执行。”^② 《留日学生施行奖金细则》给予成绩最优的留日学生以极大的鼓励。

留学生回国后，需要接受进一步考察。根据教育部曾规定，对归国留学生在使用之前，要经过两次考试，王永江认为前两次“主要是为查悉学生根底若何”。但毕业生“性行若何，关系尤为重要。”在任用前必须再次进行“明察口试，以昭郑重。”^③ 因此，奉天省留学生有第三试，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777 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916 号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926 号卷。

由王永江亲自主持。王永江重用留学归国人员，并在任用中注重专业对口，学有所用。如表 4-2 所列的 27 名留学生中，工业学校毕业生大多分配到兵工厂、纺织厂、电灯厂等，而早稻田大学经济科的胡锡禄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罗振邦分别被省财政厅和教育厅录用，可谓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材。

表 4-3 1923—1924 年奉天省留日毕业学生任用情况表

姓 名	毕业学校	任用单位
白铭璋	东京帝国大学矿科	千金寨煤矿公司
韩凤苓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纺织科	奉天纺织厂
郑向荣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	东三省兵工厂
陈鸿翰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	奉天电灯厂
司桂章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	教育厅视学
董振铭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化学科	沈阳高等师范学校
李安人	北海道大学水产制造科	奉天省教育厅
罗振邦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奉天省教育厅
李德新	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	奉天市政公所
王文庆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关科	四洮铁路公司
杜重远	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	奉天市政公所
张圣恩	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工科	奉天市政公所
徐箴	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电气工科	奉天市政公所
王春生	秋田矿山专门学习采矿科	本湖煤铁公司
李禹忱	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	东北大学
耿熙旭	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	东三省兵工厂
吕振	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	东三省兵工厂
刘家琳	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	东三省兵工厂

续表

姓 名	毕业学校	任用单位
魏华实	东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电气化学科	东三省兵工厂
王英麟	仙台高等工科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科	洮昂铁路公司
张谅	东京应庆大学经济科	洮昂铁路公司
张嘉宾	京都帝国大学法科	洮昂铁路公司
岳铎	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酿造科	省实业厅
崔笠堂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	省教育厅
徐耀宗	明治大学法科	高等法院
胡锡禄	早稻田大学经济科	省财政厅
孙泽长	东京铁道司教习所专门部机械科	沈海铁路公司

资料来源：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220页。

三、学制改革的影响

奉天省新学制集结了教育界广大人士的智慧，成功地借鉴了中外教育的经验，成为奉天省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首先，建立了“一举而三得”的教育体制。中学实行分科制度成为新学制改革的一大亮点。民国初年的学制，从国民初等小学到高等小学再到中学，“穷尽十一年光阴，以之升学则不足，以之谋生则不能”^①。中学介于小学和大学之间，表面看来似乎是承上启下的学校，实际上中学为“大学之预备学校，所应重者在道德，在基本学科，欲升入大学深造，仅仅接受中学教育不够，仍需入预科。”^②而高等小学最后学期所讲授功课与中学第一学年多有重复。因此，新学制将小学缩短一年，中学增加两年。以培养社会实际应用人才为原则，新学制将中学分为中学

① 《奉天省教育事业之状况》，《东北文化月报》，第一卷第四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798号卷。

预科和分科中学两种。分科中学课程分为文科、理科、农科、工科、商科及其他特殊各科等。^① 原有省立第一中学改为文理科中学，省城第一小学改为第一中学预科。原有女子师范内的女子中学改为女子理科中学；甲种商业学校改为商科中学；省立的六所师范学校都改称为国民师范，并增设工科职业学校两所，分别附设于工科中学内和原有省城第五小学内，分设锻工、铸工、木工、钣金、工机、器工和制革等科。沈阳高师附属中学改组为农理科中学。这样，中学毕业生“升学则裕如，不升学则亦可恃专门学识以谋生。即使退而不能入分科中学者，亦能得普通教育，诚一举而三得，”^② 解除了学生的后顾之忧，满足了社会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

其次，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职业教育渗透到普通教育中。奉天省根据地方情况，允许设置职业准备教育，初中可根据需要兼设各种职业课程，高中则是普通科与职业科并立，这样就在各个层次上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学生有较大选择余地，满足了不同家境和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需求。其二，职业学校数量增加。民国时期奉天省共有职业学校 44 所，其中晚清时设立 1 所，民国以后新学制实行前建立 5 所，新学制实行后建立了 38 所。尤其 1923 年建立职业学校 12 所，可谓职业学校高峰年。^③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891 号。

② 《奉天省教育事业之状况》，《东北文化月报》，第一卷第四号。

③ 李喜平主编：《辽宁教育史》，沈阳文海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3～274 页。

表 4-4 民国时期奉天省职业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全年经费（元）	设立年月
省立东边商科高级中学附属职业学校	—	1909 年 2 月
省立第一工科职业学校	8067	1923 年 2 月
省立第二工科职业学校	21330	1923 年 8 月
省立第一农科职业学校	14598	1926 年 7 月
省立第一女子工科职业学校	51924	1923 年 2 月
省立第四小学附设商科职业学校	1830	1923 年 8 月
辽阳县立职业学校	1320	1913 年 4 月
宽甸县立职业学校	5784	1915 年 2 月
铁岭县立蚕桑学校	1742	1917 年 8 月
辽源县立职业学校	2065	1918 年 7 月
西丰私立职业学校	624	1922 年 9 月
盖平县区立商科职业学校	540	1923 年 2 月
铁岭县立第一工科学校	990	1923 年 2 月
康平县立职业学校	2090	1923 年 2 月
西安县私立医学校	1000	1923 年 3 月
安东（今丹东）县立职业学校	2980	1923 年 3 月
怀德县里农科职业学校	3724	1923 年 8 月
铁岭县立第一商科学校	837	1923 年 8 月
辽阳私立女子职业学校	3000	1924 年 2 月
西丰县立职业学校	1696	1924 年 3 月
辑安县立职业学校	2861	1924 年 7 月
开原县立职业学校	7127	1924 年 7 月
铁岭县立第二工科学校	1000	1923 年 8 月

续表

学校名称	全年经费（元）	设立年月
铁岭区立柞蚕学校	880	1924年8月
梨树县立女子工科职业学校	3211	1924年12月
法库县立林科学校	2117	1924年10月
昌图县立农科职业学校	6664	1925年1月
兴京县立农科职业学校	4513	1925年2月
绥中县立职业学校	1596	1925年2月
盖平县立职业学校	6318	1925年6月
义县县立乙种工科职业学校	1462	1925年7月
盖平县区立职业学校	1668	1926年2月
桓仁县立职业学校	4236	1926年2月
凤城县立职业学校	13478	1926年8月
铁岭县立女子职业学校	400	1926年8月
海龙县立职业学校	2081	1926年10月
桓仁县立女子工业职业学校	4236	1927年1月
西丰县立女子职业学校	1264	1927年3月
新民县立工科职业学校	5999	1927年4月
东丰县立职业学校	1836	1927年10月
岫岩县立甲种职业学校	6754	1928年2月
抚顺县立女子职业学校	1659	1928年8月
通化县立职业学校	1938	1929年
盖平私立职业学校	1000	1929年8月
庄河县立工科职业学校	3112	1930年2月

资料来源：此表根据鸿宾等主编：《东北教育通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447—448页。

其三，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规程。新学制实行后先后颁布了《奉天省小学校附设职业科暂行规程》、《奉天省职业学校暂行规程》、《奉天省职业科教员养成所暂行规程》及《奉天省职业学校教员养成特别办法》等。《奉天省小学校附设职业科暂行规程》明确设小学职业科的目的为已修毕“初级小学科目之学生出谋职业者而设”。职业科开设普通和职业两类课程，普通课程包括公民须知、国文、算术、理科、簿记、艺术、体育等7科；职业课程要根据所设职业类别临时确定。根据新的规程，县市均设之，区村酌设之。^① 职业科不仅能大大普及，而且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设立和发展。《奉天省职业学校暂行规程》确立了职业学校宗旨：“以养成国民独立生活或台力经营必需之技能，并发展地方人工天产，供世界之利用”。职业学校的种类为农科、工科、商科及特殊科；修学年限为1—5年。省县市以及私人均可设立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学徒（不再称学生）酌免学膳各费；职业学校的实习和实验时间须占总授课时间的二分之一，工科职业学校可将科目转移一、二时在晚间讲授，商科职业学校得将实习时间酌减；农科职业学校于农忙时得变通其课程。^②

师资力量是保证职业学校质量的关键。《奉天省职业科教员养成所暂行规程》及《奉天省职业学校教员养成特别办法》突出了职业学校其专业性，要求所设科目要符合教师专业的需要，尤其强调重视实习的效果。为了培养实际经验，学生不仅要在校内实习，还要到“相当之农林牧场、工厂、商店参观学习”，还可以“分送外省外国农工场所实地练习”，以提高学生的实际专业水平。其费用均系省县财政支出。^③ 这些职业教育规程的颁布使得职业教育有章可循，职业教育逐步走入正规化。

① 教育法令汇存续编下册奉天省教育厅辑印

② 《教育法令汇存续编》（下册）奉天省教育厅辑印。

③ 《教育法令汇存续编》（下册）奉天省教育厅辑印。

第三，将幼稚园正式列入学制中的一级教育，标志着幼儿教育的地位得以确立。

王永江主持的奉天省学制改革重视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才以适应社会和个人需要。中等教育兼顾就业和升学的双重需要，成为新学制最成功的一部分。学制在制订过程中所实行的政府、教育厅、教育专家与普通教育工作者互相讨论的模式，为未来的学制制订提供了有益借鉴。1920年代奉天省学制改革标志着东北地区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基本完成。

第二节 筹建东北大学

高等教育是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其主要职能为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的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级专门人才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极端重要性，人的文化层次越高，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幅度就越大。一般说来，小学文化程度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幅度为 30%，中学为 108%，大学为 300%。^① 因此，近代高等学校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机构，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王永江认识到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因而他冲破层层阻力，全力筹建东北大学。

一、东北大学成立背景

东北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一直处于日、俄威胁之中。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大连湾、旅顺、郭家岭和金县等地设立学校，这是外国人在东北设立学校之嚆矢。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大连和旅顺设立公学

^① 曲绍卫：《经济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99 页。

堂，收容中国学生。高等教育形势更为严峻。1923年，在奉天省内属于中国自办的高等学校仅有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私立医学专科学校而已。^① 而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不仅设备完善，而且教育体系健全。例如设于奉天的满洲医科大学，原系专门学校，学生实习场所为南满医院。1922年5月改组为医科大学，开始招收中国学生，学制比日本学生增加一年。学校分本科、预科及预习科，预习科是专为中国学生设置的，主要学习日语。中国学生在预习科毕业后才能进入本科学习。旅顺工科大学“规模宏大，经费极多，……人谓该校一校之经费与奉天省教育经费相伯仲，其言虽不可靠，然亦大致不差。分采矿、冶金、机械、电气、建筑四科，每科有学生二级。”^② 另外还有教育研究所和教育专门学校。^③ 奉天省内中学毕业生若想进一步深造，除了进入日本大学外，只能前往平津等地各大学及专门学校求学。

奉天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专门人才。王永江担任奉天省代理省长后，推行一系列鼓励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筹划开办奉天纺纱厂、奉海铁路等大型项目，经济发展呈现繁荣景象。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有大批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为其服务。同时，东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资金为创办东北大学创造了条件。当时中国“内省政纲废弛，事权纷乱，戎马频经，……东省政象，较诸内地各省，稍微安谧。”王永江的财政金融整顿取得显著成效，“外债肃清，内帑充裕，此番设立东北大学，业经划定的款。更无经济上之困难，而至停滞之忧。”^④ 另外，东北大学校址设于奉天省省城，“水陆走集，轮轨交通，大连、营口朝发夕至。东趋日本、朝鲜，南达津沪、闽粤乃至香港而通欧陆，经横滨而达美洲。路程均极联络，较之燕都金陵，尤为便利。若夫陕甘大

① 东北文化年鉴编印处编辑：《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270页。

② 奉天教育厅编译处：《东北》第十五期，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

③ 《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集（下），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7页。

④ 《对于东北大学之奏议》，《东北文化月报》第二卷第二号，1923年2月。

学之在凉州，四川大学之在成都，云南大学之在昆明，更不足与之相提并论。”^① 当时奉天省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倡举办高等教育，他们提出“东洋各国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此外，机械学等也无一不备，就是政治、法律也足进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培养各方面之人才，今天看来是当务之急。”^②

无论是从维护教育利权，还是从经济建设角度分析，在东北发展高等教育都势在必行，东北大学建立的时机日趋成熟。

二、筹备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从酝酿到创办都是在王永江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东北大学筹办伊始就横遭日本人的干涉，日本驻奉总领事即向王永江提出：“创办大学是件事倍功半的事情。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可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深造，大日本国予以优待，官费补助。”^③ 王永江对此未置可否，只是加快了东北大学的筹建步伐。1922年8月，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设于奉天省政府院内，委员为关海清、佟兆元、谢荫昌、王镜寰、汪兆璠、吴家象等十二人，^④ 筹备委员会公推王永江为校长；北京大学理学士吴家象为总务长。不久，王永江委任留美文学硕士汪兆璠为文法科学长、留德工学博士赵厚达为理工科学长。东北大学的筹建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后，拟定了《东北大学组织大纲》，规定

① 《对于东北大学之奏议》，《东北文化月报》第二卷第二号，1923年2月。

② 潘鹤年：《演苍年史》转引自王鸿宾等编：《东北教育通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③ 王振乾等编：《东北大学史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④ 国立东北大学编写组编辑：《国立东北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43年版，第27页。

东北大学由奉天、吉林、黑龙江及所辖蒙旗“合力组织之”，经费奉天占十分之六、吉林占十分之三，黑龙江占十分之一，以后开设经费和经常费也按照这一标准分担。大学设校长一人，分为六科，每科设分科学长一人，教授若干人，各科分设专门图书馆、各种实验室和实习的园林场所。大学计划分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商科和法科等六科，分年组织。文科分六个学系：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地理学系、俄文学系、英文学系；理科分三学系：数学系、化学系、物理学系；工科分六个学系：土木工系、机械工系、采矿学系、冶金学系、电气工系、建筑学系；农科分四个学系：农学系、林学系、农艺化学系、兽医学系；商科分二个学系：银行学系、外国贸易学系；法科分三个学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① 东北大学校务以奉天省政府为主管机关，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随时与吉林、黑龙江省政府沟通。《东北大学组织大纲》从经费筹备到组织机构，再到科系设置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尤其科系设置科学合理，为东北大学日后成为新型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基础。在东北大学的建校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此大纲进行的，由于吉林省计划自办大学，东北大学经费由奉黑两省承担，黑龙江省担负十分之一，奉天省担负十分之九。因此，奉天省成为筹办东北大学的主要力量。

经费的筹备是建立东北大学的首要问题。王永江在财力方面给予以全力支持。1923年3月拨奉大洋1,000元给筹备处作经费；6月又续拨5,000元。高专和高师的校舍均需修缮。1923年4月，奉天省政府先期投款奉大洋10,000元。到6月份，“重要工程已完成五分之三，需续拨大洋7,000元，作为剩余工程的经费。同时零碎工程也有部分修完，需拨大洋7,000元，此次一并拨大洋14,000元”。^② 东北大学筹建时期，奉天省政府共投资于修缮费共计奉洋24,000元。除了财政拨款以外，王永江还采用其他手段解决经费问题。如在建立新校舍的过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45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12号卷。

程中经费严重不足，王永江将高专校址标价售卖给商民，所得款项补助北陵建筑新校舍，使校舍建设得以顺利完工。

大学的未来发展规模如何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是否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议定东北大学借用高专和高师的校舍。但由于其空间狭窄，限制未来的发展规模。1923年4月16日，奉天省政府在昭陵东南购500余亩地，拨归东北大学理、工、农三科建新校舍。但是经勘查发现，其中有陵地300亩为清皇家所有，不能随便占用。王永江亲自写信与醇亲王沟通，顺利地解决了学校用地问题。

经费和学校用地解决后，东北大学筹备工作得以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东北大学在“北陵前勘定校址，将拟建校舍的工程包给天津之某建筑公司，不日即行动工，限于秋季完成。”^① 大学招生初试早已完毕，其中三分之二的学生来源于奉天省。1923年7月22日在高师内进行复试并检查身体，文、法、理、工四科共录取学生近200人。另外，王永江以“大学之中不可无校医，以专司校内之卫生设施及学生健康事宜，”聘定南满医学毕业生刘雨辰及另一中医共同担任。此后，王永江开始大刀阔斧地建设东北大学。

三、建设东北大学

(一) 高薪聘请名师

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最重要条件。根据很多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担心奉票跌价影响收入而不愿意应聘的情况，王永江果断做出决定：凡东北大学教授的薪金一律用银元支付。东北大学筹建时，筹备委员会拟订的大学草案对教师薪金有专项规定：预科教授月薪最高额为260元现大洋，最低额为150元现大洋；本科教授月薪最高额为300元现大洋，最低额为180元现大洋；助教月薪最高额为

^① 《东北大学之进行》，《盛京时报》1923年7月24日，第4版。

120 元现大洋，最低额为 50 元现大洋；助手月薪最高额为 50 元现大洋，最低额为 30 元现大洋。^① 东北大学正式招聘时，王永江不惜重金，将教授的月薪从原来的 300 元现大洋增至 360 元现大洋。东北大学教师薪金高于当时国内的任何一所大学。学校还为教授们修建了专门的宿舍区，当时称南新村、东新村、西新村，皆为新式洋房或楼房。

重金礼遇之下，东北大学教育精英云集。在聘任的 128 名教职员中，留学生约有 77 人，其中 11 个博士、37 个硕士、29 个学士。他们大部分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留学于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著名大学。教师中其余 40 余名均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和专门学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洋大学、香港大学、北洋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等。^② 许多当时知名学者、著名专家和社会名流都曾来东北大学校执教讲学，如黄侃、陈天倪、柳诒征、吴宓、冯祖荀、何育杰、庄长恭等均先后应聘到校任教。东北大学高薪聘请大量留学欧美的理工科教授和社会著名专家学者，为把东北大学建成现代化高等学府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采用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

教学管理模式的科学化是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东北大学科系设置合理，当时开办科系文科语学系为英文、俄文两组；理科为数学系、化学系和物理学系；法科为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工科为土木工学系、机械工学系，共四科八系两组。^③ 课程设置主要涉及在当时较为前沿、较为实用的学科，这在理工科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理工学院的物理学课程设有原子构造、热辐射、量子论、新量子论、相对论等十几门专业科目。土木系课程设有水力学、电汽工学、测地天文学等 40 余

^①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812 号卷。

^②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7 页。

^③ 《东北大学将招生》，《盛京时报》1923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门专业科目。文科教学内容更是涉及当时的热点问题，如文法学院哲学心理系的心理学课程设有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高等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系统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等十几门专业课程。^① 前沿的知识体系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精神，为东北大学成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功能于一体的先进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分制是当时国内外各大学所采用的比较先进的学业考核办法。东北大学采用学分制，规定预科生毕业时要修满 100 分，本科生 190 分，专科生 180 分。各科系所开设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课程按每周时数之多少核算其学分。学生在学习本系必修课的基础上，可以选修外系、外院的任何一门课程。^② 学分制度方法灵活，有利于学生开发智力，发展个性。但学分制度的实行需要足够的教学设备，例如大小教室、阶梯教室、实验室，并配备相应的仪器等。东北大学因为开始筹备时其教学设施即按照学分制设计，学分制得以顺利实行。

东北大学学生管理的主要特点是标准高、要求严。这在考试制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东北大学考试实行考试委员会制。每逢招生、期考、升级、毕业等考试，以各学院院长为首，由各系主任以及知名教授组成临时组织，成立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宜，考试结束即行解散。各院长均亲临考场进行监督，严禁学生交头接耳，打小抄，传递纸条，偷看书本。如有发现，轻者记过扣分，重者记大过或剥夺成绩。成绩不及格者，一律牌示降级，如无衔接的班次可降，即予开除学籍。由于考试纪律严明，建校初期遭淘汰的学生很多，如政法系各班入学时 60 余人，经期考、年考之后，到预科毕业时各班仅剩 40 人左右，到本科毕业时仅剩下 30 余人。文法各系入学时每班大约 50 人，但毕业者仅有半数。理工科被淘汰的更多，例如土木系入学时 37 人，毕业时仅剩 13 人。有

^①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7 页。

^②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00 页。

的学生被迫停学、有的转入关内其他大学继续学习。由于东北大学对学生要求得非常严格，所以学生的能力水平也高于国内其他学校。^①

总之，东北大学各学科课程设置目的明确，实用性强，保证学生增长专业知识，提高专业修养，从而与其“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② 的办学宗旨相吻合。

（三）建设东北大学工厂

王永江强调在办学中注重实际，主张理论研究和课堂教学必须辅之以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尤其理工科必须要设实习工厂和实验园地，才能学以致用。因此，创办东北大学不久，王永江即着手筹办东北大学工厂。东北大学工厂既是工科学生的实习工厂，又是省政府所投资的工业工厂。工厂的设计方案由赵厚达、孙国封等人拟定，并从德国购入先进的机器设备。1925年初，工厂开始动工，占地面积330余亩。王永江先后拨奉大洋380余万元作为办厂资金，以后又增加资本100万元。1926年4月厂房落成，机器设备也安装完毕，同年就为奉海铁路修造了8辆机车，运行状况良好，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东北大学工厂根据社会需要制造出大量产品，曾先后为东北各铁路局安装机车和客货车740余辆，修理客货车271辆，并能制造起重机、机车发电、各式锅炉、印刷机、摇纱机、钻孔机等各种机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工厂已成为设备先进、产品质量精良又有中外著名的科学技术人员参加指导和管理的著名企业。^③

东北大学的建立意义极为重大。首先，它为东北地区尤其是为奉天省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1923—1931年东北大学共招九届学生，招收学生3700余名。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子弟就有387人毕业于东北大学。其中部分高材生以公费送往美、英、德、日等国留学，其余均

^①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4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12号卷。

^③ 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被分配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营、北平政务委员会、各省政府文教政经司法等部门、中东铁路公司、实业建设、铁路、交通和厂矿等重要部门工作。^① 在这些部门，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

其次，东北大学的创办推动了奉天省及东北文化教育的发展。东北大学创办之后，黑龙江省于 1926 年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1927 年，冯庸捐私产创立了冯庸大学；吉林省于 1929 年成立了吉林大学。同年交通部在锦县设立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对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意义深远。

再次，东北大学的建立维护了教育利权，提高了中国教育声誉。王永江对日本的阻挠成立东北大学“建议”未加丝毫顾忌，拨巨款继续筹建东北大学：1923 年度拨款奉大洋 439,000 余元，1924 年度 397,000 余元，1925 年度 478,000 余元，1926 年度 517,000 余元。^② 其经费的投入在全国 58 所大学中位居第四。东北大学虽属省立，但“其实验室设备却是第一流”，教师薪水也比国立大学高。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东北大学是省区管辖的大学，但它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这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优秀大学，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③

王永江晚年因与张作霖政见不合，辞去本兼各官职，只留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虽重病在身，仍亲阅函件。许多东北大学校友对王永江创办东北大学的功德念念不忘。有的校友在回忆东北大学时讲：“前奉天

① 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2 页。

②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52，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版。

③ [英]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04 页。

省长王岷源先生，时当倭虏谋我日急之秋，从百年树人之计出发，高瞻远瞩，集资创设东北大学”。有的校友依然感慨：“首任校长岷源王公，于开学之日恳切陈词，其所以勖勉同学者倍至，故无不感奋万端”。^①

第三节 发展民众教育

“民众”在古代泛指没有世袭贵族身份，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在近代，民众一般是指居于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人，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工人、手工工匠、小商人、城市下层市民等。民众教育是“失学的儿童、青年、成人的基础教育，也是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青年、成人的继续教育和进修”。^② 有的学者认为民众教育就是社会教育，也是成人教育。^③ 还有学者把民众教育的内涵指定为普及识字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等。^④ 民众教育的内涵之所以众说纷纭，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民众教育产生时期，我国已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循环圈内。一方面，中国社会本身处于急速变化中；另一方面，西方的各种学说流入中国并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可以说民众教育是在近代剧烈的社会激荡和迫切的民族忧患意识中，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互交融的产物。时代的特性赋予了民众教育以丰富的内涵，并呈现不断变化发展的态势。民众教育虽然处于发展变化状态，却有着不变的根本特质。其一，民众教育具有全民性。民众教育为民众而设，力求教育权利平等。其二，民众教育具有终身性。民众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将教育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全国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受教育，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可以继续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如此递进，

^① 国立东北大学编写组编辑：《国立东北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1943年，第57页。

^② 俞庆棠：《民众教育》，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3页。

^③ 赵冕：《民众教育》，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2页。

^④ 李喜平：《辽宁教育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以至于无穷。其三，民众教育具有全面性，民众教育的内容应着眼于整个的人生，包括人生全部活动。其四，民众教育具有社会性。民众教育注重社会影响，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所大学校，以创造优良的社会。^①民国时期奉天省民众教育表现为复杂的流变过程，其发展可分为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和国民简易教育三个阶段，这三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交织重叠，呈现出不断深入的动态发展过程。鉴于“国民程度之文野，以识字者之多寡为衡”，^②王永江主要关注以“扫盲”为目标的平民教育和民众教育机构的管理。

一、平民教育的发展

奉天省最早以平民为教育对象的平民识字学校源起于民国初年。1914年，奉天省公署训令各地方筹办简易识字学校，要求凡16—35岁的不识字者，都有接受简易学校教育的义务。到1916年9月，在省城已经办起简易识字学校5处，每校3个班，每班30人。^③王永江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认为普通教育已初具规模，但离普及教育的程度相差甚远，于是敦促教育厅发展平民教育。不久，教育厅颁发《奉天省立各校附设平民识字夜校暂行章程》，规定平民识字夜学校教育对象主要为“年长失学及家贫无力就学者”，年龄在13岁以上40岁以下且不识字者都可以可入校学习。夜校一般附设于中小学校，“授课概在夜，教员由各校教员充当，既不妨害学者之职业，更无须另筹巨款。”^④其授课内容为“读法、书法、缀法三门，课本以日常之字千个为基数编定之，并得酌加珠算”。^⑤授课时间一般为每晚5点至7点或6点至8点，毕业期

① 张蓉：《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44号卷。

③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④ 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页。

⑤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44号卷。

限为4个月，期间一概不休假，考试及格者发给毕业证书。

省城平民夜校发展较快，第二小学陈校长创设平民夜课，前来报名者达300余名。学生“求学又颇殷切，每晚点名缺席者甚鲜。”^① 城西皇姑屯学校设立平民夜课，“一切费用概不收纳”，报名求学者已达70余名，“续报者尚极踊跃”。由于该校地处京奉铁路附近，前来学习者大多数是工人。因此，夜校除授国语、算术外，“并授英语及铁路规章、尺牍等项，一般学者非常欢迎。”^②

鉴于“省城已设立平民学校多处，四乡尚付阙如，殊非普及教育之道”。王永江“通令各县劝学所酌量在各市镇乡村设立平民夜校”。^③ 各县的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中小学校纷纷附设平民识字夜校。凤城县“土牛子高等小学校招集无力就学贫家子弟卅余人开设夜课，教授二小时，该教员亦皆义务不受津贴。”^④ 为了取得更好教学效果，王永江提出平民识字夜校“应授特种课本使其浅显易解，”于是令教科书编审处编写平民夜校教科书。不久，教科书编审处编辑两册平民夜课教科书。^⑤ 各校设立平民夜课以后，一般人士均认为是“普及教育之善道。因其间期既短，字又有限，全部习熟后亦足致用，故入校者甚形踊跃。”^⑥ 平民识字夜校在奉天全省普及开来，成绩斐然。

关于平民识字夜校的经费，“凡附设识字夜课，经厅核准者，每月由厅补助奉大洋贰拾元作为教员津贴及各项杂费”。^⑦ 随后，县立各小学也陆续开设平民夜课，各县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如沈阳县规定“经费

^① 《平民夜课之成绩》，《盛京时报》1922年11月5日第4版。

^② 《乡校亦开平民夜课》，《盛京时报》1922年12月10日第4版。

^③ 《通令设平民夜校》，《盛京时报》1922年11月28日第4版。

^④ 《凤城平民校添授夜课》，《盛京时报》1923年10月19日第4版。

^⑤ 《平民课本出版》，《盛京时报》1922年12月2日第4版。

^⑥ 《平民夜课之近况》，《盛京时报》1922年12月6日第4版。

^⑦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844号卷。

每年 36 元，教员每小时 3 角，炉火费 9 元，余则分摊。”^①

以行政法规形式规范教育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在王永江支持下，1924 年 6 月教育厅颁发了《奉天平民教育办法纲要》，指明平民教育的宗旨是“使失学男女皆领受人生及共和国民必不可少之基本教育”，采取平民学校及平民读书处两种方式进行推广。并且对举办平民识字夜校的具体事项进一步规范管理：平民学校一般借用省、县、城乡各学校或其他比较合适地点，在夜间施行教学。省城所下辖的平民学校经费来源于教育厅拨款，各县平民学校经费由该县平民教育委员会筹措。学校主要开设国文、珠算两种，国文使用教育厅编写的平民识字课本。每天夜间授国文、珠算各 1 小时，具体上课时间由学校酌情核定。但学生如无余暇，也可只学习国文 1 小时。4 个月后毕业，成绩优良者发给奖状。教师一般聘任所在校的教师充当，但也可由外校教师担任。职员由所在校之职员兼任，不另支付薪水。教师每授课 1 小时给奉大洋 0.3 元。

平民读书处对地点没有限制，可以设在任何一家机关、店铺或住户家中。各户中能读平民识字课本的人即可担任教师，也可聘任中学肄业生担任。读书处人数不限，可以每处 1—2 人，也可每处 1000 余人。经费以每处 5 人计算，每期大约需奉大洋 7 角钱，由个人捐资创办。平民读书处一般采用连环教学法，“由每处先教会数人，再由此数人各教若干人，逐渐扩大。”^②与平民夜校一样，平民读书处学习期限为 4 个月，毕业时参加平民教育委员会考试，及格者发给识字国民文凭。办理出色的读书处，可给予奖励。《奉天平民教育办法纲要》还规定各地方应建立监督机制，由各县教育公所成立平民教育委员会和董事会，对各地方平民教育情况实行监督。《纲要》以行政法规方式确定了平民教育之方法，同时增加了一种平民教育形式—平民读书处，进一步扩大了平民教

① 《规定平民校经费》，《盛京时报》1922 年 12 月 5 日第 4 版。

② 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册）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68 页。

育的范围，增强了平民教育的力度。由于对学生资格放宽至 50 岁，使更多的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尤其省教育厅增加了对平民学校的资助，经费由原来的每班每期 20 元增至 25 元。另外付给教师一定的酬金，鼓励更多的教师积极参与到平民教育中来。^①

《奉天平民教育办法纲要》颁布后，奉天省的平民学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到 1925 年春，由于经济形势震荡，平民学校处于停滞和逐渐被取消的状态。针对这种状况，王永江通过教育厅令各县继续遵行《平民教育办法大纲》，并颁布了省教育会制订的促进平民教育办法四条：其一，各处倡办平民教育所需经费，须列入各县教育预算，以资补助；其二，招生应由各县督促村长负责，警甲均须辅助维持；其三，各县平民教育委员会设立后应立即报厅备案，以资统计而利进行；其四，委员会应设法鼓舞和奖励入平民学校学习者，以引起平民求学之共鸣。^② 这一办法的出台给予平民学校以经济和行政上的资助，平民学校因此得以继续发展，同时标志着奉天省政府已成为推动平民教育重要力量。

二、民众教育机构的兴起

通俗教育讲演社。民国初期“国民教育尚未普及，多数国民缺乏常识，而社会上旧日之风俗习惯，实在足为教育之障碍者，又非一朝所能骤革于此，而欲亟图补救之方，舍通俗教育盖无他法。”^③ 通俗教育在当时被视为养成共和国民的重要途径之一。1923 年 5 月，在王永江积极筹划下奉天市政公所成立，设立了“以启导市民、改良社会为宗旨”的通俗教育讲演社。通俗教育讲演社附设市政公所后院书报阅览社内，

^①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6 页。

^② 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二册）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68 页。

^③ 白淑兰，赵家鼎选编：《北京通俗教育会史料》，《北京档案史料》1994 年第 2 期。

讲演分固定讲演和巡回讲演二种。固定讲演每天从正午 12 点起至午后 1 点半止，在本所书报阅览社内进行；巡回讲演每日午后 12 点半到下午 4 点，在临时指定地点进行。通俗教育讲演主要内容为宣讲市政、勤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和劝导卫生等 8 种。讲演题目由讲演员预定，在讲演前 3 日送教育课，教育课按照讲演题目范围搜集材料发给讲演员参考。讲演员将参考之书籍妥慎保管，一星期后交回。讲演稿每星期须分选两稿送教育课审核，审定合格即发还讲演员。其中有删改之处或由教育课直接代为修改，或交回讲演员自行修改。每次讲演后，讲演员将讲演事项按记事表程式填送教育课存查。讲演时如需用各种图表由讲演员自行准备，经教育课核定用款，由市政公所支给。为保证通俗教育讲演顺利进行，通俗教育讲演社制定了《通俗教育讲演社规则》：市民在讲演时均可自由入社听讲，入场时需依次列坐，不允许任意喧哗行走、吸烟及食瓜果等物，更不允许任意吐痰。听讲者如有疑问时，必须等讲演完毕再行发言提问。讲演时间依照讲演规程确定，题目由讲演员临时宣布。讲演室内还备有茶水于休息时可以自由取饮。^①

图书阅报社。1923 年 10 月奉天省通俗书报阅览社成立，阅览社以“增进市民常识广市民见闻为宗旨”，地址在市公所后院。阅览社储集各种杂志报纸，专门准备提供给市民阅览，不收取任何费用，但书报限在室内阅览不向外贷借。阅览社阅览时间为午前九点钟开馆午后四点钟闭关，但冬季天短随时规定。阅览社每月须制阅览人数表及职业表等送教育课存档。^② 各县也先后建立图书阅报社。兴城县图书阅报社于 1925 年开办，隶属于教育公所，以开通民智为宗旨，设“阅报室两楹，夫役一人”。报纸有《盛京时报》、《东三省民报》和《益世报》等三种。每日上午 9 点至 12 点和下午 2 点到 5 点为阅报时间，并设有围棋、象棋、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 157—160 页。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 160 页。

图画、书籍、杂志及白话小说二十余种，供人观览。后来又添购书费320元。^①各县也先后建立图书阅报社，推动了报刊等传媒的发展。如当时在兴城所能见到的报纸，除《行政公报》、《司法公报》、《教育公报》、《东三省公报》、《农商公报》、《警甲汇报》等六种外，其余如《东北报》、《东报》、《民报》、《营商日报》、《教育杂志》、《农业浅说》、《种棉浅说》、《基督教之通问报》、《青年》、《进步杂志》和《盛京时报》等共计十一种。^②

戏园、影园和书（肆）场。戏剧、影片、小说等被誉为民众教育之“利器”，因此，“小说、戏剧、影片良，则社会道德有蒸蒸日上之气象。否则社会卑污，自无待言”。^③1923年12月，王永江批准奉天市政公所颁布的《取缔戏曲影片图画小说唱本规则》。《规则》规定由公所随时选派视察员前往各书肆、戏园、影园、书场实地视察。视察员执行职务时要佩徽章和领取视察表，视察结束后将视察结果填表并填写附加意见送市政公所备查。视察员有权对戏园、影园、书场所演戏剧、歌曲，书肆所售书画等提取检阅，对于其中有伤风化的戏曲、影片、小说唱本等可以严行取缔。如果仍照旧演出或售卖，除禁演禁卖外，处以相当数额的罚金。各园演剧之前先将所演戏目详列名单，审查审定后方准许印刷报单排演。但仅仅“对不良之类品严加取缔，究非澄本清源之道。”^④鉴于此，奉天市政公所成立了“以养成演奏改良书曲之艺员为宗旨”的“改良书曲传习社”。凡在市区内之说书者，年龄13岁以上40岁以下皆得入社传习。主要传授各种改良书曲、应用文字及职业上之道德。男女分级教授，学员以各原有书场为实习地点，一年毕业。合格者由本所发

^① 《兴城县志》，卷四《教育 社会教育》，第51页，奉天作新印刷局印。

^② 《兴城县志》，卷四《教育 社会教育》，第51页，奉天作新印刷局印。

^③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④ 《取缔不良之说本》，《盛京时报》1924年4月29日第4版。

给证书及许可状，允许在市内演唱。^①

王永江还在各县推广宣讲所。如兴城县宣讲所由知事遴派一名讲演员，其讲演大纲以开通民智，提倡实业为宗旨，附设简易识字学塾夜班，专为小本营业、年长失学者而设。^②

三、民众教育发展原因

(一) 清末“开民智”思想的影响

清末，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许多有识之士投身于变法图强运动，呼吁开通民智，改变人才匮乏、国民素质低下的状况。1896 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及：“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此，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③ 而梁启超更明确提出变法要取得成功，必须办好三件大事：“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三者同时并举，才能达到“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方能“去千年愚民之弊”。^④ 基于这种思想理念，维新派积极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通过遍设报馆、学堂、组织学会、译书、著书等方式，掀起了“开民智”的高潮。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开通民智”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简易识字学塾是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教育机构。1908 年，清政府制定《推广简易识字学塾计划》，拟设简易识字学塾，以救济失学成人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1909 年，学部公布了《简易识字学塾章程》，规定毕业年限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年长失学、急于谋生，入此项学塾，或三年或两年或一年，均可听便；家贫年幼入

① 《改良书曲传习社简章》，《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 165 页。

② 《兴城县志》卷四《教育 社会教育》，第 51 页，奉天作新印刷局印。

③ 高阳：《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1932 年第 3 期。

④ 梁启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 6 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 129—138 页。

此学塾者，自以三年毕业为宜”。^① 教师由小学教员兼任，学生入学不收学费，并发给应用的书籍、物品；经费主要来源于官府和富绅捐款。总之，清末有关提倡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范围的言论非常之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民众教育的因素，可以看作是我国近代民众教育的起源。

（二）西方民主教育思想的传播

西方民主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民主主义对近代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已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精神，近代人类生活的总源泉和现代人类最高、最普遍的理想了”。^② 西方的民主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推崇，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最受青睐。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使人都能够接受教育，促进社会进步”，注重教育与社会生活实际的联系，尤其提出“教育是一个人终身的事业，教育是由改变个人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的教育理念。这些教育观点与民众教育宗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众教育是20世纪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分支。^③ 而20世纪20年代起，杜威及其弟子的先后来华讲学及其著作在中国的广泛译述，无疑在实践上促进了民众教育的实施。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表现出注重生活、注重实践的发展趋向，固然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所致。西方成人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等也是我国近代民众教育重要思想理论渊源。近代中国教育界有识之士在大量译介西方教育著作及对外留学考察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教育发达要归功于这些国家特别重视发展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等，因此他们立足本国国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443页。

^② 钱俊瑞：《民众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转引自张蓉：《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③ 张蓉：《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情，系统地引进西方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理论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与实验，开始了我国民众教育之路的探索。

（三）奉天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民国初期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民众教育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 1914 年 2 月期至 1916 年 3 月，教育部先后公布《半日学校规程》（1914 年 2 月）、《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1915 年 7 月）、《通俗讲演所规程》（1915 年 10 月）、《通俗教育讲演规则》（1915 年 10 月）和《露天学校简章及规则》等有关民众教育政策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民众教育的发展。^① 为了更好贯彻国家教育政策，奉天省政府一方面不断举办面向全省教育界的各种讲演、讲习会；另一方面主动邀请当时著名教育人士来东奉天省讲演。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黄炎培、晏阳初等先后到奉天省访问；美国教育家孟禄、克伯屈等都曾到奉天生演讲考察，分别受到张作霖和王永江接见。提高教育者的素质是推进民众教育的有效保证。1923 年 4 月 25 日，王永江令奉天教育厅要求各县视学、知事，在“教育思潮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教育者应学习反映新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著作。教育厅这一次就列出了 58 种书目，不仅有《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有影响的国内教育刊物，而且有一些外国译著，如《设计教学法》、《教育心理大意》、《美国教育概览》、《教育心理学纲要》、《社会与教育》和《蒙台梭利教育法》等。^② 这无疑对培养教育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永江和奉天省政府对教育界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1925 年教育会提出的“各处倡办平民教育所需经费，应请厅令各县列入教育预算案，以资补助；招生应令各县督促区村长负责，警甲均须辅助维持；一

^①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第 811—817 页。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 3999 号。

般平民求学甚乏兴味，委员会应设法鼓舞奖励方能持久”^① 等议案，省教育厅以很快对此回应，通令各县查照教育厅 1925 年 3 月颁布的平民教育法大纲切实遵行。在推行国民简易教育过程中，省政府提出奖惩办法，“对于那些热心平民教育工作并且卓有成效者，对于小县办理简易学校 10 处、中县 20 处、大县 30 处、每校学生 10 名以上且著有成绩者均给予奖励；对不尽心办理简易教育的县份，对不尽职的教师，对于不按规定入学的学生，对于阻挠学生入学的雇主和家长等均给予惩戒。”^② 王永江和奉天省政府对各种新教育思潮予以密切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团结东北教育界进步力量，从而有效地推进东北教育近代化，成为东北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四）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取得的成就与知识分子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对奉天省民众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最大的是阎宝航、车向忱等人。

“奉天贫儿学校”是民国时期奉天省平民教育中的一朵奇葩，其创办者为阎宝航。阎宝航（1895—1968）是海城县人。年幼时因家境贫寒，求学十分艰难，在半耕半读中完成了高级小学学业并考取了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预科。1918 年，阎宝航毕业后着手创办奉天贫儿学校，专门招收贫苦儿童入学，学生白念书、不花钱，还供给课本、纸墨等学习用品。4 月 18 日“奉天贫儿学校”开学时，阎宝航仅募捐到十多块钱，全部作为学生书籍、文具的费用。为了支付教学费用，他做外国人的中文教师，依靠自己教中文得到的 7 块钱，以 3 元维持个人生活，以 4 元钱补贴学校。阎宝航是学校校长，又是唯一的教员和公务员。经过一年的努力，贫儿学校成绩斐然，除设备太差之外，学生成绩与公立学校相差无几。1930 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参观贫儿学校后大加赞赏：“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941 号卷。

②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3 页。

成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的了。”^① 到 1931 年，贫儿学校发展到总校 1 所，分校 6 所，实习工厂 1 个，学生多达 2000 余人，其中不少儿童升入中学、大学。

车向忱（1898—1971）是法库县人。1919 年秋季考入中国大学。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他开始了平民教育活动。1923 年，他写成 3.7 万字的《打破迷信》一书，自费出版 1000 册，阐述民主、科学主张。1925 年大学毕业后，车向忱回到奉天省为创办平民学校而奔走。半年时间就创办了两所平民学校，学生 300 多人。1926 年他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等三所中学任教期间，又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并组织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改为辽宁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为了平民教育，车向忱把自己大部薪金拿来办学，为此曾被中学解聘，但是他义无反顾。经过四五年的奋斗，车向忱在奉天省各县共建平民学校 240 多所，学生共 8,700 余人，波及全省 20 余市县。^② 到 1929 年时，在省城内八个关的各小学、中学、福音堂及慈善机关、监狱、军队、工厂等都附设了简易平民学校，并在奉天城北农村试办乡村简校。至 1930 年 11 月全省有民众学校 1,302 所，学生 45,716 人。^③ 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如张学良、张惠林、韩淑秀等对国时期奉天省民众教育给予了大力支持。1920 年代，奉天省政府和社会贤达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将教育范围从学校扩大到社会，为民众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通过民众图书馆、电影、戏剧、改良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来增进百姓知识和提高民众觉悟，启迪民智、移风易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普及，提高了整体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对东北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① 赵焕林，李国伟：《阎宝航与奉天贫儿学校》，《兰台世界》1994 年第 1 期。

② 李喜平：《辽宁教育史》，辽海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49 页。

③ 东北文化年鉴编印处编辑：《东北年鉴》，1931 年版，第 310 页。

1925年底郭松龄战败后，张作霖决定收束军事，以走出困境。王永江认为这是发展教育的难得机遇，训令教育厅扩充教育方案。他在训令中指出：“教育事业为立国根本，亦作人基础……本省施行新学制三载于兹，只以战事关系，财政为军费所占，致兴学育才之愿望卒未能达。现在拟议收束军事，虽缩减之军费究有若干，能否足供励行各事业之用，现尚难以预定，但兴教之道首在设校。而先后缓急之序，自应定一全盘计算，以为将来进行准备。”^①

不久王永江辞职，但奉省教育经此次大力扩充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省库对扩充计划内的项目共投入150余万元现大洋；省库年拨教育经费由以往的50—60万元现大洋增至80余万元现大洋。地方的教育投入也有大幅度的增加；学校数量及规模明显增加。仅就省立学校而言，扩充教育之后（1926—1929年）成立的各类学校共16校，占奉系统治时期成立学校总数的42%。各县情况亦如此。从这些明显的变化可见，1926年开始的扩充教育确是奉省教育的一次中兴。^②

从学制的改革到高等教育异军突起，再到民众教育与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王永江在奉天省创建了以理论和制度的创新为基础，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为重心，辅之以民众教育的教育早期现代化模式。此后，奉天省的教育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① 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578号卷。

② 郭建平：《奉系教育》，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第五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城市早期现代化

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一有限空间区域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一起的网状系列，是各种活动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① 城市产生的历史悠久，但是城市早期现代化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开始的。一般说来，城市早期现代化包括原有市区的重新组织与城市的自我更新、城市地域的扩大、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变化和大城市地域的形成等。^②可以说，城市早期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城市文明的形成过程，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之一。1920年代，奉天省城市建设过程也是不断地向现代演进过程。王永江筹建市政公所、创立奉天纺纱厂、对城市进行整体规划并付诸于实施，促进了城市管理民主化、法制化，推动了奉天省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第一节 市政公所的建立

民国初年，奉天省城市建设依然由商业局、警察局、建筑局、公用局多个部门负责，它们彼此间并无隶属关系，所以往往相互推诿和掣肘，根本无法适应加快城市发展的现实要求。因此，组织专门的市政机关独立担当起领导市政的职能势在必行。1923年5月，在王永江积极筹划下，奉天市政公所正式成立。市政公所为正规的市政领导机关，是市政府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奉天省城市已进入行政体制的早期现代

① 英」K. J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② 杨贵庆编：《城市社会心理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化阶段。

一、市政公所建立的原因

奉天省是我国较早建立正规市政领导机关的省份之一。奉天市政公所成立后不久，营口和安东（今丹东）也先后成立市政公所。到1928年，奉天省大部分中等以上城市都建立了市政公所。奉天省市政领导机关纷纷建立以至形成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商埠地的示范效应

清末，东北地方政府自开商埠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利权。此外，利用商埠地的早期现代化物质成果及其良好的生活环境来刺激和拉动老城区的建设也是其重要目标。到1920年代初期，奉天省商埠地土地面积虽然增加不多，但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已经呈现出浓厚的现代化色彩，在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方面都远远优越于老城区。尤其商埠地工商企业的建设规模在不断向前推进，甚至某些民族工业基本具备了同外资工业竞争的实力。相比较而言，老城区城建速度缓慢，两者空间反差日趋明显。商埠地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市民传统理念，他们强烈要求改造旧城，建设新区以改善滞后的城市生活环境。同时，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迫切需要拓展城市空间。在此情况下，奉天省地方政府急需组织能够独立担当起领导市政职能的专门的市政机关，以实现城市的整体进步。

（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

奉天省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最直接的动力不是来自市民和企业家、商人，而是来源于地方政府。早在1919年奉天省政府就成立了政务厅第四科，管理省城街道、桥梁和土木建筑，同年在奉天城外规划和建设了近代东北第一个民族工业园区——大东工业区。王永江担任代省长后，更是积极推进市政建设。1922年9月，他决计成立市政厅，地址设在总商会院内，拟建“楼房1所，内设厅长1人、科长4人、科员若干

人，计分总务、工程、捐务、卫生四科，等待楼房告成即当正式成立”。^① 并对其组织形式和性质等进行了如下设想：市政厅职员一部分政府委派，一部分通过民选产生。民选职员由各商号进行资本审核后，特划定省城 16 街为 16 处，每处选出代表若干人，然后选举市政厅之职员。^② 市政厅作为成立市自治的初级阶段，不作官衙性质。同时，派人调查资本家及执事人资格，为将来选举市议员之预备。如办有成，逐渐扩张民权完全归民自办。^③ 王永江还饬令安东（今丹东）、营口着手筹备施行市制事宜，其办法与省城大体相同。“市举市长一人，街举街长、副街长各一人，由官督民办。一切市政待办之有效再归市民自办。”^④ 关于开办市政经费，王永江按奉天有奖储蓄办法开办一市政有奖储蓄，于开付奖金外所得盈余即为办理市政厅之基金。^⑤ 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使市政建设逐步成为奉天省各项工作的中心，为市政公所成立准备了条件。

（三）广州等城市的市政早期现代化运动

1921 年，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省政府颁布《广州市暂行条例》，规定设立广州市参事会和市长为首的市行政委员会。市行政委员会下设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六局，这是我国政府直接管理下的城市实行市制和市行政设局管理的肇端。新式市政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推进城市的开发和建设速度快，效率高，因此很快为南方其他城市所仿效，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市政体制早期代化运动。^⑥ 《盛京时报》等传媒对此给予突出报道，并结合本地实际发表了一些赞扬市政运动的社评。广州等城市的市政早期现代化运动和关于市政运动的报道评论，为

① 《市政厅积极进行》，《盛京时报》1922年9月29日第4版。

② 《市政厅票选职员》，《盛京时报》1922年12月29日第4版。

③ 《组织市政厅之准备》，《盛京时报》1922年9月30日第4版。

④ 《令营安筹备市制》，《盛京时报》1922年12月9日第4版。

⑤ 《筹措市政厅基金》，《盛京时报》1922年12月20日第4版。

⑥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奉天省地方政府提供了现实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另外，东北殖民地城市市政体制对市政公所的建立也起了一定作用。民国初年，殖民统治下的大连、哈尔滨就已实行正规的市政建制，这一体制包括市长及其领导之下的市政厅、市参事会、警察署和法院等。因其职能划分明确，相互监督机制完善，效率很高。这种市政体制模式对于奉天省市政公所建立提供了现实样本。

1923年5月3日，奉天市政公所筹备处成立，曾有翼任所长，对市政公所未来工作做出了如下规划：组织市政机关之规定；市政工程之计划；卫生之组织；消防除之组织；组织公共澡塘；与办社会慈善事业；设立公园；设立旅馆；市内路政；设立业商场；添设公共游泳场；设立公共茶社；设立厕所；设立教育会；设义冢；市区之改正；市内模范区之计划；市内工业区之计划；设立新肥料场。^① 随后，市政公所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城市建设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二、市政公所的主要活动

(一) 宣传市政文明

市政文明的宣传是提高市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其主要形式为报刊宣传。奉天省各市通过本地报纸和杂志刊载传播市政文明的教育性文章。王永江支持奉天市政公所创办奉天《市政公报》，《市政公报》以启迪市民之知识，促进市民责任义务和自觉协助市政进行为宗旨，每日出版一张，内容主要涉及论著、市政公所内各项议案、市政公所备告、市内大事记、市民论坛等。版面设计力求精美，以唤读者之观感，^② 从而获得更好的效果。奉天市政公所还通过其他报刊宣传市政文明，在其成立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在《盛京时报》连续发表了多篇市政建设的社评。例如在其《市民之训练》的社论中，作者针对许多市民缺乏文明素

^① 《市政公所进行详志》，《盛京时报》1923年5月23日第4版。

^② 《市政报简章披露》，《盛京时报》1923年9月30日第4版。

质指出：“为市民者，尤须知道公共观念，大家爱护，大家享用。有了善良市民的好习惯，市政自然进步；有了公共厕所，不宜再向墙根便溺；有了尘芥箱，不宜再向街心倒土；有了公共观念，自然有自治的可能性。所以市民之训练，是极要緊的。”^① 通过这些报道或社论，广大市民了解市政，更加关心市政，珍惜市政建设成果。电影宣传和组织讲演也是教育市民良好办法。为了向市民宣传夏季公共卫生，“增进市民卫生知识”，奉天、普兰店市政当局利用晚上市民外出纳凉的机会，在广场和公园等市民集中地方，为市民免费放映介绍外国环境卫生的科教影片，这些影片内容新奇，生动直观，极受观众欢迎。^② 市民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不自觉地接受了卫生知识的教育。奉天市政公所还组织全市警察上街游行，向公众散发传单，宣传交通安全；派遣演讲员到市内繁华地段讲演，“颇受市民欢迎”。

（二）颁布法规章程

法规章程对强化市政管理效率和公正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城市社会生活有序进行，王永江责令市政公所实行法制化管理。奉天市政公所自成立起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法规章程，如《建设万泉河公园章程》、《街道、沟渠、桥梁及一切土木工程统一管理章程》、《管理肥料章程》、《卫生清洁法则》、《电车厂规则》、《北陵公园售票暂行章程》、《考核建筑技术人员办法》、《限制载重车通行马路通告》、《北陵暂行取缔办法》、《管理三陵章程》、《管理公厕章程》、《规定路厕商户打扫道路暂行章程》、《西北工业区限制建筑期间办法》、《翻修马路施工办法》和《东三省兵工厂市政管理处暂行简章》等近百个章程。^③ 以法规来规范城市管理，标志着奉天省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已经进入了法制化时代。

① 《市民之训练》，《盛京时报》1923年9月11日第4版。

② 《市政所巡回演讲讯》，《盛京时报》1927年5月57日第4版。

③ 沈阳城建局编：《沈阳城建志大事记 法规卷》，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三) 发展城市公用事业

奉天市政公所成立后，即着手发展城市公用事业。奉天市老城区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几乎没有正规意义的公用事业。为改变老城区这一落后状况，奉天市政公所设立汽车公司，开办市内汽车客运^①，又在“大、小北边门外和新开河北岸开辟公园”，^②以方便市民休闲游览。还使用电动水车等近代化工具清扫街巷。^③ 安东（今丹东）市政所集资“勘修桥梁”。^④ 奉天省各市政所还创办电灯和自来水、建设公共厕所等公用设施。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各市政公所在其市政规划过程中，积极引入田园城市概念，十分注重街路绿化和建筑物布局，因而所建城市新区在外在形式上非常美观、适用。此外，市政公所在城市规划、城市交通、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市政公所的运行机制

市政公所是近代正规的市政领导机关，与旧式城建机关相比较，它在运行机制方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政组织制度化。市政组织制度化是城市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市政公所成立不久，王永江就批准了《市政所暂行新章》，对市政机构的性质、职权、责任以及机构编制、数额等以制度的形式以明确规定，将其运行程序纳入制度化轨道。根据《市政所暂行新章》的规定，市政的日常管理，由市政府各组成六课分职负责。市长在市政管理中居于统领地位，指挥监督所属职员。市政公所内暂设六课，即总务课、财务课、工务课、卫生课、教育课、事业课。每课设置课长1人，主管课内事务；课员3—4人，分管课内各项事务，同时每课配置设1

^① 《盛京时报》1923年6月23日第4版。

^② 《盛京时报》1925年8月18日第4版。

^③ 《盛京时报》1924年6月3日第4版。

^④ 《盛京时报》1926年5月22日第4版。

名技师，4名技士，解决专业技术方面问题。各科的具体职能也有明确分工。总务课主要办理市政公所经费预决算和市选举事宜，同时保管文书和编制章程等。“市费之征收，市公产之管理，市公债之办理，关于省库补助金之收入及经理，全市行政经费预算之办理”等工作由财政课负责。工务科主要管理市政工程事项，如道路、桥梁、沟渠、水道、电车、公园及公共建筑物的建设和修理，还包括私人建筑物的取缔和街头树木种植与保护。卫生课的主要职责为“街道及公共厕所之清除，公共市场、屠场、菜场和浴场之管理，戏园旅店妓馆及饮食营业之取缔，市民厕所之取缔，各种传染病院之设立及管理，医生及药房之取缔等公共卫生事项。”^①教育课和事业课分别管理教育事务和属于公用性质之各种事业。为规范税收，市政公所下设征收处。征收处由1名财务课课员，1名调查员和3名雇员组成，市长可以依据事务繁忙与否随时增减人数。征收处必须将每日所收款项分门别类登记账簿，在下班前将账簿连同款项送至财务课。^②

第二，市政管理法规体系化。虽然奉天省各市政公所成立后颁布了几个章程，但所颁布的各项法规并非杂乱无章，而是表现为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的体系化。以卫生管理为例，奉天市政公所先后颁布饮食卫生法规，如《改订检验冰糕办法检查》、《罐头及其他饮食品规则》；与饮食相关行业卫生法规，如《取缔豆腐坊胶坊酱园营业卫生规则》、《奉天市取缔猪店规则》、《取缔饮食营业卫生规则》；其他公共场所卫生法规，如《取缔理发营业规则》、《取缔妓馆戏园书馆茶社营业卫生规则》、《取缔澡塘营业卫生规则》、《取缔旅店营业卫生规则》、《管理公厕规则》；管理医士和药商的法规，如《公所管理医士暂行规则》、《公所管理药商规则》等。可见，这些法规内容囊括了食品卫生、公共卫生和医药医师士管理，它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从而保护市民身体健康，保

① 《市政所暂行新章》，《盛京时报》1923年8月11日第4版。

② 《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30页。

证城市社会有序发展。每一项法规也自成体系，如《取缔旅店营业卫生规则》做出如下规定：营业者须设备厕所，但其位置不能与厨房相连接。厕所内必须时常撒布石灰乳、石油乳、石炭酸等杀菌药品来消毒灭菌。客房内必须设置痰筒、捕蝇器、纱窗等。痰筒内并须注入杀菌药品，锅碗瓢盆等饮食器具在清洁后用纱网或玻璃匣笼罩，尤其提出饮食原料品须必须贮藏于壁柜中，而一切有毒染色产品不能作为食品原料。厨房和客房内严禁出现苍蝇和臭虫。如有不符合上述标准，处以 10 元以下 2 元以上的罚金，连犯 3 次令停止其营业。^① 这些具体规定环环相扣，面面俱到，从而保证为外出人员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其他规则章程也具有这一特点。

第三，市政操作民主化和专业化。奉天市政的民主化表现在所有市政决策都要经过市政会议厅在集体讨论后作出，不允许市长一人独断专行。市政公所例行性会议，每周召开一次，遇特殊情况可随时召开。时间定于每星期三午后 3 点起至 5 点，会议由市长主持。^② 各课部开会时提出议案，讨论由市议会通过的关于城市建设的各种应兴应革议案，最终形成落实决议。这是城市管理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市长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临时召开会议。

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和知识化是行政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尺。奉天市政公所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从归国留学生中选拔出来的，许多专业人才逐步进入市政机关中。如日本留学生徐箴攻读电专科，1923 年归国后任市政公所事业课长，亲自设计了有轨电车线路及全部指挥系统，修建了从小西门（后改为太清宫）到南满站（沈阳站）的有轨电车。奉天电车厂成立后，徐箴被任命为奉天电车厂厂长。由于职员个人专门业务能力强，各职能部门又有严格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要求，既避免了相互推诿扯皮，又防止了重复浪费，使市政机关的每一个人都能以高度的责任

^① 《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二集，第 121 页。

^② 《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二集，第 9 页。

心去对待市政工作。

总之，王永江重视市政公所的建设和城市管理，促进了市政组织制度化、市政管理法规化、市政操作民主化，彰显了浓厚的现代化色彩，带动城市社会生活走向法制化和有序化，奉天省的城市早期现代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二节 城市规划与实施

城市规划是各级政府指导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手段。^① 传统城市规划“以天子为中心、充分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统制平稳有序”为旨归^②，同时渗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思想，其主导功能也多局限于政治或军事领域，经济功能处于附属地位。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模式的先进性，引发了中国人学习、效法的激情。20世纪初，梁启超目睹美国城市感叹不已：“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也，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也，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也，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③ 西方城市观念对中国传统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中国人开始重新考察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清末，中国人开始考察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民国初期，人们对城市功能，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空间布局有了全新体认，更加重视城市的经济功能和城市的整体规划。社会学家吴景超则强调城市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从“组织市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

① 赵旭编：《城市规划与小区建设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② 许英编著：《城市社会学》，第175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

“整顿金融”四个方面入手，并强调城市建设要有总体规划——“都市设计”，城市空间要按商业、住宅、工业等进行职能分隔。^① 总之，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制定城市规划，成为市政建设主流。王永江顺应时代潮流，对城市进行整体规划，筹建市政公所，组织市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城市建设管理和日趋法制化，城市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大大加快了奉天城市化进程。

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和制定城市规划成为市政建设主流。王永江顺应时代潮流，对城市进行整体规划，并通过兴办工业、组织市场、发展城市交通等措施把规划变为现实。

一、城市规划

王永江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视为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捷径。市政公所成立前，为了学习西方市政建设和管理模式，他派科员赴大连调查道路、植树、卫生、电车、水道、下水、电气、瓦斯、建筑形式、市内娱乐、公私之学校、医院等之预算概况、经营沿革等，同时还派人分赴日本及美国考察市政办法。^② 随后，王永江加快成立市政厅的步伐，筹划将电灯、电话、教育、警察等划归市政厅管辖，并对城市发展远景进行了具体规划：“明年（1923年）筹集款项，兴办瓦斯工场以补电气燃料之不足，并以瓦斯中副产物之臭油以修道路。道成以后，现有大车亦应加以通行限制，逐渐改用动车以保护道途及市房建筑。其他各项次第举办，期于五年中得有相当成绩。”^③

根据城市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不同的设计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原则，其中对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规划是城市规划的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奉天市政公所正式成立后，划原沈阳县的城区及商埠地一

^①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22—68页。

^② 《市政厅成立日期》，《盛京时报》1922年10月27日第4版。

^③ 《当局之市政计划》，《盛京时报》1922年8月26日第4版。

带为市区，开始进行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规划。工业区规划主要分四部分：在古城西北规划建设惠工工业区，在古城东部建设兵工工业区，在古城东北部规划建设奉海市场，在商埠地建设一批民族工业。惠工工业区规划用地面积 1.3 平方公里，以惠工广场为中心，建设 6 条干道，路网呈方格加放射状，街坊整齐划一。规划区内安排迫击炮厂、电灯厂、文教用品厂、民族工业和国民大市场。东塔兵工工业区以军事工业为主，规划用地面积约 4 平方公里，建设兵工厂、纺织厂、电灯厂、飞机场、讲武堂和兵工学校等。奉海市场规划用地面积 3.2 平方公里，街衢区与奉海铁路平行，市场中心设置规模较大椭圆形广场，围绕广场设 7 条放射状道路。奉海站设 3 条放射状道路，与全区连接。区内规划有大型跑马场和公园、剧场等游乐措施，全区 161 个街场，183 条以各地地名命名的街道。^① 后来在此区建立了肇新窑业公司、东兴色染纺织厂、奉海铁路机械厂、东北化学皮革厂、大亨铁工厂等。商埠地建设也列入规划中，计划在这一地区建立奉天纺纱厂和惠临火柴公司等。^②

“发达工商各业，端在市场”。当时南北两市场偏在城西城南，城北尚付阙如，市政公所拟定在“风雨台空地、大北旁门外各开一市场，以资提倡工商业。”^③ 市政公所还将城内大街定为商业区，预定计划凡临街市面均须一律建筑三层楼房，以壮观瞻。^④ 小河沿一带在城市规划中被划为模范区，计划将来在河南地方建筑居住屋，万泉河改为万泉湖，利用现有的两水道改筑成方圆形，周围一律建筑三层楼房。除重新点缀各种景色外，仅留有关艺术之茶社，其余各种商贩“一概摒弃”，使其成为“完全为消遣地方，一切建筑以达到模范区域为止。”^⑤ 后来因水患

^①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 城市规划》，沈阳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03 页。

^② 吴晓松：《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36 页。

^③ 《市政所扩充市场》，《盛京时报》1923 年 9 月 6 日第 4 版。

^④ 《市政公所计划商区》，《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10 日第 4 版。

^⑤ 《模范区计划近闻》，《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29 日第 4 版。

问题中止这一规划，而变换方针，“向城北一带扩张，在大小北边门外划定甲乙丙三类居住区，收买南边墙至北铁道的所有土地，这一区域内的坟墓都迁往铁道北地区。”^① 城市自来水及沟渠也进行具体规划。市政公所指定水管必须使用铁管，用水限度按市民生活程度为标准。此外注重水源地的选择。计划“由浑河挑沟至小河沿，滤净再送入水塔；或择八王寺小河沿处多掘水井，再汲入水塔。”^② 明沟暗渠操作性强，不能预先估定，因此，“先对其宽深须实行测量后，参照人们之废水量及最大雨水量方能得真正之尺寸”。^③

不久，市政公所订立 1924 年市政建设计划书：首先，电车之敷设。第一期工程由大西门为起点，沿城墙根北修至西北转角，西折由太清宫后身西区，出边城，至沈阳车站，再由沈阳车站向西修至商埠界。连轨带路共宽 9 丈，从城墙起量，在界内的房屋一律拆除。电车车辆、轨道、电柱、电线、车库等工程采取投标包办的方法施行。其次，重点经营小河沿、风雨台、东北草仓、西北校场四大区。将风雨台（皮革区）、草仓（菜市）两地拟由市所筑房租赁于商人，小河沿之模范区、校场之工业区拟定为官筑私筑并行。^④ 从而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定下了基调。此后的奉天市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规划绘制的蓝图而实施市政建设。

二、城市规划的实施

（一）拓展与更新城市空间

在城市建设中，通过对旧城区的系统整理来拓展城市空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旧城区历时已久，弊病百端，因此，对旧城区的整理尤为困难。民国初年，作为“陪都”的奉天依然保留着高大城墙，城内更是设

^① 《市所划定居住区》，《盛京时报》1924 年 4 月 17 日第 4 版。

^② 《市政核定自来水计划》，《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24 日第 4 版。

^③ 《市政公所开沟渠计划》，《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28 日第 4 版。

^④ 《本年度市政计划》，《盛京时报》1923 年 11 月 25 日第 4 版。

有两道城墙边墙，总长数十里。这些城墙在历史上是明确和隔离城乡的边界标志和保卫市民安全的重要措施。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城郊地带逐步演化为城市的一部分，城墙原有功能开始渐次丧失，并且成了严重阻碍交通、影响卫生、制约旧城改造及整个城市发展的障碍。^① 市政当局从城市发展的总体布局考虑，排除各种干扰，先后实施了拆除或部分拆除城墙的计划。至 1923 年，奉天边墙的主要部分已被平毁。西安（今辽源）为缓解“民户拥挤，发展商务”，将西门拆除，“向外拓展城垣半里许。”^② 城墙的拆除消除了一城之内各区间的隔离，使城市的整体性更为突出，并且大大扩展了城市的空间。

宽阔整齐的马路和公园是现代城市的标志之一。“市内街道太窄，拟定整理旧路，丈尺标准为城内干路宽度均以 7 丈为标准。自马路中心起算两旁应展 3 丈 5 尺。”其他街道根据地点不同宽度标志分为 4 丈、3 丈和 2 丈等三种。^③ 拓宽马路主要通过拆除建筑物来完成，如临街的“草房、土墙或土墙和房盖凹凸不平的平房”都在拆除之列。由于草房遇火即发，不易遏制，特令禁止后不得再盖草房，以防火险。^④ 公园是市民休闲的重要场所。作为一种公共休闲空间，公园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公园为市民安慰之所，各文明国之都会无不安设，以改良人民之生活，市政方面对此亦必有所筹备。”^⑤ 奉天市政公所将“临近浑河之荒废已久的树秧公园加以整顿，藉为各方之提倡。市政公所拨出整顿经费二万元从事栽种各种树苗，并修治水道，所有工役比去年亦增添三分之一。”^⑥ 市政公所还将万泉河一带的公园派人接收，以便

①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1 页。

② 《拆除旧城墙》，《盛京时报》1925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

③ 《市道展宽之办法》，《盛京时报》1923 年 9 月 22 日第 4 版。

④ 《曾市长禁盖草房》，《盛京时报》1924 年 2 月 21 日第 4 版。

⑤ 《曾市长之谈话》，《盛京时报》1923 年 12 月 7 日第 4 版。

⑥ 《树秧公园整顿讯》，《盛京时报》1924 年 4 月 17 日第 4 版。

从事改造。^①

(二) 发展现代城市交通

城市经济活动要求建立安全、快捷、方便、舒适的城市现代交通体系。奉天最早的公共交通工具是马车铁道，由中日商办马车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经营，1908年1月开始通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车铁道被视为先进的公共交通工具，经济效益很好。1922年中日商办马铁合同期满后，王永江指令奉天省总商会按约解散了马车铁道股份有限公司。从此，马车铁道的经营业务以“南满”铁道附属地界线（今西塔附近）为界，分别由奉天马车铁道公司善后事务所和大仓组经营。^②

中日商办马车铁道股份有限公司解体之后，王永江将创建有轨电车提上日程。他责令市政公所将此项工程列为公所要政，令曾市长“迅速着手办理”。^③ 市政公所对修建有轨电车与无轨电车之利弊，如造价、耗电、占用路面及改造路面难易程度等调查情况上报省政府后，王永江随即召集军、政、绅、商各界及市政委员会开特别会议，要求对电车路线等问题详加讨论。最后议定“由西塔日站附属地界起，东达奉天车站，再直东抵西北砖城角，南折逾小西门至大西门止，计长1340丈，沿线拆房较少，敷设较易。”^④ 王永江强调在沿线收买民房过程中“倘有无知之徒，从中蛊惑，藉滋事端”，省政府随时依法严惩，绝不姑息。1924年3月15日有轨电车第一期线路工程开始修建。第一期线路工程分为东西两段^⑤施工。当时东段路面尚未成形，多为居民住宅，困难较多。需动迁的房屋“小西边门外6间，小西边门至城西北角338间，城西北角至小西门246间，小西门至大西门545间，合计1,195间。此

^① 《市政所接管公园》，《盛京时报》1923年12月5日第4版。

^② 《马铁问题之昨闻》，《盛京时报》1922年11月4日第4版。

^③ 《派员调查日电车》，《盛京时报》1923年8月24日第4版。

^④ 沈阳城市建设管理局编：《沈阳城建志（1388—1990）》，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⑤ 大西城门经太清宫至小西边门为东段；小西边门至西塔为西段。

外尚有木棚、偏厦、铁棚 133 间，拆迁量很大。”^① 此后，市政公所于 7 月 16 日到 9 月 20 日间开始动迁，除“北寺 4 亩菜园、10 间房间尚未领动迁费外，共支付奉大洋 88,305 元。”^② 当时动迁障碍和开辟马路等工作进展较快。但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整个工程“迟误数月，中途停顿”。1925 年春，铺设轨道工作继续施工。1925 年 10 月初，东段电车线路竣工。9 月 1 日，有轨电车西段工程开始施工，11 月 5 日竣工通车。至此，奉天市第一期电车线路建成通车。道路线车辆等“试验运转之结果，颇称良好，其运速度自大西门至沈阳站仅需 7 分钟。”^③ 至此，奉天市区有了先进的有轨电车这一现代化公共交通工具。

为庆祝“电铁”通车，1925 年 11 月 8 日举行了通车典礼。王永江到会祝贺并讲了话，提出“今日为奉天市第一期电车举行通车礼式之期，中外人士济济，咸临盛举，本省长良用欣慰。奉垣自禹舜分州，迄于有清肇迹，经历祀祀，繁荣生聚，蔚成东北一大都会。……工商繁荣，户口充盈。言政治者，当以交通为先，而言交通者，以无电车为憾。本省长早已计划及此，议有端倪。适民国十二年秋八月，奉天市政公所成立，住遂将原有议案，发交筹办。并拨给专款，督促进行。经岁两稔，始告成功。……此次开辟电车路，拆毁民房不下千数百间，虽经公平报价，而奉垣民智尚未尽开，与之乐成则可，与之开始盛难，与人兴讼，或不能免”。但是“全市交通脉络为之贯穿，王道康庄，行复见于今日，是则本省长所深望也”。^④

有轨电车建成后，王永江责成市政公所对相关事宜加强管理。为有效保护车辆及设施，市政公所发表公告：如果电车“沿线有小儿搬弄石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二集）第 279 页。

② 沈阳城市建设管理局编：《沈阳城建志（1388—1990）》，沈阳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 页。

③ 《市电车先行营业》，《盛京时报》1925 年 10 月 9 日第 4 版。

④ 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编委会编：《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沈阳出版社，1992 年版，第 75 页。

块、砖土填塞轨道，将其家长从重惩处。”^① 10月末，又公布了《电车路线整理交通办法》，规定电车轨道左右各3尺以内为电车专用轨路，一切行人、车马无故不得通行；如果行人车马必须通过电车轨道时，按以下办法办理：向电车对行时，汽车、马车和自行车在电车前20丈以外即须避出轨道；行人及人力车在电车前十丈以外即须避出轨道；汽车、马车和自行车距电车10丈以内不得追随；电车静止时行人车马距电车前后3丈以内不得通过。在十字路口一切行人车马须先让电车行过然后通行；汽车、人力车、马车、自行车等在通过十字路口以前，无论电车到否，均须特别缓行以防危险。^② 市政公所还制定了《奉天市政公所电车车票票价规定》，将“全线路按距离分为各区，现以大西门至小西边门为一区；由小西边门至日本租界地为一区”；“车票分特等票与普通票两种，特等票1区1角5分，普通票1区1角……特等票3元，普通票2元；通车票1册30张，中等学校学生用1元5角，小学校学生用1元。”^③ 并规定了违章乘车罚款的办法。1922年中日马车铁道股份有限公司解体之后，大仓组于1925年9月将其租借地内马铁线路改为电铁线路，但由于线路过短，只能勉强维持经营。而奉天省有轨电车通车以后，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6月就收入29万余元，盈余15.7万元，利润达53%。^④ 日本财团大仓组为了达到和中方合办“电铁”的目的，多次与奉天省长公署交涉，都遭到王永江的拒绝。

王永江在筹划修建电车线路的同时也筹划修建电车厂。1925年8月19日，奉天省长公署公布了《奉天市电车厂暂行章程》并组建了奉

^① 沈阳城市建设管理局编：《沈阳城建志（1388—1990）》，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② 《市所定交通办法》，《盛京时报》1925年11月2日第4版。

^③ 沈阳城市建设管理局编：《沈阳城建志（1388—1990）》，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④ 辽宁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编：《辽宁公路交通史》（上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天市电车厂。奉天电车厂为市直属单位，设厂长1人，技术长1人。厂内设总务、运务、电工、轨道四股，各股均配主任1名，事务员1至3人。^① 奉天市电车厂是奉天省首办的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它先后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1925年7月一次就制定了《电车厂暂行章程》、《电车职员待遇规定》、《电车车务员、各公务员及车掌、司机待遇规定》、《电车车票票价规定》、《电车车掌、司机练习章程》、《电车车掌、司机保证规则》、《电车车掌、司机惩奖规则》、《电气铁道乘车规则》、《电车车掌、司机服务规》等章程规则。电车通车之后，又制定了《电车路线整理交通办法》、《警察对于电车肇事处理章程》、《乘客须知》等办法。后来电车厂又补充制定了《电车厂乘务员及工人请假规则》、《电车厂乘务员、职员敬礼规则》、《电车厂车掌、司机贪污处理办法》、《电车厂采买物品、材料规则》、《电车厂暂行领款规则》、《电车厂领用物品规则》、《电车厂处理遗失物规则》、《电车厂会计规则》、《电车厂营值规则》、《电车厂暂行清洁及放火规则》、《购买外货罚则》、《电车厂附设乘务速成学校简章》、《养病室规则》等先后建立二十余种规章制度，使其管理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② 电车运行服务与管理进入良性运营轨道。

近代中国每一种新式公共交通的出现、转换，都是以城市发展、人口增长、面积扩大为基础，是城市居民对新的环境产生新要求的结果。反过来，新式公共交通的应用又有助于人们的出行，提高了城市生活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向前发展。^③ 有轨电车在推动奉天省城市商品经济诸要素如人员、物资等方面的加速流动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电车运行促使奉天省城市的发展重心由旧城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这一方面城市

^①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二集，第117页。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市政公所章则汇编》第二集，第78页。

^③ 鲍成志：《试论新式公共交通兴起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国近代史》2009年第7期。

空间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城市区域功能的划分。从而使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既有社区的功能分工，又连为一体的发展趋向。

总之，有轨电车的运行既提高了交通的安全性，又大大地缓解了交通拥挤状况，有利于实现城市商贸的聚集效应，促使城市形态结构向现代演进，尤其在加速城市人口流动、促进城市经济繁荣和推动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三）建立奉天公立医院

城市是人口的密集地区，也是疫病高发区，医疗机构由此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王永江认为“生存于人类社会，首先要有强壮之身体，尔后方能谋求发展事业。故保护公众健康，导致社会福利，”^① 是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鉴于奉天省“无完善病院，向之官营医院，又因官家掣肘，未能良好成绩，”^② 王永江在1923年12月建立了奉天省公立医院。奉天省公立医院由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主要募款人为王永江和吴俊生。共募得十八万元。公立医院院址设在同善堂所属的善缘寺旧址（小西边门外商埠公园后）。在其东院新建医院。“楼门南向，南北连接十数间，设有挂号处、内科诊所室、外科诊察室、手术室、妇人科诊疗室、药局、爱克斯光室、试验室、眼科诊疗室等。”设置整齐有序。办公处及职员宿舍，安置在后院的旧房间内。病室设于西院，共有病房“一等一处，二等一处，三等一处。全部可容纳三十余人。”^③ 虽然病房也由旧房改造，但是采光取暖，“俱极完备”。医院设总裁一员，王永江担任名誉总裁。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阮振铎担任院长，管理全院事务。医院下分医务、药物、事务三部，大部分医务人员来自鞍山满铁病院，其余都是满医学院毕业之优级生。医院开办伊始，所收病人主要

^①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② 《奉天公立医院成立参观记》，《盛京时报》1923年12月18日第4版。

^③ 《奉天公立医院成立参观记》，《盛京时报》1923年12月18日第4版。

为“由警察证明确为丙等以下之贫户和旅中乏资、无亲无依之病者。”^① 奉天公立医院经营状况良好，从1923年12月至1924年10月，“出入相抵小有余剩。”这期间共治疗病人达10,024人，主要医治“肺病、梅病、流行性感及胃病伤寒。”^②

王永江重视提高公立医院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认为公立医院作为治疗机关，“尤未能尽符合人创设之初意”。因此，特意为医院拨款项4万元作为基金，用于每年派1人赴德国留学。所有院中各科主任均留学完毕，“乃以基金创办医学，以广造完善之西医人才。”^③ 鉴于奉天中医早有医学会之组织并发行杂志，而西医同业无此组织，公立医院建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奉天分会，“以便于医药学术上交换知识，又为医药卫生学识之宣传”，并组织奉天医学杂志社。所有稿件由各会员供给，公立医院各科主任分任编辑责任。^④ 奉天省公立医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共医疗卫生设施，传播了现代西医学知识，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王永江对其他热心于公益事业的药房等也积极鼓励表彰。德记号药房是民国时期大连最著名的中医药房之一，发展规模很大，在普兰店和瓦房店等地有10多家分号。1925年夏季，金州和普兰店一带发生瘟疫。为有效地控制瘟疫，“德记号药房”及其各分店调配中药，低价卖给城乡居民，无力买药的穷困人家则分文不收。王永江亲笔给“德记号”题写了这一副对联：“德兼和缓活人术，记取黄农济世心”，以表彰其救济民众的高尚医德。

① 《奉天公立医院成立参观记》，《盛京时报》1923年12月18日第4版。

② 《公立病院周年记》，《盛京时报》1924年11月16日。

③ 《两当局注重医学》，《盛京时报》1925年6月19日。

④ 《公立医院新事业》，《盛京时报》1925年9月4日。

第三节 城市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只有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去。而良好的城市设施反过来又吸引大量投资，强化城市的经济聚集功能。由此，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王永江认为经济发展既是“富国良策”，也是城市建设主导元素。早在1915年7月，王永江即申办东三省兴利公司。在申报报告中，他指出：“东三省疆域广袤，土脉沃衍，天产之富，不独为全国之冠，亦各国所涎而视。”但是由于“众情涣散，民力单薄，不足以尽地之利，虽于各项实业有所经营，多因资本不充，中途废止，以致利权坐失，束手让人。势非萃群力结财团，以巨资长期经营之，则东省实业前途无望振兴之一日也。”^①为了发展实业，王永江拟招集股本二百万元组织公司，办理东省森林、矿产、银行等实业，以六十年为期，名曰兴利公司，纯然商办性质。王永江制定了《东三省兴利公司简章》对公司性质、经营项目、组织形式、利益分配等作了详细规划。

为加快城市经济建设，他采取了规范公司的注册机制、保护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等政策措施，并亲自主持建立了奉天纺纱厂，从而促成了奉天省城市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一、规范公司注册机制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承载体。按照组织形式不同，企业分为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三种形态。^②民国初期，奉天省兴起了开办公司的热潮，但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经济组织并未消失，形成了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351号卷。

^② 孙选中：《现代企业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三种企业组织形式并存的复杂局面。王永江认为公司制代表了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主流，因此着重引导公司制企业发展，尤其关注规范公司的注册机制。注册是公司成立的先决条件，也是政府与公司发生直接关系的重要环节。公司通过注册，一方面能够使“公司设立这一事实及公司的各种情况为社会公众周知，以保护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便于国家掌握公司情况，进行必要管理，保障合法经营，制止非法活动”。^①王永江采取以下办法规范公司制企业组织注册：

第一，严格督察公司设立条件。为了明确公司法人的身份，所有集资设立的公司必须首先由董事及监察人或执行人呈请实业厅立案，在呈请同时提交公司章程、股东簿、发起人及董事监察人姓名、籍贯、职业等。注册工作的时效性也有明确规定。实业厅核对呈请材料后，如果认为有需要更改之处，创办人必须在 2 个月内修改完毕，否则原立案失效。公司呈请获准后，需要马上对资本总额提出确实证据，经实业厅检验无误后发给开业凭证。公司获得开业凭证后必须在 6 个月之内开业，如果超过期限又不能申明合理的理由，“即将原案撤销，准许他人另办”。^②对电灯、电气等专业技术性较强公司注册更为严格。鉴于这些公司所有“筹备设施非具有学识经验，先事图维，万不足以策推行”，而筹设电灯公司承办人员“具有电气知识者甚鲜，对于各国厂家之制品茫无闻知，遑辩机器优劣？”省政府通告各县“创设电灯公司或其他电气事业，……饬创办人将详细计划于事前送厂审查各办法。”同时明令正在呈请注册的西丰、西安（今辽源）、海龙、山城镇等处的电灯公司“或将计划建厂详为审查，或选派委员前往示导。”^③

第二，严禁外资渗透。1925 年以后，奉天省电灯事业发展迅速，

^① 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01~102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896 号卷。

^③ 《抚顺县公署档》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 94 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8 页。

各县“成立之电灯公司已经达十之六七，而正式请准者实属寥寥”，^①许多电灯公司在县署登记后即行开业，其内部情形及营业状况省政府“无从得悉”。并且这些公司在购机、用料等方面大多依靠外国人，“若不设法取缔，难免不无暗入外资及押借外款情事，日久百病丛生”。^②鉴于此，王永江令实业厅制定注册领证办法细则，以便于管理。《电灯工厂公司立案规则》中更明确规定，“电灯公司工厂招募股款以中国人为限，不准引入外资，违者停止其营业并处罚之。”^③

第三，降低公司注册费用。奉天省工商业发展阻碍来自于资金不足。王永江指出工商业“有待于资本而后方兴，”^④因此，他尽力降低公司注册费，尤其对股本金额3万元以下公司，注册金额降低幅度很大。^⑤而为促进矿业公司的发展，王永江则建议简化注册手续，“凡人民报领矿区，报领之后，即派员查核，如无纠葛，即发探照，不得故意批难。”^⑥

由于在注册过程中对公司法人、公司资本来源等进行了详细的审查，政府掌握了公司的总体情况，从而能够更有效地督促投资者与经营者，促进公司的成长壮大。

二、鼓励工商业发展

民国时期，奉天省民族工商业不论是资金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远远低于外资企业。若想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借助政府的大力支持。王永江通过制定一系列发展计划，鼓励工商业的发展。1917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896号卷。

^② 《抚顺县公署档》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9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896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⑤ 奉天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896号卷。

^⑥ 《王永江进矿政之建设》，《盛京时报》1917年8月23日第4版。

年，他提出废止没有前途的官营事业，而对“暂时无利但将来有希望者”大力提倡。同时积极倡导开采矿山以促进工业发展，垦殖省内荒地以发展农业。^① 1922年，他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工商业发展计划：官商联合出资，采掘抚顺、本溪、柳河、西安（今辽源）等各县金矿；扩大呼兰制糖厂和鸭绿江采木公司的经营规模；加速筹备纺纱厂；继续推进路政建设。同时令各县扩“充教养公产，普设平民习艺所以减少游民，消灭匪患。”^② 1924年初，为扩充实业、振兴国货，他特别传见实业厅长张之汉，作出如下指示：“鼓励实业之发展；扩充各县大工厂；改良丝布出品；接济工厂经费；改良茶油各项办法。”^③ 同时，王永江为促进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上采取了减免政策。如惠临火柴公司所初创时期向财政厅呈请免税出口，王永江随即准予。^④

王永江鼓励工商业发展，尽力保护民族工商业免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势力的破坏和打击。随着工商业发展，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从国外购买机器进行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在棉纺业尤为明显。王永江鼓励引进先进科技进行机器生产，同时对传统土布生产部门也给予保护，这主要通过调整税率来实现的。王永江将机制棉货与旧式土布区分纳税。1917年5月16日起，对国内华、洋商厂机制各种洋式棉货，如棉纱、布匹一级其他棉制织品，前仅征收货物税一道，沿途税厘，免予重征。其货运出口时，所纳正税税率不一，经拟定此法后，凡国内华、洋机厂所出各种洋式棉货，统按旧则征税。其货品为旧则没有的，按薪则征税；新则没有的，按估价征税。对旧式土布，仍按过去减税成案办理，即每百斤征收出口正税银1两。如运往内地，除照纳沿途

① 《王永江整顿财政计划》，《盛京时报》1917年7月6日，第4版。

② 《当道注意实业》，《盛京时报》1922年12月4日第4版。

③ 《王省长关心实业》，《盛京时报》1924年1月19日第4版。

④ 《惠临火柴厂获准免税》，《盛京时报》1923年5月16日第4版。

税厘外，由此口运往彼口，免征复进口半税，但土布必须符合下列标准：布织法必须与以前之织法不同；由旧式人工手机织出；宽不得过20英寸；所用之土纱或洋纱，粗细不得逾过20号；经纬纱俱用单线，在未织成布之先未经炼过；本色未染或加以晒白或先染后织，惟不得织成后再染。^① 1918年8月，奉天省执行重订土布标准四条：经纱每英寸不得逾70条之数；纬纱不能超过60条之数；织布不能用斜纹布织法，并不能用提花架织法；织布不能用丝光线；如经纬之内或经或纬一有用双线者，则每百斤征税1辆2钱5分；如经纬俱用双线者，则每百斤征税1辆5钱。^② 1919年4月28日，奉天省对土布前颁四条标准之外，又明令发布：凡机器仿制洋式之棉货，如有特准完税成案者，完正税一道后，概免重征；在新订标准四条范围以内之土布，每百斤应完出口正税关平1两，免征复进口半税；在新订标准四条范围以外较细之布，征收出口税，免征复进口半税；由外洋运来之棉布，在中国染成者，每百斤应完出口正税关平银1两5钱；复出口率税7钱5分。^③ 上述标准1920年6月实行，并于1924年7月24日增订《税务处编订机制洋式货物税现行办法》，机器仿制洋式货物，系指以教育品类、机械类、布匹、棉纱、毛织物及其他各种工艺品为限。

王永江的发展工商业计划和保护工商业政策，带动了东兴色织纺织公司、肇新窑业公司纯益缫丝公司和惠临火柴公司等一批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东兴色织纺织公司：始建于1924年，由归国留日高级染色专家陈维则发起，张惠霖等赞助，组织形式为商办股份公司，资本额18万元，厂址设于小东边门。有织机300台，染色机7台，日产布300匹，染布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317号卷。

^② 《奉天公报》，第1329号。

^③ 《盛京时报》，《土布缴税新办法》1919年5月11日第4版。

800 匹。20 年代末期，该厂在营口设立了更为现代化的分厂。^①

肇新窑业公司：由杜重远于 1923 年创办，建厂时只两筒烧青砖的旧式马蹄窑 1 座，当年只生产青砖 7 万余块，小青瓦 5 万余块。1924 年新建十八筒烧红砖的新式输窑，日本式瓦窑 5 座。^② 到 1925 年，已生产砖 1000 万块，瓦 70 万片。后又增设瓷窑，产品品种和产量不断增加，销售远至海外。

纯益缫丝公司：创建于 1918 年，由商人刘尚清发起组织，资本额为奉钞 25 万元，有提花机 40 台，用本省山茧为原料缫制细丝，产品销往日本等国，在上海等地设有分号。1923 年该厂在海城建立分厂，其规模迅速扩大，年产灰丝 2,000 箱（10 余万公斤）、药水纯丝 300 箱（1.5 万公斤）、奉绸 8,000 匹。1927 年后该厂转归东三省官银号接办。^③

惠临火柴公司：1922 年由张惠霖创办，资本奉钞 18 万元。开办时地址设在皇寺附近，1924 年兼并日商奉天磷寸（火柴）株式会社后，总厂改设大西关，1924 年时日产麒麟牌、双鹤牌安全椴木火柴 100 多箱（每箱 240 包）。^④

工商业的发展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但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非来源于技术本身，而是借助于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⑤ 王永江积极推行专利制度。他认为正是由于西方各国对于“能制造新器、著作新书之有能之士，国家皆予优奖，保护其特权”，才促成了欧美新发明、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14，实业 2，工业，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版。

^② 杨振禹：《肇新窑业公司经营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3 页。

^③ 《辽宁百年工业史料》辽宁省统计局，2003 年版，第 462 页。

^④ 曲晓范：《近代的历史变迁东北城市》，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4—125 页。

^⑤ 葛健：《北京政府工商业政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年，第 56 页。

新著作层出不穷。东三省人民聪明才智并不低于欧美人，但“工艺尚不能日趋优胜，实因对工艺无奖励法之所致也”。因此，他对发明者除了根据《技工艺品奖励暂行章程》给予以奖励外，还赋予免税权和授予专利权。^① 1923年底，王永江在省政府组织“特产制作品”会展，制作者可以将自己的新特产品参加验证，如果认定属于新发明或者利用特产模仿制造品，则给予奖励：“其一，授以3万元以下1千元以上之特奖金；其二，授以省署技士官职并优给月俸；其三，准予专制年限并通令全省商会为之倡销；其四，酌予免税。”^② 这一措施有利于挖掘奉天省技术创新的内在潜力和促进科技水平的整体进步，并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技术创新热情。

一般说来，只有拥有雄厚资产的企业才能不断改良设备，增进生产效率。也只有拥雄厚资金的企业才能把握购销时机，使产业得以最有利地运行。^③ 王永江在鼓励、扶持工商业发展的同时，积极筹集资本，建立能与外资企业相抗衡的奉天纺纱厂。

三、创办奉天纺纱厂

1920年代初，奉天省除辽阳、盖平、海城等自清以来的重要产棉区外，法库、康平、铁岭等地区也开始生产棉花，但东北的棉花几乎全从关内运来或从国外进口，每年总计达1630万海关两，并且东北仍旧没有纺织厂。现成的廉价劳动力、便宜的建厂成本、轻微的租税、日本国内工业的衰落等因素都迫切要求日本实业尽快地进入这个地区。1923年3月，日本在辽阳的南满铁路附属地设立了满洲纺织株式会社，资本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② 《奖励特产制造品》，《盛京时报》1923年12月11日第4版。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78—179页。

500万日元。^①然而，几乎就在日本建立这个工厂的同时，传来了奉天纺纱厂建立的消息。

奉天纺纱厂是由王永江亲自主持筹备的。他首先拟定纱厂由官商合办，资本450万元奉大洋，其中有200万为官股，其余250万为商股，由资本家添购股份，“将来将官股抽去，为一纯粹之商办之工厂。”^②每股作为奉大洋100元，由奉天省财政厅支出250万元；商股2万股，计200万元。至1925年底，奉天纺纱厂商股为21,117股，股款为奉大洋211.17万元。其中东三省官银号为3,389股，33.89万元；中国银行1,328股，13.28万元；交通银行1,128股，11.28万元；奉天储蓄会528股，5.28万元；奉天总商会1097股，7.67万元；辽阳县1,289股，12.89万元。^③厂址选在省城小西边门外十间房后商埠界内，占地270亩。由于该处距皇姑屯及省城南、北两站均不过数里，且由北宁线拨修道岔于厂内，运输极为便利。全厂地基共占318亩，为将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创造了条件。^④



奉天纺纱厂原貌

① [英]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② 《纺纱厂开工期近》，《盛京时报》1923年5月5日第4版。

③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3296号卷。

④ 马尚斌：《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在创办纺纱厂过程中，王永江重用专门人才，特聘留学欧美、日本及中国高级学校专门人才为厂技师，主持纺织及机修事务。“韩副厂长新近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纺织科，对于纺纱事宜习有专长，故入厂以后大事改革，极力筹进；商业部长郭子扬也新近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对于工业知识亦极宏富。”^① 在工务员方面，曾招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 30 名，先后送至天津各厂实习，回厂后量才任用，各尽所长。筹备时期又招徒工 100 余人，也送入天津各厂学习 3 个月，主要学习基本操作技能。^② 一些纺织学校毕业生毛遂自荐到纺纱厂工作。“南京纺织科专门学校毕业生孙永芳，富于纺织知识。现因奉天纺纱厂需用人员甚多，故特具履历赴省长公署请求录用。王省长以该生既系纺织专科毕业。令纺纱厂检验文凭，考核技术，酌量试用。”^③ 纺纱厂的组织结构比较完备，设董事 11 人，监察人 5 人，总理 1 人。以现有官商股之比例，官股内派董事 6 人，监察人 3 人，其中 1 人为常驻监察人；商股内选举董事 5 人，监察人 2 人。总理由官股董事内派定之，协理山商股董事会互选之。纺纱厂组织力求简单，以期提高办事效率。在总理、协理之下设秘书、稽核各 1 人，并设商务、工务两大处。商务处设商务长 1 人，下设营业、会计、庶务 3 科。工务处设上务长 1 人，下设纺绩、机织、电气、机械、考工 5 科及上人管理室、医药室、上账房、物料库。^④

奉天纺纱厂开工初期，棉花价与纱价发生倒挂，“纺纱一捆须赔大洋 30 余元”，^⑤ 因此经营惨淡，举步维艰。王永江责令对纺纱厂内部大加整顿，工厂内部组织全部改革，将工厂分营业、会计、议事、司检 4 部，各部设部长 1 人，部员根据事务繁简确定人数。工厂内设置调查员

^① 《纺纱厂开工期近》，《盛京时报》1923 年 5 月 5 日第 4 版。

^② 马尚斌：《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4 页。

^③ 《录用纺织毕业生》，《盛京时报》1923 年 6 月 22 日第 4 版。

^④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3296 号卷。

^⑤ 《纺纱厂初步困难》，《盛京时报》1923 年 5 月 15 日第 4 版。

和监视员各 4 人，负责考查以前去天津的练习生的成绩，并按照优劣分配具体工作任务。为解决各县棉花产额少的问题，王永江提出东三省产出的棉花，都由纺纱厂收买，禁止对外输出。同时筹集 150 万元派人分赴各县，向地方农民分发棉花栽培简单说明书，“一以教其种植之法，一以教其种棉之利”。如果农民愿种植棉花但资金不足，纺纱厂以低利贷与。”^① 经过整顿以后，奉天纺纱厂状况有所好转。1923 年 7 月 16 日开工生产，年底纯益利润奉大洋 300 414.11 元，除去开办费奉大洋 112 073.29 元之外，股东分配红利奉大洋 2.25 元。1924 年共获纯益奉大洋 560 343.55 元，股东每股分配红利奉大洋 6.9 元。1925 年共获纯益奉大洋 1 434 846.35 元，股东每股分配红利奉大洋 17 元。1926 年共获纯益奉大洋 1 667 413.3 元，股东每股分配红利奉大洋 20 元。1927 年共获纯益奉大洋 7 132 488.8 元，股东每股分配红利奉大洋 276 元。1929 年共获纯益奉大洋 52 612 620.82 元，股东每股分配红利奉大洋 470 元。^② 当时纺纱厂生产能力和所获利润在全国前五名之内，居于东北同行业之首。

奉天纺纱厂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纱厂所产纱布仅批发而不零售，省城内代卖的商号达 50 余家，其他城市也有专门商家代卖。纺纱厂要求各代卖商号必须先找可靠铺保，写明取货最高额，在此额内随时任意取货，取货后限 30 日交款，所有买卖损益概归各商号自己负担，厂方不负责任。然而，因奉天纺纱厂制品精良，质地坚固，销路日广。^③ 奉天纱厂开创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成功开办企业的模式，成为东北民族工业兴起的重要标志。它的成功举办增强了国人发展民族工业的信心，正如时人所谈：“日本纺绩业年来已极发达，我国纺业方在萌芽，似难与之

① 《纺纱厂内部之整顿》，《盛京时报》1923 年 6 月 17 日第 4 版。

② 董慧云，张秀春：《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8 页。

③ 马尚斌著：《奉系经济》，辽海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5 页。

对抗。但我国方面也有种种优势，即工价之低廉、原料之自给、燃料之低廉、关税之节省。有此数端我国出品不难与外洋相抗衡，将来改良棉种当必较南方之各大纱厂尤为发达，其进步未可限量。”^①

王永江所实行的推进城市早期现代化措施，给奉天省城市面貌和功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商埠区、工业区的开发，老城区的改造，原来大片城郊和农村地带被纳入到城市新区，各城市的版图因此大幅度地扩大了。市内交通和对外交通比以前更为通畅，卫生条件明显改善。由于城市公共设施日益完善，整体环境得到改良，从而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城市早期现代化带来了民族商业流通领域的繁荣。1905年，奉天的中国人商号总数为1803户；到1924年，已发展为6598户。这其中确有一些商号在满铁附属地内经营，但绝大部分为商埠地和老城区的新增商户，如北市场一地就有民族商号1400户，分属40个行业。^②人口规模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量化指标。一方面，工商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剩余人口，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商埠区、工业区的开发和老城区的改造，城郊和农村地带被纳为城市新区，各城市的版图大幅度地扩大了，由此增加了城市空间的容纳度。而市内交通和对外交通比以前更为快捷通畅，为人口流动提供了方便。1922年奉天市人口达到25万人，营口8万、西安（今辽源）7万、锦州6万、辽阳4万。^③人口规模扩大促成了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形态，形成了城市早期现代化重要一环。市政领导机构设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环境改良，使城市资源得以的优化配置，对移民、商业投资和对外贸易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力。城市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发生变化，仅在万泉河边即有东、西凝香榭等7个茶社，喝午茶成为市民的时尚。女性的衣着和打扮

^① 《纺纱厂开工期近》，《盛京时报》1923年5月5日第4版。

^② 沈阳市商业管理局《商业志》编纂办公室：《沈阳市商业志》，内部印发，1990年版，第24页。

^③ 葛勒石：《中国区域地理》，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76—77页。

发生明显变化。“奉垣女子喜欢奇装异服，有服时装者，有改西服者，有剪发者，有烙发者，更有中服而西冠者”。^①传统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向被视为耻辱的离婚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同情乃至赞扬，甚至将其视为“国人思想发展之结果。”^② 在这种宽容的社会风气下，城市呈现出更加开放活跃的态势，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了，从而更进一步向早期现代化迈进。

① 《盛京时报》1926年7月31日第4版。

② 《盛京时报》1923年11月14日第4版。

第六章 王永江与奉天省区村政权 建设和警政早期现代化

基层政权建设是早期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末民初，虽然国家政权频繁更迭，但国家一直十分关注对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企图将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他们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① 奉天省政府通过推行区村制度来加强乡村政权建设。这一过程实质是“政府努力将其行政机构扩展”的过程，亦是国家力量在整个社会中缓慢扩散的过程。^②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社会控制，王永江整顿保甲制度，最终促成了警甲合一，推进了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早期现代化。

第一节 区村行政组织建设

中国自秦至晚清，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州）县，乡村社会虽然存在以乡官和役员为领袖的乡里组织，但没有区乡一级国家行政，国家权力只达到县级。清末，社会各阶层和清政府一致认同“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将推行“地方自治”作为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中国地方行政结构由此发生根本转变，开始出现县以下的行政区域划分。1922年王永江在奉天省推行区村制度，加强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省

^① [美]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② [美]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政府的控制力渗入到广大乡村。

一、区乡行政组织的缘起

1907年清政府公布《各省官制通则》，规定各省将县以下地方划分为若干区，每区置区官一人，管理本区巡警事务。^①随后又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提出以城镇乡为县以下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规定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城、镇、乡均为地方自治体。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实行“议行分立”。乡议事会在本乡选民中选举产生，为议事机构。^②乡的自治执行机构则很简单，只有乡董、乡佐各1人。乡议事会和乡董的职责范围主要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农工商务、慈善事业和公共营业等。但尚未来得及实行，清政府遂告灭亡。民国建立以后，在1914年12月公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县域之内的自治区域正式以“区”命名。《地方自治试行条例》规定：“一县之自治区域，得设四区至六区，其二县以上合并之县，得增至八区。”^③每区设区董1人及自治员6至10人。自治人员的产生是从各区选民中先选出“数倍于定额之人”，由县知事从中择选委任，任期均为2年。区自治事务主要是“本区内卫生、慈善、教育、交通及农、工、商事项，但属于国家行政范围之内的，不在此限”。^④后来袁世凯政权虽然覆亡，但区级政权的设置却保留下来。至少在理论上，“区”成为政府最低一级组织，它直接接受县政权的严格控制。^⑤

1921年，北洋政府废除了区级建制，改区自治为县与市乡自治。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徐秀丽：《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页。

③ 徐秀丽：《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页。

④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纂：《内政年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16页。

⑤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但是中央政府衰微，许多省份都是根据本省情况自行制定法规，因此“区”级设置依然存在并逐渐发展。如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区村体制，每县划为3至6区，每区设区长1人。区长由省长委任，隶属于县，其主要职责是秉承县一级的命令，督察所管区域内村长，维持治安和税收。可见，阎锡山所设置的“区”已经从自治转向行政，成为政府派出在乡村中的一级行政机构，对广大乡村起着一种督察管理作用。^① 区级政权最终能够得以存在并逐渐发展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的县级单位面积过于庞大。如胡汉民曾言：“我们中国的一县，可抵人家一国，人家一国有一国的规模，而我们一县却只靠极简单的县治机关去办理一切，哪知这就是一切毛病的根源。”^② 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以及县政事务的繁多，对县以下区域进行划分势属必然。其二，国家政权介入乡村社会的必然选择。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新生有赖于新型地方政府的形成”的思想观念占了绝对上风，但“这个设想如何才能实现呢？是将名流罗致在一个地方自治的组织系统中，使他们为国家的目的服务，还是建立一个能够延伸到乡村一级的更强有力的官僚控制机制更符合中国的传统呢？”^③ 这本是一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问题，但中国现实很快给出了答案。清末新政与民初建设，均需要财政支持，而当时中央政府财力困乏，向乡村社会攫取经济资源成为国家政权的必然选择，而以“地方自治”的名义介入其中是地方政府比较乐于接受的方式。

民国时期的区级政权建设过程其实是“政府努力将其行政机构扩展”的过程，亦是国家力量在整个社会中缓慢扩散的过程。^④ 从这个意

^① 李巨澜：《略论民国时期的区级政权建设》，《史林》2005年第1期。

^② 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秘书处编：《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纪要》（1929年），第319页。

^③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

^④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义上说，区村级政权的设立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历程，也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

二、区村制的推行

清末东北实行“新政”后，尝试着建构“地方自治”为基本的政治权力体系。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具体规定了城镇乡自治的运行机制。原有的旗民分治体制被打破，一些旗制体系完全转化为民治体系。在自治运行的过程中，地方绅士直接进入政治舞台，加强了乡村组织的控制。这样，乡村行政系统形成两种机制：一是乡地保甲等，他们由政府统一督建，具有现代行政那种普遍化科层化的特点，然而其首领人员却地位低贱，其流品在平民之下，不足为治；另一方面是士绅和宗族领袖，他们虽然在乡里素有威望，但却是私人势力，没有被纳入普遍性的组织机构中去。而近代性质的区乡行政要求对上述两种机制各取其利舍其弊。即近代区乡行政应一方面具有普遍化科层化特征，另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① 为顺应这一需要，王永江筹划在奉天省实行区村制。

按照现代行政理论，基层行政单位需要适度数量的人口以负担经费和从事自治事业，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于行政不利。当时我国行政区域的最小单位为县，奉天省县境广阔者达万余平方公里，小者亦有数千平方公里。一切政令只止于县知事，百姓对此一无所知。由此造成政令不通，“遂致村民万事自谋，官不亲民，民不信官。上不导民以正规，下视官如神明而惧之。户籍无法掌握，盗贼容易潜藏。”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县知事不了解地方需求及缓急，实业难以发展，卫生、教育事业等项无从做起。而“区村两级公所建立，可辅助县行政之不足，使政令民

^① 魏光奇：《官治和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8页。

情上下通达。”^①1922年8月，王永江颁布《议定区村制单行章程》，规定除“边远县份及新设治者，村堡星散，暂从缓设”外，每县根据县境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区。区设区长1名，助理员1名，区长经县知事保送后而由省长任命，“受县知事指挥”，“辅佐县知事办理地方行政，排解人民讼争”，“经费由清赋税契提成，不足则以公款扶助。”^②

1922年10月王永江颁布《奉天省区村制大纲》及其附则，共14章76条，并着手建立区村公所，开始实行区村制。区村制将每县分为八区，每区管辖若干村区，设区长1人，办理地方行政事宜，作为地方自治之先导。居民在200户以上的村庄设村长副各1人；零散的小村庄实行联村制，即先指定一个主村，然后再联合若干个小村一起组成一个联合村，设村长副各一人。各区管辖区域先由县知事划分，县知事一般根据“地方之形势，习惯之便利，切实计划分之”，并绘制地图说明，由省政府作出最后决定。区村制可分为区制和村制两部分，对区村组织、区村的区域、区长与村长的选任、职责及奖惩都作了详细规定。

（一）区制

区长的资格与任用：区长必须已经连续在本区居住3年以上且年龄在30岁至55岁之间，同时要至少具备以下某个条件：其一，明达政体，富有公正威望；其二，品行端正，具有多年从政经验；其三，法政学校毕业生，办理过地方行政；其四，曾担任农商学各会会长或会员，善于办理地方公益事业。^③另外，曾受刑事处分、曾办理地方公益被控告和“品行不洽于情者”没有担任区长的资格。^④区长由县知事按照区长资格推荐两人，省长从中选定一名加以任命。区长任期两年，任满后可以连任但不得超过六年。区长在任期内如没有重大过错和不称职的行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② 东北文化社编印处：《东北年鉴》，1931年版，第249页。

^③ 《省长颁布自治区制》，《盛京时报》1922年10月25日第4版。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为不轻易撤换，但区长也不能中途无故辞职。王永江非常重视区长人选的素质。盖平县推举区长 16 人，王永江认为“资格多不相符，不但不合章程规定且有品行卑鄙素无经验，饬令县署秉公遵章程另选。”^① 辽阳吴知事，彰武温知事，因“冒滥保送区长，被各记过一次，并令知财政厅即行扣薪抵过。”^② 区长一职“事繁任重，非专心致志筹谋进行事务，不能收良好结果。”因此，区长除学董外不准兼任教育职员。为避免兼职现象，王永江特令各县将区长名单抄送教育厅，其中如有现担任劝学所长、校长教员等职者“立即撤差”。^③

区长的职责与奖惩：区长辅佐县知事办理地方事务，对于应办地方行政事宜，区长秉承县知事命令，督饬各村长副办理；区长于所管区域内应办事务，有督率各村长副指挥巡警、指挥保甲协助之权。^④ 区长的具体职责为督率村长副调查户口、侦查匪徒、禁止赌博、禁止吸烟等四项，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可以知会巡警指挥保甲协助。实际上，区长对于其辖区内宣告各级长官命令、办理义仓积谷、整理学校、劝办实业、修筑道路桥梁、种植树木、改革农田水利等所有兴利除弊及公益事项都积极参与。^⑤ 此外，区长必须在年终时报告一年来区村的情况，主要包括户口增减、水田和旱田数量、盛产的粮食品种和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侨居外国人出入情况等。^⑥ 区长还担当着仲裁事务角色。村民因一些小事而引起民事诉讼，村长副无力劝解，则由区长评议解决。经区长评议解决的案件应随时报明县政府。区长不能解决争议时要写明意见书，送交县署讯判。在区村制实行过程中，区长权限有所变化。1924 年王永江以“各县区长对于职务发生疑问，或计划区村事务时，如呈由县知事

^① 《盖平区长不合格驳回》，《盛京时报》1922 年 11 月 26 日第 4 版。

^② 《保区长知事记过》，《盛京时报》1922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

^③ 《当局慎重区长》，《盛京时报》1923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

^④ 《省长公布实行区村自治》，《盛京时报》1922 年 11 月 25 日第 4 版。

^⑤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⑥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转请核示，往返周折，耗费时间，贻误良多，于是决定由区长直接呈请省署核示。”^① 区长的奖惩也有明确规定。一般区长被任命后，省政府派员对其工作状况进行调查，一般考查全境情况。每年考核四次，每三月一次。管辖百村以上的区实行抽查，村数少者仍须全查。^② 对于区长办理区务取得良好成绩，由县知事呈请省长给予三个等级的省制金银色奖章。区长在一年之内取得下列某一项成绩即可获得奖励：创办或整理 3 所以上学校且成绩合乎学制；评判 80 起以上民事诉讼；管辖区域无盗案发生；管辖区域无烟赌案发生；当场缉获 3 名以上盗匪首各要犯；查获邻境盗犯；所办理地方特别公益取得卓越成效。对于“不遵制度，任意妄为，以致商民纷纷来省控告”的区长，王永江特通令各知事派员调查，如果属实则即行惩办。^③ 区长有违法行为时，除立即予以撤换外，还要逮捕归案，依法惩办。区长具有以下任何一项行为即可判定其违法：玩忽县署委办公件；查获罪犯系该区长亲属或藏匿故不报；管辖区域内迭出盗案；遇事于规定外擅派各村摊款；命盗重案延不呈报；办理区内公益事项，有蒙混舞弊等。另外，区长在查禁烟赌过程中，如果私自罚办，应“由县知事将罚金追出并撤换之”；处理民事纠纷时，当事人不服区长评议，区长“胁迫禁阻，使不得起诉以至于遗心愤极变出意外者，县知事查核情形罚薪并撤惩之”。^④

（二）村制

村长副资格与任命：村长副必须已经连续在本村居住 3 年以上且年龄在 30 岁至 55 岁之间，同时办事公正，素孚重望，粗通文明或有财产价值在 2000 元以上。有下列某一种情形则不允许当选为村长副：武断乡里，欺压善良；被控告侵吞村会款项；曾受刑事处分。村长副一般仍

^① 《区长权限扩充》，《盛京时报》1924 年 4 月 8 日第 4 版。

^② 《考察区村长之办法》，《盛京时报》1923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

^③ 《令查视区长行政》，《盛京时报》1923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④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由原村长副担任，如实在有撤换必要时，则由区长按照村长副资格“指择 3 人，请县公署拣委，呈报省道公署。”^① 村长副任期一年，任期满后，村长副仍可以连任，但不能超过 3 年。村长在任职内不能任事时，由村长转告县公署委任本村副接任，同时另任命村副，但不得无故辞退。

村长副职责与奖惩：村长秉承区长命令，办理本村一切事宜；村副协助村长。村长副在遇紧要情况时也秉承县知事的直接命令。村长副负责办理调查户口、侦查匪徒和禁止赌博，其具体事项基本上与区长相同，只是其报告的对象为区长，范围限定在其管辖的村屯。^② 有些县知事对村长副的职责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如台安知事传见各村正副，指示各村公会之开办费不得过小洋 5 元；亩捐确数详加调查后转呈县署；劝告早报浮多荒熟地以免丈放加罚；各村人民口角时村正副应立时前往排解不得坐视以成巨讼；以往之典卖田房未经公证人盖戳者，村正副须搜查明白，填写公证人姓名、戳记，并照章抽收数料汇报县署；各沿途所植树株宜严加保护，以免枯萎；各村正副宜常阅报，以期多闻广见。^③

三、区村制度的早期近代化特征

奉天省区村制虽然未能褪尽传统色彩，但基本上具备了早期现代化性质，体现了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的特点。

首先，拥有正式的机构设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行政管理者享有对行政空间的所有权是传统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意味着它们在自己的生活场所而不是在公共场所办公。换一个角

①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③ 《台安县对正副村长之训示》，《盛京时报》1923 年 6 月 7 日第 4 版。

度说，公共职履行的场所随着管理者的居所而转移。^① 这种办公方式必然导致决策和治理的任意性。而现代行政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具有常设机构和常设人员。奉天省实行区村制，区公所和村公会均属于常设机构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区长、村长副等为常设人员。区公所和村公会不因区长人员的更换而废立。区长常驻区公所，专门管理区村行政事宜。为工作需要，区长可以选用一名雇员，专门抄写文件；一名助理员，协助办理区内事宜，公文任务繁重时也参与文件抄写；^② 两名公役负责公所内其他事务。区公所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1923年，王永江饬令区村长组设区村会，区公所增加了“书记长1人，书记3人，庶务1人，公役5人。”^③ 1924年，王永江责成各县在区公所内组设区公会，区长任会长，村长副等为会员。同时“恐区长村长副力有未逮，在每区添任素孚众望者八名为区村会董事。”^④ 无论人事和职责怎样变化，机构和人员依然属于常设性质。

其次，经费筹措显示现代性色彩。现代行政运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法定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在中国传统乡村公共事务的财务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临时性，因事而兴，事毕而息，既无经常性收支，也无常设经理机构；二是私人性，所需经费主要靠私人自愿募捐及少量公款公产生息，而不是靠以公共权力和有关制度为依托的强制性税费。^⑤ 奉天省区村制虽然不存在区乡一级财政，但有关行政机构具有法定的经费收支制度。区长月薪30元，助理员月薪事务员雇员月薪10元，年计共660元。均以奉大洋计算。区公所办公

^① 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2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③ 《区村会实行组织》，《盛京时报》1923年12月27日第4版。

^④ 《区村制将设董事》，《盛京时报》1924年1月22日第4版。

^⑤ 魏光奇，丁海秀：《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费月支 15 元，2 名公役每月各给工资 8 元。另有炉火费月支 10 元，但只支付从 11 月至第二年 3 月底 5 个月。开办费临时再定。按照以上统计，每区年需奉大洋 1,080 元。^① 村长副办理本村纯属尽义务，不另支薪，只是办公纸张及出外川资等项，月定公费小洋 10 元，不准超越。村长副每届年终将公费用途并列清单张贴本村以昭公信。^② 1925 年 4 月，每区设立两科，每科设立三股，科长月薪 50 元，股长月薪 30 元，村长月薪 30 元。^③ 区村经费的来源，在大纲中规定“以村会旧有习惯之摊款、公产之收入并公证手数料之四成拨充之，其摊款及公产之种类、数目并经管方法，由县先行查明呈报省署再另行核定”。^④ 区村制实际实行时则规定区村经费由清赋、契税提成，不足则以公款补助。村长副的办公经费来源于村民典卖田房抽收手续费。“卖契按价收千分之十，典契按契价收千分之五，月底结清，以四成归公，四成分充村长副办公费，一成归组织办公费，一成解送县署，留作临时公用之费。”^⑤ 后来，王永江又规定“以各县亩杂、车牌等捐款项提百分之十，发商生息者，划拨补助。其无此项提款者，准予就地筹补。”^⑥ 具体的财政收支规定更为详细，如“区长代领村长副公费必须随时转发；区长村长副对于预算不得超越；村长副经管各款应用支款收款分类二种账簿等。”^⑦ 可见，区村制下的经费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褪去了传统特点。

第三，承担现代性社会职能。奉天省区村制是为适应当时地方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承担建设公共设施、创办学校等现代性社会职能，如怀德县第五区区长何首职召集村长副召开会议，会议商定：其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③ 《规定区村制经费》，《盛京时报》1925 年 4 月 11 日第 4 版。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⑤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⑥ 《区村经费改筹法》，《盛京时报》1923 年 5 月 6 日第 4 版。

^⑦ 《饬拨村长副公费》，《盛京时报》1925 年 6 月 17 日第 4 版。

一，“修筑河桥及道路。现在百谷登场，农忙将毕，所有道路河桥，今夏被水冲坏者均应赶速兴修，以便交通；其二，补栽树木。去秋今春所栽之树本有未活者，一律补栽；其三，创办学校。各村如未有学校及学校少者均应一律创办，以开民智。”^① 其他区长会议议决了大量有关地方兴革的议案，如黑山县打虎山第一区区长提出“筹办乡团以资守卫、成立各私立学校和认真办理及严禁各村烟赌等。”^②

奉天省区村制作为处于生成过程中的现代区乡行政，有时也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性质。行政人员按法定程序任免是现代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奉天省 1922 年实行区村制时，每区由县知事保送二三人作为区长候选人，经省长“面加考询，对答合格者乃得充任，区助理员由区长择用。”^③ 兴京县第八区长宋桂“因案撤革遗缺，该区另择候拣区长于宝泉等两名补送，听候考询。当经省长王岷源拣定于宝泉堪以试充，遂于十一日饬令该县知事遵照试充，三月胜任后再呈请加委并令东边道查照。”^④ 可见，区长的任用具有明显的“官治”色彩。奉天省区乡行政没有建立法治化的财务机制，其经费虽然来源于公共捐税，但仍缺乏固定性和程序化，系较为随意的临时摊派。

虽然王永江推行的区村制的还存在很多传统因素，但这一制度的推行，改变了奉天省县以下不存在科层化行政的传统制度，构成了奉天省地方行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

第二节 改革警政

警察机构的设立是清末“新政”中的要政，具有浓厚的现代色彩。

① 《区所会议之要政》，《盛京时报》1923年11月3日第4版。

② 《黑山区长会议之大端》，《盛京时报》1924年1月23日第4版。

③ 黄世芳等：《铁岭县志 民治志》，1933年版。

④ 《省公署检定区长》，《盛京时报》1924年4月13日第4版。

1902年，奉天省城设立了警察总局，试图藉此恢复因义和团运动而紊乱的地方社会秩序，加强对城乡的控制力。但奉天警察制度建立初期，未能发挥作用，日俄战争后才开始初具组织规模。警察除了担当社会治安任务外，还负责对城乡的管理和控制。张作霖统治初期，奉天省社会治安状况混乱，奉天省城周边胡匪活动猖獗，开原县“胡匪猖獗蔓延全境”，^①“抚顺警所遭胡匪围攻。”边远县区匪患问题更为复杂严重。日本利用巴布扎布蒙匪^②和宗社党^③策划满蒙独立，对其提供军事物质和军事顾问。1916年9月，瞻榆县知事被“巴匪余孽刺毙，其余官吏绅商之被该匪戕害者亦有多名。瞻榆境内紊乱不堪，洮属全境亦莫名其妙”。^④奉天省城也由于汤玉麟驻军目无法纪而处于混乱之中。

警察是维护社会治安，保证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为整顿城乡社会治安，张作霖决计起用曾被誉为“奉省办警政第一人”的王永江。王永江慨然担承，但提出“惟以奉省警政权限不专，势必遭人掣肘，特请张军长允将省城警察厅长一席归己担任，且于任用各县警务长事，不必求省长同意，他如警费支配、警额之分布亦随意办理。”^⑤得到张作霖的允许后，1916年11月，王永江担任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厅长，开始大力改革奉省警政。

① 《开原警察遇害》，《盛京时报》1916年9月19日第4版。

② 巴布扎布是内蒙古卓索图盟图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人。日俄战争期间，他投靠日军的后备队，后任彰武县警察队长。外蒙古“独立”后，他被任命为外蒙古军队的营长，授予公爵称号。1912年到1913年，他参加了外蒙古叛军窜犯内蒙古的战争。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巴布扎布开始了他有目的的进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企图成立有独立性质的区域。从1915年11月开始，中国政府多次剿匪，但由于外蒙古官府的包庇，沙皇俄国通过政治阻挠，都没有彻底消灭，直到1916年年底，巴布扎布匪帮才被全部消灭。

③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皇族中的顽固分子良弼、溥伟、铁良等结成集团，反对清帝退位及与革命政府议和，企图保存清皇朝的统治，被称为“宗社党”。清朝灭亡后，宗社党以复辟帝制为宗旨，与日本勾结，多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④ 《瞻榆县知事被戕》，《盛京时报》1916年9月28日第4版。

⑤ 《王永江受任》，《盛京时报》1916年11月11日第4版。

一、改革警政内务

王永江上任伊始即召集由警务处各科科长、科员及各关警察署署长和巡官等人参加会议，明确警察职责为“调查户口以清匪患”和“取缔赌博以清盗源”。并要求各署警察“整顿警装以壮观瞻”，尤其对枪械“加意保持”。^①随后，王永江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整顿警政内务。

（一）警务人员专业化

警察的素质与纲纪状况如何，是警察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根本要素。王永江深知其中道理，指出由于警察主要职责与“人民接近”，其行为直接影响警察形象。因此，“必须具有警察学识品格高尚者”才能胜任这一职务。奉天省以前取录警士“凡文理通顺，体格强健，身家清白者即为合格”；王永江上任后，要求警察录用除有以上资格外，必须毕业于警察专门学校、有警察教练所毕业文凭或素有警政经验，并经过考试“学识相符者始能录取”。^②外县的警务长和省城各署长由一等警官中之成绩最优者选任。如警士陈品一毕业于奉天省警察专门学校，后在安东（今丹东）等处办警务，取得了良好成绩。王永江“久器其才”，适逢辽阳警长出缺，即行优先委任陈为警长。铁岭县警察所所长离职后，王永江查该县第一区区官陈质夫资格相宜，当即委充所长。^③区巡官的选用主要从警官补习所毕业生中录用。1916年警官补习所毕业之警官约有百余名，其中在职警官居大多数，其余各学校或前时私立法政学生补入的学员也为数不少。王永江饬令所属各县知事，如“遇有区巡官等缺，则先由此项人员补充，”从而提高警察素质。^④警务人员选用趋于专业化，有利于规范警政。辽阳警长陈品一上任后，“旬日间将内外

^① 《王处长会议警政》，《盛京时报》1916年11月21日第4版。

^② 《王岷源整顿警政之大计》，《盛京时报》1916年12月13日第4版。

^③ 《铁岭警长易委》，《盛京时报》1917年1月27日第4版。

^④ 《警务处饬用毕业人员》，《盛京时报》1916年12月17日第4版。

事务大加整理，秩序井然。”^①

警察教育是培养专业警察的主要途径。为保证教育质量，王永江对警察教育机构进行改革，将警官补习所及警察教练所合并一处。设置警官班，以 50 人为限。学员来源于各县在职的优秀区巡官。^② 毕业生的考试成绩要造册送入县署考核，由县发给证书。^③ 王永江还在警察教练所采取两级教练制。所有在教练所毕业之警员，如果任职期间服务勤勉，就有机会被选拔进入警官学校，继续学习高等警务知识。再度毕业后即为“记名署长或记名警务长”，实习期满后实行升任。^④ 在省城警察厅带动下，各县也开始注重对警员的培训。营口警察厅召集本埠全体署员巡官考试，其内容为郑家屯交涉之警察权、保甲与警察之利弊、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之关系等。^⑤

（二）严定赏罚

警政的推行以法律为基础，只有每个警员必须熟识相关法律和章程，才能提高警员的行政管理能力。王永江重视考核警员专业能力和道德水平，并将其作为奖惩制的重要标准。他重新编订警员赏罚规则，对于因有劣迹被控待撤的警察酌量更调，其余职员分为勤慎、平庸二种分别考核，区别赏罚。^⑥ 对于各关警署署长、巡官、巡长以及警兵有“未能保护地面者”，王永江通令各警署定期“一律甄别”，^⑦ 作为赏罚依据。当时奉天省赌博风气严重，王永江重新订立缉赌罚令：“无论长官及警士，缉获赌局一处，赏洋 1 元，并以罚金之十分之二提成，以分赏

^① 《辽阳警长得人》，《盛京时报》1917 年 2 月 4 日第 4 版。

^② 《警察所改组招生》，《盛京时报》1917 年 1 月 13 日第 4 版。

^③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59 页。

^④ 《王岷源整顿警政之大计》，《盛京时报》1916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⑤ 《营口警察厅考试巡》，《盛京时报》1916 年 12 月 13 日。

^⑥ 《王处长整顿警务之初步》，《盛京时报》1916 年 11 月 24 日第 4 版。

^⑦ 《王处长将甄别警察》，《盛京时报》1916 年 11 月 25 日第 4 版。

该警署警士”。^① 为保证赏罚之公正性，王永江派视察员调查各县“警务之兴废、警长之优劣、是否图谋改革，”^② 将其作为赏罚的重要依据。1922年王永江改定警察奖励法。奖励法规定：“厅局县区警察巡官以及警长等有剿匪出力者分别给予省制警察各等奖牌。警察奖牌共分五等，是按其劳绩分别授予，没有特别成绩不能逾越等级。”^③

（三）裁员增薪和设置派出所

犹豫警察人员负责调查户口、管理赌博等事务，有些警察利用自身势力庇护非法行为，从而获得一定贿赂。还有的警察直接对民众进行勒索。为防止类似警察腐败现象发生，王永江提出“非予以相当之薪水，不足以养其廉洁”，这与当今“以薪养廉”理念如出一辙。王永江通过裁员为留任的警员增加薪水，他命令警务厅全部人员参加通行考试，“未通过者即行裁汰，所剩余款项，分增于其他各级之留任者，以重养廉而示鼓励”。^④ 各关警署也奉命进行裁减，“城里第一署奉令后现已实行淘汰警察30余名，藉资节省而图改良”。^⑤ 由于王永江倡导，各县纷纷效仿。营口新任警察厅长王莲坡“进行其外勤裁减”。“裁撤总务科长韩作新，以司法科长邹介亭兼充。行政科员杜永新裁去，行政科长刘树藩以科员降用，其科长一席以卫生科长刘绍塘兼代。其翻译刁文明则减发月薪10元”。^⑥

王永江仿照日本办法改革警政，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负责户口调查事宜，以树警务之基础。^⑦ 乡镇也设派出所。一般每县四乡设东西南北四警区，区下设署，署下设派出所，所下设岗，递层管辖。“各乡

^① 《警务处新订缉赌之赏格》，《盛京时报》1917年2月4日第4版。

^② 《视察员回省报告》，《盛京时报》1916年12月10日第4版。

^③ 《改订警察奖励法》，《盛京时报》1922年11月28日第4版。

^④ 《警界裁额加薪》，《盛京时报》1917年2月4日第4版。

^⑤ 《警厅实行淘汰》，《盛京时报》1917年2月14日第4版。

^⑥ 《警厅裁并内勤》，《盛京时报》1916年12月9日第4版。

^⑦ 《王振源整顿警政之大计》，《盛京时报》1916年12月13日第4版。

村民在 50 户以上者即设一岗，200 户以上者即设派出所”。^① 不足 50 户的乡镇，联合几个村设一岗，岗位设于最适中的地点，并设一名“警视员”，随时监督本县四乡警察。派出所的设立，裁撤了大量岗警，推进了裁员增薪。另外，王永江对安奉铁路巡警进行调整。安奉铁路巡警局原设两分局五分所，其统辖办法及驻在地点不免有“偏枯间寂之弊端”。王永江将连山关分所改设分局，抚安分所移驻姚千户屯。^②

二、维护警权与省城社会秩序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军警权责不明，以军权压警权现象成为一种常态。王永江上任后竭力维护警权。当时汤玉麟除了担任奉天省城内驻军第五十三旅旅长一职外，还兼任省城密探队长。王永江认为“缉捕案犯，责属警察，今非战时，何需军探，”并指出侦探在省城“多有敲诈情事”，张作霖当即下令其“侦探勿得出外办案”，^③ 只准许张作霖外出时暗地保护。同时，王永江饬令省城各处所设立的派出所严格执行检查制度，“遇有兵违法，悉绳以严法，无所回避。”汤玉麟因此对王永江“深以为恨”。

奉天省非常重视盗匪的防御机制，“除警甲之外，尚有军队，加之各县联防，其法不能谓之不备”，但是，盗匪依然横行。探求其原因，王永江认为“由于尚未注意盗源之故也，鸦片乃盗匪之根源，赌博乃盗匪之媒介。”^④ 因此，王永江把扫除省城烟赌作为其重要职责。一般平民所设的烟赌很容易被禁止了，而汤玉麟的部属多在省城内开设赌局却难以禁绝。王永江“不揣冒昧，偏欲取缔，”^⑤ 命令部下将罪犯逮捕下狱，

① 《警察所尊令改组》，《盛京时报》1917 年 3 月 18 日第 4 版。

②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 661 页。

③ 《军长旅长作难之索引》，《盛京时报》1917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⑤ 《军警倾轧之原因》，《盛京时报》1916 年 12 月 28 日第 4 版。

严令封闭赌局。汤玉麟纠合军界“反对王氏，力保宋墨、廖钱如二人为警务长。”^① 王永江为维护警权寸步不让，军警之间冲突愈演愈烈。1917年初，汤玉麟部下在西关平康里妓院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汤玉麟向警务处要人并扬言要率兵包围警务处；警务处院内则早已架起一门小炮借以防卫。军警两界冲突结果，王永江获得了张作霖支持，1917年3月汤玉麟被免去旅长职务。军警冲突中警界获得胜利，其重要意义在于肯定了警察在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乞丐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潜在隐患。奉天省每逢隆冬季节，因冻馁而死的乞丐不可胜计。王永江对于此极为注意，命令各署警士无论在任何岗区，只要“遇有老弱乞丐衣裤俱无者，一律送返栖流所，著以衣裤，饮以稀粥”。因此，省城“冻毙人数较他年甚为减少”。^② 新年和春节历来是犯罪案件发生的高峰期。为保证节日期间安宁，王永江饬令岗警“虽系新年，警察有不眠不休保卫人民之责，退班人员不得任意外出，”尤其“不得饮酒以免醉后误事；值班时遇有醉酒人吵闹喧哗者，犹宜妥为保护，送之使归，不得有强暴举动”。^③ 各县警察厅也大力整顿，营口警察厅厅长召集各署队及各科长开全体会议，做出如下决议：禁燃纸炮以防火险；禁止赌博以安良善；整理交通以便行人；警服加章以示尊严；修补厕所以重卫生。^④

清查户籍是警察的重要职责。王永江担任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厅长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尚未参战。王永江为了避免办理德侨的相关手续错乱，及时制定了《保护德侨办法施行细则》，命令各级警署严格遵守。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确定德侨之住所、财

^① 《军警之暗潮》，《盛京时报》1917年2月10日第4版。

^② 《王处长惠及穷民》，《盛京时报》1917年1月16日第4版。

^③ 《警察厅饬年关应注意事项》，《盛京时报》1916年12月30日第4版。

^④ 《营口警厅开全体会议》，《盛京时报》1917年1月10日第4版。

产，责成所在地区官警加意保护，如果警员认为德侨之户口有必要调查时，由该管区所选用适当的调查办法，注意“和平合法，不可稍有侮慢和故意繁扰行为”。第二，将户口调查分为两种，即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直接调查主要内容为户主、亲属和雇佣的姓名、年龄、职业、住所所属的警察区域及门牌号；对于新迁入者除前款项外并应详问其迁来之地及迁入之理由。间接调查事项为生计状况，如所从事职业、所营工商及其他事业、财产状况、与其交往的主要人物，尤其关注“有无大宗物品之输入或输出等”。第三，警员调查户口时必须验明护照。针对没有执照而在本警察区域内确有住所的德侨，限期到警察厅补请登录及相关调查手续，之后再进行审核。德侨由外处迁入省城或由省城迁住他处，“均须索验护照”。^①

王永江对于警政革新“纯取严格主义”，在日常工作中对属员则铁面无私，“将其短处劣迹当场揭出”，因此警员中“一般及时行乐诸分子已咸有戒心”；^②对于警察职责之执行状况，王永江明察秋毫，赏罚分明，警员素质和办事效率得到提高，省城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时人称赞“奉天警务庶几可日臻完善”。

三、整顿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一般是指自上而下推行的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制度，是以家或户为编制的最小单位。清末民初，随着近代警察制度进一步推行，大多省份原有的保甲组织呈现出颓废的趋势。但根基于传统社会的保甲制度并没有被彻底倾覆。尤其乡村传统生活模式并未发生质的变动，“乡村社会组织与结构亦处于复杂多变之中，但社会底层的变化往往不如社会表层那样激烈动荡，多是名变而实未变”。^③奉天省情况也是如此。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2622号卷。

^② 《王永江接任警务之初幕》，《盛京时报》1916年11月15日第4版。

^③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1900 年奉天省城设保甲总局，下设保甲局，四乡各设分局，“抽丁购械使人民自卫”。1910 年，锡良鉴于“地方不靖，正警力不足恃”，提出举办预警。“平时就地训练，以保卫地方，“遇事则协同正警以御寇盗”，预警案经咨议局议复，通知各县遵办。1913 年奉天省政府专设预警课，各县设预警办事处。^① 1914 年，各县预警改为保卫团，设办事员 1 人，参事稽查数人，县知事为保卫团监督。“各村巡警基本上被取消，留存者亦是有名无实”。^② 1918 年，撤销保卫团，改设保甲办公处，置保甲委员一人，裁去参议，改团为区，设总甲长，改保董为保长。甲丁分常备、临时、备补，用抽签法每年抽定若干名，分两班常驻，六个月一更代，其经费按亩捐附收。^③ 奉天省基层政权组织变化频繁，表明了政府为实现有效的地方控制而不断地积极努力探索，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过程的艰难。

如上所述，1918 年奉天省出现了警甲并立局面。奉天省保甲制存在问题也很多，“甲丁人数大县逾万，小县数千，由于不编不练，名册徒存，平日预防几无设施，临时戒备仍须另雇，匪多各县则编成游击队，队丁尽系招募，与保甲性质迥殊，一经遣散，即不为匪，亦游荡失。”^④ 而保甲“在职人员本无薪水，即津贴亦微，自好者不为，愿为者非藉以凌人，即从中渔利……其办理最善各县亦不过虚应故事。”^⑤ 针对这种情况，王永江首先整顿保甲制度，而后逐渐调适警甲关系，最后完成了警甲合一。

^①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44，民治三，保甲，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版，第 3283—3284 页。

^② 江世杰：《里甲制度考略》，商务印书馆，1942 年版，第 6 页。

^③ 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奉天通志》，卷 144，民治三，保甲，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 年，第 3283—3284 页。

^④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27 页。

^⑤ 《奉天全省警甲报告书》（上卷），第 196—197 页。

1922年9月，王永江颁布《奉天保甲试办章程》，指出“保甲为团结人民自卫之能力、发扬全体互助之精神、以保卫公共安宁为宗旨。”^①他从完善保甲组织入手，建立与各级警察机关相对应的保甲网络。保甲组织体系由省、县、保甲区和保等四级构成。省设奉天全省保甲总办公所，设总办、会办各一人，根据省长指示办理全省保甲事宜。保甲总办公所下设第一、二、三科。第一科掌管文牍，保存案卷，收发文件以及会计、庶务事宜；第二科掌管清理户籍、编查丁额以及统计、编辑事宜；第三科掌管训练、防剿、械弹、服装、稽查、考核、恤赏等事宜。此外，还设负责巡视、稽查和训练事宜的视察员10人。办理缮写、印刷事宜的录事长4人、录事12人。为了应付日常杂务，总办公所设差遣队长1人，飞步兵各10人，差弁4人，夫役14人。奉天省各县均设有保甲事务所，根据住户多少，划分为若干个保甲区。每个保甲区设保甲事务分所；每一保甲区下设若干个保，一般以三村或五村为一保，每保设保长1人，保长必须亲自督率所有编练甲丁，主要进行防剿盗匪等训练。保以下设甲，甲设甲长。由于县所辖区域和人口有区别，县分等级。依据县的等级不同，常备丁和临时丁的数量有所不同。一等县常备丁和临时丁各为400人，二等县各为300人，三等县各为200人，四等县各为100人。^②

保甲人员任用也有明确规定。各级保长、甲长都由各级政府遴选委任或批准。除奉天全省保甲总办公所总办、会办由省长委任外，各县保甲事务所所长由该县知事遴选三人，呈请省保甲总办公所总办择一人委任，此人必须籍隶本县，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有军警专门学识，曾充委任职三年以上、或曾任军队连长和警察区官以上，或曾办理保

^① 《保甲章程已颁行》，《盛京时报》1923年1月18日第4版。

^② 参见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428页。

甲、保卫团三年以上。^① 各县的区保长由县保甲事务所所长拟选，呈请县知事委任。

明定奖惩是保证规章制度有效实行的重要手段。王永江明令对于那些管理有方、管辖境内治安情况良好的保甲人员和能够在规定期限内破获盗贼案件的保甲人员以及因缉拿盗匪负伤或毙命的保甲人员，经县知事呈请，保甲总办公所可以酌情给予奖恤。保甲缉匪赏格分为五等，其中以“能破获谋为不轨之乱党教匪者”奖给最多，“能破获悬赏著名之巨匪者”次之。保甲人员因缉匪伤亡，其恤金按照警察恤金条例办理。在规定赏格的同时，奉天地方当局对于失职的保甲人员也规定了惩罚措施。对于保甲人员中“措置乖方、办事不力者”，“境内选出枪案、防卫不力者”，“境内有盗匪隐匿而不能查出拿获者”、“甲丁与盗匪通气而不能查出究办者”、“玩忽公务或遇紧急事故临调不到者”等等，县知事有权要求保甲总办公所酌予惩罚。^②

保甲经费由地方自行筹募，一般“按地亩之多寡照数抽取现已拟订抽取办法，计一等地每日 5 角 5 分，二等地每日 3 角 3 分，三等地每日 2 角 4 分”。^③ 但是一些县区保甲费用“归当地催收，并无规定收捐章程，亦无纳捐票据，以故各区保甲长等任意征收，切饱私囊。近月以来，各县署所接此等控案层出不穷。”为剔除积弊，整顿捐款，王永江通令各县区保甲知照，嗣后保甲捐款统归县署征收，各区保甲不得藉口接济，任意截留。^④ 警甲合一以后，保甲费按亩摊派，每亩收小洋一角，此项收入大县一、二万，小县数千元。夏秋两防抽编临时甲丁，衣食等费仍须摊自民间，有“按亩摊派者，亦有按锄头、按门户摊派者，名目

^①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28 页。

^②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29 页。

^③ 《保甲捐分等抽取》，《盛京时报》1922 年 10 月 24 日第 4 版。

^④ 《保甲捐归县征收》，《盛京时报》1922 年 12 月 19 日第 4 版。

不一，县与县殊，保与保异，全省摊款在四百万以上，但摊派多自地亩，商埠、盐场、林场、参园等，或摊或不摊，无一定之规。”^①

经过整顿，奉天保甲制度趋于规范化，但与治安警察的职能差异甚少。1923年12月王永江合并奉天全省警务处与奉天全省保甲总办公所于一处，改名为奉天全省警务处兼警甲总办公所，简称处所，在省一级实现了“警甲合一”。

“警甲合一”后，取消了奉天全省保甲总办公所的原有机构，而由奉天全省警务处取代，由警务处长兼保甲总办；处所分设四科，同时办理警甲事务。如第一科承办警甲官吏之考绩、黜陟、迁调、委任、请奖、编制、统计等事宜；第二科承办警甲官员违法被控、管理外侨等事宜；第三科承办警甲剿匪、请恤、修理枪弹、考核盗案等事宜；第四科承办警甲预决算、勤务、防务等事宜。处所设视察长一人，视察员若干人，担负对全省警甲的视察任务，如警甲的编制、教练、服务、服装、枪弹、经费的使用、器具的分发及保管等等。^②

“警甲合一”改变了保甲“除摊派外少会议、除催款外无工作”状态，警甲之间分行责权。保甲原来作为民间自卫机关，主要补助警察之不足，并无明文规定责任。鉴于“各县警察办理行政司法事宜，已属事多人少，更兼辑匪，实有难周。而保甲不负辑匪之权责，于补助防范，每多敷衍，且有侵及警察权限之事，因此警甲办事联络，责任分行，行政司法事宜，由警察负责，辑捕事宜保甲负责，惟仍须随从警察之指挥”。^③

从撤销地方保卫团改编为保甲，到整顿保甲制度，直至奉天省“警甲合一”，王永江的警政改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奉天省地方政府在不断寻求最适宜自身需求的社会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警甲合一”实质

① 《奉天全省警甲报告书》（上卷），奉天作新印刷局，1925年版，第196页。

② 《奉天全省警甲报告书》（上卷），奉天作新印刷局，1925年版，第3~6页。

③ 《警甲分责之筹划》，《盛京时报》1923年1月18日第4版。

是警察直接控制保甲，保甲完全依附于警察，强化了警察力量，同时也体现了在中国传统体制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体制文化资源双重作用下传统与现代化因素的统一。

总而言之，奉天省区村制的推行和警甲合一制度的确立，是省地方政府权力强化与扩大的产物。王永江立足于奉天省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对社会基层组织进行适度变革，在城乡建立起了组织严密的基层行政管理机制，弥补了省政府在乡村社会贯彻力量不足的缺陷，发挥了稳定城乡社会的作用，推动了地方行政的早期现代化，同时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保持了相对有序的社会状态。

结 论

1920年代，华夏文明在世界的中心地位早已经旁落，中国从世界文明中心衍化为西洋文明的边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特有的纷繁复杂的局势。钱乘旦曾这样描述：“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这样，它把人们带向未来。这个未来虽依稀可见，但通往未来的路上却布满陷阱。许多国家在陷阱中栽下去，更多的国家却仍然在走上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看到这种现象：旧的问题尚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旧社会的弊病尚未完全克服，新社会的弱点却已经显现。”^① 近代东北地区由于日俄势力的渗透，局势更为复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更加艰难。这给王永江提供了展示其才能的空间。从1916—1926年十年间，王永江历任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厅长、省财政厅厅长和奉天省代理省长等职。在任职期间，他“博访周諮，不守故常，创法立制，胥有精义。立东北大学、造沈海铁路、设奉天纺纱厂，行区村制、辟修公路，皆匠心独运，开东省未有之局，”^② 建立了“保境安民”的奉天省区域现代化的模式，成为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主要设计者。综合考察王永江所推行的早期现代化政策和措施，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全面性

在奉天省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王永江最初涉猎警政和财税金融改

^① 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2页。

^② 金毓黻：《王永江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革，取得了良好成效，也积累了丰富的阅历经验。担任代理省长后，他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早期现代化的范围扩大到农业、工商业、交通、教育、城市和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与此同时，随着王永江自身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他开始尝试通过修建奉海铁路、筹建东北大学和建立奉天纺纱厂等直接参与早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王永江借助于示范效应，引导各阶层的民众参与到早期现代化中来，形成官和民之间、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从而带动了奉天省的早期现代化向全方位纵深发展。

第二，具有可行性

王永江被誉为奉系政坛的核心人物，但日本人对其评价却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① 一方认为他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一方认为他是“日满一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者。”^②这种悖论源于他通过发展实力来抵御外侮、争取民族利权的思想。民族主义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但在时机不成熟时，王永江选择忍耐和等待。无疑，王永江拥有爱国热情，他在南金书院任职汉文教员时，因为不满日本不准中国学员业余读中国书籍而辞职。1923年王永江回金州过春节时，曾对家乡父老说：“金州本属奉天省，现25年租期已到，仍未归还，家乡仍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余身为省长，实感惭愧。”^③ 1924年2月，王永江根据中俄条约向关东厅要求收回关东州对于中国人之司法权。^④但是，3月1日，《晨报》又对此事澄清，“此案并非王省长之意，不但其提出手续有错误，且应充分加以研究。”^⑤因此，奉省当局已向奉天日总领事馆撤回此案。田岛富穗以此为论据，认

^① [英]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页。

^② [日] 田岛富穗：《王永江》，满洲公论社刊，1944年版。

^③ 张凯程，谷庆福：《关于王永江》，《金州博物馆馆刊》，1990年1月第22页。

^④ 《奉天要求收回关东州司法权》，《晨报》，1924年2月22日第2版。

^⑤ 《奉天撤回金州法权收回案》，《晨报》，1924年3月1日第3版。

定王永江是“日满一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者。”其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撤回议案是王永江无奈之举。就当时东北形势而言，“张作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许多方面，都比张所拥有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①王永江必须在这个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抉择。权衡利弊，他选择了屈服。人类渴求公理，而公理需要实力作为后盾，离开实力而向日本谋求正义，无异于与虎谋皮。王永江对此有了更深刻认知。他在一次设宴招待东北大学教授时说：“我们做事应当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譬如我们人民生活，不能不穿衣服，但自己没有纺纱厂，就不能不买外国布匹；我们有铁路，但是自己不能造机动车，自然需要向外国购买；我们要办工厂，自己没有工程师，不请外国工程师，机器就不能安装，不能转动；我们想彻底抵制日货，根本办法需要自己有，自己有了就不需要向外国购买了。所以几年来我们设纺纱厂，修沈海铁路，办东北大学，又办大学工厂。自己造就人才，自己造机关车。几年后人才有了，一切东西自己能生产了，虽不抵制外货，外货自然也就不能在我国推销了”。^② 可见，王永江已经意识到只有改变自身畸形的经济结构，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才能摆脱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这与通过建立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以达到加快现代化进程和减少对国外经济依附的“进口替代”^③ 战略不谋而合，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

总之，王永江在推进奉天省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效。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就，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①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② 安文溥，陈国庆《九一八前的东北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7页。

③ 是指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的目的出发，减少或完全消除某种产品的进口，国内市场完全由本国生产者供应的政策。参见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首先，王永江探寻到了比较适合奉天省情的早期现代化的途径

1920年代是中西文化整合的时代，王永江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承续华夏传统价值观念，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鉴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组织管理或技术层面上，都较为先进。王永江主张通过直接的模仿或借用来迅速地推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探索过程，以期在最短时间内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他把借用西方文明的思想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实行，如在创办奉天纺纱厂时，先后从美国购进纺织机200架，纺织锭2万锭，并特聘留学欧美、日本的专门人才为工厂技师，主持纺织及机修事务；举办东北大学时，亲自给奉天省留美学生孙国封去电，让他“就近将美国学校学制宜于吾国者，详密调查，加具意见”；^① 大学创办后，他采纳了当时西方先进的学分制教学管理；筹建东北大学工厂时，大部分仪器和机械都从德国购买；他尤其强调奉天省的办学要“钻研西学，取人之长，补我之短。”^② 留美农科硕士生张鸿钧积极引进西方先进农具，创办忠义农场，王永江本人不仅大力支持而且训令各县知事大力推广。总之，王永江借用西方文明，以开放的心态寻求吸纳西方新元素，加速了奉天省早期现代化进程。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③ 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是社会变革过程，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不可能轻易改变自己的特性而去完全接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理念，世世代代积淀而成的传统无法被断然割舍。因

^①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② 辽宁省图书馆藏：《奉天公报》，第4586号。

^③ [美] E. 希尔斯著，傅铿等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此，王永江在追求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倡承续传统价值观念。他“尚俭德”，提倡俭以养廉，要求县知事“倡朴素之风”，承担训诫地方“奢侈恶习”的责任，藉此促成整个社会“贫而知俭，富不奢而好义”的良好风尚。^① 民族习俗是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王永江注重优良传统习俗的传承，提出“冠婚、丧葬之礼，岁时祭祀之仪、事亲敬长之规，敦族睦邻之道，合乎礼者务必予以保存。”^② 他还十分重视国学，认为奉天省“文化素称薄弱”，^③ 不仅近代科学技术薄弱，而且传统文化底蕴也相当匮乏，因而提出“应采取他人之特长，尤应保存自有之美质”。^④ 可见，王永江把传统道德教育作为“立国立教之大本”和维持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但并非彻底排斥西学，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将两者兼容并蓄。总之，王永江对传统文化是一种“开明的固守”，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中，他审时度势，较好地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其次，王永江较好地处理了与张作霖的关系，为推行奉天省早期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在任何政治制度下，个人和集团的能力、行动和目标都受物质资源的制约。在军阀林立的状态下，这种制约演变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奉系军阀需要财力维持庞大的军队，付津贴、供伙食以及装备自己，尤其需要金钱来满足不断上涨的战争消费和补充战争损失。另外还需要金钱作为外交经费。^⑤ 张作霖需要通过发展地方经济来发掘社会财源。王永江以其出色的才能和 1922 年拒绝就任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奉天省省长职务，获得张作霖的充分信赖，从而为自己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②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4060 号卷。

③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818 号卷。

④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 2798 号卷。

⑤ [美]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1 页。

力空间。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称王永江与张作霖“以气类之相感，治奉十年，言听计从，一若王猛之与符坚。虽云凶终隙末，未能全其始终，亦遇合之足称者矣。”^① 诸多史料也印证了这一点。王永江初任奉天省警务处长时即提出“任用各县警务长事，不必求省长同意，他如警费支配、警额之分布亦随意办理，”^② 得到张作霖的应允。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王永江与张作霖达成了一项谅解：王永江可以不受阻挠地掌管奉天省民政。^③ 虽然两者间还“时有意见冲突，但在行事上则双方均能谅解，……张氏对于王氏之行政上取不干涉主义。”^④ 时人称誉王永江是有实权的省长，以致于传出这样歇后语：“王永江进门，高人一等”。由于王永江较好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这一时期全面推进奉天省早期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透过王永江在奉天省推行早期现代化的政策措施，放眼中华近代社会的沧桑巨变，我们能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政府政策的实施对现代化的进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及时而正确的决策将迅速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进程；错误的决策则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甚至延误和丧失某些不复再现的绝好机遇。^⑤ 然而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人可以借助于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影响各种政策的施行。因此，如何最大限度挖掘政府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潜力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是当前国家有关部门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

① 金毓黻：《王永江别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② 《王永江受任》，《盛京时报》1916年11月11日第4版。

③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张作霖在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④ 《岩间德也之王省长成绩谈》，《盛京时报》1923年8月4日第4版。

⑤ 朱英等：《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4—5页。

其二，我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必须在政府的合理部署和统一领导下协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从而避免为追求本集团或本地区局部利益采用短期行为和造成本地区现代化建设的畸形性发展，使国家整体现代化处于上下冲突的和无序自发的状态。因此，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注重政府合理进行资源配置的职能建设，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引进外国技术和本国的有限资源和建设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可以通盘衡量轻重缓急，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局部利益和全局结构。

其三，每个国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基础和民族传统的差异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些具有特色的东西。^①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立足于本国，扬弃传统文化，坚持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统一，才能最后走向成功。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承载者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具有自身发展的潜质。所以，我们应当从民族的内部探寻现代化最基本的生长力量。外在的压力等因素固然可以对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是，这种外在的影响因素存在一个转换为内生力或是内部阻力的内化问题。外在的因素一旦经过内化的处理，其“外在”的意义已不复存在，而成为该民族内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② 开放性是现代化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特质，开放能提供必要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启动一个民族的原动力，使本民族的现实能量及潜在能量得以持续不断地生成，同时从其他民族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照，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民族性和开放性和谐统一，必然赋予中华文明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而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① [匈]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② 吴忠民等：《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参考文献

中文报刊、档案和民国地方志

- [01] 盛京时报 [N]. (1916—1922)
- [02] 奉天公报 [N]. (1916—1926)
- [03] 满洲日日新闻 [N]. (1922—1924)
- [04] 晨报 [N]. (1922—1926)
- [05] 东方杂志 [N]. (1922—1925)
- [06] 奉天省公署档案全宗 [Z]. (1916—1926)
- [07] 沈阳县志 [Z]. 1917 年铅印本
- [08] 新民县志 [Z]. 1924.
- [09] 海城县志 [Z]. 1924.
- [10] 兴城县志 [Z]. 1925.
- [11] 岫岩县志 [Z]. 1928 年铅印本.
- [12] 开原县志 [Z]. 1929 年铅印本.
- [13] 辽中县志 [Z]. 1930.
- [14] 铁岭县志 [Z]. 1931 年铅印本.
- [15] 丹东县志 [Z]. 1931.
- [16] 营口县志 [Z]. 1935 年油印本.
- [17] 海龙县志 [Z]. 1937.
- [18] 奉天通志 [Z]. 1983.

中文编著

- [01]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 《东三省经济调查》[C]. 1919.

- [02] 袁文编. 东北铁路问题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23.
- [03] 辽宁省图书馆藏. 奉天省税则汇编 [Z]. 1925.
- [04] 侯树彤. 东三省金融概论 [M]. 上海: 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 1931.
- [05] 东北文化社编印处. 东北年鉴 [Z]. 沈阳: 东北文化局社, 1931.
- [06] 稻叶岩吉. 满洲发达史杨成能译沈阳东亚印刷株式会社奉天支店, 1940.
- [07] 朱惠方, 董一臣. 东北垦殖史 [M]. 国立长春大学农学院丛书, 长春从文社, 1947 年版。
- [08] 东北物质调节委员会研究组. 东北经济小丛书 农产 [M]. 北京: 京华印书局, 1948.
- [09]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二辑 [C]. 上海: 三联书店, 1957.
- [10] 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一辑 [C]. 上海: 三联书店, 1957.
- [11] 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 [12] 孔经纬. 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
- [1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辑室.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4] 朱传誉主编. 张作霖传记资料第 3 册 [C].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79.
- [15] [苏] B. 阿瓦林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 帝国主义在满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16] 薛暮桥. 旧中国的农村经济 [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0 年重印版.

- [17]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18] 王奉瑞. 东北之交通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2. (影印本)
- [19] 彭泽益. 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财政与经济 [M]. 人民出版社, 1983.
- [20] 许道夫.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和贸易统计资料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21] 王家俭. 清末民初我国警察近代化历程 (1901—1928)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4.
- [22] 辽宁省档案馆编. 奉系军阀密电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3] [日] 永井道雄著, 王振宇, 张葆春译. 近代化与教育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 [24]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5] 金毓黻. 辽海丛书 [Z]. 辽沈出版社 1985年影印版.
- [26] 吴承明, 许涤新.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27] 辽宁文史资料选辑. 第12辑, 第1辑, 第8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
- [28] 金士宣, 徐文述. 中国铁路发展史 (1876—1949) [M]. 北京: 中国铁路出版社, 1986.
- [29] 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学会. 东北地区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 [M]. 1987
- [30] 周谷城.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 [31] 宋则行. 中国人口 辽宁分册 [Z].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 [32] 郑庆平, 岳深.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概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

- 大学出版社，1987.
- [33] 王振乾等编著. 东北大学史稿 [M]. 长春：东北大学出版社，1988.
- [34] [匈] 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突进与和谐的增长 [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 [35] [英] 加文·麦柯马克著，毕万闻译. 张作霖在东北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 [36] [日] 满史会著，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 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下卷）[M]. 营口：辽宁省营口县商标印刷厂，1988.
- [37] 张福全. 辽宁近代经济史（1840—1949）[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 [38] 中国东北地区货币编辑组. 中国东北地区货币 [M]. 1989.
- [39] 孔经纬，傅笑枫. 奉系军阀官僚资本 [M]. 长春：吉大出版社，1989.
- [40] 高汉显. 铁岭市公路运输志 [Z]. 铁岭：铁岭县文昌印刷厂，1989.
- [41] [美] 爱德华·罗斯著，秦志勇、毛永政等译. 社会控制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42] 衣保中. 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43] 乌廷玉等. 东北土地关系史研究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44] 苏崇民. 满铁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5] 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 辽宁教育史志资料 [C].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 [46]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 北洋军阀：1912—1928 [Z].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 [47] 辽宁省档案馆编.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 [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港地平线出版社, 1990.
- [48] 李林, 汤建中. 北镇满族志 [Z]. 沈阳: 辽沈书社, 1990.
- [49] 王旭等译.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 [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 [50] 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 沈阳满族志 [Z].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 [51] 王长富. 东北近代林业经济史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1.
- [52] 姜宏业主编. 中国地方银行史 [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1.
- [53] 薛虹, 李澎田. 中国东北通史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 [54] [美] 齐锡生, 杨云若译. 中国的军阀政治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91.
- [55] 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编委会. 沈阳市公路公共交通史 [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2.
- [56] 齐红深主编: 东北地方教育史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
- [57] 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 [M]. 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58] 章开沅, 罗福惠主编. 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59] 王晓华, 李占财. 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 [M]. 郑州: 河南出版社, 1993.
- [60] 张志强. 沈阳城市史 [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3.
- [61] 赵锡安等主编. 东北银行史 [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 [62]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近代史资料第总 83 号, 89 号 [Z].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63] 政协大连市金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王永江纪念文集 [C]. 大连: 大连出版社, 1993.
- [64] 刁书仁, 衣兴国. 东北旗地研究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 [65] 刘景玉, 智喜君. 鞍山城市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 [66] 朱荫贵. 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4.
- [67] 许纪霖, 陈达凯主编.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 [68] 汤士安主编. 东北城市规划史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 [69] 沈玉成主编. 本溪城市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 [70] 齐红深, 魏正书主编. 东北教育家评传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 [71] 张文汇, 张宝纯主编. 本溪金融志 [Z].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 [72] 周积明. 最初的纪元: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73] 耿丽华, 陈崇桥. 张作霖真传 [M]. 沈阳: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 [74]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 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 (1913—1948) [C]. 1996.
- [75] [英] 罗素著, 秦悦译. 中国问题 [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6.

- [76] 江沛. 二十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 [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 [77]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M]. 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78]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续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79] 沈阳铁路局志编纂委员会. 沈阳铁路局志 (1891—1995) [Z]. 1997.
- [80] 李喜平主编. 辽宁教育史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8.
- [81] 郑树模主编. 辽宁税务志 [Z].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 [82] [日] 水野明著, 郑梁生译. 东北军阀政权研究: 张作霖·张学良之抗外与协助统一国内的轨迹 [M].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98年.
- [83] 吴晓松. 近代东北城市建设史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 [84] [美] 弗朗兹·博厄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85] 何炳棣著, 葛剑雄译.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 [86] 衣保中. 中国东北区域经济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 [87] 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88] 辽宁国家税务局编. 辽宁税收历史资料选编 (1840—1948) [C].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89] 曲晓范. 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 [M]. 长春: 东北师大出版社 2001.

- [90] 虞和平主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91] 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1.
- [92] 戴建兵. 中国钱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93] 洪硕管主编. 中国金融史 [M].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 [94] 胡玉海, 张伟. 奉系人物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1.
- [95] 苑书义. 中国近代化历程研究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96] 胡玉海. 奉系人物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1.
- [97]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98] 杨佩桢等编著. 东北大学八十年 [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3.
- [99] 辽宁省统计局编. 辽宁工业百年史料 [C]. 辽宁省统计局印刷厂, 2003.
- [100]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中国的近代化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101] [日] 速水次郎, 李周译. 发展经济学: 从贫困到富裕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02] 马大正. 中国东北边疆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03] 吴忠民等. 发展社会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104]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5] 陈佳贵. 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06] 张新颖. 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比较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107] 文斐. 我所知道的张作霖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 [108] 徐秀丽. 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汇编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09] 马尚斌. 奉系经济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5.
- [1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文集第三卷 [A].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11] 郭建平. 奉系教育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5.
- [112] 车维汉. 奉系对外关系 [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5.
- [113]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 辽宁省志 政府志 [Z].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5.
- [114] 辽宁省图书馆藏. 东三省经济实况要览 (1—3 册) [Z].
- [115] 辽宁省图书馆藏. 奉天省警甲报告书 [Z].
- [116] 辽宁省图书馆藏. 东北要览 (1—3 册) [Z].
- [117] 辽宁省图书馆藏. 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兼屯垦局报告书 (下卷) [C].
- [1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西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丰文史资料 [Z]. 第 1 辑.
- [119]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下册) [C].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文期刊

- [01] 孔经纬. 清代民国时期东北社会经济的演变 [J]. 史学集刊, 1982 (04).
- [02] 赵守仁. 王永江与东北大学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1986 (03)
- [03] 陈崇桥. 奉系军阀与知识分子 [J]. 辽宁大学学报, 1986 (03).

- [04] 高乐才. 王永江评传 [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1990 (01).
- [05] 李辉, 里蓉.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J]. 档案工作, 1991 (11).
- [06] 陈崇桥, 车维汉. 张学良将军与教育 [J]. 社会科学辑刊, 1991 (05).
- [07] 沈毅. 略论近代大连城市的产生 [J]. 历史教学问题, 1992 (01).
- [08] 郑言. 打通铁路建设与中日交涉 [J]. 日本研究, 1992 (02).
- [09] 马文良. 东北大学与张学良将军 [J]. 辽宁大学学报, 1993 (05).
- [10] 郭建平. 王永江代省长治理奉天 [J]. 兰台世界, 1993 (01).
- [11] 衣保中. 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 [J]. 中国农史, 1994 (01).
- [12] 苏甫, 解传路. 中国东北地区近代教育概述 [J]. 普教研究, 1994 (02).
- [13] 卢海燕. 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 [D].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94.
- [14] 吴晓松. 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 [J]. 城市规划汇刊, 1995 (02).
- [15] 吴晓松, 王丽尔. 近代东北工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J]. 城市规划汇刊, 1995 (04).
- [16] 刘志超. 张作霖也知道重视教育 [J]. 辽宁大学学报, 1995 (02).
- [17] 吴晓松. 交通拓展与近代东北城市建设 [J]. 城市规划汇刊, 1996 (03).
- [18] 楚双志, 马平安. 关于近代东北移民问题的几点看法 [J].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96 (02).
- [19] 董伟, 赵丽明.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J]. 民国春秋, 1996 (1).

- [20] 衣保中. 论东北时期东北民族资本的三种形态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 (05).
- [21] 毛英萍.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的农业经济政策 [J]. 北方文物, 1997 (02).
- [22] 衣保中, 吴祖鲲. 论东北农业近代化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7 (01).
- [23] 陈毓述. 试论东北交通委员会抵制满铁的业绩 [J]. 绥化师专学报, 1997 (03).
- [24] 耿丽华. 王永江与东北大学 [J]. 教师博览, 1997 (04).
- [25] 储成仿. 中国工业化起点探析——“一五”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 [J]. 天津商学院学报, 1998 (06).
- [26] 魏芙蓉, 张锐. 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 [J]. 东北亚论坛, 1998 (04).
- [27] 吴祖鲲, 富萍. 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J]. 长白学刊, 1998 (03).
- [28] 齐春风. 略论近代东北地价的变迁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 (04).
- [29] 葛玉红. 东北近代工业的形成和发展 [J]. 宁大学学报, 1999 (01).
- [30] 苏晓轩. 论 1912 年至 1931 年东北民族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J]. 辽宁大学学报, 1999 (04).
- [31] 王杉. 二十年代东北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 [J]. 史学月刊, 1999 (06).
- [32] 王杉. 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 [J]. 民国档案, 1999 (02).
- [33] 李淑云.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铁路建设 [J]. 辽宁大学学报, 1999 (03).

- [34] 王贵忠. 20年代中国东北自建铁路的管理方针与政策 [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01).
- [35] 李淑云. 铁路交通与东北近现代经济发展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04).
- [36] 申桂兰.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 [J]. 党史纵横, 1999 (4).
- [37] 何又春. 奉张统治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经济的侵略 [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02).
- [38] 智喜君. 有关东北地区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 [J]. 北方文物, 2000 (02).
- [39] 王晓峰. 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 [J]. 东北亚论坛, 2000 (04).
- [40] 衣保中、林莎. 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J]. 东北亚论坛, 2001 (04).
- [41] 周春英. 试论近代关内移民对东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J]. 济南大学学报, 2001 (02).
- [42] 曲晓范, 李保安. 清末民初东北城市近代化运动与区域城市变迁 [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04).
- [43] 王杉. 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1 (03).
- [44] 王杉. 民初东北乡村移民探析 [J]. 社会科学辑刊, 2001 (03).
- [45] 周春英. 试论近代关内移民对东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J]. 济南大学学报, 2001 (02).
- [46] 王杉. 20世纪20年代东北城市移民管窥 [J]. 绥化师专学报, 2001 (09).
- [47] 鲁岩. 论王永江的治奉思想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03).
- [48] 何一民, 易善连. 近代东北区域城市发展述论 [J]. 史学集刊,

2002 (03).

- [49] 尹虹. 安奉铁路改筑始末 [J]. 党史纵横, 2002 (12).
- [50] 瑞丽华.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2 (03).
- [51] 郭建平. 奉系军阀时期奉天的职业教育 [J]. 兰台世界, 2002 (11).
- [52] 古小丹. 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 [J]. 兰台世界, 2002 (6).
- [53] 葛洪源, 吕健. 论王永江的霸王思想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2 (01).
- [54] 姚会元.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 [J]. 中国钱币, 2002 (04).
- [55] 王德朋, 华正伟. 论奉系军阀经济力量的构成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2 (02).
- [56] 董昕. 著张作霖统治时期东北货币金融概况与分析 [D].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2.
- [57] 宋燕. 日俄战后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及后果 [J]. 东北亚论坛, 2003 (05).
- [58] 何一民, 易善连. 近代东北城市殖民地化的进程及特点 [J]. 社会科学辑刊, 2003 (01).
- [59] 侯文强. 张作霖、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 [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3 (03).
- [60] [美] 薛龙. 王永江与东三省官银号的重组 [J]. 史学集刊, 2003 (01).
- [61] 王续添. 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意识 [J]. 教学与研究, 2003 (05).
- [62] 周春英. 近代东北三省关内移民动态的分析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4 (02).

- [63] 宋金玲, 刘素范.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满铁 [J]. 北京交通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09).
- [64] 杨小红. 从铁路政策看东北地方政府的治边思路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4 (05).
- [65] 张伟. 东北自建铁路面临的难题与财政难题的破解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4 (05).
- [66] 尹英杰. 中国东北自有铁路的建设 [J]. 绥化师专学报, 2004 (07).
- [67] 王海晨. 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自办铁路的意义 [J]. 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03).
- [68] 胡玉海. 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4 (03).
- [69] 继英. 王永江与奉海铁路 [J]. 中国地名, 2004 (06).
- [70] 李银涛. 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鼠疫研究 [D]. 河南大学, 2004.
- [71] 王冠鸿. 张作霖对日外交评述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4.
- [72] 李明明. 论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D].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4 年.
- [73] 石建国. 东北工业化研究综述 [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5 (05).
- [74] 衣保中. 近代东北地区林业开发及其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03).
- [75] 许桂清, 许丽芬. 民国时期辽宁私立教育发展原因探析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4).
- [76] 王志彦. 1923—1931 年间东北大学的院系设置及教学模式 [J].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5 (03).
- [77] 李巨澜. 略论民国时期的区级政权建设 [J]. 史林, 2005 年 (01).
- [78] 李巨澜. 略论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控制结构的失衡 [J]. 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 2005 (06).

- [79] 尹英杰. 略论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铁路投资及影响 (1905—1931) [D].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5.
- [80] 田俊峰. 东三省官银号研究 (1905—1932) [D].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5.
- [81] 张欣. 军阀政治与民国社会 (1916—1928 年) [D].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5.
- [82] 谭玉秀, 范立君. 从市场发育等角度对近代东北城市化的分析——以奉天东部为例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6 (02).
- [83] 范立君, 黄秉红. 清末民初东三省移民与近代城镇的兴起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01).
- [84] 王国臣. 近代东北地区大豆三品贸易研究 [J]. 农业经济, 2006 (09).
- [85] 王国臣. 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J]. 人口学刊, 2006 (02).
- [86] 衣保中. 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 [J]. 中国农史, 2006 (02).
- [87] 陶俐. 张作霖与奉海铁路 [J]. 兰台世界, 2006 (04).
- [88] 常江. 实用实利的奉系职业教育 [J]. 辽宁大学学报, 2006 (06).
- [89] 杨天宏.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6 (05).
- [90] 朱兰英. 二十世纪辽宁地区的职业教育 [J]. 辽宁师专学报, 2006 (03).
- [91] 杜臻. 近代山东移民对东北文化的影响 (1860—1911) [D]. 山东大学, 2006.
- [92] 鲁卫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官僚构成研究 (1916—1928)

- [D].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6.
- [93] 金泽璟. 清末东北奉天警察制度研究 [D].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6.
- [94] 王广义. 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研究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 [95] 陈楠. 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 [96] 陈宇. 奉系军阀 1926—1927 年的财政金融改革 [D].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7.
- [97] 董师嫡. 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 [D].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 [98] 徐振. 民初奉天实业教育研究 [D].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8.

外文资料

- [01] 满铁调查课. 满蒙の大势 [M]. 第 2 卷, 1918.
- [02]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蒙全书 (第三卷) [M]. 1923.
- [03]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 南满洲三港の中继贸易 (1921—1923) [M]. 大连满铁发行, 1924.
- [04] 鞍山地方事务所编纂. 辽西事情 [M].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行, 1925.
- [05] 奉天票と东三省の金融 [M].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26.
- [06]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 支那の戎克と南满の三港 [M]. 大连满铁发行, 1928.
- [07]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兴业部商工课. 对满贸易の现状及将来—我国对满输出贸易の促进及在满邦商の发展策に関する调查报告书 (上卷) [M]. 大连满铁发行, 1928.
- [08] 奉天省の财政 [M].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28.
- [09] [日] 田岛富穗. 王永江 [M]. 满洲公论社刊, 1944.
- [10] 陆军参谋本部. 满蒙资源要览 [M]. 日本东京, 1932.

- [11]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农务课. 满洲未来农业 [M]. 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35.
- [12] 铃木小兵卫. 满洲の农业机构 [M]. 长春白杨社, 1937.
- [13] 篠崎嘉郎. 大连营口两港に於ける支那沿岸贸易 [M]. 大连满铁发行, 1937.
- [14] Ronald Suleski,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 [J]. Modern China, October 1978.
- [15] Ronald Sulesk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engtian Dollar, 1917—1928: Currency Reform in Warlord China, Mordern Asia Studies, [3, 4] (1979).
- [16] Ronald Suleski, Northeast China Under Japanese Control [J]. Modern China, July1981
- [17] Ronald Suleski,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churia anbibography [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94.
- [18] 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tradition Modernization of Manchuria [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996.

附录一

王永江年表

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壬申）1岁

2月 17 日（正月初九日）寅时，生于金州城南门内路西。祖父作霖，父克谦，母邱氏。

清光绪七年（1881 年辛巳）10岁

3月，入蒙塾。8月，塾师杨朴卒，仅得从读六个月。

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乙酉）14岁

祖母许氏捐馆于金州。

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丁亥）16岁

试应南金书院月课，稍稍知名。

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戊子）17岁

值县试，同试者二百余，以最幼年龄名列榜首，而金州厅海防同知马宗武以“年幼尚有待”定为第二名。

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辛卯）20岁

参加厅学考试，金州厅海防同知谈广庆（云浦）亲自校卷定为案首。

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壬辰）21岁

入泮。科试又取第一。及秋，得补廪食饩。是年 11 月，娶本城曹氏第五女为妻。

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癸巳）22岁

进京应癸巳恩科乡试落第。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甲午）23岁

应甲午正科乡试落第。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城。率眷避居青岛。冬，女端云出生。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24岁

秋，率眷避难于山东烟台，后移居于北京东四牌楼门楼胡同。同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25岁

春，清廷派员接收旅大。二月，随父克谦携眷归故里。与弟永潮赴省就试。夏，弟永潮以府案入泮。冬，赴省城应丁酉拔贡试，因被人诬告行为不端而落第。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26岁

入省赴考不第，回金州后，在城内设童子塾。同年，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湾）地区，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依约，仅遗金州一城，归清廷管辖。光绪皇帝任用康有为等人实行新政。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28岁

与弟永潮同举优行。弃塾师业。同年，慈禧太后“训政”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29岁

与弟永潮同赴省秋闱。永潮获优贡，水江仅被注册教职。义和团运动兴起，俄兵进占奉天省城。与弟永潮从省城步行19天才回到金州。同年，俄军突袭并占领了金州城，至此，旅大地区完全落入沙俄之手。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30岁

有感于古训“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广购医书，潜心研究中医。是年，清政府与各国议和，签订了《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31岁

弟永潮优贡朝考一等，以知县用签分直隶。为不拂弟意，称贷戚友

以资之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癸卯）32 岁

设“采真堂”药房于旅顺口。8 月，子贤泌（嗣源）生。

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甲辰）33 岁

时疫流行。任时疫病院院长，设病院于旅顺孙家沟山上。入其病院者十活六七。是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竟然宣布“严守中立”。“采真堂”药房遭兵燹。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乙巳）34 岁

“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成立，被推为监理。

是年冬，次子贤伟（幼源）生。。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丙午）35 岁

继续义务为“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服务。

同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又设置“关东都督府”，对旅大实行殖民统治。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丁未）36 岁

承母命，往保定府探望弟永潮，旋赴京贷三百金子弟。劝弟弃官归里，未果。乃独自归奉天。同年，东北三省改制，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行省，各设巡抚，盛京将军改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5 月，应辽阳袁金铠邀，为辽阳警务学堂教习。9 月，弟永潮卒于保定府。遂赴保定料理丧事，载柩归里，途中备尝艰辛。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戊申）37 岁

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被委以辽阳巡警总局局长之职。就职未及 2 月，因知州欧阳翥贪暴，愤而辞职归里。4 月，三子贤灝（少源）生。

宣统元年（1909 年己酉）38 岁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欧阳翥因贪暴而被 职。洪汝冲任辽阳知州，邀其襄办警政。

宣统二年（1910 年庚戌）39 岁

任辽阳警务长。冬，东北鼠疫大流行，漫及辽南。因明瞭医学，被委以防疫委员长，糜资甚少而成效最大。事毕，当局拟保以知县，但须交纳“部费”百元。以“耻于此次奖案”而谢之。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40岁

遵照新规定，以优贡在部注册，补用知县候补府经历。被委任以整顿营口警务。4月，东三省总督锡良保奏，破格以知县分省补用，获批准。

5月，赵尔巽再任东三省总督。6月，委以调查奉省新政。赵尔巽电奏破格录用知府存记，并加五品衔。又命其招募新兵三营。

10月，保安会成立，委以内政部副部长未就，又调以军械局总办，亦坚辞。旋改委民政科参事兼秘书厅秘书员。同月，辛亥革命事起。

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41岁

1月，铁岭被革命党占领，奉檄以南路巡防管带收复。革命党闻声宵遁，遂代理知县三日。旋回民政科任参事。中华民国成立。

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务，北洋军阀开始统治中国。赵尔巽任奉天都督。4月，国民政府任命为署理奉天民政使，因故坚辞未就，假归修墓。同月，四子贤澐（小源）生。

9月，赵尔巽复委以署理兴凤道尹。11月，辞职挂冠，径回故里。被人笑为“百余年，官场无此行径”。自号“老铁山人”。

民国二年（1913癸丑）42岁

2月，与袁金铠同赴青岛考察德人在青经营情况，并问候赵尔巽。赵力劝出山，并给袁世凯等人写了推荐书。同月，由青岛归里。被奉省推荐为人才，大总统袁世凯召见问话，袁特令为“记名内务部存记道尹，着国务院备案。”归省后曾历任辽阳、康平、海城、牛庄等地的税捐局长。

民国四年（1915年乙卯）44岁

任奉天省城税捐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屯垦局长等职，始以“干

“练”知名。

民国五年（1916年丙辰）45岁，

4月，任奉天督军署高级顾问，获张作霖的信任。11月，任奉天全省警务局长兼警察厅长。厘订规章，严督部下，按章办事，雷厉风行。因逮捕贪图不义之财的汤玉麟部下宋某，发生了军警两界的冲突，成了张作霖与冯德麟朋党之争的导火线。为避免汤的加害。亦为试探张支持其改革警政的决心，托病留下辞呈，回到金州。

袁世凯宣布以是年为洪宪元年。在全国的一片声讨声中，遂被迫取消帝制。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日本寺内正毅组阁，主张支持张作霖。

民国六年（1917丁巳）46岁

张作霖平息了冯德麟和汤玉麟联合倒张事件。恢复了王永江的职务。5月，因王树翰的辞职，转任奉天财政厅长。当时的奉省，金融紊乱，开支全靠外债，已窘困到极点。

民国七年（1918年戊午）47岁

4月，兼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经认真调查研究，摸清积弊原因，特立独行，力图刷新。通过整顿官营企业，奖励开垦殖民，整顿税收，压缩办公经费等方法聚敛资财。

同年，段祺瑞派其亲信徐树铮拉奉军入关，助皖倒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徐世昌任大总统，南北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民国八年（1919年己未）48岁

张作霖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任命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已完全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同年，南北议和会议决裂。“巴黎和会”结束。“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49岁

至是年3月，经过治理整顿，大力刷新改革，奉省财政大有好转，

不仅偿还了一千多万元的外债和弥补了每年二三百万元的财政亏空，还有一千余万元的结余。

6月，代理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实行一系列行政机构和人事调整；本着“保境安民，造福桑梓”的宗旨，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兴利除弊，大胆改革。对县知事进行培训，编写《县知事学》，亲自讲授；兴学育才，振兴职业教育；完善基层政权机构；提倡兴办实业，发展交通等。由是，奉省很快出现了“金融稳，仓库足、治安宁”的局面。

张作霖一心扩军备战，问鼎中原。直皖战争爆发，为助直倒皖，奉军投入战斗。皖系失败，奉张与曹锟拥护靳云鹏组阁，直奉共同把持北京政权。

民国十年（1921年辛酉）50岁

张作霖以蒙疆经略使名义，借机扩军。后与皖系修好，在北京组织梁士诒内阁。对张的迷信强权，置人民于水火的行径，竭力反对。与张作霖政见开始分歧。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民国十一年（1922年壬戌）51岁

春，开始筹办东北大学，任筹委会主任委员。

4月，奉军入关，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军失败，退回东北。张作霖宣布“东北自治”，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断绝关系。6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响亮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的口号。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旅大运动。

7月，张作霖再次任命为奉天省长，然只允代行。给杨宇霆的信强调“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表明自己反对内战的态度。

是年，张作霖在杨宇霆的怂恿下不顾王永江的反对，为内战而成立了东三省兵工厂，购进大批外国设备，耗资数百万。还在奉天成立了陆军粮秣厂等。张作霖联合孙中山，组织了孙（中山）、段（祺瑞）、张

(作霖) 三角反直联盟。国民党再次兴起，在广州组织政府，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宣布北伐计划。

10月，公布实施《奉天省区村制大纲》及《附则》，建立村公所，实行保甲制度。

12月，主持制定《奉省新学制大纲》，规定小学、中学均为六年制，大学为四至六年。民国十二年（1923年癸亥）52岁。

1月，为节约，下令“大幅度压缩县区行政经费”。

2月，回金州过春节时，对家乡父老言：金州地本属民国之奉省，租期二十五年已到，外长要求日本政府交还“关东州”，至今不果，我这个省长的家乡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实感惭愧。

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任校长。任命大学文、法、理、工四科科长和总务长。亲自主持聘请教授、遴选职员，拟定课程标准，草订办事细则和招生等项工作。招考预科学生共310名。

6月，主持召开财经会议。决定停办银元奉票交易所。指出，有交易所钱法先遭紊乱，奉票变为日本人在交易中的一种投机商品，为害兹甚。为统一东北金融机构，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与东三省官银号合并，仍称东三省官银号，资本总额为奉大洋二千万元。自此而后，奉大洋币值稳定，实力充沛。

7月，顶着日本政府的高压，在沈阳投资450万元，设立奉天纺纱厂，此为奉天最大规模的民族工业，当年即获纯利奉大洋30万元。

8月，为甄试知事派员赴辽沈密查24个县。同月，发布命令，严督各地警甲查禁鸦片。

10月，参加东北大学开学典礼，题写了“知行合一”匾额。

秋，发生了“临江设领事件”。在奉吉两省各界人士的坚决支持下，奉天省政府坚决拒绝和日本人谈判，终于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12月，为整顿钱法，决定：（1）由奉天和各银行支出大洋2500万

元，鼓铸 2 角，5 角之大洋补助货币；（2）明年起以大洋为本位；（3）限定各银行纸币发行额度；（4）各银行长期贷款，须在已收资本的五分之一以内；（5）非实有资本 300 万元以上者，不准设立银行；（6）非实有一万元以上资本者，不准开钱铺；（7）由省公署等部门选派人员组成调查会，随时监督调查等。上述办法在奉、吉、黑三省一律实行。

是年，个人募捐积款在奉天小西边门外，创建了奉天公立医院，任总裁。

奉天军费开支为 2040 万元。占财政支出总数的 81%。

民国十三年（1924 年甲子）53 岁

1 月，召集东三省军政官员，举行发展经济实业会议。决定三个月内三省集资 2000 万元，用以设立 10 处官办工厂，20 处采矿场。扩充呼兰制糖厂、沈阳棉花厂、鸭绿江木材公司、本溪湖煤矿。自行开采鹤岗、烟台、穆棱等煤矿以及利用英国资本开采阜新、北票等煤矿。同月，为维持金融稳定，再饬各县查禁私帖。

5 月，为了和日本满铁竞争，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创办奉（天）海（龙）铁路。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任委员长。同时，对东北铁路、交通、电信等事业进行统一管理。

2 月，由于旅大转租日本的期限已到，而日本拒不归还，故以个人名义照会日本总领事，要求收回“关东州”，被无理拒绝。

5 月，写信给杨宇霆，反对召开“三省乡老会议”。

7 月，以目疾回金州省亲治病。

8 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通电援助卢永祥反对直系军阀。张组织讨直“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奉军分别向山海关、朝阳进发。

9 月，奉军突袭朝阳，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奉军挥师入关。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成立了由黄郛任国务总理的摄政内阁，被任为内务总长（未就）。

是年，孙中山派汪精卫，路孝忱执其亲笔信赴北京面见张作霖，商

讨联合反曹等问题。亲自动手安排了援助孙中山一百余万元。

由于奉军入关，当年东三省军费开支为银元 7032 元，占全年总收入的 95%，几陷东三省人民于绝境。

民国十四年（1925 年乙丑）54 岁

3 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是月，《铁龛诗存》四卷本结集，28 日，通令各县知事转饬各该管区村会，将本年春季应行条陈书之意见，限时报省，以便采纳。

4 月，为禁烟，饬东边道尹，将境内罂粟严行铲除，并准人民举发给赏。同月，在《东三省古迹遗闻》一书序言中，主张“发扬国光，为山河增色”。

5 月，官商合办的“奉海铁路公司”成立，委王镜寰为总经理，资本为奉大洋 2000 万元，股份官商各半。30 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6 月，全国各地掀起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

9 月，为及时查办枉法殃民，营私舞弊的恶霸乡绅、道尹、知县、税捐局长及各机关人员，在奉省公署门前设“密状匣”。同月，为积谷备荒，通令各地建立义仓。

11 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前线倒戈反对奉张。为挽救败局，张作霖与日本达成了“日张密约”。主要内容为，承认日在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自由居住权；将间岛（延边）地区的行政权移交日本；日本在重要城市可设立领事馆，三省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等。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出兵援张。

王永江事后，得知密约内容。惊愕之余，找到省议会议长张成箕，指使召集议员开会反对密约。并向新闻媒体透露。嗣后，借口政界反对，与日本人周旋。经过艰苦努力，挫败了日本的阴谋，终未兑现日本提出的条件。

12 月，张作霖在日本军队支持下。在巨流河击败了郭松龄军。

郭夫妇被毙。

是年，奉天纺纱厂获纯利奉大洋 143 万元。

民国十五年（1926 丙寅）55 岁

2 月，请假回金州探亲。

3 月 1 日（正月十八日），为抗议张作霖穷兵黩武，称霸中原而不顾人民死活，向张作霖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只保留东大校长一职。《辞职书》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国人争相传诵。同月，段祺瑞下令枪杀爱国请愿学生，造成了“三·一八惨案”。是月，为金州北屏山佛爷洞撰重修碑记。张作霖委督办吴兴权赴金州劝复出。

4 月，奉军入关压迫国民军，“南口战役”发生

7 月，东大工科又设立了采矿系、冶金系和纺织系。18 日，张作霖赴旅大。在访问日本关东厅儿玉长官等以后，欲与晤而，促其出山。然其不肯趋谒。张作霖在金州站停车久候不至，怅然归奉。

同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攻占了武汉。张作霖在奉军将领韩麟春、张宗昌的拥戴下，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的职务。张作霖再次控制北京。

民国十六年（1927 年丁卯）56 岁

春，张学良受张作霖的委派，以探病的名义，亲赴金州，婉言劝其出山。与张学良座谈移晷，也使张学良对东北政局有了新的认识。

2 月，张作霖派张宗昌部队沿津浦铁路进入上海，派张学良，韩麟春进军河南以对抗北伐军。张作霖发表“讨赤宣言”，并和蒋介石互派代表南北妥协，共同“反赤化”。在 15 日的日记中，对张作霖的“讨赤宣言”予以痛斥。

3 月 11 日，奉票大幅度暴落。21 日，所著《易原窥余》出版发行。28 日，张作霖在北京遣官银号总办彭贤（相亭）来金州，促其出山相助，或在北京组阁，或为奉天省长，听任自择。以“政见完全不同，”出山“绝谈不到”拒绝。是日，张作霖在北京下令绞杀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8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进入河南的奉军被北伐军击溃。23日，彭贤再次受张作霖之命，从北京赴金州，恳请出山，被拒之。28日张作霖向王永江发出效电，盼其晋京一晤。遂以“政见不改，碍难相助”以辞之。

6月，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讲和条件。要张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为国民军，被张拒绝。孙传芳拥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15日，所著之《铁龛词》付梓。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并发表通电，称愿联蒋反赤，停止内战，共同对外。在21日的日记中，对张作霖的行径，表示极度的轻蔑，并指出其行将覆亡云：“张雨亭就任大元帅职。人之将死，强作回光，此之谓也。”

7月，与段祺瑞在大连会晤。同月，为了制定对华政策，日本在大连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其主要内容为：1. 东三省为特别区，有扰乱者，日本愿以武力维持治安；2. 东三省当局须承认与日本有特殊关系；3. 东三省须承认日本有特殊权利并公诸中外。其后，日本驻华公使，向张作霖提出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并向张索取特权。东北各地民众集会，反对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和行动。

9月17日，彭贤再受张作霖之命恳请出山，复信拒之。同月，黄炎培来金州晤见。

11月1日，病重。满铁派来日本医生治疗，遂去世。张作霖追赠“勋三位”并颁五千洋元治丧。

12月7日，葬于金州城东肖金山南麓之祖阡。

资料来源：张松石《王岷源先生年表》

附录二

王永江致张作霖辞职信

十五年阴历十八日致张作霖

雨亭将军大鉴：

签为才弱事纷，留职无益，请开去本兼各职事。窃永江从事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正德厚生根本之图。唯是将军督奉之初，岁入不过千万，全恃抵借债务，以济军政各费之不足，故债累日深。自民国六年，任永江以财政重责，勉竭愚忱，不辞劳怨，得以财政日裕，内外债渐次偿清，度支由是以不乏，此正艰难缔造之时也。然枯竭始苏，余款无几，仅办轻而易举者数事。至十一年，又俾以兼任省长，节用剔弊，岁入益增，达三千万，而至四千余万矣。乃又值时局不靖，战端屡开，知进而不知退。而卒因军事之牵动，致金融紊乱，且犹复牵动不已，则一切希望将难达到。民生日蹙，复何以固根本而图发荣。夫金融财政，为万事之母，东省西连蒙古，地大物博，仅凭此有限之财力，即使收神返顾，专精致志以经营之，犹非数十年难以尽举。诚使以将军之雄才大略，用之于此，未始不可泱泱乎称东北之大风也。今观将军之心，竟在彼而不在此，得毋借著为筹者，计有所失乎！郭叛以后，非数年休养生息，难复元气。夫时局如此，简练军实，自属必要。然备兵自卫，与逞兵争雄，则利害相反。昔管仲治国三十年，始一用兵。燕昭礼士十九年，仅乃报齐。汉武连年穷兵，卒有轮台之悔。古之明王贤佐，犹且如此，况中原兵交方始，民生雕蔽之秋，独东省一隅，最得地利，本足自强，无待外求，而不速为图之。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

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年来屡值危疑震撼之局，永江劳精疲神，致左目失明，心脏漏血，或愈月而一病，或一月而数病，勉力支持，非不自惜也，顾桑梓之邦，忧心独切，不遑计一身之安危。非见利则趋，见害则避者之比也。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诸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使永江在职，不过（等）于脑满肠肥之一大官而已，无益于桑梓人民，并无裨于将军也。如其进而违心求合，不如退而藏拙蓬门，倘将来时局变换，有可以实修内政之时，苟余年未尽，尚可勉效驰驱，今非其时。务请开去本兼各职，另简贤能，不胜感激之至。

三月一日

十五年三月五日致张作霖

上将军钧鉴：

来电敬悉。永江前呈辞职，非畏时局之难，亦别无难言之隐。唯前呈所谓实业、交通、屯垦、教育、吏治诸大端，皆非财莫举，而财政尤非金融稳固莫办。今凡关于军事之繁费，皆不论有无，随便向官银号支取，是以金融紊乱，财政亦无法整理。若就此缩小军备，尚非三、四年之期限，不能恢复。今军备之扩充如故，兵工厂之消耗如故，粮秣处之铺张如故。况间有向外国购械之事，而一切之浪费，更无论矣！试问，凡此诸款，从何而来？区区盐款，不足二十分之一耳。

夫官银号之票额，贷给商民，随时可以归还，今尽入以上消费之途，而无归还之法，奉票安得不失信用，而日益低落？奉票愈低，则经费愈增。譬如，从前用一千万可以足用者，今非二千余万，不能相抵。财政安得有充裕之日？事实相因，了如指掌。不思远虑，但快目前，即使军备增至数十倍，兵工厂增至数百倍，粮秣处增至数千倍，而财力耗竭，奉票废纸，人民破产，不待人之来攻，而奉省已不能自为生活矣！虽增至十百千倍何益！此自杀之道，尚何有于实业、交通、屯垦、教育、吏治之可为哉！此永江为将军后世计，为桑梓祸福计者，不亦远大

乎！人言：乱世人才，皆不祥之物。永江之不愿留职，盖不甘居为不祥之物也，非喋喋利口之比也！若将军能幡然改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作生产事业，汰粮秣处之冗费，撤骈枝之机关，裁冗滥之亲员，节用爱民，省财力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政，永江虽竭尽驽钝，死而后已，又何所辞。此无待再计而可决者也。否则，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入荆棘，人民之陷入水火，唯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掬诚布公，不暇择言，唯将军图之。

永江再呈。

三月五日

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张作霖

不晤将军一年又二月矣。想履纊嘉祥，为颂为慰。

三月廿八日，彭总办奉命来访，送达盛意，感激实深。夫我之去年辞职，非不欲相助为理，乃以政见不同，不能不自明去就。然亦为三省久远计，非为一身计也。不过有小人中伤之言，用惑听闻耳。唯此一年又二月中，无日不以三省安危为念。今不以直懇为嫌，遣人劳问，自不能再伸愚见。

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存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生死存亡之机，豪杰之所以宜究也！古今凡图大事者，莫不先植生存之基，避死亡之渐，外审大势，内定大谋，而后乃利用时机，可进则进以图功，不可进则退自以保，以和于国人。谚云“旁观者清”。今以旁观者之见衡诸大势：南军蒋介石主意尚较稳健，而过激之左派犹不能相容。倘蒋倒而左派势成，则南北和缓愈无希望。彼抱其过激主意，非推倒一切不止。晋军冯军皆彼党援，国民运动，南北一致，一蚁溃堤，防不胜防。乃欲以孤立无援之众，处四面皆敌之中，不可谓势之安也！三省民生日困，金融淆乱，政象所趋，根本动摇。倘有奸人利用，民众暴动、复将安归？蜂虿有毒，民言可畏。当元气斫丧之余。冒外撄群敌之险，不可谓计之得也！纵使兵精械足，尽有江北，而

祸机四伏，为患更深。十四年苏皖事起，郭遂倒戈，内外鼎沸，岌岌濒危。虽侥幸转圜，然可偶逢而不可常恃也！殷鉴非遥，来日之难，更有百倍于此者，不可谓时机之堪利用也！此可退而不可进，宜自保而不宜进争之时也！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与将军十年相交，情礼兼至不愿以诺诺相欺。夫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争胜负于生死之顷。此小不忍则乱大谋，非远虑深算能屈能伸之道也！如以愚言为合于时势，幡然变计，则第一宜速回辽东，节财用而爱人民，屏小人而登贤俊以保根本。第二，请另决彻底改革方针。如政见相协，江虽不才亦必竭驽钝以相助。此后出处，仍视政见如何为转移。不知将军之政见今复何在也。昔钟离者对齐宣王曰，大王不用妾言，安用妾身？今反不如一嫫母乎！军事妨害民政，非断然改革，无以为善后之谋，将军其有意乎？

民国十六年三月廿八日

资料来源：《王永江纪念文集》

附录三

《县知事学》^①

官吏之一呼一吸直接与人民之痛痒相关，且官吏如缺少道德，其一言一行自身即不能辨别是非。若彼贪官污吏者，当无容身之地也。即偏于圆滑习性者，亦频频造成不明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也。用人徇私，不问才学；处事尚巧佞、缺真挚；习性偷安，处事缓慢；自以为是，耳目受蔽于婢仆，凭阿谀以定善恶，深居简出，不知民间疾苦；鼓唇弄笔，以铺陈文书而自喜；至甚者，使用奸臣，驾御污吏，暗中操纵，形成恶习；凝神于亲吏杂役之交际应酬，相摹陋习，吸吮人民之膏血，冗员闲吏日益增多，事务益愈旷废；只作一纸空文，盖不关心庶政，为民父母之官吏如斯，羞耻善恶之心何在？揣其心事，或若一事无为，则可不招人怨，易保禄位；整日处事真挚，必招众人诽谤而有蹉跌之虞也。巧宦之心，余得揣也！然尸位之咎，孰能恕之！现将考核方法列举数条，凡供职地方，为亲民之官吏者，宜速将其熏染之旧弊除掉，共同开辟新生活。

盖今之官治非无恩无为之官治，今之人民非不知不识之人民。政治不修，如何指导启发人民之自治耶？如举民治，官僚不贤者必失其禄位，此乃瞭然也。图安禄位愈切，则修明政务弥深；蹉跌之虞愈深，则当克已精励也。至于鹰裘之谤，孰杀之讥，虽古人亦终有感悟之日也。何况事实无凭毁誉褒贬，今人岂无鉴察之明乎？明不犯法，暗亦不敬神明，切望劝戒官吏，速除诽谤。余冀望属僚自重，实乃切也。

^① 很多学者认为王永江所著《县知事学》早已佚失，笔者在辽宁省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时有幸查到原文，以飨读者。

敬老贤，正人心

邪说蠢起，道德论胥，论自由平等，诋毁圣贤之风潮，传播于社会；僻陬亦受其浸润，万众皆从之，已为人心之大思矣。思及此，如不予以匡正，长幼尊卑之分，礼义廉耻之别，尽将灭绝而不复至矣。为牧民之官者，使民兴孝旺行，如将此纳入轨道之中，唯有敬老尊贤。盖敬老之道，即使民兴孝也。如吾亲自敬老，民必仿之，而以孝侍父母也。尊贤之道在于旺行，如吾亲自尊贤，则人民必传闻兴起。力成贤者。敬一人即劝千万人也。居一方劝一方之人，则人心匡正，民俗淳厚。昔酉伯善于养老而筑基，周公勤于求贤而效治，于国亦然，何况宰相乎！盖人心之邪正，依地方官吏为转移。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仿者”，可不勉乎。

劝财团，振兴实业

为政之要谛，首先在使民足，而使民富，唯靠振兴实业。我奉天土地膏腴，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为各省之冠，诚足以天然之物产兴办各种实业。因势利导，渐次扩之，假以数载，其财力生产之雄厚，必为他省所不及也。

然实业须待资本而后方兴，断非空谈之所能也。而若广聚资本必须组织财团，财团发展之后，资金方能流通。近年来各县储蓄会相继成立，性质虽属财团，然专以营利为目的，而不决心于实业。结果，仅能流传资金，止于少数人营利之用而已。即或吸收大资本，亦无助于社会生产。今后，各知事对既设之储蓄会，务使其从事生产，注重实业；并诱导农、工、商等各团体，个别组织财团，投资者只限地方人民，管理者亦以地方绅商为之。制订详细之章程，以保证其利息：严格监督，以限制其用途，谋求增进人民之财力。然后节制地利，兴办各种产业。即于山地开办矿业，水边兴办渔业，平原开垦农业，沙漠发展畜牧业，而

工艺制造业则可到处兴起。果若如此，则地尽其利，人有取之不尽之材，而财力又有无穷之用途，利用厚生之道即在此也。

宣讲教化

民国肇基以来，为重视社会教育，扩大宣化方法，于省城设立模范讲习所，为各县设立巡回讲演员。其宗旨虽无可，但其讲演者多作陈腐空谈，敷衍了事，无一对地方人民之深切利害，进行情况考察而善加利导者。故讲演者谆谆而谈，听者却马耳东风。方今之时局，徒自纠纷，宛如乱麻。民俗日益颓废，生活日愈穷迫，居民之上者应当速起，筹划救济挽回之策。为各县知事者应以身当之，公务之暇，巡行管内，以简易之词，就地方利害情况，进行剀切之讲解。若是，则地方之年老德高者、学校教员等必闻风而仿之，并将遵其主旨，进行讲演、教化人民而引以为荣。此不仅可使乱苗之莠迁善改过，而且必能消弭地方之夙患，达到宣讲之目的。并能以融合上下精神，革陋习，布新政，皆基于此也。

整理沟渠

周礼中，雍氏掌沟渎浍池之禁，每年三月令司空疏通沟渎作为惯例。此乃沟洫之制，古来亟为郑重对之者也。而后世多所废弃，时至今日，各县之城市，虽污秽积潦亦无留意者。对乡村之沟洫之陋习，更无人讲究。尤为甚者，于田野路旁，堆土挖壕，掘地造坑，专防车马踏人田禾。然而沟浍应如何加以修整，官员则茫然不填，慢然不管。至于群众更蒙然不知所措。究其责，乃人民公德心薄弱，而实则官吏放弃职责，遂致如此也。回顾古井田时代，十夫有沟，千夫有浍，挽近当然难以拘此成规，但应按土地参酌采用也。县知事应以地方责任当局者，从速提倡适当之整理方法，令人民协力经营、修理，妥善加以管理，防止埋没。未修者利用一年三次农闲期间，使用保甲壮丁，由各户出徭役，

实行联村合作，由近及远，划分区域，进行施工，务使逐次进行。若是，既不防碍农耕，亦无必要另筹经费。全管区施工完成后，必须逐年使之进行修补，照此，则沟洫疏通，禾稼可免浸涝之虞，道路田畴皆可受其益也。此实紧要之事，切勿疏忽置之。

严禁村会苛敛诛求

财乃民之心，诛求民财无异于乱民心也。关于官府之政费，原有一定之纳税，人民亦知其当然，如此年久未变。然而唯独村会之苛敛诛求日增月累，如斯，人民有形之负担虽然有限，而无名之负担却无穷也。虽屡次严令予以限制，但各村长之苛敛诛求依然如故。凡一村一会之内，庄稼之保护监管费、车辆费、诉讼费等，每次都实行分摊，而且其分摊额皆比正规纳税额多。村会之事皆于村会亲自处理，县知事不对其干预，如是为之尚可谓之官治乎？然而人称我只有官治专政，而无民治，实乃诬蔑也。各县知事应专心致志，认真禁止并惩办以苛敛诛求而肥私者。同时，对谋求公益者予以利导，此乃自治最古之遗风也。如是，则民可免受其弊，官亦不蒙其害。各县知事应随时对管下广泛视察，进而于僻远村落遍张布告，直至各户，以期彻底。与此同时，务须竭力防止村会之不正。另一方面，为了不得已之需要，乡民自己有此希望分摊负担时，此时首先要作事前申请，得到认可后，公布其用途方可，断然不准有私吞等不正行为。如斯。则历来官民各个皆得一扫蒙受非难与诛求，各县知事所受利泽亦非浅也。

开垦边境与殖民

奉天省土地虽然广阔，但西北各县尽属蒙古荒地，此处开放虽然已有年余，但开垦尚未及其半。内地荒地亦有开拓未尽之处。故边境如不设法殖民，则不能奏效。盖农家购买土地之所以稀少，乃因荒芜之地地价过高之故。最终只有按照地质降低价格；另外开荒农民所以不来，余

认为乃由于土地买占之弊，最终亦得逐次严禁。而且，之所以未能收到更大效果者，则完全应归罪于知事之办理不当。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受命之各知事必须爱民如子，时时巡视地方，民有疾苦，则当予以抚慰；民有情弊，则当予以指正。春期开垦之际，各村应联合相助；收获有余，则应讲求销路，予以处理。村里发生争议时，应以情理指导解决之。其它，要筹划防止旱潦，讲究市镇建设之策，此等事项必须同时谋求实施。若是，则远近土地购买之农家，无不争先恐后前往开垦。其中不宜耕种之地，则可植树造林，发展牧畜，或采集自然产物等，切勿任之荒芜也。如斯，边境未垦之地则可绝其迹，地无弃利，变榛芜之地而为繁盛之域。守土、垦边其责皆重，各知事务须努力奋斗以图之。

慎重举行褒扬荣典

厌污辱，喜荣誉，乃人之常情。得其褒扬者不独其自身之光荣，戚党宗族亦莫不以为荣，此乃使懦者起、愚者立之妙用也。而且，用此如得其道，则收效甚大；然而，如用之不得其所，则感化亦少。今绅缙富豪虽无应予褒扬之事实，但不问是非，不察真伪，一旦提出申请立即上报，则未免失之轻率。与此相反，其人已逝，风教微薄，而对其不加注意，则未免失之怠慢。如若轻率，则等于盛典空文；如若怠慢，则为疏忽，从而必使贞妇孝子沉沦于尘巷也。其如古之谒庙、讲经、吾宾、乡饮等礼，现已改变废弃不举，成为区区褒扬之法，或等于虚礼。如若轻率对之，将何以能鼓人心，励风俗耶？自今，凡合乎褒扬条例第一条规定，对由其子孙、亲族、近邻中前来申请者，县知事须详加审查，丝毫不得缺乏慎重；而且虽尚未申请，但对其言行确应予以表彰，而乡党之好评亦翕然者，县知事须随时使之写成文件，予以提出申请。断然不可置之不理，任之湮没。潜德应予表明于世，名器不得假借于人。褒扬慎重，而后民皆感激，并达到予民以激励。书经曰：“表彰其宅里，以树

风化。”须知人心及风俗常依其观念而转移，古人购骏马之骸，对蛙表礼，亦有故也。

保存优美之旧俗

东三省民风强毅，习俗敦朴。分省统治以来，文化逐渐开发，男子务耕耘，女子勤纺织；民尚勤俭，士尚廉直。故由于思潮之变化，废礼教，丧廉耻之造者不可同日而语。然最近数年以来，民俗逐渐流于奢侈，欲求从前之淳实朴厚，已再难得。如不火速谋求挽回，道德则将日坏，风俗则将日废，千百年来之立国精神殆将濒于覆灭，念及此实可虑也。然而，良风之养成，乃为政者之责，为县知事者，公务以外，应聚集绅耆，周询博访，所有美俗，皆应予以保存。冠婚、丧葬之礼，岁时祭祀之仪或事亲敬长之规，敦族睦邻之道，无不随地方时代，各有其习惯，应竭力取其中节，合乎礼者务必予以保存。古苏东坡上疏谓：国家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如何，而在其强弱；历数之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于贫弱。治国尚且如斯，何况于县乎？世风不古，美俗易于湮灭，为各知事音当更加注意。

整顿义仓

王制编冢宰曰：“以三十年之通则，作为国用，必得有九年之蓄”。《周礼》大司徒救荒之政有十二，“其筹之者预，其备之者周，故虽有水旱灾，而民无菜色。”挽近之世，不讲仓政，疏于用人、补救凶歉，委之于天。虽然移民移粟，但其计也拙，徒然劳心而已。虽讲减免租税，但有名无实，饥饿严重来临时，人民流离失所，饿殍满途，实令人痛心者也。奉天省自民国三年以来，命令所属，计划实行积谷，以使仓库积蓄富裕。如此，各县相继送文章程。继而，各道尹呈送积谷办法大纲，皆经过审查，命令试行。各县虽情况不等，规划各异，但总之要旨一致，不外仿效常平仓社仓之遗制，储蓄粮食于仓库、春季予以贷给，冬

季返还。丰年加利息二分，逐渐增加谷商，而凶年欠收则减免利息。遭灾地区则予减价出售。如斯，历时数年，各县已予以实行，其中亦有详报情况者。尚未实行者，仍徒然迁延时日。若此，长期荏苒时日，焉有成功之望耶！自今而后进一步规划区制，各县已实行者，须更加努力谋求扩充，尚未实行者，亦应火速计划实行。按区成立后，各氏负责执行之。每年六月、十二月令管理员将出纳谷数及经过事实报告之。如此长达数年，谷仓则呈现出尤如栉墉之象，从而饿民之叹声不再闻之于野矣。

监查学塾

西哲有云：“不完备之教育犹胜于无教育”。本省兴学以来，教育者有识之士，因私塾腐败而予以驱逐解散。此时，寒村僻地皆无学校设置、无数学令儿童，虽欲求读书之地而不可得。此乃因教育尚未普及，有识之士甚少之故也。且禁止私塾又过严，故无学问之寒村，愚昧之乡人，设私塾而贻误青年，为害甚也。夫普及教育，乃以使国民获得常识为宗旨。私塾之教育方法有所不善，虽谋求予以整顿改良，尚不足以补救学校之不足。今如求救济之道，唯有酌情许可私塾之存在，对私塾附以一定之名称。如以某乡、某村、某县或其街立等名称，以示区别。并使用一定之教科书，此书现正由本署委员编辑中，该教科书编成之后，立即印刷发行。关于私塾教师之采用，当局须进行严格之选定。对学生应给予与学校之学生以同等待遇，并令各视学负责随时与官、公诸学校同样进行监督，其良好者予以奖励；不良者进行指导纠正，以使学塾与学校纳入同一轨道。于普及教育上勿失其功也。

禁止豪族交游往来

古时，地方官吏能限制豪族；而今，豪族竟致操纵官吏。因此地方官吏不论其贤与不肖，皆孜孜以求经常与豪族交游。夫贤者，其往来交

谊深而荒废公务大；其不肖者，更竭尽忠欢而与一切人相联合。若与其中之一不相联合，其地位则难保。终因按照贿赂而加大请托，遂致对人事行政之掣肘愈多。如是官吏倚据豪族，并以之为护符；而豪族则以官吏为傀儡也。甚者，顾使其于青天之下，毫无畏惧进行奸恶。然而，一旦被告发，则官位既不能保，而且从来以交游联络恃以为护符者，亦终无任何效力矣。官在治民，如无所欲，则可刚而不惧任何豪族。如内省而无疾，则无可忧疑。如阳藉联络之名而阴行不善，则品行尽皆鄙陋，心亦不正。若是，安能指望廉洁，企求地方之幸福耶！必须以身为社会人民之师表而自觉、自爱。奔走于权门之流，乃昔人以为耻辱者也。管子曰：“士怀耿介之志，不荫于恶木之枝。”其言亦明。据此为禁与豪族交游往来也。

必须注意清查盗源

宋之欧阳永叔曰：“医者之于人，必推其病源，而后治其所受之病。”治国之道犹如治病。奉天省盗贼甚多，虽称难治，但对其防御，除警、甲之外，尚有军队，加之各县联防，其法不能谓之不备。然而盗风依然。何故也？此盖由于尚未注意盗源之故也。夫鸦片乃盗匪之根源，赌博乃盗匪之媒介，无职游惰乃走入盗匪之途，地方之无赖汉乃隐匿盗匪之巢穴。盗匪益繁，盗风愈炽。今日之鼠辈，他日则成为横行之盗匪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等鼠辈日益大胆，组织多数党徒，手持武器，终致与官宪对抗。古来无治盗良法，诛此而他出。而且，欲以一纸空文消除隐患，恐会引起卖刀剑而牛犊之风，此作为古代龙勃海太子之匪贼归定法，虽然有效，然而，今日如以行之，则必为盗匪所嘲笑也。故作为方策得有对症授药之要点，即以清查户籍最为重要。户籍整备，无职亦想求职，如是，五方杂处之民，自身亦可得安居。昔汉之张敞守山阳，查郡九万三千户，五十万人以上，但为盗匪而未能予以扑获者仅二十七人。诚可谓力行之明，其效果大矣。知事以安民为责务，警

甲有防盗之责任，各自须相互致力于职，以期肃清闾阎也。

严谕鸦片赌博之害

对鸦片赌博之害，世人无不知者。一旦感染，由于侥幸，进而想达到欲望之心，使正确之精神被蒙蔽，遂致失去自觉。如是，吸烟者由于精神之兴奋而成痼癖，终于以致亡身。赌博者最初虽不过为了投机之计，但终于导致倾家荡产，此皆因正确精神被蒙蔽之结果也。昔陶侃将僚属之赌博工具投之河中，同时，对牧猪者之奴戏一律予以叱责。因而，人士皆为振奋。又清代之崇实将军，由于对赌博者处以极刑，不良之民尽绝迹矣。今昔世情，虽不相同，但由于风俗上有重大关系而不可放任。将其诱导为善良之风俗，乃为政者之责务也。对鸦片、赌博之案件，不能仅以罚金拘留为了事。当然，对既遂犯应予严惩，即对未遂犯亦须予以严谕，使之知其害之大，断不可置之不理也。周礼有州长、党正、族师等每月择吉日，宣读诸法规，大司寇揭示布告。故民见法规而知惧，见诸律而思刑也。各知事应能学古而入宦途，善识往迹之事，或以俗语张贴布告，编里俚之歌词；或于初一、十五、星期日举行特别讲演：或随地揭示训告，以使各户知之，如能达到直至妇女，皆能熟知鸦片赌博之害，方能排除恶癖恶习，使人人享受其安宁幸福。

广泛争取卫生利益

生存于人类社会，首先要有强壮之身体，尔后方能谋求发展事业。故卫生之事，东西方各国莫不将其列入重要政治项目，对其研究唱导不遗余力。此即保护公众健康，导致社会福利，唯一之道不外卫生之故也。然而，对我国人民之卫生，从来不予研究。故突然谈起卫生，彼等则曰：“吾等秽衣垢食，数世及今而享长寿，岂有注意卫生之必要乎？”然而，人民虽然习惯于积习，但为官吏者必须予以竭力唱导。对住宅、居室、衣服、饮食等一切日用必需品，应尽力使一般人民熟悉卫生之利

与不洁之害，必须预防疾病，保持强健，此乃地方官保护人民责务之一也。

须经常到乡市努力平息斗议

民好诉讼今后不多。因此，祸民之事今后甚少。然而，审判制度为四级三审制，其费用有起诉预交金，如此经过烦琐手续之后，初审审判虽然终了，但其败诉者为了体面，再次上诉以图挽回。如斯，因一小事，而以睚眦反目相争为事。恶吏亦为之干预，小则失业，大则破产亡家，其害实不堪言。此岂非司法改良者能思考者乎。《诗经》曰：民之失德也，皆起因于食物问题，不和之生也，尽因细微之事而起。又，《易经》诉文象曰：君子作事谋其始，谋求平息诉讼，以绝其端为贵。果然如此。当争端将起，仇怨尚未萌芽之际，如能很好讲法，讲尽道理，进行劝告，使之理解，则可能达到相互谅解。一方如能包容大度，另一方对手自然会产生悔悟之心。如斯，则可得正本清源也。县知事应以亲民之疾苦为念，知事如能善于职守，竭尽其责，人民则可得减少诸多疾苦也。今后，各知事要利用政务之暇，巡行乡市。有由于婚姻财产等细微问题而引起争吵时，应竭力予以平息，以勿使导致诉讼为佳也。而老年、硕德、缙绅等之士，能善于驯化良风，要使彼等致力于驯致和睦之风习，而成为地方之师表。同时。须对得意奸顽兹事之不良之徒，或进行诡计教唆，恣意诈骗之徒予以最严厉之惩罚。孔子曰：听讼时，须善处其人之位，予以思之，这样，则必不应成讼。为各县知事者，此言应三唱之。

访耆老，探民意

政治之道首在赈民。而恤民之道在于知民之所欲言。而知民意以访乡间耆老最为适当，凡对下情上达者，须忠实询问耆老，而后方可得而知之。然而，不得其人而询之于豪强者流，彼等出于自己狡黠之见地，

而徒然进行献媚之言，不啻不幸于民，反而伤民。若年高德重之耆老，阅历深、慈心重之士，明知利害沿革，经常身处其境。故能详细剖析为所直言也。吉林文忠为通民情，闻己之过，写成八字书联。以为自惊。有一王辉祖官，做容言簿，有关自己之绅士之言，无所不记。本署冕曰民国八年十一月通令各县、选其乡耆送之晋省，询问地方情况，亦按照其要旨也。然各县距省城远近不一。而且一省之长官征询全部既有困难，而且即使询问亦多所遗漏。如斯未若由县知事随时随地，予以访问更为剖析妥当。今当推行自治之际，广知民所欲言最为重要。如是所是，可资施政方针，以除闾阎之疾苦，并涤地力之积弊。可宣上德，通下情，切勿忽之。

特殊农产品之唱导

东三省农民历来对农作物播种插秧，不论其土质如何，除种植豆类、高粱、粟、黍、麦等诸谷外，其经营特殊农产品者不仅稀少，而且对其研究亦不充分。不知特殊农产品需要之大，而且优良者盈利亦高。如马铃薯能制造酒精、靛青能做染料、烟叶可做纸烟的原料。落花生为榨油的必需品。其它，棉花做织布外，主要还能造火药，大麻之纤维亦能织布。而且，此等诸农产品皆一日不可缺者也。故如能善于从事其种植，所得其利必将无限。而且，于东三省由于对此类产品毫无竞争，终致由其它地区供给，诚痛惜之至。各县对于属官应除掉地位、亲戚等观念，特别选出具有特殊农业知识和经验者，使其对适合土地之谷物进行充分之研究。如有适于某种特产品时，应竭力予以唱导。资金有限时，担当唱导实行之责者无妨采取募集股份。如能诚心努力予以办理。尽量不流于空谈，则必致地力大兴，民亦可受其恩泽也。

修筑堤防

关于各县内之河流水患必须讲求防备。一旦大雨来临，山洪暴发，

河流泛滥，则如同以空葫芦筑起之房屋，投美玉，沉白马，斩淇竹以筑堤等，无论讲求何策、尽皆晚矣。我奉天省河流之大者，有辽河、凌河、柳河等。次之，有太子河、范河、养息牧河、亮子河、清河、柴河、洮河等。水患虽然不常，而一区一段之被害，累积之，农民所受之害，亦诚然大也。故各县知事应亲自予以视察，按其情况，采取适当之修堤方法，为人民讲求预防水患之策。人民亦当自动前往施工。此时各知事只付出指挥唱导之劳足矣。然而经营一旦开始，其利害如有迫切者，彼等自己辛苦亦能忍耐而无怨也。如斯，则可除民害、增民福。故应竭尽全力，谋求予以计划达成之。

尚俭德

左传曰：“俭者德也。”论语曰：“俭以养廉。”古人处身循规。此乃立身之法则。而一旦出任就官，则推之而为治民之准绳。良吏贤宰无不以尚俭为重者。人心所求尽皆同也。凡一族之家长无不厌其后继之奢华，一乡之耆绅无不愿其乡为之敦朴也。其势导之，则甚顺。其情唱之，则必通。为县知事者，何苦而不为之耶！此乃亟易之事也。近来纲纪废弛，习俗日沦，大自冠婚葬祭之举，小至宴饮之微，一掷千金，毫无吝啬，辗转相仿，已成惯习矣。如斯，伤廉而驯致无耻之风事，相继发生，追究其根源，此皆亟尽争相奢侈之故也。我奉天省夙以朴素而闻名，而近来逐渐染上奢侈之风，民间之应酬，衣饰用品无不争奇斗艳，今与昔比其差异实无可得而知也。究其过，乃地方官对人民之奢侈，放任不理之故也。今后必须亲自率先带其僚属，提倡朴素之风，诫绅耆力矫华丽之习，一切要贫而知俭，使之无流离失所之虞。富不奢而好义，以期产生救济社会之念。如斯，育美俗，国基亦可得固也，望百司共勉之。

讲究农业

东三省地质肥沃，人民质朴，善耐劳，最适合于农业。查民国三年

农业生产总额，亦可得知其生产力之丰富也，故须知之，应善于指导，加以研究。

然而，于具有六万余平方公里面积之广大地域，农业从来未得振兴。当然，系由于民智幼稚和耕种方法粗陋，但执政者不予注意亦实为最大之原因也。诸如美国卡达伦卿之讲演终奏庶民富裕之功。日本北海道屯田兵之实习，竞收丰饶之效。若此者实例多矣。将来以口语体出版一部农业通说，虽欲广为传播，但各县知事如不予以努力实施，则终将成为空文而已。此亦行政之一要事，各知事亦不得轻视，而须竭力为之。

随文明之进步，需要日愈增多，商战亦变得激烈。具有力权之国家皆与此相关也。苟吾放任，人必侵之。东西各国对其商业悉取保护政策者，皆为此也。奉天省位于东西交通之地，已成世界商业之竞争市场。试观当今商界之一般状况，不仅输出未能增加，国内贸易亦不发达，海外贸易实权终被他人所掌捏。此固然于商人之知识有关，但由于对其保护指导之责丝毫无所研究。如斯，即欲谋求进步，岂可得哉，各知事应就物产状况和社会需要，详加计算，输出如何予以保护，贩路如何谋求予以扩充，资金如何使之运转，运输如何计算，方期得以便利，务使商业经营等能获得实利。利之所在，人闻之自当奋励兴起。东三省土地广阔，物产丰富，如经营得当，操纵合法，必可得旭日升天之势也。

如此，不仅只谋取单间之间庶民之富，而应谋求四方财货之流通，利国惠商，将无止境也。为地方官者勿再以商人为鱼肉，应尽保护各商业之责也。

奖励工艺

泰西各国亦于二百年以前，发明新学新法不少。一旦开英国人培根之新例，对能制造新器著作新书之有能之士，国家皆予以奖励，以保护其特权，自此以来，欧美人士争相钻研于讲求新法。结果，每年新利器

之发明，新书之著作接续而出。利器达二千余种，新书达二万余种。盖人智由于相互磨炼而进步，才能由于相互竞争而显现。为此说者曰：“泰西富强之源全在此也”乃非过言。东三省人民聪明才力非劣于欧美人也。我工艺之所以尚未日愈优良。非人才缺乏，实因无奖励法之所致也。人性尚美，各国同然。“器尚新”古训有所教也。故物之精粗，式之新陈，所关其销路及价值大矣。我匡人墨守旧规，不知改良，因而工艺之竞争日趋劣败，利权外逸，前述诚堪忧惧。尔后，各知事对能制改良品或行特别发明者，依照《工艺品奖励暂行章程》进行奖励外，对其新发明品持珠予以免税或于特权，或向商埠集镇提倡予以购买，或乘原料价格低落，使之准备资金，购入原料，或做宣传广告，或使当局官厅尽力予以保护。同时根据情况，举行工艺展览会，讲求以资观览奖励等有效方法。如斯，工业前途尚可有所期待也。

资料来源：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全宗，第4060号卷。

附录四

《王公神道碑》志

《王公神道碑》，全称《内务部总长奉天省长勋三位王公神道碑》。原位于金州城东之萧金山南麓王水江墓道东。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此碑为汉白玉质，有额，龟蚨座，今已全毁。依据拓本，碑纵170、横65厘米。碑文楷书，计二十三行，行六十四字。新城王树枏撰文，吉林成多禄书丹，辽阳袁金铠篆额，北平刘璞刻字。

现据拓片将碑文加以标点移录如下：

内务总长奉天省长勋三位王公神道碑

新城王树枏撰文，吉林成多禄书丹，辽阳袁金铠篆额

公姓王氏，讳永江，字岷源，原籍山东之蓬莱。始迁之祖曰国祿服贾辽东，遂徒居金县。三传至讳兴富者，是为公之曾祖。兴富公生作霖、是为公之祖；作霖公生公父克谦，字益芝。娶邱氏，生丈夫于二人。公居长。次永潮。以优贡生朝考一等，授知县，未几病亡。初，公与弟幼同就傅昕夕攻苦，博洽群书。兄弟间自相勵勉，弱冠即以县试第一补弟子员，旋食饩，以岁贡起家。公风骨峻整，才力兼人，平生嗜读经世有用之书，而尤精于综核；每任一事，期于必成，无顾虑踌躇之态。韧以府经历任辽阳警察所长。仆强植弱，法成令修。总督锡公奖为全省警政第一，以防疫劳保知事。武昌变起，海内糜沸。奉省二三不逞之徒乘势麻起，大局岌岌不可支。总督赵公以公有应变才，调参机务，擢升知府。是岁除夕，革党陷铁岭，檄公戡之。不数日，乱定收复全城。当道伟其功，保署奉天民政司使，未就。民国初元权兴凤道，日韩

交涉之案层见迭出，公理争舌战，不为屈挠；寻以病辞归。大总统袁公闻其名，招入京，以道尹存记。时奉省新政繁兴，需财孔急。公长于会计，檄办辽、康、牛、海榷务。既调省城税捐局，兼全省官地清丈局长并东三省屯垦事宜。五年四月，今大元帅兼长军民两政，以奉省为神京重地、介日俄两大之间，急图自强。为保境绥民之策，乃嘱秘书长袁洁珊金铠为举通省贤豪魁杰；有为之士，各抒所长，以分职任事。袁公者，辽阳名宿，号知人，今大元帅所重者也。于是举公及孙君百斛等数人，畀以重寄，而俾公长警务兼全省警察厅长。公躬亲校课，手订章程，以次贯彻，悬为世法。明年，调长奉天财政厅。先是财政告匮，积亏赏贷；外债至不能完其负。公至，严核税捐，动疵栉垢，探污吏之口出其食以输之。公并定比额多寡，以为官吏赏罚。故税捐之数，不取加于民而取之中饱，岁增巨万。不数年，宿逋悉廓清而粟溢于廪，钱溢于库，足兵足食，公私有余。自是设兵工厂，大张军备，岁耗二三千万，西向以挫关内之师。连岁战争而器械无或缺供者，公之力也。嗣代省长，益毕诚图治，详求利弊而兴革之，而课吏尤严厉，黜贪奖廉百废俱举。以教育为人才之本，既改创高等小学堂，定学期、学级；更建东北大学以造成材之选；以转运之捷，首在交通，乃造奉海铁路以收利权。又以实业为三省利源之所在，乃立纺纱厂，开煤铁诸矿。次第举行，而司法独立；虽隶中央近则权操省长。公建公署二十余，监狱十余，不假中央一钱。东西诸国考察监狱者，推为诸省之冠。公初受知大元帅，凡所策划，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尝欲就奉省民气财力修养生息，以成强国不拔之基。而数载以来，兵争不已，财竭民殚，时时隐忧破产，前功尽弃。十四年特任为内务部总长，力辞不就，旋以疾归金县养疴。十六年丁卯十月九日，竟以病卒于里第，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始任事也，人言啧啧，众谤交腾。袁公独以公为天下才，力为推挽，公亦毅然不避劳怨，负艰任重，卒成信友获上之功。惜乎！天不假年而以不获竟行其志，其所设施，乃仅止于此也。悲夫，悲夫！大元帅闻之，痛悼累

日。给治丧番银五千，派员致祭，待颁奖词，追赠勋三位，国史馆立传。即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于金县祖阡。公配曹氏，生四子：贤泌、贤津、贤灝、贤澐。女子二，适霍，适倪。孙男二，谔廷、仁喜。袁公为经纪其丧；墓上之刻，则屑树柏为铭，以昭之碑。乃为铭曰：东海之滨，挺生异人。遭会旧迹，观听一新。宏为硕施，石画有伦。公制邦用，首渝财蠹。贪囊累累，俾茹而吐。税有常程，一丝不诛。其负逋，富我公储；既富而教，舍鳞比。舟车大通，飙驰电驶。山孕川毓，有利不訾。金曰公功，公则大懼。人之有恒，出之无度。古人有言，泉竭自中。兵祸不戢，我心则忡。见几不俟，赍志终古。千秋万祀，永闷斯土。

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三月日立石
北平刘璞刻字。

资料来源：《王永江纪念文集》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初读博士期间，我对东北地区早期现代化问题产生了兴趣。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发现关于东北地方政府与早期现代化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对于与张作霖统治几乎相伴始终的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王永江的研究非常零散，因此萌发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清理和总结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对王永江与奉天省早期现代化作系统全面的研究，藉此推动东北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为家乡的史学发展尽微薄之力。

从2005年10月定题到2010年4月本书的最后付梓，前后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如果本书对于研究王永江和民国时期辽宁省早期现代化有所裨益，首先得益于我的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曲晓范教授。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资料搜集、框架构思到最后的文字表述，无一不凝结着先生的心血。先生在自己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依然字斟句酌地批阅我的论文。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先生渊博深厚的知识底蕴、睿智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风格令我受益终生。师恩难忘！能忝列先生门墙，实在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对先生几年来的教诲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与此同时，我要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渤海大学崔向东教授和解晓东教授。在我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期间，两位先生给予我诸多教益，把我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培养我初步具备了独立从事专业研究的能力。在我读博士期间，他们一直深切地关注我论文写作进展情况，给我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并于我气馁时给予鼓励，于我懈怠时进行鞭策，在我取得些许进步时提醒我戒骄戒躁。书稿的完成及几年来在学术研究成果

的取得与两位先生是分不开的。拙著完成之际，向两位先生致以最衷心的谢意！

吉林大学的赵英兰教授、刘会军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周颂伦教授、高乐才教授、程舒伟教授和权赫秀等教授或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或评审我的论文，他们中肯的建议为本书的修改予以极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东北文献文献中心的唐晓天老师、渤海大学的王兴荣老师和辽宁省图书馆王爽老师为我收集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感谢我的师姐、师兄、师弟、师妹以及杨美英、谢晋东、于春英、孙国辉、朱小天、陈颖、杜焕丽、万青宇、刘天辉和李海蓉等同学对我的真诚帮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我所在单位渤海大学历史系领导和教师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的热情支持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最后，感谢我的爱人刘忠。爱人在自己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不仅承担着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且几乎承担全部家务，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研究和写作环境。其中的冷暖与甘苦，两心自知，永难忘怀！

此书虽然付梓，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期待着学界同仁对拙著提出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爱我的人！

王凤杰

2010年3月于渤海大学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46L5rC45rGf5LiO5aWJ5aSp55yB5pep5pyf546w5Luj5YyW56CU56m2XzEyNzEzMjE0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738b\u6c38\u6c5f\u4e0e\u5949\u5929\u7701\u65e9\u671f\u73b0\u4ee3\u5316\u7814\u7a76_12713214.zip",  
  "filesize": 20794046,  
  "md5": "9e172bfa243de18ee2497bdbf48bdf37",  
  "header_md5": "fb3de1c293c4c1b71e03150454c76383",  
  "sha1": "181532c3ddf761c0d62fd0f661b36fed05728ee6",  
  "sha256": "1df994de2ff306fde0ec9a0926646f0755728e05460b9f0a1ffd0b0a16156751",  
  "crc32": 306218886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76570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82,  
  "pdg_main_pages_max": 282,  
  "total_pages": 295,  
  "total_pixels": 111755220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